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

一丁 著



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出版

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

YI TING,
LU XUN ET SON TEMPS

※ ※ ※ ※

Ce volume est le trente-huitième de la BIBLIOTHEQUE ASIATIQUE, collection dirigée par René Viénet.

※ ※ ※ ※

※ ※ ※ ※

Tirage de cette première édition, 1000 exemplaires au format 215×125 mm, 300000 caractères, 380 pages.

※ ※ ※ ※

達道 Achevé d'imprimer le 31-9-1978, par TAT TO en son imprimerie de Kowloon, à Hong Kong, pour le compte de Centre de publication Asie orientale de l'Université Paris 7, Tc 613, 2, place Jussieu, 75221 Paris cedex 05. Dépot légal en France, 3e trimestre 1978.

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

一 丁 著

達道圖書印刷廠
觀塘道三三六號遠東工業大厦六樓

觀察家出版社總經銷
The observer publishers, P.O. Box 2910,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Hong Kong.

一九七八年九月第一版

定價 H.K. $ 25.00
U.S. $ 12.50


1926



靈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闇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

二十一歲時作五十一歲時寫之時辛未二月十六日也 魯迅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
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
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
向刀邊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
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魯迅

目　　錄

長　篇

短　篇

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

魯迅是中國近代文學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人，談他的文章很多，有的說他是「左翼之雄」（郭沫若）；有的捧他爲「文藝工作者的榜樣」（毛澤東）；有的要用他的小說拭屁股（葉靈鳳）；有的罵他自私和作僞（鄭學稼）；更有的要用他的一生，替某種學說作註解（李歐梵）。關於他的書：有年譜，有評傳，有回憶，更有關於三〇年代的爭論，用他作爲政治鬥爭的工具。這一切自然都已與魯迅無關，因爲他早已說過，待到偉大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為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魯迅有他的時代，而且也屬於他一定的階級；時代和階級當然不衹是消極地作爲他生活的一種背景。他對於那個時代，那個階級，都主動地積極地予以反應，抨擊，甚至背叛；但如果稱他爲革命家，中國文化革命的前驅，與李大釗相提並論，這種與事實顯然不符的紙糊冠他一定敬謝不敏。

魯迅確是一個勇士，他能鬥爭，但在鬥爭中不斷的徘徊瞻顧，甚至失望，這種內心矛盾，一直繼續到最後——死。

魯迅不是慷慨悲歌之士，他雖然鬥爭，但作爲一個冷靜的觀察者，不信光明就會到來。對於潛在革命深處的黑暗勢力，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他悲觀，寂寞；他永遠向黑暗攻擊，對未來的黃金世界不存希望，也無信心。

對於魯迅影响最深刻的，當然是一九二七年失敗的革命，這使他的鬥爭改變了一個方向，而且也不再相信進化

論，不相信青年人一定比老年人進步。

但魯迅始終是站在革命門外的人，因爲他說一到裏面去，便嚮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了。

魯迅是應該研究的，他的精神值得青年效法；我想從許許多多附會在魯迅身上的神話中，研究一個眞眞實實的魯迅出來。魯迅有全部日記，有部份書信，有整部著作，他已最好的說明了自己。他並不隱瞞他的思想感情和好惡，他把自己的正反面都暴露在讀者之前，但有人還是要從某種角度去解釋魯迅，譬如馮雪峯，便視魯迅爲革命的化身。

把魯迅看作是和我們在一道生活的人，我們才能從魯迅得到教益；他的文章雖嚴峻，他的生活却一樣有人情味。在他那鐵似的面孔之後，他甚至也有非常世俗的一面，這從他的日記上可以領畧的，日記雖簡單，要了解魯迅那是最好的材料。

我也想從時代的變易中探究魯迅，這方面即使曹聚仁先生的了解也有失之千里的地方。

想探究魯迅，依循魯迅本人的歷史發展，較爲容易，所以我也按照年代來分期的：從出生到七歲入學（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七年）爲童年期；八至十五歲（入學後至父病，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五年）爲幼年期；十六——二十一歲（父死至路礦學堂畢業，一八九六——一九〇一年）爲青年期；二十二——三十歲（往日本留學以至回國，一九〇二——一九一〇年）爲成年期；三十一至四十六歲（辛亥革命——南下到厦門教書，一九一一——一九二六年）爲壯年期；四十七——五十六歲（從廣州至上海至死，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爲中年期。

壯年期和中年期的分界不應照字面固執地看，這是從魯迅生活的段落和時代的轉折姑且如此劃分的。魯迅沒有老年，不只因爲他死得早，而且因爲他精神上年青。有等人過了五十歲，也許已接近老年了。

魯迅的童年

魯迅生於一八八一年，上距鴉片戰爭（一八四一年）爲四十年；中距太平天國之亂（一八五一年）爲三十年；下距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亦爲三十年。太平天國歷時十一年，到一八六二年滅亡，魯迅生前二十年許的天國故事，流傳深遠，對於魯迅的童年及往後民族思想的啓發，甚有影响。

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勢力入侵，亡國之禍，時迫眉睫，生在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有愛國憂時之心，魯迅當然不會例外，這是後話。

可是魯迅還有一個幸福的童年。

魯迅生於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的一座新台門內，據周作人說：這台門共有五進，後面還有園地——百草園。住在台門裏的，自然不祇魯迅他們一家，還有其他五房近族。

據曹聚仁先生的魯迅年譜：這一周姓人家，原籍湖南道州，徙居浙江紹興，迄魯迅已有十四世。他們的先世，原是務農的，到了後來，慢慢地富有了，屬於台門階層的士大夫。到了魯迅這一代，又眼見新舊台門，都在敗落了。

從魯迅以及周作人的文章中，我們可以上溯到他們的曾祖父，即是四代同堂。曾祖父去世早，從他愛種蘭花的癖好看來，他是一個守業的世家子弟。曾祖母本家全稱她「九太太」，在曾孫們的眼中，她是終日畢挺的坐在一把紫檀的一字椅上邊的。

據說這位九太太孤僻任性，當他的兒子介孚公中進士，

報子敲鑼報喜時，她却在裏面放聲大哭，人家問她爲什麼哭，她說：拆家者，拆家者！

後來介甫公果然拆家敗業，不出九太太所料，大概她見得做官人家的興敗太多了。

魯迅對於祖母有很好印象，她大概是個慈祥的老太太。

父親伯宜公祇是個會稽生員，幾次鄉試都未中式，自然進不得仕途。他寡言笑，孩子們少去親近。魯迅生在這樣的家庭，如他說：正是一個少爺。

> 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稀為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去，拜了一個和尚為師了……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長庚』。

魯迅在一九三六年死的一年，才在**我的第一個師父**中，記述這一歲時候的事情。

魯迅出世後，有個保姆長媽媽負責照顧他，她生得胖而矮，襲用了在她早前的身材高大的眞阿長的名字，才叫「阿長」的。她有許多迷信，許多規矩教給魯迅，例如遇到正月初一，清早一睜眼睛，魯迅第一句話就得說，阿媽，恭喜，恭喜！其他例如說人死了，不該說死掉，必須說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裏，不應該走進去，飯粒落在地上，必須揀起來，最好是喫下去，曬褲子用的竹竿底下，是萬不可鑽過去的……

這一切禁忌，都是當時社會風俗的說明。

長媽媽的睡相不大好，一到夏天，伸開兩腳兩手，在床上擺個「大」字，擠得魯迅無法翻身。他久睡一角席子上，又已經烤得那麼熱，推她呢，不動，叫她呢，也不聞。

但談到長毛的時候，魯迅也曾對她發生過空前的敬意。

長媽媽嘴裏的長毛並無邪正之分，只說最可怕的東西有三種，一種自然是**長毛**，一種是**短毛**，還有一種是**花綠頭**。魯迅到大了，纔知道其他二種，其實是官兵，所以長媽媽的所謂長毛，是官匪同一的。她說得長毛非常可怕，他們的話

就聽不懂。長毛進城的時候，魯迅家裏的人全都逃到海邊去了，只留一個門房和年老的煮飯老媽子看家。後來長毛果然進門來了，那老媽子便叫他們大王——據說對長毛就應該這樣叫——訴說自己的飢餓。長毛笑道，那麼這東西就給你喫了吧！將一個圓圓的東西擲了過去，還帶着一條小辮子，正是那門房的頭。煮飯老媽子從此就駭破了胆，後來一提起，還是立刻面如土色……

這故事魯迅聽了並不怕，因爲他覺得和自己不相干，他不是個門房。長媽媽覺到了這一點， 說道： 像你們的小孩子，長毛也要擄的，擄去做小長毛。還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擄。

那麼，你是不要緊的。魯迅問。

那裏的話？她嚴肅地說。我們就沒有用處？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 ， 長毛就叫我們脱下褲子，一排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了；再要放，就炸了！

魯迅料不到她除了滿肚麻煩的禮節外，還有這樣偉大的神力。從此對她有了特別敬意，對於她在夜裏佔領全牀，也覺情有可原了。

但當魯迅知道長媽媽謀害了他的隱鼠之後，這種敬意就完全消失了，不只嚴重的詰問她，而且當面叫她「阿長」，事情就是這樣的：

魯迅小時對貓仇恨，但對老鼠偏愛，他的牀前貼有兩張花紙：一張是「八戒招贅」，滿紙長嘴大耳，他覺得很不雅觀，另一張是「老鼠成親」，却可愛，自新郎、新娘，以至賓相、賓客、執事，沒有一個不是尖腮細腿 ， 像煞讀書人的，但穿的都是紅衫綠褲。他想，能舉辦這樣大儀式的，一定只有他所喜歡的那些隱鼠了。

幾百年老屋中豆油燈的月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老鼠的大敵其實不是貓。春後，你會聽到牠咋！咋咋咋！地叫

着，大家稱為**老鼠數銅錢的**，便知道牠遇見了可怕的屠伯——蛇。

有一回，他聽得一間空屋裏有着這種數錢的聲音，推門進去，一條蛇伏在橫樑上，看地上，躺着一匹隱鼠，口角流血，兩脅還是一起一落的，取來給躺在一個紙盒裏，大半天，竟醒過來了，漸漸地能夠飲食，行走。到第二日，似乎就復原了，但是不逃走。放在地上，也時時跑到人面前來，而且從腿而上，一直爬到膝頭。……

這樣大約有一兩月，有一天却不見了隱鼠。大家吃午飯了，也不見牠出來。再等牠一半天，仍然沒有見。

長媽媽見他等得苦，輕輕地告訴他，**隱鼠昨天晚上被貓吃去了！**

這使他心中充滿了報讎的惡念！

他的報讎，從家裏飼養着一匹花貓起手，逐漸推廣，至於凡所遇見的諸貓。這童年時期的「惡念」，一直保持到了北京以後，「仇貓」的話柄也從此傳揚開來。……

在大半年之後，他偶然得到一個意外的消息，那隱鼠其實並非被貓所害，倒是緣着長媽媽的腿要爬上去，被她一腳踏死了。

他哀悼隱鼠，對長媽媽失去了敬意，這時候他又渴慕**山海經**了。他從一個遠房叔祖的書齋裏，看見了陸璣的**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還有許多名目很生的書籍。他那時最愛看的是**花鏡**，上面有很多圖。叔祖說給魯迅聽，曾經有過一部繪圖的**山海經**，畫着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腳的鳥，生着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作眼睛的怪物。……

從此他念念不忘地想要這部**山海經**，連阿長也來問**山海經**是怎麼一回事。

過了十多天或一個月，阿長告假回家以後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藍布衫回來，一見面就將一包書遞給他，高興地說道：——

哥兒，有畫兒的『三哼經』，我都給你買來了！

他似乎遇着了霹靂，全身都震悚起來，趕緊去接過來，打開紙包，是四本小小的書……

這又使他發生了新的敬意，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長媽媽都能做成功。謀害隱鼠的怨恨，從此完全消失了。

魯迅童年時期的故事，和長媽媽聯系起來的爲多，他的十篇**朝花夕拾**中，有四篇說到長媽媽，他確是長於保姆之手的少爺哥兒。從他對於童年時期的敘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善良的根芽，將來發揚滋長到如何程度！

除了長媽媽以外，還有祖母值得一提，他說：

> 那是一個我幼時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乘涼，祖母搖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給我猜謎，講故事。忽然，桂樹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聲，一對閃閃的眼睛在暗中隨聲而下，使我喫驚，也將祖母講着的話語打斷，另講貓的故事了——
>
> 『你知道嗎？貓是老虎的先生。』她說。『小孩子怎麼會知道呢，貓是老虎的師父。老虎本來是什麼也不會的，就投到貓的門下來。貓就教給牠撲的方法，捉的方法，喫的方法，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樣。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領都學到了，誰也比不過牠了，只有老師的貓還比自己強，要是殺掉貓，自己便是最強的脚色了。牠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撲貓。貓是早知道牠的來意的，一跳，便上了樹，老虎却只能眼睜睜地在樹下蹲着。牠還沒有將一切本領傳授完，還沒有教給牠上樹。』

魯迅小時候，他的母親給了他什麼影响，我們不知道，只在他那篇**我的第一個師父**中，說起他到北平去時，母親還給了他嬰兒時代的銀飾，是那時唯一的紀念。

對於兒童時代的回憶，似乎是年齡越大越分明的，每個人都有這個經驗，魯迅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說：

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喫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唯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即使這種反顧是哄騙吧，魯迅的童年總是幸福的，上面的叙述，都直接引自魯迅自己的文字，但到了他七歲入學之後，即踏入他的幼年期，他就嘗到人生的苦味了。

魯迅的幼年

魯迅無憂無慮的童年，快要過去了。十二歲時，我不知道為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裏去了，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為最嚴厲的書塾。這書塾所在是：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條石橋，便是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着一塊扁道：三味書屋；扁下是一幅畫，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着那扁和鹿行禮。……

先生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着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魯迅雖然初次上學，他却已知道東方朔這名字，而且知道東方朔認識一種蟲，名曰「怪哉」，這是阿長所不知道的，他以爲現在得到機會了，可以問先生：

先生，『怪哉』這蟲，是怎麼一回事？………他上了生書，將要退下來的時候，趕忙問。

不知道！先生似乎很不高興，臉上還有怒色，魯迅這纔知道做學生不該問這些事，只要讀書……

魯迅就這樣拘束在書塾裏了，可是在書塾之外，他可以在大家面前，冠冕堂皇地閱看**文昌帝君陰騭文**和**玉歷鈔傳**，都畫着冥冥之中賞善罰惡的故事，雷公電母站在當中，牛頭馬面布在地下……

他所看的那些陰間的圖畫，都是家傳的老書，並非他所專有，他專有的是一部**二十四孝圖**，一位長輩的贈品，上圖

下說，鬼少人多，卽使不識字的阿長，一看圖畫也能滔滔的講出一段事跡。但他看完後纔知道孝是如此之難，於是想做孝子的計劃，完全絕望了。

他知道「子路負米」，「黃香扇枕」，以至「陸績懷橘」都不難，「哭竹生筍」就可疑，「臥冰求鯉」簡直有性命之虞，至於「老萊娛親」，「郭巨埋兒」，他就發生了很大的反感。

魯迅的批評精神和懷疑態度，可說從小就開始的。他說：那時我雖然年紀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這樣的巧事。他說的是「郭巨埋兒」得金的事。

魯迅幼年時期的懷疑，就在不相信冥冥之中的因果報應。所以他雖然愛看**文昌帝君陰騭文**等圖畫，只是爲的欣賞黑白無常和牛頭馬面，這和他欣賞**山海經**，「老鼠成親」的圖畫是一樣的。從魯迅以後的發展看，在幼稚心靈中留下印象的，祇是富有人情味的白無常，抱着復仇心念至死不忘的女吊（這是從社戲得來的），他能從迷信的習俗中濾出優美的故事，却絕未受到兇神惡煞加於精神的損害。

中國的農村社會，長時期受着鬼神的統治，所以孩子們所盼望的，過年過節之外，大概要數迎神賽會的時候了。魯迅對這有很好的回憶，但是興奮變成了掃興：

> 要到東關看五猖會去了。這是我兒時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爲那會是全縣中最盛的會，東關又是離我家很遠的地方，出城還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裏有兩座特別的廟。一是梅姑廟……其一便是五猖廟了……
>
> 因爲東關離城遠，大清早大家就起來，昨夜預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經泊在河埠頭，船椅、飯菜、茶炊、點心盒子，都在陸續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們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臉色很謹肅了，我知道有些蹊蹺，四面一看，父親就站在我背後。
>
> 『去拿你的書來。』他慢慢地說。

這所謂『書』，是指我在開蒙時候所讀的『鑑畧』。因為我再沒有第二本了。我們那裏上學的歲數是多揀單數的，所以這使我記住我其時是七歲。

我忐忑着，拿了書來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讀下去。……

兩句一行，大約讀了二三十行罷，他說：『給我讀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會。』

他說完，便站起來，走進書房去了。

我似乎從頭上澆了一盆冷水。但是，有甚麼法子呢？自然是讀着，讀着……

粵自盤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開混茫。

…………

應用的物件已經搬完，家中由忙亂變成靜肅了。朝陽照着西牆，天氣很清朗。母親、工人、長媽媽卽阿長，都無法營救，只默默地靜候着我讀熟，而且背出來。

我忽然似乎已經很有把握，便卽站了起來，拿書走進父親的書房，一氣背將下去，夢似的就背完了。

『不錯，去吧。』父親點着頭，說。

大家同時活動起來，臉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將我高高抱起，彷彿在祝賀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頭。

我却並沒有他們那麼高興。開船以後，水路中的風景，盒子裏的點心，以及到了東關的五猖會的熱鬧，對於我似乎都沒有什麼大意思。

直到現在，別的完全忘却，不留一點痕跡了，只有背誦『鑑畧』這一段，却還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

魯迅所說的現在，已是一九二六年了，那時他在北京被段祺瑞通緝，躲在法國醫院的雜物房中，寫這篇**五猖會**的回憶。他表示對他父親的詫異，他當然了解父權制度的威嚴，所以他說要救救孩子。

這種教育對魯迅留有一定的影响，他說：長輩的教誨，于我是這樣的有力，所以我道從讀書人家的家教 。 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

在魯迅已懂人事之前，雖然因入學讀書，受到了私塾和家庭在不合理教育中的精神磨折，但整個的童年（也包括一部份幼年）時期，總是非常幸福的。這種幸福生活特別描寫在他的**百草園**和**社戲**中，實際上**社戲**也應屬於**朝花夕拾**的，這篇迷人的小說，實是他幼年生活的一段忠實寫照。

先說**百草園**，替魯迅寫傳的人，都引用他這節文字，由於描寫的優美，我們自然也不願意捨棄。

>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 ， 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裏低唱，蟋蟀們在這裏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班蝥，倘用手指按住牠的脊梁，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竅噴出一陣烟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臃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牠起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曾因此弄壞了泥牆，却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却比桑椹要好得遠。
>
> 魯迅過了四十年之後說：……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却是我的樂園。

其次是**社戲**。魯迅的「回憶」很少有確切的年份，

這當然是由於童年時期的歡樂是融成一片的、不紀年的，也許幾年中的生活濃縮成一章一節，這點是不值得考據的。即使周作人的文章我也有些懷疑：譬如他確定「隱鼠」爲魯迅十三歲時的事，但仔細讀一下魯迅的**貓、狗、鼠**及**阿長與山海經**，無論如何難以相信，這是快將成爲少年，而且在祖父被囚、父親患病的那年的事。但是**社戲**中記有他的年齡，那時他大約十一、二歲，正當家難的前一、二年，所以他有如此愉快的回憶。

> 我們魯鎮的習慣，本來是凡有出嫁的女兒，倘自己尚未當家，夏間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時我的祖母雖然還康健，但母親已分擔了些家務。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歸省了。只得在掃墓完畢之後，抽空去住幾天，這時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親住在外祖母的家裏……。
>
> 和我一同玩的是許多小朋友，因為有了遠客，他們也都從父母那裏得了減少工作的許可，伴我來游戲……
>
> 我們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來穿在銅絲做的小鈎上，伏在河沿上去釣蝦，………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
>
> 至於我在那裏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趙莊去看戲。
>
> 就在我十一二歲時候的一年，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外祖母很氣惱，怪家裏的人不早定，絮叨起來。……我急得要哭，母親却竭力的囑咐我，說萬不能裝模裝樣，怕又招外祖母生氣，又不准和別人一同去，說是怕外祖母要擔心。
>
> 這一天我不釣蝦，東西也少喫。母親很為難，沒有法子想。到晚飯時候，外祖母也終于覺察了，並且說我應當不高興，他們太怠慢，是待客的禮數裏從來所沒有的。喫飯之後，看過戲的少年們也都聚攏來了，高高興興的來講戲。只有我不開口，他們都嘆息而且表同情。忽然間，一個最聰明的雙喜大悟似的提議了，他說，『

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來了麼？』十幾個別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攛掇起來，說可以坐了這航船和我一同去。我高興了。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們，不可靠；……在這遲疑之中，雙喜可又看出底細來了，便又大聲的說道，『我寫包票！船又大；迅哥兒向來不亂跑；我們又都是識水性的！』

誠然，這十多個少年，委實沒有一個不會鳧水的，而且兩三個還是弄潮的好手。

外祖母和母親也相信，便不再駁回，都微笑了。我們立刻一鬨的出了門。

……一出門，便望見月下的平橋內泊着一隻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雙喜拔前篙，阿發拔後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艙中，較大的聚在船尾。母親送出來吩咐『要小心』的時候，我們已經點開船，在橋石上一磕，退後幾尺，即又上前出了橋。於是架起兩枝櫓，一枝兩人，一里一換，……飛一般徑向趙莊前進了。

至於如何在月夜江心欣賞舞台上的角色和戲劇，如何在回程中偷豆田裏的豆來煮食，因原文太長，無法俱引了。這篇回憶，應該選入中學教科書內，它的確寫得富有泥土氣息，而且有純樸的美。

文章的結尾，魯迅說：真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喫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

除掉看「社戲」時結識的幼年朋友外，在他記憶中永遠留有好感的，那是眞名叫做運水的「閏土」，在小說**故鄉**中，他說：

……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裏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

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閏土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閏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閏土來了，我便飛跑的去看。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這一個小時的朋友，到長大時很使魯迅爲之惆悵的，我們且等以後再說吧。這一篇小說也是值得向青年們推薦的，在舊時代農民如何陷於貧困的無出路中，這篇交織着歡愉和辛酸的小說是最好的說明。

一過了十二歲，魯迅的快樂時期結束了，從此慢慢領署了冷酷的人生滋味，激發了往後的戰鬥精神。

曾祖母在他過完了十二歲的那年舊曆除夕過了世，年七十九歲，她的死只是老衰，她在闔台門六房宗族裏是最長的長輩。祖父得到了電報，便告假從北京囘來，一個月便到了家，他帶了和小女兒一樣大的潘姨太和當時十二歲的兒子伯升一同囘來。過不了多久， 他的家長作風大大地發揮出來了。周作人說：但是這種粗暴的行為，只賣得小孩們的看不起。這時魯迅十三歲，作人八歲，建人四歲。

當時盛行科舉，考試多通關節，已成一時公開的風氣，但究竟需要遮人耳目的。祖父和浙江鄉試的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於是親友中有人招集幾個有錢的秀才，湊成一萬兩銀子托祖父去送給主考，買通關節，取中舉人，事發後祖父定爲「斬監侯」的罪名，押在杭州府獄內，前後經過了八年，才被赦免。

在幸福中生活着的孩子們，給送到了皇甫莊外祖母家避

難；外祖母家姓魯，也是書香人家，外祖父是舉人(已死)，兩個舅父是秀才。魯迅這時在大舅父那裏描寫**蕩寇誌**的插畫，又見到了**毛詩品物圖考**，到年底又跟大舅父一家移居到小皋埠。

大舅父一家寄居在他先妻秦氏的母家，家有「娛園」；大舅父的妻舅名叫少伊，善畫梅花；魯迅和他談得來，他有當時通行的小說，魯迅便不再畫人像，看小說了。

他們在外祖母家避難，大約不到一年，第二年（一八九四）上半年就回家了。這避難的生活在魯迅的文章中祇留下如次的幾句話：

……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

敏感的魯迅，在這幾句話裏留下了人生的酸辛，我於是決心回家，決心兩字寫出了魯迅堅強不屈的性格，也決定了他往後不斷奮鬥的一生。

正是祖父介孚公入獄的一年，父親伯宜公又患了重病，家道眞是不堪設想的了。

父親的病，從一八九三年遷延到一八九六年，即從魯迅的十三歲到十六歲，這將及四年的病，給魯迅的感覺是：

家景正在壞下去，常聽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現在魯迅成爲一家之中唯一的長男了，他年紀尚幼，但

對家庭的責任感，一定有必須挑上這副重担的感覺吧，往後他的行事可以證明這一點。時代變了，思想變了，他不可能去重振家風，讓新舊台門的古老社會回來。但他事母孝，對弟悌，對子姪呵護，在若干年中獨挑一家生計，直至他如此看顧的弟弟——作人，受了女人的播弄和他翻臉爲止。

在父親病中給他精神上的磨折，不止出入於質鋪和藥店，尤其是庸醫古怪的處方藥引，促使他後來在日本學醫，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

下面的對話，描寫的雖然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和她孩子的病，但庸醫何小仙那種玄妙的騙人話，確是典型的。

『先生，——我家的寶兒什麼病呀？』

『他中焦塞着。』

『不妨事麼？他……』

『先去喫兩帖。』

『他喘不過氣來，鼻翅子都扇着呢。』

『這是火尅金……』

魯迅關於父親的病，有一篇專題的回憶，談到當時很有名氣的醫生：

我曾經和這名醫周旋過兩整年，因為他隔日一回，來診我的父親的病。……診金却已經是一元四角……很不容易張羅的了；……我不知道藥品，所覺得的，就是『藥引』的難得，新方一換，就得忙一大場。先買藥，再尋藥引。生姜兩片，竹葉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碼是蘆根，去到河邊去掘；一到經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尋兩三天。……

這樣有兩年，漸漸地熟識，幾乎是朋友了，父親的水腫是逐日厲害，將要不能起牀；……他有一天來診，問過病狀，便極其誠懇地說：

『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這裏還有一位陳蓮河先生，本領比我高。我薦他來看一看……』

陳蓮河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他一張藥方上，總兼有一種特別的丸散和一種奇特的藥引。

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卽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弦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並不為難，走進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得，將牠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然而還有『平地木十株』呢，這可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問藥店，問鄉下人 ， 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搖頭，臨末纔記起那遠房的叔祖，愛種一點花木的老人，跑去一問，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能結紅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稱為『老弗大』。

……藥引尋到了，然而還有一種特別的丸藥：敗鼓皮丸。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可以尅伏他。……

『我有一種丹，』有一回陳蓮河先生說，『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為舌乃心之靈苗。……價錢也並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

有一回陳蓮河先生又說 ，『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寃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眞是名醫束手了，魯迅父親的病遷延了幾年，終於不治了。（據周作人說：第一個名醫叫姚芝仙 ， 第二個叫何連臣，「舌爲心之靈苗」則是一個姓馮的醫生說的，但魯迅說過，他是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的，所以對於眞名姓或具體的事實，都不必刻舟求劍的。）

中西醫的爭論，曾經熱鬧過一時。在台灣的年青小伙子李敖，直到六十年代還在排擊中醫 。 和魯迅當時的經驗一比，這當然言之成理。可是中醫中藥，一經科學方法整理，

仍然是無盡的寶藏 。 大陸的中西醫結合研究已經卓著成效了。爲時代所限，魯迅當時自然看不見今天的成就。可是魯迅排斥的只是庸醫，他對於中醫藥這門遺產，雖然並未加深研究，却很是推重 。 他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所作「經驗」一文中有云：

> 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寶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後人很大的益處。
>
> 偶然翻翻『本草綱目』，不禁想起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 但裏面却含有豐富的寶藏。 自然，捕風捉影的記載，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 却由歷久的經驗， 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而尤其驚人的是關於毒藥的叙述。……

魯迅不是一味崇洋的，由此可見了。

魯迅的幼年時期，到他父親死前已告完結，在這幾年當中及往後的歲月，已沒有歡愉可言，有的祇是一種對家庭對社會的責任了。

魯迅的青年

在經歷家庭的重重變故後，魯迅不得不在十八歲那年，就踏上充滿荊棘的人生道路。他的私塾學業也許早已結束，百草園的幻夢亦不再迷人，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

魯迅到南京去的時候，他祖父還未出獄，他似乎專一服侍父親的病，由伯升和作人去服侍祖父，他的文集中從未談及祖父，是不是對祖父無言的批評呢，我們不知道；只是因爲祖父的事發了，家道才中落的。後來魯迅在北京住在紹興縣館，老聽差對他講了好多老周大人的故事，家裏有位姨太太，怎樣的打架等等，魯迅聽了很不好受，以後便不再找他來談，可見他對祖父那樣腐敗的小官僚生活，有多麼厭惡！

在魯迅的家難重重中，國難亦越來越劇了。他十四歲那年，中日的甲午戰爭爆發，喪師辱國，訂立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在他十五歲時，康梁在北京組織强學會，直接造成變法維新的局面。但是這一切當時對魯迅不會有影响，要到他十八歲去南京進水師學堂以後，他才逐漸接觸到新事物，新思想。

魯迅第一個進去的學校，是「江南水師學堂」，另外自然還有一個「江南陸師學堂」。一進水師的儀鳳門，便可看見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課簡單，四整天英文，一整天漢文， 讀的是「君子曰， 潁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愛其母，施及莊公。」一整天做漢文：題目是「知己知

彼，百戰百勝論」，「顯考叔論」，「雲從龍風從虎論」，「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

這和八股文試帖詩已完全不同了。魯迅去南京前，學的正是八股文試帖詩，那時他已不去三味書屋，只在家自做詩文請先生批改。據周作人日記：

> 戊戌二月廿四日：接紹廿三函，附來文詩各兩篇，文題一云『義然後取』，二云『無如寡人之用心者』，詩題云『百花生日』（得花字），二云『紅杏枝頭春意鬧』（得枝字），壽洙鄰先生改。三月二十日：下午接紹函，併文詩各兩篇，文題一云『左右皆曰賢』，二云『人告之以過則喜』，詩題一云『苔痕上階綠（得苔字），二云『滿地梨花昨夜風』（得風字）。

魯迅十八歲前後，正是新舊交替的時候，從作文題可以知道。但從水師學堂那裏雖然一星期中讀四整天英文，並未獲得眞正的新事物，他在那裏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現在是發見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烟瘴氣』，庶幾乎其可也。只得走開。他到那裏去呢，到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去。

礦路學堂確乎不同些，漢文雖然仍是「顯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此外則有所謂格致，地學，金石學……都非常新鮮。後二項就是地質學和礦物學……第二年的總辦已是一個新黨，坐在馬車上看時務報了。他親自出的題目是「華盛頓論」，害得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問學生：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

在進礦路學堂之前，魯迅曾於十月間回家考了一次縣試，却不曾府試，府試是槍手代考的，這還是魯迅所說因為那時讀書考試是正路之故。但由於他四弟殤逝，無心應考府試，就回南京去了。

在礦路學堂，流行了看新書的風氣：

> 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

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 在英倫之南， 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机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裏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學堂裏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彙編……

魯迅完全醉心於新學了。

『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輩嚴肅地對我說，而且遞過一張報紙來。接來看時，『臣許應騤跪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總之是參康有為變法的；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

魯迅十八歲是戊戌年，有名的戊戌變法，百日維新，正是這一年。六君子已被殺，康梁逃亡日本，其影响直接引致辛亥革命，因爲改良的路行不通，非革命不可了。也許就是這一位替魯迅担憂的老輩吧，教訓他說 ： 康有為是想簒位的，所以他的名字叫有為，有者『富有天下』，為者『貴為天子』也。……

礦路學堂對於魯迅說來，也是有名無實的，讀到第三年（一九〇一年，魯迅二十一歲）畢業了。

畢業，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畢業，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幾次桅，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聽了幾年講，下了幾回礦洞，就能掘出金、銀、銅、鐵、錫來麼？實在連自己也茫無把握，沒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的那麼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或鑽下地面

二十文，結果還是一無所能 ， 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黄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所餘的只還有一條路：到外國去。

魯迅在南京的四年 ， 是近代中國發展史上最重要的年頭，戊戌政變表示滿清皇朝之必然覆亡；庚子義和團起事，表示帝國主義的侵略已引起廣大農民的反抗；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計劃雖然挫折甚多，但仍不斷進行；有志之士，紛紛遠渡日本，都已躍躍欲試了。

這一年，魯迅曾寫過一首詩以明志：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闇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魯迅的成年

魯迅死前一年，即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回憶去日本留學的事，有云：

> 我出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正是聖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政府對於讀書的人們，使讀一定的書，即**四書**和**五經**；使遵守一定的註釋；使寫一定的文章，即所謂『八股文』；並且使發一定的議論。然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却什麼也不知道，於是和**四書**上並無記載的法蘭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敗了。不知道為了覺得與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們之為得計呢，還是為了什麼，總而言之，這回是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動搖起來，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書籍來了。……
>
> 然而一定有反動。清末之所謂儒者的結晶，也是代表的大學士徐桐氏出現了。……他又是一九〇〇年的有名的義和團的幕後的發動者，也是指揮者。但是義和團完全失敗，徐桐氏也自殺了。政府就又以為外國的政治法律和學問技術頗有可取之處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學，也就在那時候。……

魯迅去日本留學，是官費的，即是由政府派遣的。他進的是嘉納治五郎辦的東京的弘文學院，在這裏，三澤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養氣和輕氣所合成，山內繁雄先生教我貝殼裏的什麼地方其名為『外套』。這是有一天的事情。學監大久

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廟裏去行禮罷！我大喫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裏想，正因為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麼？一時覺得很奇怪。……

他在弘文讀了兩年。

這兩年中，他自然欣賞過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望去確像是緋紅的輕雲。但更使他觸目的，那是 ： 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頸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他有時也去留學生會館，因爲門房裏有幾本書買，還值得去轉一下。一到傍晚，那裏有一間的房子便常不免要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烟塵斗亂，據精通時事的人說：那是在學跳舞。

大概平江不肖生寫的**留東外史**，在當時不一定是言過其實的。

魯迅在日本結交了許多朋友，其中有不少革命志士。有一個終生不渝的朋友，那是許季茀。

據許季茀回憶，一九〇二年他和魯迅先後去日本時，章太炎正避地日本，曾和孫中山會見，同謀革命，發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以勵光復，並且撰書告留學生，極爲沉痛。有云：

……願我滇人無忘李定國，願我閩人無忘鄭成功，願我越人無忘張煌言，願我桂人無忘瞿式耜，願我楚人無忘何騰蛟，願我遼人無忘李成梁！……

他說：魯迅那時已在東京，當然受到這位革命前輩的莫大的影响。

魯迅終生師事章太炎，他死前所作追念章太炎的文章，感情非常深摯，對章太炎於革命的貢獻，推崇尤甚。但魯迅

知道中國有章太炎，據他自述，乃由於：

他駁斥了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誌『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却並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並沒有忘記，現在抄兩首在下面——

獄中贈鄒容

鄒容吾小弟，被髮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餱。
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

獄中聞沈禹希見殺

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
螭魅羞爭焰，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浙江潮創刊於一九〇三年二月，章太炎的詩登載於**浙江潮**第七期，即一九〇三年九月，可見魯迅初到日本時，還沒有受到章太炎的影响。

魯迅眞正師事章太炎，則是一九〇八年的事，相距有五年之久。

魯迅是不是和鄒容相識，我們無從證明，鄒容和其他四人闖入留學生監督姚某寓中，用快剪截去其辮子，掛在留學生會館裏示衆，由此可見鄒容之爲人。他似乎不久回國，因爲一九〇三年五月，在上海出版了他的**革命軍**以後，他就和章太炎一起被捕，一年後瘐死獄中了。

章太炎和鄒容在日本當然都剪去了辮子的，章太炎剪辮更早，據魯迅引述，章太炎去髮時，曾作**解辮髮**，當時他三十三歲，爲時該在一九〇〇年，早魯迅去辮兩年餘。魯迅則是留日學生中去辮的第一人（據周作人所說，大約是在一九〇三年二月），他自述去辮原因：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限界的，不是書，是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纔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為

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纔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

剪辮是表示漢滿不兩立，這在當時是一大事。但魯迅在一九三六年寫文記念章太炎時，却說無辮之徒，回國以後，默然留長，化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黃克强在東京作師範學生時，就始終沒有斷髮，也未嘗大叫革命……

一九〇四年四月，魯迅在弘文畢了業。弘文書院對留學生來說，是一家特設的預備學校，便利留學生學習日文的。畢業之後當然要考慮進專修或高等學校的。而魯迅選的却是醫學。

魯迅自述學醫的原因之一，是他確知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其他原因應該是他父親的病，在南京水師學堂時，他已漸漸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騙子，他學醫衹爲的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

九月，魯迅去了仙台，進了醫學專門學校。他之所以去仙台，實在厭於看見頭頂富士山的那些清國留學生，那裏路遠，醫學又冷門，熱中於學速成法政的留學生所不去的。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爲他的食宿操心。他受影响最深的，是叫藤野嚴九郎的先生。

魯迅學醫學了兩年，在藤野先生的指導下，理論之外，還實習了剖解學，由於他的用心學習，和跟藤野先生的關係密切，引起了同學的妒嫉，甚至於寫信給他，引用托爾斯泰給日本皇帝信的開首一句話：你改悔吧。但這種輕視中國人的事，並不會使他中途退學的；給他一次深的刺激的，是在課室裏看到時事影片。那時日俄戰爭已告完結，日本勝，俄國敗。

> 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鎗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看每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鎗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變化的結果，到第二學年終結，在一九〇六年三月便向藤野先生辭了行，離開了仙台。

這當然是一個損失。他後來對曹聚仁說：

習西醫大須記憶，基礎科學等，至少四年，然尚不過一毛胚，此後非多練習不可。我學理論兩年後，持聽診器試聽人們之胸，健者病者，其聲如一，大不如書上所記之了然。今幸放棄，免於殺人……

但學醫兩年，對於魯迅終究不是沒有益處的，他的醫學知識，雖不曾用於治病，卻運用在他畢生所寫的文章中，隨處可見。

使魯迅爲之改變意見的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這在日本、俄國、中國往後的歷史發展中，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日本戰勝俄國，目的在可以肆無忌憚地侵畧中國，它們在半個世紀中侵畧中國的歷程如下：

一八九四年七月　中日甲午戰爭。

一八九五年四月　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割讓台灣及澎湖列島。

一九〇四年十月　日俄戰爭開始。

一九〇五年九月　日俄朴資茅斯和約成立，俄以中國旅順大連及南北滿鐵路租借權讓日。

（一九一〇年八月　日本併吞韓國。）

一九一四年十月　日軍侵佔濟南。

十一月　侵佔青島。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　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

五月七日　致最後通牒。

五月九日　袁世凱承認最後通牒。

五月二十五日　中日簽訂二十一條協定。

一九一九年四月　日本在巴黎和會中强迫列强承認其繼承德國在山東之權益。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上海日本紗廠殘殺工人顧正紅，導致五卅慘案。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日軍艦駛入大沽，與國民軍發生衝突，引致段瑞祺在北京的「三・一八慘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　日本出兵山東。

七月　青島日軍開濟南。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　濟南慘案。

六月四日　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　日軍在長春演習。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日　日軍陰謀製造「萬寶山事件」。

九月十八日　侵佔瀋陽，席捲東北。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日軍突襲上海，十九路軍抗戰。

二月十八日　成立滿洲國。

七月　犯熱河。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　陷山海關。

五月　陷灤州。

五月三十一日　簽塘沽協定。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日俄滿在東京簽訂中東路買賣條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蘆溝橋事變，中日全面戰爭爆發。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四日　日本無條件投降。

一九〇四年戰敗的俄國，後果尤其重大，一九〇五年十月，彼得堡發生革命，革命中產生了第一次蘇維埃，由托洛次基任蘇維埃主席，革命雖被鎭壓，但這是一九一七年兩次

革命，即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的預演。

對於中國來說，日本的長期侵畧，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直接引致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所有自鴉片戰爭以來，在中國根深蒂固的帝國主義勢力，一概剷除淨盡，開始了新的歷史的一頁。

魯迅的後半生，是努力參加了這個鬥爭的。

× × ×

魯迅從仙台回東京後，沒有再進學校，祇是一心學習德文。到了七月，他回家結婚，這是一次失敗的婚姻，幾乎使他犧牲了畢生的幸福。

在新舊交替的時代，一切社會制度發生動搖，婚姻制度也不例外，但只有不中途妥協，反叛到底的人，才免於爲這種舊式婚姻所犧牲。所謂舊式婚姻，就是單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撮合的盲婚。我們無法查得出，這位山陰姓朱的小姐何時和魯迅定的婚，只是根據周作人的**回想錄**所說：

> 新人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的同族，由玉田的兒媳伯撝夫人做媒成功的。伯撝夫人乃出於觀音橋趙氏，也是紹興的大族，人極漂亮能幹，有王鳳姐之風，平素和魯老太太也頂講得來，可是這一件事却做得十分不高明。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這些情形，姑媳不會得不曉得，却是成心欺騙，這是很對不起人的。本來父母包辦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當；這回並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極要好的妯娌的當，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

魯迅對於這件事毫不反抗，祇能說是在既成事實之前低頭，爲母盡孝，但他婚後不數日便和作人去日本。他曾對許季茀說：這是一件母親送給我的禮物，我只得好好供養她。魯迅對她確是盡了扶養責任的，而且並無怨言，唯一的一句表示不滿的話，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記**上的：下

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衖朱宅發，頗謬。

在魯迅未和許廣平結合前，生活的孤寂，是可以想見的。他在孤寂中有一次很大的激動，因爲：有一首詩，從一位不相識的少年寄來，却對於我有意義。——

愛　情

我是一個可憐的中國人。愛情！我不知道你是什麼。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們，也還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時共我玩耍，長來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們，也還不差。但是沒有人曾經『愛』過我，我也不曾『愛』過他。

我年十九，父母給我討老婆。于今數年，我們兩個，也還和睦。可是這婚姻，是全憑別人主張，別人撮合；把他們一日戲言，當我們百年的盟約。彷彿兩個牲口聽着主人的命令：『咄，你們好好地住在一塊兒罷！』

愛情，可憐我不知道你是什麼！

詩的好歹，意思的深淺，姑且勿論；但我說，這，是血的蒸氣，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

愛情是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

但從前沒有聽到苦悶的叫聲。卽使苦悶，一叫便錯，少的老的，一齊搖頭，一齊痛駡。

然而無愛情結婚的惡結果，却連續不斷的進行。形式上的夫婦，旣然都全不相關，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來買妾：麻痺了良心，各有妙法。……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旣然自覺着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只好陪着做一世

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

做一世犧牲，是萬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乾淨，聲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們能夠大叫，是黃鶯便黃鶯般叫，是鴟鴞便鴟鴞般叫。……

我們還要叫出沒有愛的悲哀，叫出無所可愛的悲哀。……

魯迅寫這文章時，已是一九一八年，和朱小姐結婚十二年了，那時正是五四運動的前二年，反抗禮教，謀求個性解放的呼聲，通過**新青年**喊出來，不只青年人喊，連魯迅也起來喊叫了。

魯迅學醫時受到了精神刺激，……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可是這個夢想也不容易實現，他們準備出版的雜誌——**新生**，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魯迅、周作人和許季茀——這就是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新生雖未出版，這一年（一九〇七年）魯迅是努力從事文字工作的，我說文字工作，因爲照後來收集在墳裏的四篇文字說，那不盡是屬於文藝作品，這些作品毋寧說是思想性的。作品本身自然相當幼稚，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民報』的影響之故。

一九〇七年在中國革命史中發生了一件大事，這便是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被捕殉難，接着秋瑾也在紹興被殺，這都是魯迅在東京時的熟人。

魯迅對於這件事有詳細的敘述：

在東京的客店裏，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闢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大概是：——

『安徽巡撫恩銘被Jo Shiki Rin刺殺，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後，便容光煥發地互相告語，並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字是怎樣三個字。但只要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却早已明白了。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後，在做安徽候補道，辦着巡警事務，正合於刺殺巡撫的地位。

徐錫麟，字伯蓀，別署光光子，浙江紹興人。秋瑾，字璿卿，別號競雄，又號鑑湖女俠，浙江會稽人。他們都不是徒托空言的革命家，故行事轟轟烈烈，關於他們的革命事蹟，應該在這裏詳細記述一下：

周作人**回想錄**：

說到叔祖椒生公當紹興府學堂的監督………而同時有一個副監督，這人却不好相與，此人非別，即是後來過了三年實行暗殺造反的徐伯蓀，即徐錫麟便是。這兩個人共處一堂辦起事來，其不能順利進行，蓋是必然的道理。一個是矮胖臃腫的身材，身穿一件『接衫』，上半截的白布，有下半截綠綢的三分之二的長，——接衫者穿在馬褂底下的襯袍，因為有馬褂遮蓋着的緣故，為節省綢料起見，用白布替代，古時馬褂特別的長，故下邊露出的綢料只三分之一——蹣跚行來，看來的人都不禁要喝一聲彩，説好一個『蕩湖船』的老爺出來也。又一個則是蒼老精悍的小伙子，項上留着一個小頂搭和一條細辮子，夏天穿着一件竹布長衫，正在教學生們兵操，過了一會兒他叫學生走到牆陰地方，立定少息，自己便在太陽地裏晒着。……

據另一位史家（左舜生）的記述：

徐錫麟在三十以前……曾一度遊日本，晤陶成章、紐永建，已懷顛覆清廷之志；常以手槍習射擊，彈無虛發。光緒三十年秋（一九〇四年），『光復會』成立於上海，蔡元培任會長，錫麟以事到滬，晤元培於愛國女學，欣然入會。歸紹興，乃從事會黨聯絡，創體育會，秋瑾與焉，並設大通師範於本籍，特注重兵式體操，錫麟以革命重實行，謀攫政權以傾清室，得友人助，入貲得道員。年三十三，再度赴日本，擬與馬宗漢，陳伯平等習軍事，以短視試不及格，不果。歸國後，乃至北平並出關遊歷，見大盜馮麟閣，與語甚悅。次年，即以道員赴安徽試用，見賞於巡撫恩銘，先後主陸軍小學及會辦巡警學堂，並與諸軍將士相結納。巡警學堂會計顧松以徐係革命黨向恩銘告密，恩始稍稍忌之；徐亦不自安，乃以書召留浙諸同志集安慶謀大舉，陳伯平，馬宗漢諸人到後，即與錫麟同住，共同策劃。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巡警生甲班卒業，錫麟謀於是日集閤省大吏參與典禮，一舉殲之，乘軍民擾亂，即因以舉事。適是日恩銘以有他事，須改期提早，乃改於二十六，及期，恩於午前八九時偕藩司馮煦臬司毓秀等均到，甫就位，錫麟命顧松鍵門，顧知情，陽諾不為鍵，錫麟即持手槍擊恩銘，數發皆中要害，左右輿之走，延至午後二時氣絕。其他死傷數人，顧松被殺，馮、毓等奪門逃出，即閉城門，諸軍至，不得入，乃發兵捕錫麟，錫麟驅學生二三十人據軍械局，為官軍所包圍，發槍彈丸盡；發炮，炮機關失靈；錫麟登屋被擒，陳伯平戰死，馬宗漢逃出亦被捕。馮煦、毓秀等會審錫麟，錫麟侃侃供稱蓄意排滿十餘年，為漢人復仇，先殺恩銘，後殺端方、鐵良、良弼不諱，即於是日被殺，並剖心以祭恩銘；宗漢繫獄五十日，亦被殺於安慶獄前，陳

伯平名淵，籍浙江會稽，馬宗漢字子貽（一作子畦），籍餘姚。

秋瑾，……浙江會稽人。年十八，嫁湘人王廷鈞，生子女各一，瑾與廷鈞不睦，分產別居，曾兩度留學日本，能詩文，入同盟會及光復會，並倡辦女校於上海。錫麟之赴安慶也，秋瑾適任大通學堂體育會教員，與陶成章，竺紹康，王金發等連，陰有所布署，謀與錫麟策應，錫麟死，大通學堂乃陷入四面楚歌，瑾已定六月初十起事，初四傍晚，學堂即為官軍圍搜，瑾被捕，嚴訊無供，僅書『秋雨秋風愁殺人』七字，……六月六日，被殺於古軒亭口。……

徐錫麟刺恩銘，對於革命發展影響甚大， 前此潮州黃崗、惠州，欽廉防城、鎮南關，海口等起事失敗，以地處偏僻，知者不多；徐錫麟以後，繼有熊成基在安慶起義，汪精衛、黃復生在北京謀刺載灃，都是轟轟烈烈的。

魯迅對於徐錫麟，秋瑾，都有沉痛的紀念，徐錫麟第二次去日本，魯迅和陳子英二人去接他們：

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着子細地看。我很不滿，心裏想，這些鳥男人，怎麼帶這東西來呢。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 。 檢驗完畢，在客店小坐之後，即須上火車。不料這一羣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了……揖讓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裏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自己不注意，也許又搖了搖頭。然而那羣雍容揖讓的人物中就有范愛農……豈但他呢，說起來也慚愧，這一羣裏，還有後來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被囚在黑獄裏，到革命後才見天日而身上永帶着匪刑的

傷痕的也還有一兩人。而我都茫無所知，搖着頭將他們一併運上東京了。徐伯蓀雖然和他們同船來，却不在這車上，因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

魯迅記念秋瑾，用的是小說體裁——藥，他借殺秋瑾，用她的血蘸在饅頭上醫治小栓的癆病來作隱喻，我們也可說，這小栓是中國的化身。魯迅對於辛亥革命非常失望，烈士的血終於醫治不好它的毛病。最後有人在烈士的墳上安上一個花圈，使人在悲哀中點綴些渺茫的希望，讓年老的母親相信將來總會有報應……

沒有多久，又見幾個兵，在那邊走動；衣服前後的一個大白圓圈，遠地裏也看得清楚，走過面前的，並且看出號衣上暗紅色的鑲邊。——一陣脚步聲響，一眨眼，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那三三兩兩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趕；將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個半圓。

這就是秋瑾殉難時的描寫。

可是不多幾年過去，軒亭口離紹興中學並不遠，就是秋瑾小姐就義之處，他們常走，然而忘却了。

我說魯迅始終是站在革命門外的人，這在東京留學時候已是如此，據周作人說：

……這以前她（指秋瑾）在東京，在留學生中間有很大的威信，日本政府發表取締規例，這裏當然也有中國公使館的陰謀在內，留學生大起反對，主張全體歸國，這個運動是由秋瑾為首主持的。但老學生多不贊成，以為『管束』的意思雖不很好，但並不限定只用於流氓私娼等，從這文字上去反對是不成的，也別無全體歸國的必要。這些人裏邊有魯迅和許壽裳諸人在內，結果被大會認為反動，給判處死刑。大會主席就是秋女士，據魯迅說她還將一把小刀拋在桌上，以示威嚇。當時還有章行嚴等人是中間派，主張調停其間，但是沒有

效，秋瑾的一派便獨自回來了。……第二年丙午初夏……這時秋女士已經在紹興辦起大通學堂來，招集越中綠林豪傑，實行東湖上預定的『大做』的計劃……

即使是徐伯蓀的學生范愛農吧，在他先生犧牲之後，日本留學生中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弔烈士，罵滿洲，此後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那時候，范愛農却冷冷地說：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麼屁電報呢。范愛農雖無光榮的革命歷史 ， 但仍不失爲狂狷，主張打電報的魯迅却是實行「中庸之道」的。

此外還有幾個革命的實行者，是魯迅的朋友。據周作人說：

自從安慶事件以後，來伏見館訪問的客人似乎要比從前增加了。以前來訪的人無非是南京礦路學堂的同學張協和，或是弘文學院的同學許季茀，要不然就是新來的張午樓和吳一齋罷了。這回來的却很有不同，大都是與革命案件有關的人，首先是在東湖裏與徐伯蓀一同練習路劫，預備在紹興城關門造反的陳子英，他是在紹興聞警逃回日本來的。還有游說兩浙綠林豪俠起義，要做到天下人都有飯吃的，後來被蔣介石所刺殺的陶煥卿。他這時不知在什麼地方，却也逃到東京，經常帶了龔未生來，談論革命大勢。此外還有他的本家陶望潮，本來在日本留學，專門藥學，後來又篤信佛教；但是在當時却很熱心於革命事業，也時常跑來談天。……

以後魯迅他們移住到中越館，常去的也是這幾個革命朋友，周作人特別談到陶煥卿：

……其中最常來的要算是陶煥卿，他一來就大談其中國的革命形勢，說某處某處可以起義，這在他的術語裏便是說可以『動』；其講述春秋戰國時代的軍事和外交，說得頭頭是道，如同目睹一樣，的確是有一種天才的。……記得有一回是下雨天氣，煥卿一個人忽忽的跑

到中越館來，夾着一個報紙包，說這幾天日本警察似乎在注意他，恐怕會要來搜查。有的是他聯絡革命的文件，想來這裏存放幾天，因為這是機密文件，所以我們只是替他收了起來，不曾檢查它的內容，後來過了若干時日又走來拿去。這時他打開給我們看，原來乃是聯合會黨的章程，以及有些空白的『票布』，有一種是用紅緞子印製的，據說這是『正龍頭』所用。他還開玩笑的對我們說道：『要封一個麼？』章程只有十來條的樣子，末了一條是說對違反上列戒條的處置，簡單的說『以刀劈之』。

× × ×

魯迅所接近的革命家，都是光復會中人，他有否加入過光復會，從來沒有在文字上表明過。

光復會是蔡元培、龔寶銓（未生）等發起的，成立於一九〇四年，章太炎時在獄中，致書元培鼓勵之。一九〇五年九月，在日本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三革命團體爲**中國同盟會**，但這個共同組織似乎並未取銷光復會的獨立存在。章太炎於一九〇三年六月入獄，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獄，即赴日本，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筆了。魯迅說：

……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奥，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和『××』（疑為『獻策』兩字——引注釋）的×××（吳稚暉——引注釋）鬥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藍公武——引注釋）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魯迅他們那時住在西片町，在門口標着「伍舍」。章太炎一面主持**民報**，一面辦國學講習會，據周作人**回想錄**所說：

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學講堂定期講學，在留學界很有影響。魯迅與許季茀和龔未生談起，想聽章先生講

書，怕大班太雜沓，未生去對太炎說了，請他可否於星期日午前在民報社另開一班，他便答應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許季茀和錢家治，還有我們兩人（按：周作人和魯迅）。未生和錢夏（後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萊，都是原來在大成的，也跑來參加，一總是八個聽講的人。民報社在小石川區新小川町，一間八席的房子，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學生圍着三面聽，用的書是『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的講下去，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揮新義，乾燥的材料却運用說來，很有趣味。太炎對於濶人要發脾氣，可是對於青年學生却是很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長背心，留着一點泥鰍胡鬚，笑嘻嘻的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廟裏的哈喇菩薩。中國文字中本來有些素樸的說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別是卷八尸部中的『尼』字，據說原意訓路，即後世的暱字，而許叔重的『從後近之也』的話很有點怪裏怪氣，這裏也就不能夠說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來說，所以更顯得不大雅馴了。

『說文解字』講完以後，似乎還講過『莊子』……這『莊子』的講義，後來有一部分整理成書，便是『齊物論釋』，乃是運用他廣博的佛學知識來加以說明的，屬於佛教的圓通部門；雖然是很可佩服，不過對於個人沒有多少興趣，……那時太炎的學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領導下做兩級師範的教員，隨後又做教育司(後改稱教育廳)的司員，一部分在北京當教員，後來滙合起來，成為各大學的中國文字學教學的源泉，至今很有勢力。此外國語注音字母的建立，也是與太炎有很大的關係的。所以我以為章太炎先生對於中國的貢獻，還是以文字音韻學的成績為最大，超過一切之上的。

晚年的周作人對章太炎的評述，推崇他的文字音韻學；但魯迅的評價則完全不同：

> 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板的『訄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

魯迅的聽太炎先生講學，據他說：

> 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
> 民國元年革命後，先生的所志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為了，然而還是不得志。這也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樣的。我以為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爾基先前的理想，後來都成為事實。他的一生，就是大衆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志雖伸，但視為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卻僅止於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更使先生失卻實地，僅垂空文，至於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系發源於先生的『中華民國解』（最先亦見**民報**），為巨大的紀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不多了。既離民衆，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

魯迅的**太炎先生二三事**，寫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距

章太炎的死約三個月；他續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兩三事**後的第三天，自己也死了。周作人的**回想錄**，寫完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距魯迅的死已二十六年，兩人對章太炎評價的觀點不同如此，可見彼此一生行誼和立場距離之遠。

魯迅日記載：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收共和黨事務所信。

二十二日：收共和黨證及徽識。

共和黨是光復會的後身，由章太炎主持，魯迅之加入共和黨，似在章太炎入京之後。章夫人湯國黎女士說入京係一九一三年夏，當屬誤記。

十二月二十二日：同季市赴賢良寺見章先生，坐少頃。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午後許季市來，同至錢糧胡同謁章師，朱逷先亦在，坐至傍晚歸。（按：此時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且曾一度絕食。）

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　午前同季市往章先生寓，晚歸。

二月十四日：午前往章師寓，尹默、中季、逷先、幼輿、季市、彝初皆至，夜歸。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同許季市往章師寓。

六月十七日：下午許季市來，並持來章師書一幅，自所寫與，又『齊物論釋』一册，是新刻本，龔未生贈也，……

九月十九日：得龔未生夫人訃，章師長女，有所誤事畧。

九月二十六日　：　往錢糧胡同弔龔未生夫人，賻二元。

在**魯迅日記**簡單的記述中，實包括一個革命家對民賊袁世凱的勇敢鬥爭。據章夫人湯國黎女士說：

先生既抵北京，見袁氏氣燄囂張　，　而民黨飄搖渙

散，不保旦夕，知事不可為，意欲南歸 ， 然已為監視矣。當局初以甘言相欺，爵祿為餌，先生均不之顧。繼乃加以脅迫，先生憤甚，直詣總統府，欲與面質，袁氏拒不延見；警吏復詞色傲慢，乃怒擲其座上茶具，遂被曳去，禁錮於軍事廢校中，旋徙龍泉寺。至六月，先生所携資用已盡，拒不受袁氏供給，憤而絕食，……鄉人馬夷初叙倫乃婉為勸解竟日，先生始允進食。一九一四年夏，再遷先生於錢糧胡同，閽人廚司皆為當局所派，賓客往訪，除國際友人外，非持警廳憑證皆不得入內。……

先生有女三人，長㸚，次㠭，次㗊。喪母後，均依其伯父居。一九一〇年，㸚適嘉興龔寶銓，寶銓字未生。一九一五年春，㸚偕未生及妹㗊入京省父，㸚孝思頗篤，見其父之困躓憂憤，乃極意承驩，飲食醫藥，無不周至。顧其心危慮深，居恒輒鬱鬱也！留五月，其姑馳書召歸，㸚既不忍遠離父側，又不欲重違姑意，自此益憂形於色！行有日矣，竟自縊於卧室，平旦發覺，已不救。……

在章太炎處身危難的時日，魯迅對他更爲親近了，他總是一去半天 ， 這和東京講學時當然不同，師生之間談些什麼，沒有任何文字紀錄，但情誼之篤，可以想見。魯迅對章太炎崇敬，却不苟同，他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書曹聚仁有云：

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之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後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後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後如相見，仍當執禮甚恭（而太炎先生對於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和藹若朋友然），自

以為師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這和周作人寫**謝本師**，公開與章太炎聲明斷絕師弟關係者爲如何？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魯迅寫**名人和名言**有云：

> 太白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他舉出：第一道是說『要做白話由於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說『要白話做好，先須文言弄通』。十年之後，才來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為你們說文言難，白話更難。理由是現在的口頭語，有許多是古語，非深通小學就不知道現在口頭語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寫錯。……』
>
> 太炎先生的話是極不錯的。現在的口頭語，並非一朝一夕，從天而降的語言，裏面當然有許多是古語，既有古語，當然會有許多曾見於古書，如果做白話的人，要每字都到『說文解字』裏去找本字，那的確比做任何借字的文言要難到不知多少倍 。 然而自從提倡白話以來，主張者卻沒有一個以為寫白話的主旨，是在從『小學』裏尋出本字來的， 我們就用約定俗成的借字。 誠然，如太炎先生說：『乍見熟人而相寒喧曰「好呀」，「呀」即「乎」字；應人之稱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們即使知道了這兩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還是用『好呀』或『是唉』。因為白話是寫給現代的人們看，並非寫給商、周、秦、漢的鬼看的，起古人於地下，看了不懂，我們也毫不畏縮，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實是文不對題的。這緣故，是因為先生把他所專長的小學，用得範圍太廣了。
>
> 我們的知識很有限，誰都願意聽聽名人的指點，但這時就來了個問題：聽博識家的話好，還是聽專門家的話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歷聽了兩家的種種指點以後，卻覺得必須有相當的警戒。

因為是：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的。

博識家的話多淺，意義自明，惟專門家的話多悖，還得加一點申說。他們的悖，未必悖在講述他們的專門，是悖在倚專家之名，來論他所專門以外的事。……

…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可聽，但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卽其一例。……

………………

我很自歉這回時時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大約也無傷於先生的『日月之明』的。……

魯迅雖說對章太炎所講的「說文解字」一句也不記得了，但實際上他並未完全忘記。魯迅曾經發明了中國的國罵——「他媽的」，他一到廣州，也就學會了廣州的國罵——「丟那媽」（Tiu-Na-Ma），而且由此……發見了吾師太炎先生的錯處了。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 Tiu。故 Tiuhei 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的。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裏，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

魯迅寫過一篇歷史速寫**出關**，累得許多人在這篇文章中尋找「微言大義」，結果他寫了一篇**出關的『關』**回答他們，他說：老子的西出函谷，為了孔子的幾句話，並非我的發現或創造，是三十年前，在東京從太炎先生口頭聽來的，後來他寫在『諸子學畧說』中，但我也並不信為一定的事實。……

從這兩段文字說來，章太炎對於魯迅的影響，就在文字學，諸子學說方面也是很多的。

我從魯迅就學於章太炎之門，一直談到魯迅爲文紀念章太炎的死爲止，其間經過了二十八年，把他們師生之間的關

係做了一次綜述，未免有違替魯迅按年代寫傳記的範圍，但這樣寫只是爲了顯示兩個不世出的人的全部人格而已。

魯迅親近章太炎，接近光復會和共和黨，遠離同盟會和後來的國民黨 ， 這和在東京時章太炎編**民報**的一件小事有關，據周作人**回想錄**：

> **民報**以前的編輯人用的是章炳麟名義，這時不知道為什麼緣故，却換了陶成章，沒有報告該管官廳，就要出版了。日本政府這時是等着機會的，因為有了滿清政府的要求，想禁止**民報**，就乘這個機會來小題大做了。說是違反出版法，不但禁止發刊，而且對於原編輯人科以罰金一百五十元，如過限不交，改處懲役，以一天一元折算。民報社經濟很窘，沒有錢來付這筆罰款，拖到最後這兩天裏，龔未生走來告訴魯迅，大家無法可想，恰巧這時許季茀經手替湖北留學生譯印**支那經濟全書**，經手一筆經費，便去和他商量，借用一部分，這才解了這一場危難。為了這件事，魯迅對於孫系的同盟很是不滿，特別後來孫中山對胡漢民等在法國復刊**民報**，仍從被禁止的那一期從新出起，却未用太炎的那一份，更顯示他們的褊狹的態度來了。……

× × ×

魯迅從仙台醫專退學回到東京 ， 目的是想從事文藝活動，**新生**的出版希望落了空，一方面問學於章太炎，一方面和周作人一起，翻譯有關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文藝作品，終於結成**域外小說集**一、二兩集。

魯迅的同情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我認爲主要由於當時中國處在革命前夜，而日俄之戰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則使他認淸了這個落後的沙俄帝國的大斯拉夫主義，所以他的取材爲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蘭一人三篇，波希尼亞一人二篇，芬蘭一人一篇。我至今還記得芬蘭作家哀禾的一篇**父親買洋燈回來的時候**，眞是印象深刻。

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文學是魯迅兄弟最先介紹的，他在序言上說：

> **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犂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漚與，而性解思維，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
>
> 己酉正月十五日

己酉是一九〇九年，據周作人說：第一冊出版於二月間，第二冊出版於六月間，定價每冊小銀圓兩角。可是書在上海和東京寄售，半年過去，東京只賣去了第一冊二十一本，第二冊二十本。第一冊多賣去的一本，是一位熱心朋友（許季茀）怕寄售處不遵定價，買一本試驗一下的。上海也不過賣去二十本上下，於是第三冊不再編印了。

> 但是這勞力也並不是完全消滅，因為在『五四』以後發生新文學運動，這也可以看作**新生**運動的繼續。當初**域外小說集**只出了兩冊，所以所收各國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個趨向的，這便是後來的所謂東歐的弱小民族。………這裏俄國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壓迫，所以也就歸在一起了。換句話說，這實在應該說是，凡在抵抗壓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才是，可是習慣了這樣稱呼，直至**文學研究會**的時代，也還是這麼說；因為那時的**小說月報**還出過專號，介紹弱小民族的文學，也就是那套運動的餘波了。

魯迅一直偏愛的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斐，他在那時已有介紹，給**河南**雜誌的文章中，有一篇就是譯的**裴彖飛詩論**。時移世易，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民衆組織的**裴多斐俱樂部**，倡導解除史大林運動，抵抗蘇聯的侵畧，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却厂堅決主張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

利的反革命運動」， 結果蘇共就用大炮坦克撲滅了這種反抗。想不到半個世紀之後，魯迅如此同情的匈牙利、波蘭、捷克等國家，即使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却依舊是受踐踏的弱小民族，中共和蘇共竟都是大國沙文主義者！魯迅如仍活在這個毛澤東時代，不知將作何感想 ， 並採取何種態度？

魯迅的留學生活結束了，他於一九〇九年夏回了國。

魯迅留學期間，雖有許多革命朋友，死前更拳拳於表揚章太炎的革命一面，但他在一九二七年之前，祇是一個社會改良主義者，他相信學醫有助維新，文藝能改革人心，故雖在日本時與**光復會**會員爲友，在北京時甚至加入**共和黨**爲黨員，不過掛個名，對所隸的黨並無更多更積極的貢獻。回國之後，鑑於辛亥革命之換湯不換藥，他就意志消沉，深感寂寞。

魯迅的壯年

回國至辛亥革命

魯迅在**自叙傳畧**中談到結束留學生活時說：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許季茀是一九〇九年的春天回國的，他要到杭州去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務長。臨行時魯迅對他說：你回國很好，我也只好回國去，因為起孟將結婚，從此費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這學堂的新任監督是沈衡山（鈞儒），對於魯迅一薦成功，於是魯迅於六月間回國。

魯迅是長子，仰事俯畜要靠他，周作人在日本要和羽太信子結婚，而且繼續讀書，在此後長期的歲月中，魯迅始終履行他的責任，這在他現存從一九一二年起的**日記**中歷歷可考。至於回國後三年中對作人實際資助的情況，魯迅自己沒有記錄，作人的**回想錄**簡直不著一字，他當時的結婚生活，也是畧而不談的。

> 許季茀說：魯迅的教書是循循善誘的，所編的講義是簡明扼要，為學生所信服，他燈下看書，每至深夜，有時還替我譯講義，繪插圖，真是可感！到了冬天，學校裏忽然起了一個風潮，原因由於監督易人：衡山先生被選為諮議局副議長了，繼任者是一位以道學自命的夏震武，我們名之曰『夏木瓜』。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謁聖，我拒絕了，說開學時已經拜過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興，我也如此。接着因為他對於住堂的教

員們，僅僅差送一張名片，並不親自拜會，教員們大譁，立刻集會於會議廳，請他出席，他還要擺臭架子，於是教員們一鬨而散。我因為新舊監督接替未了，即向舊監督辭職，不料教員們也陸續辭職，魯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員計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嶔，張宗祥，錢家治，張邦華，馮祖荀，胡濬濟，沈朗齋……統統搬出了校舍，表示決絕。……

魯迅自述在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那時革命發生了。

對於魯迅在兩級師範學堂時的生活，夏丏尊有最完整的回憶：

周先生教生理衛生，曾有一次，答應了學生的要求，加講生殖系統。這事在今日學校裏似乎也成問題，何況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時代。全校師生們都為驚訝，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對學生提出一個條件，就是在他講的時候，不許笑。他曾向我們說，『在這些時候，不許笑是個重要條件。因為講的人的態度是嚴肅的，如果有人笑，嚴肅的空氣就破壞了。』……據說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別班的學生，因為沒有聽到，紛紛向他來討油印講義看，他指着剩餘的油印講義對他們說：『恐防你們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來他的講義寫得很簡，而且還故意用着許多古語，用『也』字表示女陰，用『了』字表示男陰，用『夅』字表示精子，諸如此類，在無文字學素養未曾親聽過講的人看來，好比一部天書了。……

周先生那時雖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見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講究的，一件廉價的羽紗——當年叫洋官紗——長衫，從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陽。……

………………………

周先生曾學過醫學，當時一般人對於醫藥的見解，還沒有現在的明瞭，尤其關於屍體解剖等類的話，是很新奇的，閒談的時候，常有人提到這屍體解剖的題目，請他講講『海外奇談』。……據他說，他曾經解剖過不少的屍體，有老年的，壯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經驗，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後來就不覺得甚麼了，不過對於年青的婦人和小孩的屍體，當開始去破壞的時候，常會感到一種可憐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屍體，更覺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氣，拿不起解剖刀來。………

周先生很嚴肅，平時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恢諧的時候。他對於官吏，似乎特別憎惡，常摹擬官場的習氣，引人發笑。現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氣……哈哈』一類的摹擬諧謔，那時從他口頭已常聽到。……

夏丏尊很眞切地描繪出了魯迅當年的形象。

在紹興中學做學監的一年，正是辛亥革命前夜，社會矛盾卻集中表現在一條辮子上，因爲………滿洲人的紹興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來，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髮，和我多說話。

所以當學生們裏面，忽然起了剪辮風潮了的時候，他連忙禁止，學生舉出代表詰問他：究竟有辮子好呢，沒有辮子好呢？他就不假思索的答覆：沒有辮子的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

魯迅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裏通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却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看不起了。『言行一致』當然是很有價值的，現在之所謂文學家裏，也還有人以這一點自豪，但他們却不知道他們一剪辮子，價值就會集中在腦袋上。軒亭口離紹興中學並不遠，就是秋瑾小姐就義之處，他們常走，然而忘却了。

魯迅談到這件事，是在一九三四年的年底，他只是爲了「舒憤懣」而寫的，但回溯到二十多年前剪辮這一幕，我覺

得非常符合當時的環境。魯迅自己一回國，就曾在上海裝上了假辮，但爲了種種的不便，索性不裝了，於是他得了裏通外國的惡名， 而他所受的無辮之災， 據他說以在故鄉爲第一。他愛護學生，不願他們爲辮子受苦，却落得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一方面也表示他畢竟已通達世故，年青人忘記了血的教訓， 才有向前衝的勇氣， 否則都會成爲「全軀保妻子」的安分良民了。魯迅教導學生的哲學是不為物先，然而在事變發展中，這種哲學往往會使一個人落伍的。

辛亥革命發生了，這是一個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作爲資產階級代言人的一羣知識份子，黨徒，不久便和舊式的地主官僚相妥協，反動勢力佔了優勢，專制皇朝雖然倒了，民主政治却從未建立 。 但革命本身還是有一種潛力的，所以洪憲稱帝，張勳復辟，皆不旋踵而失敗，可是這時帝國主義的政治控制和經濟侵畧日益加甚，眞正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更難成功了。

紹興城裏革命的悲喜劇，是全中國革命的縮本，卽小可以見大，後來魯迅寫**阿Q正傳**，便是革命舞台上所有演員的寫照，其中也有魯迅自己在內，因爲我回到中國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却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為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失為『裏通外國』的人…………………

「假洋鬼子」與「裏通外國」的人，在**阿Q正傳**中這角色是分配在錢太爺的大兒子身上的，他是長子，日本留學，魯迅對這個角色很有些自我嘲弄的意味，自然他只是寫小說，寫辛亥革命這個未完成的革命的本質。

魯迅在革命中出了什麼力，盡了什麼責，幸而他的弟弟周建人有所記述，至於周作人，據他自述：辛亥秋天，我回到紹興，一直躲在家裏，雖是遇着革命這樣大件事，也沒有出去看過，……時代的腳步，就這樣從他的身邊走過去了，

和他毫不相干。

這時候，城內的一個寺裏就開了一個大會，好像是越社（按卽南社的紹興分社）發動的，到了許多人，公舉魯迅做主席。魯迅當下提議了若干臨時辦法，例如提議組織講演團，分發各地去演說，闡明革命的意義和鼓勵革命情緒等。關於人民的武裝，他說明在革命時期，人民武裝實屬必要，講演團亦須武裝，必要時就有力量抵抗反對者。他每一提議剛要說完而尚未說完的時候，就有一個坐在前排的頭皮精光的人，彎着腰，作要站起來但沒有完全站起來的姿勢，說一句『鄙人贊成』！又彎着腰坐下去，提議就很快的通過。這人不是別人，便是後來魯迅文章裏曾經說起的孫德卿。他雖是鄉下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但對於推翻滿清政權這件事是熱心的。他曾經拿明朝人的照片去分送給農民，我看到的一張是明太祖的像，約莫三寸來長，分明是從畫像上照下來的。他並且向農民說明，清朝的政府是外面侵入的人組成的，我們應當把他們打出去。對於這主張，農民都贊成，願意起來去打。**揚州十日記**之類的小册子，這時候也流行到民間。這孫德卿在秋瑾案發生時，曾一次下獄，但不久就出來了。

但是魯迅提議的武裝講演等，大家雖然都贊成，可是缺少準備，力量也不夠。第一件是缺少槍械。府學堂裏雖然有些槍，但沒有真的子彈，有一些也是操演時用的那種只能放響的子彈，衹有在近距離內大概能傷人。於是人民終於恐怖起來了。有一天，魯迅從家裏出去，到府學堂去，到了離學校不遠，見有些店舖已在上排門，有些人正在張惶的從西往東奔走。魯迅拉住一個問他為什麼，他說不知道究竟什麼事。魯迅知道問亦無益，不如到學堂去了再說。他走進校門，已有一部份學生聚在操場裏討論這件事，才知道市民因為聽了有敗殘

清兵要渡江過來， 到紹興來騷擾的謠言， 所以起恐慌的。於是魯迅主張整隊上街解釋，以鎮定人心。手腳很快，一歇工夫就印好了許多張油印的傳單，大概是報告省城克復的經過，和說明決沒有清兵過來的事情。卽刻打起鐘來，學生立時齊集於操場，發了槍，教兵操的先生也跑來了，滿頭是汗；他還沒有剪掉辮髮，把它打了一個大結子。他不拿平常用的狹細的指揮刀，掛上一把較濶厚的可以砍刺的長刀，這無非防備萬一的。小心怕事的校長，抖零零的到操場上來講話，想設法攔阻，但沒有用處。在路上，魯迅一班人分送傳單 ， 必要時更向人說明，叫他們不要無端恐慌；的確這很有用處，學生們走到之處，人心立刻安定下來，店鋪關的也仍然開了。時間在下午，一班人回到學校時，天已黑下來了。

離這事情不久（案大概就是第二天吧），就有人告訴魯迅，說王金發的軍隊大約今晚可以到紹興，我們應當去接他和他的軍隊，這回仍在府學堂裏會集，學生也去的。 晚飯後大家興高采烈的走到西郭門外。 到了黃昏，不見什麼動靜， 到了二更三更， 還是不見軍隊開到。學生穿的操衣很是單薄，夜深人靜時覺得很寒冷，於是只好敲開育嬰堂的門，到裏面去休息；叫起茶房，貼還些茶錢，叫他們燒茶來喝。這時候才看見穿制服的學生們之外，還有頭皮精光的孫德卿，頭戴毡帽的范愛農，好像和徐伯蓀一起捐道台出洋的陳子英也在內。但是夜深了，不特冷，而且也餓；學生們大家摸錢袋，設法敲開店門買東西吃。孫德卿拿出錢來，叫人去買了幾百個鷄蛋，大家分吃了。這以後不久，有人來報信，說軍隊因為來不及開拔，大概須明天才可開到，今晚不來了。

於是第二天晚上再去，這回不往西郭，却往東邊的偏門，人還是這一大批。黃昏以後，月亮很皎潔，正盼

望間，遠遠的聽到槍聲響，以後每隔一定的時候槍聲響一下。不多時看見三兩隻白蓬船，每隻只有一個船夫搖着，然而很快的搖來。船吃水很深，可見人是裝得滿滿的。各船都只有一扇蓬開着，過一歇時候，船中就有兵士舉起槍來，向空中放一響。先前的兵隊老是這樣做，在有開仗可能的情勢下，常常一響一響的放着槍。不多時候船已靠岸，王金發的軍隊很快的上了岸，立刻向城內進發。兵士都穿藍色的軍服，戴藍色的布帽，打裹腿，穿草鞋，拿淡黃色的槍，都是嶄新的。帶隊的人騎馬，服裝不一律，有的穿暗色的軍服，戴着帽子，有的穿淡黃色的軍服，光着頭皮。

這時候是應該睡的時候了，但人民都極興奮，路旁密密的站着看，比看會還熱鬧；中間只留一條狹狹的路，讓隊伍過去；沒有街燈的地方，人民都拿着燈，有的是桅杆燈，有的是方形玻璃燈，有的是紙燈籠，也有點着火把的。小孩也有，和尚也有，在路旁站着看。經過教堂相近的地方，還有傳道師，拿着燈，一手拿着白旗，上寫歡迎字樣。兵士身體都不甚高大，臉上多數像飽經風霜的樣子，一路過去，整齊、快捷。後面跟的人，走得慢一點的便跟不上。不久到了指定駐紮的地方，去接的人們有跟了進去，也有站在門外面，大家都高叫着革命勝利和中國萬歲等口號，情緒熱烈、緊張。不久就有人來叫讓路，一班人把酒和肉等挑進去，是慰勞兵士去了，外面的人們也就漸漸的散去了。

王金發做了紹興軍政分府的都督，他是和秋瑾早有聯絡的强盜頭子。軍政分府裏的行政司長是什麼鐵路的股東，軍械司長是什麼錢店的掌櫃……還是幾個舊鄉紳。這位王都督不久就被閒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在衙門裏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

軍政府裏有三個姓王的，頗弄權斂錢，人民倒不大怪王

金發，大家都責備「三王」；他們利用一句「戲文」上的句子，唱道：「可恨三王太無禮」以洩憤。可是府學堂的學生辦了一張**越鐸日報**， 用魯迅、 陳子英和孫德卿的名義出版的，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裏面的人員；此後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魯迅和王金發是熟人 ， 王金發請他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給了校款二百元。用魯迅他們名義辦的**越鐸日報**在罵了十多天之後，就有一種消息傳到魯迅家裏去，說都督因爲他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槍來打死他們。

魯迅相信王金發雖然綠林大學出身，殺人却很不輕易，寫信去要經費，又取了二百元。但彷彿有些怒意，同時傳令道：再來要，沒有了！

魯迅從范愛農那裏得到了一種新消息，原來所謂「詐取」者，並非指學校經費，而是指另送報館的一筆款。報紙上罵了幾天之後，王金發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學生們爲此開了會議，第一個問題是：收不收？決議曰：收。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後罵不罵？決議曰：罵。理由是：收錢之後，他是股東，股東不好，自然要罵。

魯迅卽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眞假，都是眞的。畧說了幾句不該收他錢的話 ， 一個負責會計的便不高興了，質問他道：

> 報館為什麼不收股本？
>
> 這不是股本……
>
> 不是股本是什麼？

他就不說下去了，倘使再說下去，而且說出這事會連累他們的話，就會被面斥他怕死，不肯爲社會犧牲……

這時候正好許季茀寫信給他，要他去南京教育部做事，臨時政府剛成立，做教育部長的是蔡元培。

范愛農凄凉地說：

> 這裏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吧……。

魯迅幸得及早去了南京，兩三個星期之後，報館給一羣兵士搗毀，陳子英在鄉下，得免於難，孫德卿在城裏，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

魯迅辭去師範學校校長後，孔教會會長接了他的後任，原來的學監范愛農給他撤了職；縣署裏的教育科長孫幾仲，也就是 **阿Q正傳** 裏所說的柿油黨，掛着一塊銀桃子的徽章的，此外也有羅颺伯朱幼溪等人。

以上所述，主要採自魯迅**朝花夕拾**中**范愛農**一文，和周建人的一篇記事連起來看，辛亥革命時的階級關係也就表現得很清楚了。從地主移轉過來的孫德卿，從新台門官僚家庭蛻化出來的魯迅，背景約畧相同的范愛農陳子英都是參加過革命組織**興中會**或與革命組織有關的，他們所要求的民族的（**排滿**）民主的（**共和**）革命，正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但他們的階級基礎太脆弱了，在革命中起不了領導作用，所以也掌握不到實際的政權，政權一時落在以會黨、草莽英雄爲代表的脫離生產的破落農民和城市流氓無產階級手上，他們一接近政權，很快就腐化了，一時處於下風的原來的地主官僚階級就起而代之。革命彷彿曇花似的一現，社會秩序給擾動了一下，便都恢復原狀。直到一九二七年，辛亥革命之後逐漸長成的資產階級得到了工農無產階級的幫助，才大規模的走上了政權。但革命的任務和要求——民族獨立，土地革命，民主政治——仍是沒有完成的。資產階級很快反革命，屠殺工農，外則屈服於帝國主義，內則厲行法西斯政制。以後經過八年抗日戰爭，三年內戰，這才結束了這個落後的妥協的資產階級統治。

魯迅的思想和行動，密切地和這個歷史發展相符的。

北京生活（一）——教育部僉事

南京的臨時政府成立不久，新興的革命勢力就屈服於地主官僚階級的代表人物袁世凱，由他在北京做大總統了。魯

迅自然要跟着政府北遷，根據他從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起直到他死前（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爲止）的全部日記，我們不僅可以考見魯迅大半生的行誼，也可約畧了解二十多年中歷史事件的變遷推移，這是彌足珍貴的。

魯迅在教育部任職前後達十四年三個月另三天，根據他的**日記**，這「小京官」的經歷如下：

> 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上午一時舟抵天津，下午約七時抵北京。
>
> 六日上午遷入山會邑館。坐騾車赴教育部，即歸。
>
> 十日晨九時至下午四時半，至教育部視事。枯坐終日，極無聊賴。
>
> 八月二十二日，晨見教育部任命名氏，余為僉事。
>
> 十一月二日，得袁總統委任狀。
>
> 十二月二十六日，晨赴鐵師子胡同總統府，同教育部員見袁總統，見畢，述關於教育之意見可百餘語，少頃出。
>
>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午前見策令進叙四等。
>
> 二十日，部令給四等奉。
>
>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收到文官甄別合格證書一枚。
>
>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受五等嘉禾章。
>
>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我之免職令發表。
>
> 三十一日，上午赴平政院納訴訟費三十元，控章士釗。

魯迅之去北京教育部任職，爲的是蔡元培做教育總長，蔡是光復會的發起人，後來又加入了同盟會，南北議和，袁世凱做了大總統，北京的政治鬥爭，已是波譎雲詭，蔡元培於六月二十一日辭職，七月二日再辭，由范源濂繼任，以後三年之中，教育總長更迭頻繁，據**魯迅日記**所載者如下：

> 一九一二年九月六日，上午赴本部職員會，僅有范總長演說，其詞甚怪。

一九一三年二月五日，范總長辭職而代以海軍總長劉冠雄，下午到部演說少頃，不知所云。

九月十五日，上午總長汪大燮到部，往見之。

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汪大燮辭職，嚴修代之，未至部前，以蔡儒楷署理。

五月四日，上午教育總長湯化龍到部。

五月十二日，上午次長梁善濟到部，山西人，不了了。

往後有關教育部長的更迭，不再見於日記，但據鄭學稼的統計，在魯迅任職的十四年中，教育總長換了二十七人，如果加上章士釗在內，幾乎每半年換一次總長。

魯迅後來所說的，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區區的僉事，在北京政府裏面有時也是災官，例如一九一三年**魯迅日記**：

十二月二十五日，教育部令減去僉事、主事幾半，相識者大抵未動，惟無孫壽山，下午聞改為視學云。

二十六日，晚又有部令，予與協和、稻孫均仍舊職，齊壽山為視學，而胡孟樂則竟免官。莊生所謂不胥時而落者，是矣。

至於欠薪達半年以上，時時借債度日，大約從一九二〇年起，在**魯迅日記**中已是司空見慣的了。

魯迅在任職期間，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三年，必須每年一次，陪祭孔子，這是反動的標誌，讀經與祭孔二者是相並而行的。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記**：星期休息，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總長令部員往國子監，且須跪拜，衆已譁然。晨七時往視之，則至者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錢念敂又從旁大聲而罵。頃刻間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話，聞此舉由夏穗卿主動，陰鷙可畏也。……晚國子監送來牛肉一方。

這牛肉當然是祭孔後的散胙。

十月十日**日記**：午聞鳴礮，袁總統就任也。在這樣的時代，祭孔當然是理當的節目了。

一九一四年三月二日 ： 晨往郢中館要徐吉軒同至國子監，以孔教會中人舉行丁祭也，其舉止頗荒陋可悼嘆。

自一九一五年起，**魯迅日記**中對祭孔一事，祇當例行公事記載，既無感慨，也不悼嘆了。如：

三月十五日：赴孔廟演禮。

十六日：夜往國子監西廂宿。

十七日：黎明丁祭，在崇聖寺執事，八時畢，歸寓。

以後每年有照例的記載，一九二二年沒有記載，一九二三年是最後一次記載；可是一九一八年他的**狂人日記**已在**新青年**登載，一九一九年發生五四運動了，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誕生了。

魯迅爲了並不區區的僉事職位，直至一九二三年還在祭孔這「荒陋」的滑稽劇裏當配角，也許不免給人譏爲「言行不一致」吧 。 我認爲這是由於他的「不爲物先」的處世哲學，使他隨波逐流；另方面也由於他的思想消極，即使在和**新青年**發生了關係之後，他所寫的隨感和小說，祇不過揭露過去的瘡疤，現在的癰毒，並不倡導未來的新生，必須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和章士釗開始面對面的鬥爭時才從消極轉爲積極，而且免了僉事之後，纔算是「言行一致」了。

魯迅自己描述過這一時期的心情，在日本當時預定出版**新生**失敗之後，他就：——

> 我感到未曾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在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啊，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爲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却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沈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抄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的唯一的願望。夏天，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魯迅就是這樣在寂寞與悲哀中渡過了辛亥革命以後繼起的二次革命（紹興軍政分府的王金發——王都督就在這時候給袁世凱爪牙朱端所誘殺的），洪憲稱帝，張勳復辟，和北洋軍閥的統治，時間長達十餘年，其中他說親歷或旁觀過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首先當然是他在北京時所聽到范愛農自殺的消息：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九日**日記**：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紹興發，云范愛農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無終，越之不幸也，於是何幾仲輩為羣大蠹。

二十二日**日記**：夜作均言三章，哀范君也，錄存於此：

風雨飄搖日，余懷范愛農；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鷄蟲；

世味秋荼苦，人間直道窮；奈何三月別，竟爾失畸躬。

海草國門碧，多年老異鄉；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

故里寒雲惡，炎天凛夜長；獨沈清冷水，能否滌愁腸。

把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猶茗芋，微醉自沈淪；

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故人雲散盡，我亦等輕塵。

魯迅會有一篇關於范愛農的回憶，說他是個高大身材，長頭髮，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渺視。東京別後，他們在紹興重見，他頭上已有白髮了，穿着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自從回到故鄉之後，受着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

革命以後，魯迅做了師範學校校長，范愛農做了監學，但不久魯迅交出了一角又兩銅元的賬目，去了南京，愛農也丟掉了監學。魯迅想在北京替他找點小事，然而沒有機會。他常常說：也許明天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他在一個熟人家裏寄食，景況愈困窮，寫給魯迅的信言辭也愈凄苦。魯迅接到了他自殺的消息，夜間獨坐在會館裏，十分悲涼。

早幾月，魯迅在東京時的老朋友陶成章，爲同盟會的陳英士所忌，派遣蔣介石把他刺殺。陶是革命勇士，章太炎戲呼之爲「煥皇帝」或「煥强盜」的，革命陣營中的相殘，一定也使魯迅痛苦。

於是他就躲在山會邑館裏抄古書古碑，不僅因爲寂寞和悲哀，也爲了在教育部裏無事可做。

但這一時期的魯迅，心境也並不寧帖，有時簡直在小事上紓他的憤懣，譬如**日記**：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日，聞臨時教育會議竟删美育，此種豚犬，可憐可憐！

八月十二日，半夜後鄰客以閩音高談，狺狺如犬相嚙，不得安睡。

九月二十日，鄰室又來閩客，至夜半猶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

十月七日，晚鄰閩又嗥。

一九一三年二月八日，上午赴部，車夫誤蹍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數人，突來亂擊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嘆！

魯迅不懂閩語，說閩客大嗥如野犬，未免有地域觀念作祟，也許有人視魯迅爲「偉人」的，認爲我這話說得不對，試再舉兩條**日記**以實吾言：

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下午赴中國通俗教育研究會，傍晚乃散。此會即在教育部假地設之，雖稱中國，實乃吳人所為，那有好事！

一九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夜鄰室王某處忽來一人，高談大呼，至鷄鳴不止，為之展轉不得眠，眠亦屢醒，因出屬發音稍低，而此人遽大漫罵，且以英語雜厠。人類差等之異，蓋亦甚矣。後知此人姓吳，居松樹胡同，蓋非越中人也。

魯迅遇見此種惡客，不復以「狗」視之。似乎心平氣和了，但兩則**日記**中的吳越之見，不免令人覺得可哂，吳人所為，那有好事！這是什麼邏輯？蓋非越中人也，難道越中人高人一等？

但據周作人說：魯迅是不肯承認是紹興人的，人家問他籍貫，只答說是浙江。紹興人不喜歡『紹興』這個名稱，他說理由是：紹興人滿天飛，『越諺』也登載『麻雀豆腐紹

與人』的俗語，說三者到處都有，實際是到處被人厭惡的緣故。

魯迅所住的山會邑館，宣統年間已改稱爲「紹興縣館」，傳說有女人吊死過的那棵槐樹，在補樹書屋外面，魯迅到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下午，才以避喧移入補樹書屋居住，因爲是一個獨院，再沒有什麼閫客之類來擾他，但那時又有貓，因爲牠們在配合時候的嗥叫，手續竟有這麼繁重，鬧得別人心煩，尤其是夜間要看書，睡覺的時候。魯迅於是大怒而起，拿着一枝竹竿，作人搬了小茶几，在後簷下放好，他便上前用竹竿痛打，把牠們打散。

魯迅的抄古書和古碑，這可說是一種自小的習慣，從他識字以後，他便歡喜描繪。回國以後，辛亥革命起事前後幾個月，作人便幫同魯迅翻看古書類書，抄錄**古小說鈎沉**和**會稽郡故書雜集**的材料，還有整本的如劉義慶的**幽明錄**之類。魯迅去了南京，也在圖書館借抄**沈下賢集**，**唐宋傳奇集**所收的**湘中怨辭**、**異夢錄**、**秦夢記**。所以他到北京以後的抄古書，不過是他原已開始的工作的繼續，和袁世凱的要做皇帝，特務陸建章派爪牙偵查黨人無關，這不是魯迅藉此韜晦。袁世凱稱帝不成，死於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據魯迅**日記**。

六月十五日，上午部派赴總統府弔祭，共五人。

二十八日，袁項城出殯，停止辦事。

可見魯迅在袁世凱統治之下，自做他的僉事，自抄他的古書，並未受到干擾。在章士釗做教育總長時，因女師大事件受到干擾，他在**日記**中就有記載的，這是後話，暫且不談。

魯迅一到北京，就蒐集古書，拓本，佛典。一九一四年他買的佛學書最多，一九一五年以後則買的拓本最多，這有他**日記**中的書帳可考，直到一九二三年，他仍未放棄這種工作。

我們可以說，魯迅從事這個工作，也許小部份的原因是爲了痲醉自己，大部分原因則由於他確實視爲一種有意義的工作。他那時所抄的古書古碑，對他的學問和爲人有幫助，可惜他的工作成果，後來祇影印了一部**嵇康集**。

許季茀說：

魯迅對於漢魏文章，素所愛誦，尤其稱許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們讀**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而已集**），便可得其梗概。為什麼這樣稱許呢？就因為魯迅的性質，嚴氣正性，寧願覆折，厭惡權勢，視若蔑如，皜皜焉堅貞如白玉，懍懍焉勁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類似的緣故。

至於他的搜集和抄古碑，據許季茀說：

魯迅的愛好藝術，自幼已然，愛看戲，愛描畫；中年則研究漢代畫像；晚年則提倡版畫。工作的範圍很廣，約畧言之：(一)搜集並研究漢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畫像和圖案，是舊時代的考據家鑑賞家所未曾着手的。他曾經告訴我：漢畫像的圖案，美妙無倫，為日本藝術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鱗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贊許，說日本的圖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淵源固出於我國的漢畫呢。（二）搜集並印行近代木刻，如**北平箋譜**等。（三）獎勵中國青年木刻家，不但創辦木刻講習會，自己担任口譯，使他們得以學習；創開各國名畫展覽會，使他們有所觀摩；對於本國新進者的作品，鼓舞批評，不加客氣。（四）介紹外國進步作家的版畫，例如精印『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這位有丈夫氣概的女子作品實在偉大，這本精印的選集實可寶貴，『只要一翻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鬥爭；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饑餓，流離，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號，掙扎，聯合和奮起………』

（且介亭雜文末編：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

許季茀對於魯迅抄古書古碑的論斷，說得很對，對於魯迅此後爲人爲事的發展，尤其說得深中肯綮。

也許魯迅在當時是爲了消遣寂寞的一種方法，無所爲而爲的，後來則發現了其中妙處，變成有所爲而爲了，魯迅對於此後中國木刻的提倡扶助，繼往開來，厥功甚偉，而且把這藝術領向現實的鬥爭，使牠成爲打擊反動勢力的一支尖兵，這都得推源到北京紹興縣館中歷時數年的工作。所以我覺得周作人的話不盡合乎事實，專制壓迫的空氣會使人趨於躲避，甚至頹廢，當時酒館中尚且貼着「莫談國事」的警告，祇有聲名蓋世的章太炎，才可以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罵袁世凱的包藏禍心，章太炎的學生，都不是從事實際工作的革命家（魯迅尤其不是），自無韜晦的必要，只是處在這個反動的環境中，雖不行動而有思想的人，必須設法麻醉自己才能活得下去，所以魯迅埋首在古書古碑當中。

要了解魯迅抄的是什麼古書，我們舉幾本重要的爲例，如：

> 一九一三年三月五日，夜大風，寫『謝承後漢書』始。
>
> 二十七日，寫『謝承後漢書』畢，共六卷，約十餘萬字。
>
> 二十八日，夜寫定『謝沈後漢書』一卷。
>
> 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五日，寫孫志祖『謝氏後漢補逸』起。
>
> 三月十四日傍晚『寫謝氏後漢書補逸』畢，計五卷約百三十葉，四萬餘字，歷二十七日。
>
> 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午後同關來卿先生往圖書館，並還所假書，別借宋本『易林注』二册……夜寫『易林注』。

七日，夜寫『易林』。

九日，夜寫『易林』殘本卷三，卷四一册畢。

十日，夜抄『易林』少許。

十一日，夜錄『易林』。

十二日，夜抄『易林』卷第十三畢。

十三、十四日，夜抄『易林』。

十五日，下午寫『易林』卷第十四畢。

八月十四日，續寫宋殘本『易林』起。

十七日，星期休息。終日在館寫書。

二十五日，夜續抄『易林』畢，計『卷七之十』四卷，合前抄共八卷。

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昨今兩夜從『說郛』寫出『雲谷雜記』一卷，多為聚珍版本所無，惜頗有譌奪耳，內有『辨上虞五夫邨』一則甚碻。

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六日，晚錄『雲谷雜記』起。

二十二日，夜寫張清源之『雲谷雜記』畢，總四十一葉，約一萬四千餘字。

一九一三年九月五日，夜寫『石屏集』序目畢。

十六日，夜影寫『石屏詩集』卷第一畢，計二十七葉。

二十四日，下午寫『石屏集』卷第二畢，計二十二葉。

十月一日，午後往圖書館尋王佐昌，還『易林』，借『嵇康集』一册，是明吳匏庵叢書堂寫本。夜抄『石屏集』卷第三畢，計二十葉。寫書時頭眩手戰，似神經又病矣。無日不處憂患中，可哀也。

十月九日，夜抄『石屏集』卷四畢，計二十葉。

十一日，夜寫『石屏集』第五卷畢，計十一葉。

二十八日，寫『石屏集』卷六畢，計四十六葉。發熱，似中寒，服規那丸。

三十一日，寫『石屏詩集』第七卷畢，計十八葉。

十一月一日，夜錄『石屏集』卷八畢，計六葉。

七日，夜寫『石屏集』卷九畢，計二十五葉。

十五日，夜寫『石屏集』卷十畢，計三十葉。

十六日，夜抄『石屏集』跋二葉畢，於是全書告成，凡十卷，序目一卷，總計二百七十二葉，歷時八十日矣。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往留黎廠，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

十月十五日，夜以叢書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國文』，摘出佳字，將於暇日寫之。

十九日，夜續校『嵇康集』。

二十日，夜校『嵇康集』畢，作短跋繫之……

十二月十九日，續寫『嵇中散集』。

三十日，夜寫『嵇康集』畢，計十卷，約四萬字左右。

一九一五年六月五日，下午得蔣抑卮書並抄文瀾閣本『嵇中散集』一部二册。

直至一九二一年，魯迅仍在校勘『嵇康集』。

二月十二日，校『嵇康集』一過。

三月二日，以明刻六卷本『嵇中散集』校文瀾閣本。

八日，下午校『嵇中散集』畢。

一九一四年四月六日，夜坐無事，聊寫『沈下賢文集』目錄五紙。

七日，夜寫『沈下賢集』一卷。

九日，夜寫『沈下賢集』第二卷了。

十一日，夜寫『沈下賢文集』第二卷畢。

十二日，寫畢『沈集』卷第四。

十六日，傍晚寫『沈下賢集』卷五畢。

十七日，寫『沈下賢集』卷第六畢。

十九日，寫『沈下賢文集』卷七畢。

二十三日，夜寫『沈下賢文集』卷第八畢。

二十七日，夜寫『沈下賢文集』卷第九畢。

五月十七日，夜寫『沈下賢文集』第十卷畢。

二十四日，星期休息。寫『沈下賢文集』第十一卷畢。午後大風。夜寫『沈下賢文集』第十二卷並跋畢，全書成。

其他補抄的校核的書，還很多，這工作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爲止，以後**日記**上就不見記載。

至於蒐集古碑拓本，直到一九三六年都沒有停止，他死前的八月十七日，還有朋友王正朔寄他「南陽漢石畫象」六十七枚，可見他的興趣畢生不衰。

在這期間，他還從日本文中譯了有關教育的文章，如一九一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連續三夜，譯了上野陽一著的**兒童之好奇心**，約六千字，登在**教育部月刊**；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譯**兒童觀念界之研究**等。

其間他又研究佛經，據許季茀說：魯迅讀佛經，當然是受章先生的影响。先生在西獄三年，備受獄卒的陵暴。鄒容不堪其虐，因而病死。先生於做苦工之外，朝夕必研誦**瑜伽師地論**，悟到大乘法義，才能克服苦難，期滿出獄後，鼓動革命的大業。

民三（一九一四年）以後，魯迅開始看佛經，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他買了本**瑜伽師地論**，見我後來也買了，勸我說道：『我們兩人買經不必重複。』我贊成，從此以後就實行，例如他買了**翻譯名義集**，我便不買它而買**閱藏知津**，少有再重複的了。他又對我說：『釋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份早已明白啟示了，真是大哲！』但是後來魯迅說：『佛教和孔教一樣，都已經死亡，永不

會復活了。』所以他對於佛經只當做人類思想發達的史料看，藉以研究其人生觀罷了。別人讀佛經，容易趨於消極，而他獨不然，始終是積極的。……

抄書的結果，他刻行了**會稽郡故書雜集**，讀佛經的結果，他刻印了**百喻經**。

× × ×

一般的印象，魯迅是排斥京戲的，因爲在**社戲**上他曾寫過初到北京時看戲的經驗。

第一回是民國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時候，當時一個朋友對我說，北京戲最好，你不去見見世面麼？我想，看戲是有味的，而況在北京呢。於是都興致勃勃的跑到什麼園，戲文已經開場了，在外面也早聽到鼕鼕地響。我們挨進門，幾個紅的綠的在我的眼前一閃爍，便又看見臺下滿是許多頭，再定神四面看，卻見中間也還有幾個空座，擠過去要坐時，又有人對我發議論，我因為耳朵已經喤喤的響着了，用了心，纔聽到他是說：『有人，不行！』

我們退到後面，一個辮子很光的卻來領我們到了側面，指出一個地位來。這所謂地位者，原來是一條長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狹到四分之三，他的腳比我的下腿要長過三分之二。我先是沒有爬上去的勇氣，接着便聯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

走了許多路，忽聽得我的朋友的聲音道，『究竟怎的？』我回過臉去，原來他也被我帶出來了。他很詫異的說，『怎麼總是走，不答應？』我說，『朋友，對不起，我耳朵只在鼕鼕喤喤的響，並沒有聽到你的話。』

…………

第二回忘記了那一年，總之是募集湖北水災捐而譚叫天還沒有死。捐法是兩元錢買一張戲票，可以到第

一舞台去看戲，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買了一張票，本是對於勸募人聊以塞責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機對我說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於是忘了幾天的鼕鼕喤喤之災，竟到第一舞台去了，但大約一半也因為重價購來的寶票，總得使用了纔舒服。我打聽得叫天出台是遲的，而第一舞台却是新式構造，用不着爭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點纔出去，誰料照例，人都滿了，連立足也難，我只得擠在遠處的人叢中看一個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邊插着兩個點火的紙捻子，旁邊有一個鬼卒，我費盡思量，纔疑心他或者是目蓮的母親，因為後來又出來了一個和尚。然而我不知道那名角是誰，就去問擠小在我左邊的一位胖紳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說道『龔雲甫』！我深愧淺陋而且粗疏，臉上一熱，同時腦裏也製出了決不再問的定章，於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麼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從九點多到十點，從十點到十一點，從十一點到十一點半，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

這一天，就是我對於中國戲告了別的一夜，此後再沒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經過戲院，我們也漠不相關，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天之北了。

魯迅這兩次的經驗，實際上並未接觸到京戲這一個劇種的藝術本身，只由於當時的劇場秩序太凌亂，太落後，使他無法欣賞台上演員的唱腔和身段，無法了解劇情的發展，從此裹足了，可是魯迅初到北京時，對於京劇的改良是頗有興趣的，如日記所載：

六月十日，午後與齊宗頤赴天津，寓其族人家。夕赴廣和樓考察新劇，則以天陰停演，遂至丹桂園觀舊劇。

十一日，午後赴天樂園觀舊劇。夜仍至廣和樓觀新

劇，僅一齣，曰：『江北水災記』，勇可嘉而識與技均不足；餘皆舊劇，以童子為之，觀者僅一百卅餘人。

以後他在一九二四年到陝西西安去講學，曾數度去易俗社觀劇，照他所記的劇名看來，諒是舊秦腔劇，劇種不同而已。

他的正式談到京劇，乃是一九三四年的**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但與其說他反對梅蘭芳，不如說他反對的是梅蘭芳的捧角家。其說如下：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傳統。辛亥革命後，伶人的品格提高了，這崇拜也乾淨起來。先只有譚叫天在劇場上稱雄，都說他技藝好，但恐怕也還夾着一點勢利，因為他是『老佛爺』——慈禧太后賞識過的。雖然沒有人給他宣傳，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聲，卻也沒有人來為他編劇本。我想，這不來，是帶着幾分『不敢』的。

後來有名的梅蘭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蘭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寵兒，這就使士大夫敢於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改成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們的手，這東西也就跟着他們滅亡。他們將他從俗衆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教他用多數人聽不懂的話，緩緩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戲的，這時卻成了戲為他而做，凡有新編的劇本，都只為了梅蘭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蘭芳。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也在日見其消沉，梅蘭芳近來頗有些冷落。

因為他是旦角，年紀一大，勢必至於冷落的嗎？不是的，老十三旦七十歲了，一登台，滿座還是喝采。為什麼呢？就因為他沒有被士大夫據為己有，罩進玻璃

罩。

名聲的起滅，也如光的起滅一樣，起的時候，從近到遠，滅的時候，遠處倒還留着餘光。梅蘭芳的遊日，遊美，其實也不是光的發揚，而是光在中國的收斂。他竟沒想到從玻璃罩裏跳出，所以這樣的搬出去，還是這樣的搬回來。

他未經士大夫幫忙時候所做的戲，自然是俗的，甚至於猥下，骯髒，但是潑刺， 有生氣。待到化為『天女』，高貴了，然而從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憐。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數人是倒不如看一個漂亮活動的村女的，她和我們相近。

此外，早在一九二四年，魯迅由於在照相館看到梅蘭芳「天女散花圖」或「黛玉葬花圖」，發過一陣子感慨，他說：

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因為從兩性看來， 都近於異姓， 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

這是從京戲和別的劇種歸納出來的一種結論，簡直探索到奇妙的兩性心理上去了。

魯迅是戲劇的改良論者，至少希望戲劇不要給士大夫據為己有，罩進玻璃罩。時代不同，現在京戲和別的劇種，都是有了改良了，士大夫早已打倒，意識形態的改變，使戲劇不斷地改換其面貌，這一切當然符合魯迅最初的期望。但所謂「樣版戲」，是用「毛澤東思想」做成了另一種式樣的玻璃罩的，林妹妹換了「無產階級形象」，仍然是死板板的，矜持得可憐的，因為他們都用一個模子印出來的，這不是活生生的現實裏的英雄人物，所以和我們也並不相近。

× × ×

魯迅雖然不斷訴說寂寞和悲哀 ， 但他在北京初期的生活，也有怡然自得的一面，一九一二年的日記有云。

七月十四日，下午偕銘伯，季市飲於廣和居 ， 甚

醉。

二十七日，晚與季市赴谷青寓，燮和亦在，少頃大雨，飯後歸。道上積潦二寸許，而月已在天。

八月十六日，夜飲於季市之室。

二十日，上午同司長並本部同事四人往圖書館，閱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寫經，又見宋、元刻本不少，閱畢，偕稺壽山游十刹海，飯於集賢樓，下午四時始回寓。

二十二日，晚錢稻孫來，同季市飲於廣和居，每人均出資一元。歸時，見月色甚美，騾游於街。

九月五日……飯後偕錢稻孫步至什刹海飲茗，又步至楊家園子買蒲陶，卽在棚下噉之，……

二十五日陰曆中秋也。晚銘伯，季市招飲，談至十時返室，見圓月寒光皎然，如故鄉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餅祀之不？

十月二十七日，本館祀先賢，到者才十餘人，祀畢，食茶果。夜微風，已而稍大，窗前棗葉簌，亂落如雨。

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後同季市至觀音寺街購齒磨一，鏡一，寧蒙糖一，共銀二元，又共啜茗于青雲閣，食蝦仁麵合。晚銘伯招飲，季市及俞毓吳在座，肴質而旨，有鄉味也。談良久歸。

劉半農曾說魯迅所作是「魏晉文章」，讀他的日記便覺有此種風味。

× × ×

魯迅對於家庭的照顧，眞可說是無微不至的，他一個月中最多時寫十二封信給作人和建人，並及二弟婦和三弟婦，從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北京，直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帶着全家離開新台門爲止，在這七年之中他寫的家信不下於六百封（約畧的計算）。

他寄的家用從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三年八月，每個月爲銀圓五十元，從是年九月至一九一九年一月每月爲一

百元，從不缺少。在辛亥革命前後，生活程度非常低，而且穩定，當時用錢主要以銅元做單位，一枚銀幣可兌換銅元一百枚，魯迅一家老幼，幾年之中，從四口添到七八口，如果把魯迅寄去的錢，每月化光，那是豪富之家了。如果有什麼特別支出，魯迅另外寄錢，如買屋、造墳、爲母親祝壽等。

魯迅對於在東京的羽太一家，時有資助，每月或數月，從日圓十元至五十元不等。羽太一家，除與作人結婚的信子以外，尙有芳子，福子，和她們的哥哥重久，資助並不限於家用，福子的學費，重久入營服兵役時的用費，他也均有幫助。

他的家信大多數寄給作人，理應有所保存的，但在魯迅死後，並未見有發表。從**魯迅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二個兄弟，弟婦，及姪子輩的深情摯意。

日記：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九日，苦望二弟信不得。

二十三日，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發。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婦於十六日下午七時二十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極安好，可喜！

（周作人**回想錄**：……又因分娩在即，要人照管小孩，所以去把妻妹叫來幫忙；這時她只有十五歲的樣子，由她的哥哥送來，但是到得上海的時候，這邊却是已經生產了。）

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日，赴勸業場理髮，又買不倒翁兩個，擬以貽二弟。

七月三日，豐丸傷風，往診陸炳常。（按：魯迅此時告假回里。）

四日，午後延陸炳常來診母親、芳子、豐丸。

二十六日，晨因豐丸發熱，往診陸炳常。夜不睡。

二十七日，豐丸熱減。下午乘舟向西興。以予身居孤舟中，頗有寂聊之感。

十月五日，寄二弟信，又寄餅餌一匣與豐丸。

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下午得二弟函附芳子箋，十三日發。芳子於舊歷二月四日與三弟結婚，即新歷二月二十八日。

（芳子的年齡，當時應該祇有十七歲，芳子和建人的婚姻，後來似不盡圓滿，魯迅在滬定居時，建人已另有妻子，並生有子女，**魯迅日記**中均可考見。芳子仍依作人夫婦而居，**魯迅書簡**寄母親信（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有云：

老三是好的，但他公司裏的辦公時間太長，所以頗喫力。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灣逼去一大半，而上海物價，每月只是貴起來，因此生活也頗窘的。不過這些事他決不肯對別人說，只有他自己知道。男現只每星期六請他喫飯並代付兩個孩子的學費，此外什麼都不幫，因為橫豎他去獻給八道灣，何苦來呢？八道灣是永遠填不滿的。

日記：

七月十日，又得二弟信言弟婦於五日下午十一時生一女………

一九一五年三月一日，十時得二弟及三弟信，言三弟婦於二月二十五日丑時生男，舊歷為正月十二日也………

八月十七日，得三弟所譯**生物學**中下卷藁子二冊，又芳子及冲攝景一枚………

二十六日，上午得二弟寄來女謐攝景一枚……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三弟婦大病，延醫來。

二十一日，夜三弟婦以大病卧哭，五時始睡。

（按：魯迅此時回家爲母祝壽。）

魯迅對於家庭間，可謂「親其親」，「幼其幼」，充分盡其爲長兄的責任，後來作人和他鬧翻，友朋中無一直作人

者。

魯迅爲母祝壽的事，祇在**日記**上見之。

十二月十一日，午後客至甚衆。

十二日，下午唱『花調』，夜唱『隔壁戲』及作小幻術。

十三日，舊歷十一月十九日為母親六十生辰。上午祀神，午祭祖。夜唱『平湖調』。

十五日，客漸漸散去。

「祀神祭祖」，你不覺得魯迅「言行不一致」嗎？他是爲了服從母親一輩代的生活習慣而出此的，跨在新舊兩個時代，魯迅採取妥協和調和的態度，他從不自命爲革命者，在家庭方面尤其如此。

魯迅有一篇小說：**兄弟**，寫的時候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但發生的故事是一九一七年五月八日開始的事，那時作人第一次去北京，他年已三十三，却未出過疹子，那時在北京正流行着猩紅熱，這使魯迅慌了。作人和魯迅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不穆，但過後二年，魯迅寫**弟兄**時感情仍如此眞摯，我們把**魯迅日記**抄摘些出來，再同作人的**回想錄**比較，誰的天性涼薄，就昭然若揭了。

魯迅日記：

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費六十…………

四月一日，夜二弟自越至，……翻書談説至夜分方睡。

二日，午後同二弟至益昌午飯。

七日，下午同二弟游留黎廠……

九日，夜同二弟往銘伯先生寓。

十五日，上午同二弟至留黎廠，……又至青雲閣飲茗歸。

二十二日，午同二弟往廣和居飯，又至留黎廠……

二十三日，晚同二弟往許季上寓飯，同席共七人。

二十八日，晚戴螺舲招飲，同二弟至其寓，合坐共七人。

五月六日，上午同二弟往留黎廠，……午同往益昌飯。

十二日，上午二弟就首善醫院。

十三日，二弟延Dr. Grimm 診，云是瘄子。齊壽山譯。夜寄鶴頎先生信，為二弟告假。

十四日，自告假。

十五日，自告假。

十六日，午後自請假。下午延 Dr. Diper 為二弟診。齊壽山來譯。

在這期間，魯迅與作人妻羽太信子通信甚密，諒是報告作人病情。

六月十日，下午同二弟往昇平園浴。

七月十六日，午後同二弟至昇平園理髮並浴。

二十九日，午並二弟同至廣和居飯，又游留黎廠已，……自與二弟往青雲閣啜茗。

八月五日，午前同二弟往留黎廠，……又至青雲閣飲茗並午飯。

九月一日，晚封德三招飯於香廠澄園，與二弟同往，………

九日，上午同二弟訪季市不遇……

十月七日，上午同二弟至王府井街食餅餌已，遊故宮殿並觀文華殿所列書畫，復游公園飲茗歸。

日記雖簡單，但魯迅與作人友愛之情，盎然可見。據許季茀所記，作人病後，魯迅第二天到部，眼眶陷落，尚未恢復。一九二一年作人養疴香山碧雲寺，因爲費用浩大，魯迅又四處奔走，借貸應急，並且時常前往護視。

弟兄雖是一篇小說，但與他的**日記**一對照，記的却是當

時的實際感情，小說中的張沛君是他的化身。

爲什麼魯迅在兄弟失和二年之後，還有興趣寫**兄弟**呢？是不是這失去了的三十年如一日的手足之愛，值得魯迅追懷呢？他寫得如此至情，連晚年的作人，在**回想錄**中也說，牠與事實相合。但作人却說得如此客觀，在當時，在後來，他都沒有爲魯迅此種摯愛所動，我們且把他的**回想錄**引一些在這裏吧：

在當時風聲很緊，正是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按：當時正鬧張勳復辟），我却個人先自遇到了一件災難，生了一場不小不大的病。我說不大，因為這只是一場痲疹，凡是小孩子都要出一遍的，只要不轉成肺炎，是並無什麼危險的。但這裏我又說是不小，則因我終究不是小孩了，已經是三十以上的成人，生這種病是頗有危險，因為發熱很高，頗有猩紅熱的嫌疑。但是我信憑西醫的診斷，相信這是疹子，不過何以小時候沒有出過，直到成人以後再出，則與我在四歲時候的出天花，同是不能解的事情。當發高熱的時候，的確有點兒危險；魯迅也似乎有點兒張惶了，決定請德國醫生來看，其時狄博爾是北京外國醫生最有權威的人，雖然他的診費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貴，要十二塊錢看一趟。我現在來抄錄當年一部份的舊日記在這裏，這是從五月八日起頭的：

八日晴，上午往北大圖書館，下午二時返。自昨晚起稍覺不適，似發熱，又為風所吹，少頭痛，服規那丸四個。

九日晴風。上午不出門。

十一日陰風。上午服補丸五個，令瀉，熱仍未退，又吐。

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醫院，俄國醫生蘇達科甫出診，云是感冒。

十三日晴。下午請德國醫院醫生格林來診，云是疹子，齊壽山君來為翻譯。

十六日晴。上午請德國醫生狄博爾來診，仍齊君譯。

二十日晴。下午招匠人來理髮。

廿一日晴。下午季弟貽菜湯一器。

…………

以上便是生病的全部過程，日子並不算怎樣長，在二十左右便已好起來了。那天裏已可理髮，而且在第二天許季茀送一碗菜來，吃時覺得特別鮮美，因為那時候似乎遍身都蛻了一層皮，連舌頭也蛻到了，所以特地有一種感覺，但是過了一天便又是如常的長上舌苔了。魯迅在徬徨裏邊，有一篇題名**弟兄**的小說，是一九二五年所作，是寫這件事的，雖然也是『詩與事實』的結合，但大概却是與事實相合，特別是結末的地方：

『他旋轉身子去，對了書桌，只見蒙着一層塵，再轉臉去看紙窗，掛着的日曆上，寫着兩個漆黑的隸書：廿七。』……

魯迅的篤於家庭感情，不只對作人如此，對兩個弟婦，和作人建人的孩子都是如此。**日記**上這種關心隨處可見。在小說**吶喊**中，**兎和貓**，**鴨的喜劇**所寫的孩子們，仲密太太，三太太，一望而知是他們一家人的寫照，他寫得如此娓娓動人！

北京生活（二）——新青年——語絲——未名社

袁世凱的帝制夢成空，於一九一六年六月，且以身殉後，曾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就任了北大校長，而且延攬了陳獨秀做文科學長。陳獨秀早已在編輯一本**青年雜志**，這是**新青年**的前身，文字用文言，並沒有什麼革命的主張，但魯迅注意到這本雜誌，他買了寄給作人。

錢玄同是魯迅在東京時的朋友，大家問學於章太炎之門的，有一天，他在紹興縣館訪問了魯迅，據魯迅事後說：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

查**魯迅日記**，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得錢玄同信；十月八日，錢玄同來，以後他就是魯迅的常客了。**狂人日記**作於一九一八年四月，登載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上，這是用白話作小說的第一篇，以反對吃人的舊禮教爲主旨。前乎此，**新青年**已發表了陳獨秀胡適關於文學革命的文章，和吳

虞反對孔子的文章，對於五四運動盡了推進作用。魯迅的參加雖然較遲，但一經參加便也成爲一員戰士，他的雜感和小說，都可以獨樹一幟。他說：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于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者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却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魯迅自謙在**隨感錄**中所寫的多是小問題，當時的**新青年**正在四面受敵，他所對付的不過是一小部分，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牠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魯迅是想用熱風去驅除寒冽空氣的，在**新青年**之後，他永遠堅持着這點，而且熱風越吹越烈，但始終是吹吹而已，要眞正驅除寒冽的空氣，得用革命手段，但魯迅不是一個革命者。

新青年的大將們，一部分變成了革命者，**新青年**的時代使命一完結，他們便轉進到另一個更高更現實也更澈底的陣地；至於另一部分呢，有的停在原地點，以教授終其身；有的學而優則仕，至終做了「過河卒子」。

新青年一共出了九卷，從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二二年七月，過後，便成爲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刋物，與原來的**新青年**實質上完全不同了。第九卷共出六號，魯迅和**新青年**的關

係，維持到九卷一號爲止，第四號以後，實質已變，內容盡爲有關社會主義的討論，參加者已多爲社會主義者了。這分化是必然的。魯迅在一九二七年之後，才逐漸成爲這方面的同路人。

俄國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影响了魯迅，使他同情東歐的被壓迫民族；一九一七年二月和十月的革命，則影响了中國幾輩代廣大的知識分子，從理論走向實踐，於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魯迅雖然從消極轉到積極，但他並未積極到成爲共產黨員，得經過更多的道路，他才放棄他的進化論，接受了階級鬥爭論。

但魯迅的積極不過是他消極的反面，他的消極甚至走到虛無，他的壯年時代，就是在積極和消極的兩種精神互相作用之下渡過的，所以他非常矛盾，簡直在過着兩重生活。

魯迅參加**新青年**之後不久，**新青年**的骨幹分子實際上已預兆了分裂，**新青年**是月刋，偏於理論，無法反映當時的政治要求，於是由**新青年**的一部分人發起出版**每周評論**，它是四開的報紙，分四版，有重大事件出增刋，內容分國外大事述評、國內大事述評、社論、隨感錄、新文藝、文藝時評、國內勞動狀況、評論之評論、通訊、讀者來論、新刋批評、選論、名著等欄。這份周報影响深遠，五四以後各地新出版的刋物，如上海的**星期評論**、長沙的**湘江評論**、成都的**星期日**、杭州的**浙江潮**和**錢江評論**等，都是模仿周報的。

每周評論創刋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陳獨秀和李大釗發起的，這兩個人後來是共產黨一南一北的領導人；撰稿有周作人、高一涵、王光祈、張申府、胡適等。**每周評論**既以評論政治爲目的，所以標榜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在二十五期以前祇寫了四篇關於文學的文章。**每周評論**對於當時的內憂外患，抨擊得非常凌厲，北洋政府自然視之爲眼中釘，又因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畧劍及履及，直接引致了歷史上有名的「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陳

獨秀親自在香廠分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被捕，拘留了八十天，影響到**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出版，而且由此發生了內部的分歧。

新青年因陳獨秀被捕而停刊四個月，到十一月一日纔在上海復刊，這就是第六卷第六號。**每周評論**從二十一期起至二十五期止，全部或大部分報導五四發生的事情，反對日本侵略，斥責北洋政府賣國，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等以銳利的文筆，對羣衆起了鼓動、宣傳和領導的作用，等到陳獨秀被捕，李大釗亡命，編輯責任落在胡適之手上，對於繼五四而發生的六三愛國運動，就採取漠不相干的立場。二十六、二十七兩期的評論，充塞了「杜威演講錄」之類的學術性文章。

三十一期的**每周評論**，胡適發表了有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篇文章是反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者的宣告，在意識形態上左右派已是分道揚鑣了。

魯迅對於**每周評論**並未參加，在任何有關當時記載的文字，和紀念魯迅的文字，連**魯迅日記**在內都找不出他曾經參加過這一有充分政治作用的雜誌的跡象。他在**新青年**登過的文章，收集在**熱風**、**吶喊**、**墳**等內的，篇幅不算多，除**狂人日記**較有戰鬥性，**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提出新的觀點外，其他如**孔乙己**、**藥**、**風波**、**故鄉**等小說，都偏於描寫落後的農村生活中小人物的愚昧，照見過去，自然可以洞燭未來，但這種寫實主義的小說還是帶有消極性的，即使後來最最出名的**阿Q正傳**，也是笑中見淚，鞭撻中含有悲哀，和魯迅當時的生活和精神狀態不可分離，這就是他所說像大毒蛇一樣纏住他靈魂的寂寞，和在寂寞中反省出來的自己——他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正由於此，他在「五四」、「六三」那樣的熱火朝天的運動中，能一貫保持冷靜，繼續在補樹書屋摩挲他的古碑拓本。

倒是那時的周作人比較得站在前進的行列，據**回想錄**中

的記述：

每週評論預定於十二月十四日創刊，我乃寫了『人的文學』，於十二月七日脫稿，送了過去，十四日得仲甫回信道：『大著人的文學做得極好，唯此種材料以載月刊為宜，擬登入**新青年**，先生以為如何 ？ 週刊已批准，定於本月二十一日出版 ， 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卽須交稿。文藝時評一欄 ， 望先生有一實物批評之文。』因此我就改作了一篇『平民的文學』，是二十日做成的，此外又寫了一篇『論黑幕』，這兩篇文章在**每週評論**第四五兩期上登載了出來。此後在二月十四日又寫了『再論黑幕』，不曉得發表在什麼時候……比較得至今還記得清楚的，是兩篇別的文章，因為這些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說是近於『言志』的東西，這卽是『祖先崇拜』與『思想革命』……

『五四』的情形，因為我不在北京，不能知道；但是一個月之後，遇見『六三』事件 ， 我却是親眼目睹的，有些事情便在**每週評論**上反映了出來。五四是大學生干預國政運動的開始，所以意義很是重大，六三則是運動的擴大，中小學生表示同情，援助大學生，出來講演游行。北洋政府慌了手脚，連忙加以鎮壓，可是對於幼小學生，到底不好十分亂來，只好遇見就拘捕起來。那一天下午，我在北大新造成的第一院，二樓中間的國文系教授室 ， 那時作為教職員聯合會辦事室的一間屋裏，聽說政府捉了許多中小學生拘留各處，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法科那裏，於是陳伯年、劉半農、王星拱和我四人便一同前去，自稱係北大代表，慰問被捕學生，要求進去，結果自然是被拒絕，只在門前站着看了一會兒。三院前面南北兩路斷絕交通，隔着水溝（那時北河沿的溝還未填平）的東邊空地上聚集了許多看熱鬧的男女老幼都有，學生隨時被軍警押着送來，有的只是十三

四歲的初中學生，走到門前，在門樓上的有些同學，便拍手高呼歡迎他，那看熱鬧的人也拍手相應。有的老太婆在擦眼淚，她眼看像她孫兒大的小學生被送進牢門（雖然這原是譯學館的門）裏不見了，她怎能不心酸呢？反動政府對於革命運動的無理的鎮壓，不但給予革命者本身，也給予一般民衆以最好的訓練，使得他們了解併同情於革命，往往比運動本身更有效力。

這一天就在混亂中過去了，第二天是六月四日，下午二時至第二院理科赴職教員會，沒有什麼結果，又回至文科，則門外已駐兵五棚，很有不穩的形勢。五日下午仍至文科，三時半出校，步行至前門内警察所門前，有學生講演不能通行，大隊軍警包圍着他們；我們正想擠過去，馬隊便過來衝散行人，有一老翁忽然大怒，說我們平民為什麼路都不能走，要奔去馬隊拼命，好容易由旁人勸止；這一件小事也就可以證明，和平的小市民怎麼的被激動而引起反政府的感情，這全由於北洋政府自己的行動，並不單是學生的講演所能造成的。……

魯迅確實沒有參加這個運動，他的**日記**：

五月四日，星期休息。徐吉軒為父設奠，上午赴弔，並賻三元。下午孫福源君來。劉半農來，交與書籍兩册，是丸善寄來者。

六月三日晴。下午曇。同徐吉軒往護國寺一帶看屋。晚大風一陣後，小雨。

「五四」過去了，「六三」也過去了，**每周評論**被封，陳獨秀繫獄未釋，李大釗躲避在鄉下，**新青年**停頓着。魯迅在一九一九及二〇年兩年中沒有寫雜感文章，他在**熱風題記**中說：

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

也許他以後在**華蓋集**題記上說的話，一樣可以說明當時

他所以不寫什麼文字的理由：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

一九三五年，魯迅死前的一年，他回憶到北京當年時說：

在北京這地方——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一九二〇至二二這三年間，倒顯着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

但是**新青年**在停頓了四個月之後，仍然出版了，牠轉移了陣地，跟隨着陳獨秀到上海出版。

第六卷第五號是在北京出版的最後一期，這期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但也登有魯迅的小說**藥**。

第六號中則登有魯迅的文章：**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從第六卷第一號起，本已成立編委會，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六人輪流主編的。移滬出版之後，這計劃當然不能實現，魯迅並未參加過這種主編職務，但他是參加編輯會的，他在**憶劉半農君**文中說：**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

新青年分裂了，這也就是陳獨秀和胡適之的分裂，胡適之既提倡「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和李大釗發生爭論，自然一方面撐着杜威實驗主義的大旗，一方面掄着馬克思主義的棍子，無法合作下去的。但陳獨秀並不想獨佔**新青年**，也許當時意識形態的鬥爭尚未到劇烈的階段，所以他們採取調和態度。他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六夜寫信給胡適之，高一涵：

弟今晚即上船赴粵。此間事都已布置了當，**新青年**編輯部事有陳望道君可負責，發行部事有蘇新甫君可負

責。**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幾册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來文太少，也是一個重大原因，請二兄切實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一涵兄與慰慈兄譯的『工業自治』，已成功沒有？譯成時望寄社中，前成一段已檢存望道君處（望道君已移住南陽里二號）。

南方頗傳胡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此次高師事，南方對孟和頗冷淡，也就是這個原因，我希望諸君宜注意此事。餘言俟到粵再談。弟獨秀十六夜。

胡適之提出的答覆是：

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兄言『近亦不以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實，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決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手段之神速。現在想來，只有三個辦法。

1.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極有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間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計劃，故不曾對朋友說。

2.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復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但此時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為不願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張趁兄離滬的機會，將**新青年**編輯的事，自九卷一號移到北京來。由北京同人於九卷一號內發表一個新宣言，畧根據七卷一號的宣言，而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

孟和說，**新青年**既被郵局停寄，何不暫時停辦，此是第三辦法。但此法與**新青年**的營業，似有妨碍，故不如前兩法。

總之，此問題現在確有解決之必要 。望兄質直答我，並望原諒我的質直說話。

此信一涵、慰慈見過。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內容，他們對於前兩案辦法都贊成，以為都可行。餘人我明天通知。適。

撫五看過。說『深表贊同』。適。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給上海編輯部看。適。

獨秀接到此信後，反應極壞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胡適之分函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啓明、撫五、一涵。他說：收陳十二月十六夜信後，覆信曾提出兩條辦法（原信奉上），我自信此兩條皆無足以引起獨秀誤會之處，不意獨秀答書頗多誤解。守常兄已將此書傳觀，我至今日始見之，未及加以解釋，恐誤會更深，故附加一函，並附獨秀與孟和書一份，再請你們各位一看。

胡適在回信中又說： 第三條『停辦』辦法， 我本已聲明不用，可不必談。第二條辦法，豫才、啟明和孟和都『主張不必聲明不談政治』，我於第二次與獨秀信中曾補敘入。此條含兩層：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談政治。獨秀對於後者似太生氣 ， 我很願意取消『宣言不談政治』之說，單提出『移回北京編輯』。……

信中又說：獨秀對於另辦一雜誌的辦法，也有一層大誤解。 他以為這個提議是反對他個人。 我並不反對他個人，亦不反對**新青年**。不過我認為今日有一個文學哲學雜誌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漢譯本，故我想另創一個專關學術藝文的雜誌。今獨秀既如此生氣，並且認為反對他個人的表示，我很願意取消此議，專提出『移回北京編輯』一個辦法。 總之， 我並不反對獨秀——你們看他給孟和的信，便知他動了一點感情，故輕信一種極可笑的謠言。………

結果贊成胡適之主張的，有張慰慈、高一涵、王撫五。

贊成第一條辦法的，有李守常。

贊成分裂的，有周氏兄弟。

周作人說：我看現在**新青年**的趨勢是傾於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調和統一。無論用第一、第二條辦法，結果還是一樣，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條或者倒還好一點。

魯迅的意見相同，但他補充一點：但不必爭**新青年**這一個名目。

錢玄同的話，說得更是透澈：我以為我們對於仲甫兄的友誼，今昔一樣，本未絲毫受傷。但**新青年**這個團體，本是自由組合的，即使其中有人彼此意見相左，也只有照『臨時退席』的辦法，斷不可提出解散的話。極而言之，即使大家對於仲甫兄感情真壞極了，友誼也斷絕了，只有他一個人還是要辦下去，我們也不能要他停辦。至於**新青年**精神之能團結與否，這是要看各個人的實際思想如何來斷定，斷不在乎**新青年**三個字的金字招牌。

衍變至此，**新青年**確乎祇有分裂一途了，二月十五日，獨秀致函胡適之，就是分裂的正式宣告。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六號付排時，印刷所受法國帝國主義者的搜查，稿件被沒收，所以這一期遲至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才能出版。以後雖移粵出版，但九卷四號起完全成爲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刋物。

獨秀的信如下：

> 六日信收到了。我當時不贊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實說是因為近來大學空氣不大好；現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粵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問題了。你們另外辦一個報，我十分贊成，因為中國好報太少，你們做出來的東西總不差，但我却沒有工夫幫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時不能回上海了。你勸我對於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認是我應該時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總是時時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書呆子為

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分好了，不可上課，做文章，而且很想你來廣東一遊。弟獨秀白。

陳獨秀所擔心的好朋友書呆子，後來辦了**努力週報**，自命爲不談政治的提倡了「好人政府」，本來鼓吹文學革命的鑽進了國故堆中，祇有當時站在中間立場的周氏兄弟和錢玄同保持獨立，並未加入**努力週報**。到他們第三勢力的刊物**語絲**出版，和繼承**努力週報**的**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爲敵，可說是開闢了第二戰場。

過了許多年之後，魯迅時時回憶到五四這個時代：……而北京學界，前此固亦有其光榮，這就是五四運動的策動。現在雖然還有歷史上的光輝，但當時的戰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隱』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場惡鬥，幾乎令人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感。……這當然指的是胡適之一流人物。

但說到當時的文風，魯迅對胡適之也很佩服的，……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畧比作一間倉庫罷。 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 大書道：『內有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却開着的 ， 裏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着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着頭想一想 。 半農却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却親近半農。

繼錢玄同之後，劉半農確也是紹興縣館的一個常客。

魯迅對陳胡文風的評斷，也卽是對他們人格的評斷，有道是「文如其人」。陳獨秀從參加辛亥革命，到領導五四運動，建立中國共產黨，加入托派，直至發表**我的根本意見**，離開托派爲止，他都是開着大門 ， 讓人家看清楚他的武器的，這是一個作爲革命家的他的偉大處，和那種祇知玩弄政治手段的陰謀家、陽謀家不能相提並論的。

魯迅當時親近的主要是錢玄同和劉半農，對於前者，魯迅批評道：………例如玄同之文，卽頗汪洋，而少含蓄，使讀者覽之了然，無所疑惑，故於表白意見，反為相宜，效力亦復很大，我的東西卻常招誤解，有時竟大出於意料之外，可見意在簡練，稍一不愼，卽易流於晦澀，而其弊有不可究詰者焉。（不可究詰四字頗有語病，但一時想不出適當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頗大』耳。）

對于後者，魯迅的評論相當多，但這確實是對於一個朋友的評論，這和魯迅對於章太炎的評論一樣，師友相處之道，魯迅給予了一個模式，確實值得人們效法的。所以我儘量把魯迅後來有關劉半農的文章引在下面：

> 我已經忘記了怎麼和他初次會面，以及他怎麼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後，由蔡孑民先生或陳獨秀先生去請來的，到了之後，當然更是**新青年**裏的一個戰士。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譬如罷，答王敬軒的雙鐄信，『她』字和『牠』字的創造，就都是的。這兩件，現在看起來，自然是瑣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羣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的時候，所以的確是『大仗』。……
>
> ………………
>
> 但半農的活潑，有時頗近於草率，勇敢也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好伙伴，進行之際，心口並不相應，或者暗暗的給你一刀，他是決不會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為沒有算好的緣故。
>
> ………………
>
> 所謂親近，不過是多談閒天，一多談，就露出了缺點。幾乎有一年多，他沒有消失掉從上海帶來的才子必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艷福的思想，好容易纔給我們罵掉了。但他好像到處都這麼的亂說，使有些『學者』

皺眉。……那些人們批評他的為人，是：淺。

不錯，半農確是淺，但他的淺，却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牠的深淺來了；如果是爛泥的深淵呢，那就更不如淺一點的好。

……………

近幾年，半農漸漸的據了要津，我也漸漸的更將他忘却，但從報章上看見他禁稱『密斯』之類，却很起了反感：我以為這些事情是不必半農來做的。從去年來，又看見他不斷的做打油詩，弄爛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長嘆。我想，假如見面，而我還以老朋友自居，不給一個『今天天氣……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許會弄到衝突罷。

不過，半農的忠厚，是還使我感動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後來有人通知我，半農是要來看我的，有誰恐嚇了他一下，不敢來了。這使我很慚愧，因為我到北平後，實在未曾有過訪問半農的心思。

現在他死去了，我對於他的感情，和他生時也並無變化。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他的為戰士，即使『淺』罷，却於中國更為有益。我願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羣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

魯迅這篇**憶劉半農君**寫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他早已轉移了鬥爭陣地，和劉半農與錢玄同的生活意識相去甚遠，他所說的看了半農的打油詩爲之長嘆，豈止長嘆而已，他且起而加以抨擊：

……隨手舉一個例，就是登在**論語**二十六期上的劉半農先生『自註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詩集**這打油詩。北京大學招考，他是閱卷官，從國文卷子上發現一個可笑

的錯字，就來做詩，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鑽地洞，那些剛畢業的中學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於不對的，不過我以為有些却還可有磋商的餘地。集中有一個『自註』道——

『有寫「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發達之處，娼妓必多，謂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們現在是不寫作『倡』的，但先前兩字通用，大約劉先生引據的是古書。不過要引古書，我記得『詩經』裏有一句『倡予和女』，好像至今還沒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來應和別人』的意思。所以那個錯字，錯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屬於牠的。還有一句是——

『幸「萌科學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邊都加着一個夾圈，大約是指明着可笑之處在這裏的罷，但我以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個名詞，而『萌動』，『萌發』就成了動詞，將『萌』字作動詞用，似乎也並無錯誤。

五四運動時候，提倡（劉先生或者會解作『提起婊子』來的罷）白話的人們，寫錯幾個字，用錯幾個古典，是不以為奇的，但因為有些反對者說提倡白話者都是不知古書，信口胡說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幾句古文，以塞他們的嘴。但自然，因為從舊壘中來，積習太深，一時不能擺脫，因此帶着古文氣息的作者，也不能說是沒有的。

當時的白話運動是勝利了，有些戰士，還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為白話戰鬥；並且將牠踏在脚下，拿出古字來嘲笑後進的青年了，因為還正在用古書古字來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書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為應該模仿的格式，

不再從新的道路上去企圖發展，打出新的局面來了。

現在有兩個人在這裏：一個是中學生，文中寫『留學生』為『流學生』，錯了一個字；一個是大學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詩，曰：『先生犯了彌天罪，罰往西洋把學流，應是九流加一等，麵筋熬盡一鍋油。』我們看罷，可笑是在那一面呢？

魯迅寫這文章時，距離劉半農的死約莫十個月，因爲他也是我的老朋友，所以雖然抨擊，文字却寫得婉而諷。這誠如魯迅所說：是「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之別罷。魯迅並非辯護青年人可以有資格寫錯字，魯迅的用心非常「忠厚」，他對老朋友也是不得已而道的。其實劉半農寫那樣的打油詩，仍不過顯示他的「淺」而已。

劉半農死後，魯迅不僅寫文追悼他，而且再三表出他是文學革命中的戰士，反對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他爲復古的先賢，用他的神主來打趨時的人們。

魯迅在**趨時與復古**這篇文章中說：

>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劉半農三個字，原因並不在他擅長音韻學，或是常做打油詩，是在他跳出鴛蝴派，罵倒王敬軒………然而那時有一部分人，却毀之為『趨時』。時代到底好像有些前進，光陰流過去，漸漸將這謚號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點，也就隨和一些，于是終于成為乾乾淨淨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豬怕壯』，他這時也要成為包起來作為醫治新的『趨時』病的藥料了。
>
> 這並不是半農先生獨個的苦境，舊例着實有。廣東舉人多得很，為什麼康有為獨獨那麼有名呢，因為他是公車上書的頭兒，戊戌政變的主角，趨時；留英學生也不稀罕，嚴復的姓名還沒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認真的譯過好幾部鬼子書，趨時；清末，治樸學的不止太炎先生一個人，而他的聲名，遠在孫詒讓之上者，其實是為了

他提倡種族革命，趨時，而且還『造反』。後來，『時』也『趨』了過來，他們就成為活的純正的先賢。但是，晦氣也夾屁股跟到，康有為永定為復辟的祖師，袁皇帝要嚴復勸進，孫傳芳大帥也來請太炎先生投壺了。原來拉車前進的好身手，腿壯大，臂膊也粗，這回還是請他拉，拉還是拉，然而是拉車屁股向後，這裏只好用古文，『嗚呼哀哉，尚饗』了。

我並不在譏刺半農先生曾經『趨時』，我這裏所用的是普通所謂『趨時』中的一部分：『前驅』的意思。他雖然自認『沒落』，其實是戰鬥過來的。……

魯迅的悼念劉半農，也可說是悼念五四這個時代，惋惜劉半農，也就是惋惜後來自認「沒落」的那一羣戰士。歷史無情，不前進就後退，所謂朋友也就因此失去了了解，譬如錢玄同吧，魯迅是由他的勸誘起而與之並肩作戰的。當一九二九年五月間他在北平時，給許廣平的信上說：「……途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

那簡直連對劉半農那樣的感情都沒有了！

魯迅說過：一九二〇至二二這三年間，［北京］倒顯着寂寞荒凉的古戰場的情景。他自己呢，誠如一九三三年在**徬徨**上的題詩所說：

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

徬徨雖然徬徨，但他並沒有放下武器。

× × ×

現在應該回頭來談談魯迅的小說，特別是談談別人已經談了很多的**阿Q正傳**了。

我們先讓魯迅談談他「怎麼做起小說來？」

……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並

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着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 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回國以後，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為什麼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吶喊**的序文裏，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并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裏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却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們抱着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

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魯迅說得很清楚，他寫小說的目的：（一）不過想利用牠的力量，來改良社會；（二）小說必須「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但他又自認他的小說，在當時可以稱得是「革命文學」，因爲**新青年**提倡「文學革命」的運動，無疑是一個革命的運動。他雖然對於「文學革命」並沒有怎樣的熱情，尤其是見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之後，使得他懷疑、失望、頹唐了，他又覺得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所以雖然缺少對於「文學革命」的熱情，却出於對熱情者的同感，故在寂寞中也想喊幾聲助助威……但爲此，必須與前驅者取得同一步調，而且還要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得顯出些亮色，這就是後來結集起來的**吶喊**。

他又自認爲這是「遵命文學」，是遵奉那時革命的前驅的命令，也是他自己願意遵奉的命令，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眞的指揮刀。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他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只因爲成了游勇，布不成陣，所以技術雖然比前好，思路也較少拘束，戰鬥的意氣却冷得不少，於是結印這時期的作品，就命名爲**徬徨**。

此後能稱之爲創作的，尙有**野草**、**故事新編**、**朝花夕拾**三種，却不能算做小說。

魯迅紀念獨秀先生，爲的他最着力催促他做小說，作人的**回想錄**說：

我們與仲甫的交涉，與其說是功課上，倒還不如文字上為多，便是都與**新青年**有關係的，所以從前發表的一篇『實庵的尺牘』，共總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

是一九二〇年所寫的，末尾有一行道：

『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在那時候，他還只看得孔乙己和藥這兩篇，就這樣說了，所以他的眼力是很不錯的。九月來信又說：

『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行訂正，寄來付印。』等到吶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編成，第二年出版，這已經在他的說話的三年之後了。

魯迅的小說，雖說深得陳獨秀的賞識，但在新青年發表的，爲數不過五篇，最出名的阿Q正傳，發表在晨報副刊上，新青年已經在分裂了，在往後幾年，這古戰場的情景中，祇有魯迅幾個人在支撐着由新青年開始創導的新文化運動的餘緒，這時以後到魯迅南下（一九二六年）的期間，魯迅和許多年青人在一起，確實做了許多事，如語絲和莽原的創刊，未名社的出版多種文學譯著，以及對章士釗的鬥爭等；尤其是三•一八事件中凌厲無前橫掃千軍的一枝鐵筆，使「正人君子」無所遁形。這幾年確實可說是魯迅的時代。他像一支火把，其餘的都是熠火。惟有從這時起，他才眞眞正正的成了一個文化鬥士。

對於阿Q正傳的批評多得很，但我們應該聽魯迅自己所說的。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按：孫伏園）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裏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廬（即高一涵）的『閑話』才知道的。那大畧是——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

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且並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祇有某人知道他這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對于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直到這一篇收在吶喊裏，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在罵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

這樣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發生阿Q可否要做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踪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

…………

先前，我覺得我很有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却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為這是想得太奇怪

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却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生以前，以我的淺見寡識，是萬萬想不到的。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裏（按：厦門）鎗斃一個强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手鎗，一共打了七鎗，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這麼多。當時我便對我的一羣少年同學們發感慨，說：這是民國初年初用鎗斃時候的情形；現在隔了十多年，應該進步些，無須給死者這麼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場，刑吏就從後腦一鎗，結果了性命，本人還來不及知道已經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區』，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遠。

但是前幾天看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報**，又知道我的話並不的確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條新聞，題目是『杜小栓子刀鍘而死』，共分五節，現在撮錄一節在下面——

杜小栓子刀鍘餘人鎗斃　先時，衛戍司令部因為從了毅軍各兵士的請求，決定用『梟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場以前，刑場已預備好了鍘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長形的，下邊是木底，中縫有厚大而銳利的刀一把，刀下頭有一孔，橫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動，杜等四人入刑場之後，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車，就叫他們臉冲北，對着已備好的刑桌前站着。……杜並沒有跪，有外右五區的某巡官去問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後來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時行刑兵已將刀抬起，杜枕到適宜的地方後，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鍘，杜的身首，就不在一處了。當時血出極多。在旁邊跪等鎗決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趙振一名，身上還發起顫來，後由某排長拿手鎗站在宋等的後面，先斃宋振山，後斃李有三趙振，每人都是一鎗斃命。……先時，被害程步墀的兩個兒子忠

智忠信，都在場觀看，放聲大哭，到各人執刑之後，去大喊：爸！媽呀！你的仇已報了！我們怎麼辦哪？聽的人都非常難過，後來由家族引導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個天才，真感着時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出記敘這樣情景的小說來，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以為是說着包龍圖爺爺時代的事，在西歷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九百年。

這真是怎麼好……。

阿Q正傳有法文和英文譯本，但魯迅祇給俄文譯本寫有**序**和**自敘傳署**，這序對於怎樣寫這篇小說，又有不同於上面的說明。

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于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彷彿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牆，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聖賢，將人們分為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現在雖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並且，變本加厲，連一個人的身體也有了等差，使手對於足也不免視為下等的異類。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聖人和聖人之徒却又補了造化之缺，並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但我還並不十分怨恨，因為我覺得他們倒並不是故意的。然而，許多人却不能藉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築成的高牆，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現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為了他們自己；至於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

要畫出這樣沈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

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靈魂，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牆裏面的一切人衆，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裏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我的小說出版之後，首先收到的是一個青年批評家的謾責；後來，也有以為是病的，也有以為滑稽的，也有以為諷刺的，或有還以為冷嘲，至於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裏真藏着可怕的冰塊。……

對於魯迅小說各式各樣的批評，我們完全不去理會，只有作者自己的表達，說明，才能使讀者對他的小說有眞正的理解，同時也顯出小說本身所具有的價値。按照魯迅所說，**阿Q正傳**確實說中了許多人的陰私，也刺中了許多人的靈魂。這許多人也許不是阿Q，而是趙太爺，假洋鬼子，和以阿Q的精神勝利法自我安慰的人。

魯迅認爲要革命不免有阿Q式的革命黨。

革命成功後，屈服於舊勢力，讓舊勢力篡奪革命果實，那麼這種自以爲創造了革命的革命黨，就是阿Q。

阿Q的時代背景，當然是辛亥革命，我們已談過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後的經歷，像紹興一地那樣所發生的政治上的迅速變化，正在全中國到處發生。這個革命很快使人失望，魯迅祇能浮沉在北京的官僚層中，躲在會館裏抄着古書古碑，痲醉自己。於是阿Q的形象，在他腦中逐漸的形成，這是由時代的影子濃縮成的，而牠又逐漸的變成了沉默的國民的靈魂。

但阿Q究竟盤上了辮子，這也證明革命並不是完全白費的，這就是魯迅的進化觀點。

魯迅又認爲未來的二三十年，仍是阿Q的時代。

魯迅的預見不無理由，而且歷史正是如此證明的。

辛亥革命過去了，一九二七年又發生了革命，結果仍是新的趙太爺，新的假洋鬼子們篡奪了革命，失敗了的革命黨仍是阿Q式的，他們把失敗當做勝利，把革命說做「革命向更高階段的發展」，於是進行了絕望的廣州暴動。有一個著名的革命家說，「這是挨打之後的磨拳擦掌」，阿Q！一九四九年全中國解放了，但革命黨宣佈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新的資本主義發展至少還有二十年，可是不到三年，資本主義的「五毒」上身了，革命以後的農民說：「這樣下去，不是又要走老路了嗎？」於是連續進行「三反」、「五反」、「公私合營」，以至「社會主義改造」，最後不得不承認這個革命其實是「不斷革命」，這也確實是阿Q式的。

有人要把寫阿Q時代的魯迅捧做革命家，和李大釗並列，好似**新青年**後期，魯迅和李大釗才是前進的人，這是濫言妄語。魯迅確實可以說得是一個前進的鬥士，但他止於是個澈底的民主主義者，他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但懷疑這個革命（**答國際文學社問**），所以他不可能進而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與陳獨秀李大釗並列（人家不提陳獨秀，因爲他以後加入了托派），正是這一點，他的前進止於吶喊，向前一步，他便徬徨了，而且他看得前途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呢！

魯迅轉抄了「杜小拴子刀鍘而死」的故事，他著急地叫喊這真是怎麼好……已經不是寫阿Q時那樣的只是嘲弄式的悲哀了！這樣的故事我們可以續寫下去，文化大革命中種種形式的人民公審，向人民低頭認罪的故事，已有紅衛兵的紀錄斑斑可攷，可是下面的眞實故事則是從未見過著錄的。

宗法社會早已消滅了，但是宗法社會的意識仍殘存在中國的鄉村裏，譬如趙家村和李家村的地主經過多次的鬥爭，本已蛻化爲普通的農民，但仍背着「地主」這個歷史性的黑名。文化大革命時，趙家村的紅衛兵趕到李家村把姓李的地

主殺了， 接着李家村的紅衛兵爲了報復又去殺趙家村的地主，所謂地主的孑遺就是這樣消滅淨盡的。紅衛兵又強迫地主的兒女殺自己的地主父母，結果有幾個地主兒女聯合起來在幾條村內摸黑殺死了十一個幹部和紅衛兵，上山去了。

這真是怎麼好！

一定會有人說我造謠。我是從一個游水逃來的過去的紅衛兵口中聽來的，這個紅衛兵小腹上有一個前後洞穿的彈道疤痕，他們起來要揪「軍中一小撮走資派」時給人民解放軍鎗傷的，那時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聲，全部紅衛兵都受到鎮壓了。

× × ×

我們現在要回頭談談魯迅的生活。

魯迅是新台門的肖子，但他已無意重振新台門的家聲，他要遷居到北京去，重新安排家計。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日：約徐吉軒往八道彎看屋。

二十三日，午後擬買八道彎羅姓屋，同原主赴警察總廳報告。

二十六日，為二弟及眷屬租定間壁王氏房四大間，付泉卅三元。

八月二日 ， 午後往西直門內橫橋巡警分駐所問屋事。

十日，午後二弟，二弟婦、豐，謐、鯊及重久君自東京來，寓間壁王宅內。

十八日，午後往市政公所驗契。

十九日，上午往浙江興業銀行取泉。買羅氏屋成。晚在廣和居收契並先付見泉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

九月三日，下午得三弟信並滙券千。

六日，午後二弟領得買屋凴單來。

十九日，夜得三弟信並泉六百。

十月五日，午後往徐吉軒寓，招之同往八道灣，收房九間，交泉四百。

六日，午後往警察廳報告修理房屋事。

十一日，午後往洪橋警察分駐所驗契。

十九日，上午同重君，二弟、二弟婦及豐、謐，蒙乘馬車同游農事試驗場，至下午歸，並順道視八道灣宅。

十一月四日，下午同徐吉軒往八道灣，會羅姓並中人等，交與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訖。

十三日，上午托齊壽山假他人泉五百，息一分三厘，期三月。在八道灣宅置水道，付工值銀八十元一角。水管經陳姓宅，被索去假道之費三十元，又居間者索去五元。

二十一日，上午與二弟眷屬俱遷入八道灣宅。

二十六日，上書請歸省。

二十九日，午後付木工泉百七十五，波黎泉四十。凡修繕房屋之事畧備具。

十二月一日，晨至前門乘京奉車，午抵天津。

二日，夜抵上海。

三日，午抵杭州。

四日，晚抵紹興城，即乘轎回家。

十九日，晚傳叔祖母治饌餞行，隨母往，三弟亦偕。

二十一日，夜理行李粗畢。

二十二日，與三弟等同至逍搖漊掃墓，晚歸。

二十四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屬，携行李發紹興。蔣玉田叔來送。夜燈籠焚，以手按滅之，傷指。

二十九日，下午俱到家。

根據上面摘錄的**日記**，八道彎的房屋，經之營之，皆魯

迅一人親力親爲。新台門的房子公共出售後分回的錢，魯迅自己的錢，借貸的錢，合起來才付清屋價裝修費用。他又親自去紹興接眷，克盡了作爲一家之主的責任。

他從此和親切的故鄉脫離了，但這鄉土，這人情，這生活、這時代，永遠活生生地再現在他的小說和回憶中，我們祇舉出**故鄉**一篇爲例。

>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
>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蓬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
> 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
>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却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爲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
>
> 我這次是專爲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
>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
>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 ，且不說搬家的事 。宏兒沒有見過

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說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畧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是的。』

『還有閏土，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你一回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
………………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我應聲說：

『這好極！他，——怎樣？……』

『他？……他景況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閒話：問他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我們坐火車去麼？』

『我們坐火車去。』

『船呢？』

『先坐船……』

『哈，這模樣了！鬍子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聲叫起來。

我吃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却見一個凸顴骨，薄嘴

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脚，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脚伶仃的圓規。

我愕然了。

『不認識了麼？我還抱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他多年出門，統忘却了。你該記得罷，』便向着我說：『這是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顴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為年齡的關係，我却並未蒙着一毫感化 ，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彷彿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來說。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濶了 ，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我並沒有濶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濶？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濶？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圓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我喫過午飯，坐着喝茶，

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囘頭去看，我看時，不由得非常吃驚，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這來的便是閏土。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閏土，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閏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枝長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怎麼說纔好，只是說：

『阿！閏土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鷄，跳魚兒，貝殼，猹……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面囘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凄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却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他囘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二十年前的閏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得了不得，知道老爺囘來……』閏土說。

『阿，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

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閏土說着，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只貼在他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却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閏土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了坐，將長煙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曬在那裏的，請老爺……』

我問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却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沈默了片時，便拿起煙管來默默的吸煙了。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吃過午飯，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飯喫去。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嘆息他的景況：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却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

………………

又過了九日，是我們起程的日期。閏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同來，却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

深黛顏色，連着退向船後梢去。

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風景，他忽然問道：

『大伯！我們什麼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不是，水生約我到他家裏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却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象，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我躺着，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閏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 。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黄的圓月。我想，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的鄉土文學中，除**阿Q正傳**外，我最愛讀的是**故鄉**和**社戲**，前者尤其是留下了時代的顯明的痕跡，中國革命中最大的一個主角——農民，這時正受着極大的壓迫，閏土便是被壓迫農民的具體的形象。提出了問題就是解答了問題。在辛亥前後的革命者，着眼的目的是民族革命；最先朦朦朧

朧提出中國經濟改造的是孫中山；到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共產黨成立時，仍沒有一個像樣的土地政綱；但魯迅借閏土這個人物，提出了被壓迫的農民問題，農民方面對着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像一個木偶人了。閏土恭恭敬敬地喊一聲「老爺」，這說明了二人之間階級的隔絕，魯迅希望他們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但這生活不存在好意的希望中，要在沒有路走的大地上走出路來，這便需要農民自己的覺悟，自己的鬥爭，我們可以說，魯迅是第一個用文學形式，提出這個問題的。過了七八年，農民果眞站起來了，不到三十年，他們就解放了自己。

× × ×

現在我們再回到魯迅遷家至北京後的生活，他如何負起了一家之主的責任。

這時魯迅頗有入不敷出的情形，他不斷的向朋友借貸，一有收入，立卽還淸。有時須向義興局出利息借錢。

一九二〇年一月六日，午後往本司胡同稅務處稅房契，計見泉百八十。

二月九日，還齊壽山所代假泉二百，息泉十一元七角。

十六日，還齊壽山所代假百元。

十七日，還齊壽山所代假泉二百，利泉八。

三月四日，午後從齊壽山假泉五十。

三十日，午後從戴螺舲假泉百。

三十一日，甚疲，請假。

四月十日，上午收三月上半月奉泉百廿。還戴盧舲百。

十六日，晚庭前植丁香二株。

二十一日，上午收上月所餘奉泉百八十，還齊壽山五十。

二十五日，星期休息。午後同母親、二弟及豐遊三

貝子園。

五月十六日，沛週歲，下午食麵飲酒。

十九日，沛大病，夜延醫不眠。

二十日，黎明送沛入同仁醫院，芳子、重久同往，醫云肺炎。午歸，三弟往。下午作書問三弟以沛狀，晚得答，言似佳。

二十一日，上午往病院。

二十二日，在病院。托二弟從齊壽山假泉百。

二十三日，星期休息。在病院，上午一歸，晚復往。

二十四日，在病院，沛病甚劇。

二十五日，在病院，晚歸。夜半重久來，言沛病革，復馳赴病院。

二十六日，沛轉安，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二十七日至六月十四日，有十五天「夜在病院」，其他數日，無日不去病院。對於一個週歲的姪兒，看顧得直是無微不至，七月十三日，沛退院回家；十五日，沛腹瀉，十六日復入院。十八日，因直皖戰爭，消息甚急，夜送母親以下婦孺至東城同仁醫院避。十九日，上午母親以下諸人回家。這期間魯迅不斷向齊壽山借錢，幾十元不等。

照**魯迅日記**所載，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晚馬幼漁來，送大學聘書。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午後往大學講。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午後往高師校講，自此他在僉事之外，從事教學工作。一九二一年二月四日，晚收大學九月、十月薪水共泉卅六。可見當時大學講師待遇之低，也許魯迅所開的課時間不多。

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作人生病進了山本醫院，魯迅又不斷去醫院看視，又不斷的向齊壽山等人借錢，四月十二日，下午托齊壽山從義興局借泉二百，息分半。直至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齊壽山來，同往香山碧雲寺，下午

回。二十七日，清晨携工往西山碧雲寺，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後回。六月二日，下午送二弟往碧雲寺，三弟、豐一俱去，晚歸。嗣後又不斷的去西山，替作人買佛經，付房租，代寄稿，前後達五個月之久。

> 作人回想錄說：我於六月二日搬到西山碧雲寺裏，所租的屋即在山門裏邊的東偏，是三間西房，位置在高台上面，西牆外是直臨溪谷，前面隔着一條走路，就是一個很高的石台階，走到寺外邊去。這般若堂大概以前是和尚們『掛單』的地方，……我把那西廂房一大統間佈置起來，分作三部分，中間是出入口，北頭作為臥室，擺一張桌子算是書房了，南頭給用人王鶴招住，後來有一個時期，母親帶了他的孩子們也來山上玩了一個星期，就騰出來暫時讓給她用了。
>
> 我住在西山前後有五個月，一邊養病，一邊也算用功，但是這並不是什麼重要的工作，主要的只是學習世界語，翻譯些少見的作品。後來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從世界語譯出的小說，即是那時的成績；可是更重要的乃是後來給愛羅先珂做世界語講演的翻譯，記得有一篇是『春天與其力量』，說得空靈巧妙，覺得實在不錯。……在五月與九月之間一總給孫伏園寫了六回的『山中雜信』……

作人的文章以悠閒著名，從他在西山養病的記載中，他沒有一個字說到魯迅的「勞瘁」。

作人從西山回家，據魯迅日記，是九月二十一日。但可怪的是十月十九日的日記：還二弟買書泉六元，是不是從此時起，他們兄弟之間的經濟已經分開了呢？我們無法得到其他旁證。一九二二年的日記遺失，現在所刊者，係據許壽裳的手抄片斷補入。可注意者，正月二十七日記云：舊除夕也，晚供先像。柬邀孫伏園，章士英晚餐，伏園來，章謝。夜飲酒甚多，談甚久。二月二日：……又買泥製小動物四十

個，分與諸兒。可見他對於「祖先崇拜」，並不實行「思想革命」；而對於小孩子們的眷愛，永遠不衰。

十一月十四日，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到北京，住在魯迅家中，備受他們兄弟照顧，直至第二年四月十六日，才回蘇聯去，中國的留蘇學生在東方大學見過他。

魯迅譯了**愛羅先珂童話集**和**桃色的雲**，爲當時的青年所愛讀，筆者當時曾從他那悲憫反抗的希望裏得到鼓舞。

魯迅的小說**鴨的喜劇**，就是描寫住在他家裏的愛羅先珂的，「伊和希珂先，沒有了，蝦蟆的兒子。」這句描摹孩子口吻的話，是最生動不過的，讀了使人想像到一切都漾溢着詩的意境，和魯迅，愛羅先珂，天眞的孩子，作人夫婦那種情景交融的胸懷。又誰知三個月之後，這種胸懷竟爾不再存在了呢。

這三個月中，我們從**魯迅日記**中找得到下列記載：

一九二三年四月八日：下午伏園携惠迪來，因並同二弟及豐一往公園，又遇李小峯， 章矛塵， 同飲茗良久，傍晚歸。

五月十日，晚與二弟小治肴酒共飲三弟並邀伏園。

十三日，星期休息。午後與二弟應春光社約談話。下午至中央公園會三弟及豐丸同飲茶。

二十六日，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澤邨、丸山、耀辰、鳳舉、士遠、幼漁及我輩共八人。

六月二十六日，往祿米倉訪鳳舉、 曜辰， 並見士遠、尹默、二弟已先到，同飯，談至傍晚始出。

七月三日，與二弟至東安市場……

十四日的**日記**，忽然出現了不同的調子 ， 記着下列字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看來似乎寫得一樣神定氣閑，但熟知他們兄弟之間友于之情的，這樣的句子，確乎是驚人心魄的了。

十九日，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

這封信的內容，魯迅與作人從未披露過，據許廣平後來的魯迅回憶中所說，則是信封外面寫着魯迅先生，裏面斬釘截鐵地要魯迅以後不要到後邊院子裏來。

於是魯迅被迫要搬出八道彎了，他的日記說：

>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往磚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書籍入箱。
>
> 二十九日，星期休息，終日收書冊入箱，夜畢。
>
> 八月一日，午後收拾行李。
>
> 二日，下午携婦遷往磚塔胡同六十一號。

魯迅和作人不和，只苦了他們母親，她兩頭奔走，兩個兒子誰也丢不下。

> 八月五日，晨母親來視。
>
> 十三日，母親來視，交來三太太箋，假十元，如數給之，其五元從母親轉借。
>
> 十九日，上午母親來。
>
> 二十一日，午後母親往八道彎宅。
>
> 二十二日，上午得三弟信並泉十五元。
>
> 二十六日，上午母親遣潘媽來，給桃實七枚。三弟之款即令將交三太太收。
>
> 二十九日，上午母親來，交三太太信，並所還錢五元，即以泉還母親。
>
> 三十一日，上午母親往新街口八道彎宅去。

這樣的記載，多至引不勝引的，但他母親病了，看醫服藥，都是魯迅的事。

> 九月十六日，三太太以信來問母親疾。
>
> 十八日，上午同母親往山本醫院診。母親往八道彎宅。

這期間，魯迅不停的看房子，借錢，可是他也病了。從十月三日以後，至十一月八日爲止，他的病大概非常纏綿，八日日記：夜飲汾酒，始廢粥進飯，距始病時三十九日矣。

他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給母親信說：男所生的病，報上雖說是神經衰弱，其實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經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灣趕出後的一回，和章士釗鬧後的一回，躺倒過的，就都是這病。……

在病中，魯迅仍不廢工作和日常生活，而且於十月三十日買定了阜成門三條胡同廿一號的舊屋六間，價八百。他並沒有錢買屋，錢都是向朋友借貸來的，這時他的主要收入做僉事的薪金，已積欠半年以上，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記**：下午收奉金二月分者三十一，又三月分者百。二十三日**日記**：下午收三月分奉泉百五十。至於大學裏面教書收入，不僅爲數甚微，而且積欠甚久，例如九月二十九日**日記**：上午往師範校取薪水十四元，三月分訖。十月十九日**日記**：收大學四月下半月及五月全月薪水共二十七元，可見一斑。以後魯迅的收入，主要得靠稿費和版稅。

西三條胡同的房子是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接收的，經過幾個月的修理，到五月二十五日才得搬入。據許季茀所說：

> 這是一所小小的三開間的四合式。北屋的東間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間是朱夫人的房。南屋是他的藏書室。北屋的中間，後面接出一間房子去，魯迅稱它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線充足。

魯迅移入新居後，便在八道灣搬取書及器物，六月十一日**日記**：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這不多不少是一齣「鬧劇」，**魯迅日記**中以後不再有啓孟二字，兄弟的關係永絕，關於此事，他們的共同朋友許季茀有公平的證述：

> 魯迅對於兩弟非常友愛，因為居長，所有家務統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煩兩弟。他對於作人的事，

比自己的還重要，不惜犧牲自己的名利統統來讓給他。
………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的里性的 。 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住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了。從此兩人不和， 成為參商， 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倘使無此錯誤，始終得到慈兄的指導，何至於後來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說起他的藏書室 ， 我還記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這所小屋既成以後，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 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 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却，說這是家裏的事，無須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這在取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我問他：『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我問他我所贈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道：『被沒收了。』

可是作人對許季茀這種說話，心有不慊，他在**回想錄**上有二篇**不辯解說**，上篇說的許多話，其實只是爲余澹心編的**東山談苑卷七**的一則故事作注解，這則話說：

「倪元鎮爲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 ， 元鎮曰，一說便俗。」

魯迅與作人失和的事，經許季茀在魯迅死後公開一說，作人自然要加以辯解，但他先引用倪元鎮的話「一說便俗」，以此掩蓋他的辯解，其實他的不辯是辯，而且越辯越暴露了他的小氣，和事實上曲在他這一面。

……關於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說過，過去如

此，將來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記上七月十七日項下，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有十個左右，八月二日記移住磚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衝突，也只簡單的記着衝突，並說徐張兩君來，一總都不過十個字。——這裏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的北大教授，並不是什麼『外賓』，如許季茀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件事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於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不過他有一句話却是實在的，這便是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他說這是魯迅的偉大處，這話說得對了。魯迅平素是主張以直報怨的，併且還更進一步，不但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還說過這樣的話，（原文失記，有錯當改，）人有怒目而視者，報之以罵，罵者報之以打，打者報之以殺。其主張的嚴峻有如此，而態度的偉大又如此，我們可不能學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辯解報答他的偉大乎？而且這種態度又併不是出於一時的隱忍，我前回說過對於所謂五十自壽的打油詩，那已經是那件事的十多年之後了，當時經胡風輩鬧得滿城風雨，獨他一個人在答曹聚仁楊霽雲的書簡中，能夠主持公論，胸中沒有絲毫蒂芥，這不是尋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或者有人說，書簡所說乃是私人間的說話，不能算什麼。那麼我們來看他所公表的吧，這第一是小說，收在**徬徨**裏邊的一篇**弟兄**，是寫我在一九一七年初次出疹子的事情，雖然是小說可是詩的成分並不多，主要的全是事實，乃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所作，追寫八年前的往事的。可是最特別的是寫成**弟兄**的十一天以前所作，在魯迅作品中最是難解的一篇，題目乃是**傷逝**，於十月二十一日寫成，也不曾在雜誌上發表過，便一直收在集子裏了。關於這篇小說，我在『魯迅小說裏的人

物』裏邊只在地方畧加考證，現在轉錄一部分，併加以補充於下：

『**傷逝**這篇小說大概全是寫的空想，因為事實與人物，我一點也找不出什麼模型或依據。要說是有，那只是在頭一段裏說：會館裏的被遺忘在偏僻裏的破屋是這樣的寂靜和空虛。時光過得真快，已經快滿一年了，事情又這麼不湊巧，我重來時偏偏空着的又只有這一間屋。依然是這樣的破窗，這樣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樹和老紫藤，這樣的窗前的方桌，這樣的敗壁，這樣的靠壁的板床。』第二段中又說到那窗外的半枯的槐樹的新葉，和掛在鐵似的老幹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我們知道這是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著者在民國初年曾經住過一時的，最初在北頭的藤花館，後來移在南偏的獨院補樹書屋，這裏所寫的槐樹與藤花，雖然在北京這兩樣東西很是普通，却顯然是指那會館的舊居，但看上文偏僻裏云云，又可知特別是說那補樹書屋了。當時忘記了說，他從藤花館擺搬到補樹書屋的時候，日記上說明是『避喧』，那麼更可證明會館裏偏僻的地方只是補樹書屋的一處而已。這樣的證明於了解那篇小說有什麼用處呢？**傷逝**這篇小說很是難懂，但如果把這和**弟兄**合起來看時，後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實』，而**傷逝**乃是全個是『詩』。詩的成分是空靈的，魯迅照例喜歡用『離騷』的手法來寫詩，這裏又用的不是溫李的詞藻，而是安特來也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結果更似乎很是晦澁了。**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這樣說，或者世人都要以我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覺，深信這是不大會錯的。因為我以不知為不知，聲明自己不懂文學，不敢插嘴來批評，但對於魯迅寫作這些小說的動機，却是能夠懂得。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人總只有人的力

量。我很自幸能夠不俗，對於魯迅研究供給了兩種資料，也可以說對得起他的了，關於魯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對許季茀一個人，有要訂正的地方，如上邊所說的，至於其他無論什麼樣人要怎麼說，全由他們去說好了。

我覺得作人雖然這麼說，實際上許季茀究竟造了什麼「謠」，還是沒有具體的說清楚。許季茀所記他們兄弟失和的事，證以魯迅的**日記**，並無一字造謠，周作人垂老所寫的**回想錄**，說及這事時，竟比許季茀為東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這完全不符事實。至於發明魯迅小說**傷逝**為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認為這是「對於魯迅研究供給了資料」，算是「對得起他」，這也無補於魯迅生前所遭受的隱忍的痛苦。「對得起他」與對不起他，都是無關的了。

作人所說的五十自壽詩，附帶在這裏交代一下。由此可見魯迅的胸襟浩曠，批評客觀，對事不對人，確為作人所不及的。

一九三四年，林語堂在上海編**人間世**，他把作人寄給他的兩首詩加了個**知堂五十自壽詩**的題目，給登了出來，詩如下：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骨董，閒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裏蛇。
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功夫吃講茶。

這二首詩登出以後，會做詩的紛紛和作，年青人則多加以批評攻擊，魯迅對於林語堂的提倡閒適，本多不滿，但對於作人的五十自壽詩及和詩，並未公開批評，祇在給楊霽雲

和曹聚仁的私人信中畧有談及。

致楊霽雲信中談到**人間世**者有云：

……關於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並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學獲得名位，生計已漸充裕者，很容易流入這一路。蓋先前原着鬼迷，但因環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復發，漸玩古董，始見老莊，則驚其奧博，見文選，則驚其典贍，見佛經，則服其廣大，見宋人語錄，又服其平易超脫，驚服之下，率爾宣揚，這其實還是當初沽名的老手段。有一部分青年是要受點害的，但也原是脾氣相近之故，于大局却無大關係，例如**人間世**出版後，究竟不滿者居多；而第三期已有隨感錄，雖多溫暾話，然已與編輯者所主張的『閒適』相矛盾。……

……至於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過，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覺得討厭了。

在給曹聚仁信中說：

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羣公相和，則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衆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于清流或輿論矣。

作人對於魯迅的這種批評，亦稱之爲「偉大」的，但他對魯迅的批評又如何？他在**老人的胡鬧**中說：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興佔勢力的意見，不問新舊左右，輒靡然從之，……蓋老不安分，重在投機趨時。

觀乎此，作人與魯迅二人氣度之相去，簡直不可以道里計了。

× × ×

魯迅雖和作人決裂，但對於建人的太太——三太太仍舊看顧的，例如：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日記：得三弟信，十六日發，屬以泉十交芳子太太。晚往山本醫院視芳子疾，並致泉十，又自致十。

二十六日，下午往山本醫院看三太太。

六月二十一日，至濱來香食冰酪，並買蒲陶乾，又購餅六枚，持至山本醫院贈孩子食之。

七月七日，午往山本醫院，以黃油餅十枚贈小土步。

八月十三日，午往山本醫院視三太太疾，贈以零用錢廿，贈重君蒲陶乾一合。

芳子和建人的脫離始於何時，建人與王蘊如的同居始於何時，在**魯迅日記**中均無可攷見，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記**：買布人形一枚贈曄兒，曄兒是建人與王蘊如的孩子，以後日記中常常提及他們，記載語氣與以前談到小土步時一樣，可見魯迅對芳子，王蘊如，以及她們的孩子一視同仁。

周作人的態度則完全不同，他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香港友人信云：

……日前忽忽寄信，關於某女士回憶錄之事忘記答覆，茲特補述之。她係女師大學生，一直以師弟名義通訊，不曾有過意見，其所以對我有不滿者殆因遷怒之故。內人因同情於前夫人朱安之故，對於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詞，出自舊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屬難怪，但傳聞到了對方，則為大侮辱矣，其生氣也可以說是難怪也。來書評為婦人之見，可以說是能洞見此中癥結者也。內人之女弟為我之弟婦，亦見遺棄（以係帝國主義分子之故），現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議故亦為其父所不承認，此係家庭私事，因便中一併說及耳。……

魯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日記：得許廣平信；四月十二日日記：許廣平、林卓鳳來。這是他們兩人關係的開始，過了二年，他們才在上海同居。這時魯迅和作人決裂已久，卽使作人的太太信子同情朱夫人，有甚麼對許廣平不滿之詞傳到上海，也決不會有甚麼影响的了，作人說許廣平因此遷怒到他，所以在魯迅回憶的文中詆毀他，這却是近乎「婦人之見」了。

至於建人與芳子的脫幅，作人說以係帝國主義分子之故，參考國內最近發表的魯迅致章矛塵的信（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喬峯將上海情形告之北京，不知何意，他對我亦未言及此事。但常常慨嘆保持飯碗之難，並言八道灣事情之多，一有事情，便呼令北去，勸止兩難，至於失眠云云。……又，魯迅於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致母親信，說建人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灣逼去一大半，生活頗窘，可見建人雖已在上海另組了家庭，對於八道灣的關係，他確是像個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弱小民族」；作人晚年致書香港友人，談到這件事，竟說……至於王蘊如乃是他的所謂『愛人』，若不客氣的說，照上海話說乃是『姘頭』了，我當初寫信規勸他兒女已長大（在一九三七年），何必納什麼妾，他為此便不同我通訊了。……這是甚麼話？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魯迅生前從無一言道及，我們不必徧信景宋對她的攻擊，芳子受她姊姊何種影响，我們也無從深究，但建人不是花花公子，那是可以深信的，在過渡時期中，婚姻的始合終離比比皆是，作人是五四前後時代的思想革命家，晚年思想簡直退化到十足的冬烘了，用「姘頭」，「納妾」這種封建倫理觀念的名詞作爲衡量自已兄弟婚姻變化的尺度，一臉孔悻悻之色，可見有人說他「風格淸致、思想通達」那種溢美之辭，與他的爲人是絕不相符的。

× × ×

魯迅放棄了醫學，從事文學，認為文學可以救時濟世，但在東京時候，辦**新生**文學雜誌之事，既未實現，祇印了二本**域外小說集**，銷路又不佳；回國以後，藉教書和到北京教育部當一名僉事的收入維持一家生計，眼見革命事業，瞬即為反動勢力所淹沒，意氣消沉，住在紹興縣館裏抄抄古碑，讀讀佛經，過着知識分子「苟全性命於亂世」的生活。可是陳獨秀李大釗他們大聲疾呼，震聾發聵，五四運動風起雲湧，魯迅也開始跟着吶喊了。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六年，這是魯迅文學創作最收成果的時代，據他說，**吶喊**、**徬徨**、**朝花夕拾**、**野草**、**故事新編**這五本文學著作，都是完成在這段時期內的，過後間或有文學寫作，如**我的第一個師父**，**女吊**，**阿金**等，但與戰鬥性的雜感文相比，為數太少了，無法另行編集成書，祇好散見於其他雜感集內了。

魯迅是**新青年**的主要一員；對**新潮社**則不僅供給小說，在經濟上也有幫助。但一九二一年以後，他的文章多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是年一月，文學研究會，由周作人、朱希祖、耿濟之、鄭振鐸、瞿世英、王統照、沈雁冰、蔣百里、葉紹鈞、郭紹虞、孫伏園、許地山十二人聯合宣言成立，他們的據點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小說月報**，標榜「為人生而文學」，與魯迅旨趣相同，他雖不是會員，與會員一樣供稿，他翻譯的**工人綏惠略夫**、**一個青年的夢**，**愛羅先珂童話集**均作為文學研究會叢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九二四年冬天，孫伏園脫離**晨報**，拉攏了十六個撰稿人，出版**語絲**，這是一個異軍突起的刊物，他們似乎沒有固定的結社形式，也沒有固定的編輯，所謂「社員」的稿子，由孫伏園或李小峯付排，外稿則送給周作人去看，這小小的刊物後來發生了大影響，魯迅說：

> 我付了十元之後，就不見再來收取了，因為收支已足相抵，后來並且有了贏餘。于是小峯就被尊為『老板』，但這推尊并非美意，其時伏園已另就『京報副刊』

編輯之職，川島還是搗亂小孩，所以幾個撰稿者便只好拿住了多睞眼而少開口的小峯，加以榮名，勒令拿出贏餘來，每月請一回客，這『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方法果然奏效，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鋪的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掛着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但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毫不知道內部的情形。

李小峯却由此發跡，開了北新書局，做了眞實的「老板」，後來在上海欠了魯迅爲數不少的版稅，幾乎要用法律來解決。

語絲當時很打了幾次硬仗，這主要是爲了女師大被解散，與「正人君子」正面作戰，魯迅的打落水狗論對於青年們的啓發很大，三一八慘案，**語絲**的戰績更大，魯迅的文章，簡直驚天地泣鬼神，直接促使青年人走到革命的實踐，魯迅自己也不得不因而離開了安身立命的北京。

對於**語絲**的特色，魯迅認爲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缺點則是：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却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

劉半農給周作人信說：就**語絲**的全體看，乃是一個文學為主，學術為輔的小報。這個態度，我希望你們永遠保持着，若然，**語絲**的生命能垂於永遠，我想當初**新青年**，原也應當如此，而且後幾年已經做到如此。後來變了相，眞是萬分可惜。按劉半農的說法，對於**語絲**和**新青年**的比較，也並不相符的。**新青年**的變化，是時代的變化，跟不上時代變化的，祇有被淘汰下來，所以魯迅和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等人之間，在以後還是失去了作爲朋友的了解。

林語堂認爲溫文爾雅的是**語絲**，慷慨激昂的是**猛進**……但溫文爾雅四字實不足以盡之，因爲如魯迅所說：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並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

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態度 。 語絲並不是超政治的，他無形中自有一種愛憎，所以至終不免於被禁（一九二七年）。移到上海出版時，李小峯要求魯迅担任編輯，接着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拚命的圍攻。而語絲本身，却確實也在消沉下去。在經過幾次不愉快的事情以後，魯迅提議停刊，但小峯不肯，於是找柔石編輯了六個月之後 ， 柔石也辭職了。

在新青年之後，語絲確是盡了對北洋軍閥黑暗勢力的鬥爭作用的，這個作用一過去，便如魯迅所說……時時有疲勞的顏色，大約因為看得中國的內情太清楚，不免有失望之故罷。

魯迅却是一個愈失望愈激進的人 ， 所以他要尋找生力軍，加多破壞論者，不斷與青年人在一起，把許多老朋友撇在後面了。

最先和他在一起的青年人，是未名社的人，這中間又可以分做二類，誠摯而又肯埋頭苦幹的是韋素園，韋叢蕪、李霽野、台靜農、曹靖華；發揚而有衝勁的是高長虹 ， 向培良、尚鉞、高歌、朋其，但他說：這些人裏面，做小說和能翻譯的居多，而做評論的沒有幾個，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點。又說：中國現今文壇（？）的狀況，實在不佳 ， 但究竟做詩及小說者尚有人 。 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這一種批評者來。雖在割去敝舌之後，也還有人說話，繼續撕去舊社會的假面。可是魯迅所能找到的不過是文學青年，不是破壞論者，祇有革命家能從事破壞，而魯迅自己也不是一個革命家。

可是魯迅却遇到了一批「破壞論者」，那便是高長虹幾個人，他們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的京報副刊上發表過狂飈運動的「宣言」，但由於他們那種擬尼采樣的彼此都不能解的

格言式的文章，終於使週刊難以存在。魯迅認爲高長虹似乎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但賞識他的很能做文章，他親手替長虹編選了一本雜感和詩的合集**心的探險**，作爲**烏合叢書**之一。

高長虹一夥在魯迅離開北京後，便和韋素園他們發生了衝突，又因魯迅不作左右袒，遷怒到魯迅頭上，他們到上海成立了狂飈社，在刊物上攻擊魯迅，稱之爲青年的絆脚石，世故老人，戴着紙糊冠的思想界的權威者。好好的一個團體，先分裂，後解散，長虹一夥成爲內部的「破壞者」。此事對於魯迅的影响很大，以後他對青年人就另有一種看法了。

未名社本身具有一種特色，和**語絲**完全不同，**語絲**雖有青年人投稿，但主要是由幾個久已成名的老作家做中堅，所以非常容易獲得讀者信仰；**未名社**則以魯迅爲中心，四圍集合着不出名的富於理想的青年作家。魯迅除了主編**莽原**半月刊外，又編印二種叢書：**烏合叢書**專收創作，**未名叢刊**專收翻譯。李霽野回憶說：

> 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個晚上，素園，靜農和我在魯迅先生那裏談天，他說起日本的丸善書店，開始規模很小，全是幾個大學生慢慢經營起來的。後來談到我們自己的譯書出版的困難，便想到要是我們來嘗試出版一些期刊和書籍，也不是怎樣困難的事。於是便計劃起來了。當晚我們便決定先籌出版四期半月刊和一本書籍的資本，大約需六百元，由我們三人和叢蕪，靖華各籌五十元，其餘便由魯迅先生負担。我們只打算賣前書，印後書，並無什麼計劃，也沒有什麼章程，後來為了對外，纔用已印的叢書名字名了它。我說這樣每年可以出五六本書，魯迅先生笑着說：『過了十年豈不是很可觀了嗎？』

未名社出版了的書很多，韋素園譯的有**外套**、**黃花集**；

韋叢蕪譯的有**窮人**、**罪與罰**；李霽野譯的有：**往星中**、**黑假面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文學與革命**、**不幸的一羣**；曹靖華譯的有：**第四十一**、**烟袋**；魯迅譯的有：**出了象牙之塔**、**小約翰**等。

創作方面，有韋叢蕪的**君山**；台靖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魯迅的**朝華夕拾**和**墳**等。

烏合叢書自長虹一批人分裂出去之後原已由**未名社**出版的他們的書，都紛紛另找出路了。

× × ×

一九二四年七月，在魯迅平靜的生活中有一個插曲，那是陝西長安的西北大學邀請他和其他學者去作夏期講演。講詞經人筆記後請他訂正，由西北大學出版，不知爲甚麼這講詞未蒐集在他的全集內，以致見者甚尠。孫伏園張辛南均有文記述魯迅在陝時的言行，但與他的**日記**也有出入。**日記**所記行程甚詳，字裏行間，更具體表現了他的個性好惡，和當時的社會現象。

>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至晨報社訪孫伏園，而王聘卿亦在，遂至先農赴西北大學辦事人之宴，約往陝作夏期講演也，同席可八九人。
>
> 七月四日，王捷三來約赴陝之期。
>
> 七日，赴西車站晚餐，餐畢登汽車向西安，同行十餘人，王捷三招待。
>
> 八日，下午抵鄭州寓大金臺旅館。晚與四五同伴者遊城內。
>
> 九日，上午登汽車發鄭州。夜抵陝州，張星南來迎，宿耀武大旅館。
>
> 十日，晨登舟發陝州，沿河向陝西。下午雨。晨泊靈寶。
>
> 十一日，晨發靈寶。上午遇大雨，逆風，舟不易進，夜仍泊靈寶附近。

十二日，晨發舟，仍逆風，僱四人牽船以進。夜泊閿鄉。腹瀉。

十三日，晨發閿鄉。下午抵潼關，夜宿自動車站。腹瀉，服 Help 兩次十四粒。

十四日，晨發潼關，用自動車。午後抵臨潼，游華清宮故址，並就温泉浴。營長趙清海招午飯。下午抵西安，寓西北大學教員宿舍。寄母親信，晚同王嶧山、孫伏園至附近街市散步，買栟櫚扇二柄而歸。

十五日，午後游碑林。在博古堂買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種，為「吳氏造老君象」四枚，「張僧妙碑」一枚，共泉乙元。下午赴招待會。晚同張勉之、孫伏園閱市，歷三四古董肆，買得樂妓、土寓人二枚，四元，四喜鏡一枚，二元，魌頭二枚，一元。

十六日，午後同李濟之、蔣廷輔、孫伏園閱市。晚易俗社邀觀劇，演「雙錦衣」前本。

十七日，午同李、蔣、孫三君游薦福及大慈恩寺。夜觀「雙錦衣」後本。

十八日，午後小雨即霽。同李濟之、夏浮筠、孫伏園閱市一週，又往公園飲茗。夜往易俗社觀演「大孝傳」全本，月甚朗。

十九日，午後往南院門閻甘園家看畫。晚往張辛南寓飯。

二十日，上午買雜造象拓片四種十枚，泉二元。赴夏期學校開學式並攝景。

二十一日，上午講演一小時。晚講演一小時。夜赴酒會。

二十二日，午前及晚各講演一小時。

二十三日，上午小雨。講演二小時。午後晴。晚與五六同人出校游，步蹊破砌，失足仆地，傷右膝，遂中止，購餅餌少許而回，于傷處塗碘酒。

二十四日，午前講演一小時。晚赴省長公署飲。

二十五日，上午講演一小時。午後盛熱。飲苦南酒而睡。

二十六日，午前講演一小時 。晚王捷三邀赴易俗社，觀演「人月圓」。

二十八日，上午講演一小時。午後收暑期學校薪水泉百。下午講演一小時。

二十九日，午前講演一小時，全講俱訖。下午同孫伏園游南院門市，買弩機一具 ， 小土梟一枚，共泉四元。

三十日，上午托孫伏園往郵局寄泉八十六元，還新潮社。下午往講武堂講演約半小時。

三十一日，上午尊古堂帖賈來。買「蒼公碑」並陰二枚，「大智禪師碑」側畫象二枚，「臥龍寺觀音象」一枚，共泉一元。

八月一日，上午同孫伏園閱古物肆，買小土偶人二枚，磁鳩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畫魚龍陶瓶一枚，共泉三元，以猿首贈李濟之。買弩機大者二具，小者二具，其一有字，共泉十四元。

三日，上午同夏浮筠 、 孫伏園往各處辭行 。午後收暑期學校薪水並川資泉二百 ， 即託陳定謨君寄北京五十，又捐易俗社亦五十 。下午往青年會浴 。晚劉省長在易俗社設讌演劇餞行，至夜又送來『顏勤禮碑』十分，『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二合。

四日 ，晨乘騾車出東門上船，由渭水東行 ， 遇逆風，進約廿里即泊。

五日，小逆風，晚泊渭南。

六日，逆風，夜泊華州。

七日，逆風，向晚更烈，遂泊 ， 離三河口尚十餘

里。

八日，午抵潼關，買醬萵苣十斤，泉一元。午後復進，夜泊閿鄉。

九日，逆風。午抵函谷關畧泊，與伏園登眺，歸途在水灘拾石子二枚作紀念 。下午抵陝州，寓耀武大旅館，頗有蠍蟲，徹夜不睡。

十日，乘隴海鐵路車啟行，午後抵洛陽，寓洛陽大旅館。下午與伏園畧游城市，買汴綢一匹，泉十八元，土寓人二枚，八角。晚在景陽莊飯。

十一日，晨乘火車發洛陽。上午抵鄭州，寓大金臺旅館。午後同伏園往機關鎗營訪劉冀述君。閱古物店四五家，所列大抵贋品。晚發鄭州。

十二日，黎明車至內邱，其被水之軌尚未修復，遂步行二里許，至馮村復登車發。夜半抵北京前門，稅關見所携小古物數事，視為奇貨，甚刁難，良久始已，乃僱自動車回家。

魯迅此行，全部日程三十七天，除來去路程十六天，在西安二十一天，講演十次，凡十一小時，另在講武堂講演約半小時；講演題目爲「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分六章：1.從神話到神仙傳； 2.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 3.唐之傳奇文；4.宋人之「說話」及其影響；5.明小說之兩大主潮；6.淸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講演記錄稿於九月三日寄到魯迅那裏，**日記：**

五日，夜訂閱西北大學講稿。

六日，午後改訂講稿，至夜半訖。

八日，上午以改定之講稿寄西北大學出版部。

這是一本畧而又畧的**中國小說史畧**，但不知在講武堂的半小時講演，內容又是什麼，因爲據張辛南的記述云：

在西安講學的時候，魯迅先生所講的總是小說史。對於學生及教職員講小說史，對於督省兩署和各廳處的

職員也講小說史。劉雪雅先生（陝西督軍劉鎮華一註）想請魯迅先生對西安的下級軍官士兵講演一次，教我向魯迅先生商議一個士兵能了解並感興味的題目，魯迅先生回答道：『我向士兵講說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講的題目仍然是小說史，因為我只會講小說史。』

北京生活（三）——女師大——三一八

歷史的每一次進步運動，繼起的一定是反動局面，「五四」運動在政治上是反帝反北洋政府，提倡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在文學上主張白話文與新文學（小說、詩），在思想上介紹歐美資產階級的學說體系，所以有人把「五四」運動比之於歐洲十六世紀肇端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但是反動勢力是不甘就此被打倒的，從**學衡**到**甲寅**，從吳宓到章士釗，從解散女師大到三一八，這是反動的頂點；反動的武器，千遍一例是提倡文言文，反對白話文，祀孔，讀經；最後則憑藉武力，反共，討赤。

從一九二五年起，和這種反動勢力作鬥爭的，主要是魯迅，他具有澈底而一貫的思想，凌厲而不容情的文筆，洞燭隱微，直通未來的見解，所以他主張壕塹戰，主張韌性的鬥爭，「不耻最後」。

關於女師大事件的經過，周作人**回想錄**記述得非常詳盡，要了解魯迅在這事件中成爲「正人君子」的衆矢之的，自非對這一事件有個概念不可。

> 講到女高師——它之改稱女師大，只是在楊蔭榆來做校長之後，這以前都是稱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我和它很有一段相當長的歷史。在民國十年還是熊崇煦長校的時代，由錢秣陵來說，叫我去担任兩小時的歐洲文學史，第二年生了半年的病，這功課就無形的結束了。到了十一年由許壽裳繼任校長，他是一個大好人，就是有點西楚霸王的毛病，所謂『印刓不予』，譬

如學生有什麼要求，可與則與，不可便立卽拒絕好了，他却總是遲疑不決，到後來終於依了要求，受者一點都不感謝，反而感到一種嫌惡了。他自己教杜威的『教育與民治』滿口德謨克拉西，學生們就送他一個徽號叫『德謨克拉東』，這名字也夠幽默的了。我那裏担任了一年課，到第二年卽一九二三年的八月裏，我就想辭職。在舊日記裏有這幾項記載：

八月十日，寄季茀函，辭兼課。

九月三日，季茀來，留女高師教課，只好允之。

十二月二十六日，寄鄭介石函，擬辭女高師課，這時鄭君或者是兼職國文系的主任，但辭職仍沒有准許，雖然在日記上沒有登載。一九二四年夏天許季茀辭去校長，推荐後來引起風潮的楊蔭榆繼任，楊女士是美國的留學生，許君以為辦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長，況且美國是杜威的家鄉，學來的教育一定是很進步的。豈知這位校長乃以婆婆自居，把學生們看作一羣的童養媳，釀成空前的風潮，這是和他的希望正相反了。我本來很怕在女學校裏教書，尤其怕在女人底下的女學校裏，因此在這時更想洗手不幹了，在日記裏記着這幾項，可以約畧的知道：

七月二日，晚楊校長招宴，辭不去。

七月十一日，收女高師續聘書，當還之。

七月十四日，送還女高師聘書。

七月二十日，女高師又送聘書來。

七月廿六日，仍送還女高師聘書。

七月廿七日，上午往女高師，與楊校長談，不得要領。

九月廿一日，馬幼漁來，交來女高師聘書。

卽此可以看見，我對於女師大的教課一向並無什麼興趣，特別是女校長到任以後更想積極的擺脫，可是

擺脫不了，末了倒是由北大『某籍某系』的老大哥馬幼漁，不曉得是怎麼樣找來的，出來挽留我，於是我不得不繼續在那裏做一名『西席』；後來成為女師大事件中支持學生方面的一個人，一直到大家散伙之後，還留下來與徐耀辰成了女師大方面唯一的代表，和女子大學的學長林素園交涉以至衝突，想起來實在覺得命運之不可測。而在別一方面，我對於東吉祥派的人們，便是後來在女師大事件上支持校長方面的所謂『正人君子』，我當初却是很拉攏的，舊日記上還留着這些記錄：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下午耀辰鳳舉來，晚共宴張欣海、林玉堂、丁西林、陳通伯、郁達夫及士遠、尹默，共十人，九時散去。這是第一次招待他們，是在後院的東偏三間屋裏，就是從前愛羅先珂住過的地方。

十一月十七日，午至公園來今雨軒，赴張欣海、陳通伯、徐志摩約午餐，同坐十八人，四時返。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六時至公園，赴現代評論社晚餐，共約四十人。

七月五日，下午鳳舉同通伯來談，通伯早去。

七月三十日，下午通伯邀閱英文攷卷，閱五十本，六時返。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往北大二院，閱英文卷百本。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下午同丁西林，陳通伯鳳舉乘汽車，往西山，在玉泉山旅館午飯，抵碧雲寺前，同步登玉皇頂，又至香山甘露旅館飲茶，六時返家。

這時候女師大反對校長的風潮已經很是高漲，漸有趨於決裂的形勢；在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記裏，記有『女高師舊生田羅二女士來訪，為女師大事也』的記載。她們說是中立派，來為學校求解決，只要掉換校長，風潮便自平息。那時是馬夷初以教育部次長代理部務，我當晚就打電話到馬次長的家裏轉達此意，馬次長說這事好

辦，校長可以撤換，但學生不能指定後任為誰，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難以辦到。這事我不知底細，不能負責回答，就拖延了下來，到了四月內閣改組，由章行嚴出長教育，於是局勢改變，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

女師大反對校長的風潮，發生於一九二四年的秋天，遷延至次年一月，仍未解決，學生代表乃至教育部訴說請求，併發表宣言，堅決拒絕楊蔭榆為校長。五月七日該校開國恥紀念講演會，校長與學生發生衝突，五月九日乃召集評議會開除學生自治會職員六個人，即蒲振聲、張平江、鄭德音、劉和珍、許廣平、姜伯諦。（這些年月和人名，我都是查考魯迅全集第三卷的注釋才能得來的，因為日記裏沒有詳細的記載。）我們有幾個在女師大教書的教員聽了不平，便醞釀發表一個宣言，這啟事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報上，由七個人署名，即是馬裕藻、沈尹默、周樹人、李泰棻、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

這宣言的反響來得真快，在五月三十日發行，而二十九日已經發賣的『每週評論』上，（按：『每週評論』恐為『現代評論』之誤。）就發現陳西瀅即通伯的一篇『閑話』，不但所說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挑剔風潮』的話就出在這裏邊，而且大有挑唆北京軍閥政府來嚴厲壓迫女師大的學生的意思。我以前因張鳳舉的拉攏，與東吉祥諸君子謬托知己的有些來往，但是我的心裏是有『兩個鬼』潛伏着的，即所謂紳士鬼與流氓鬼，我曾經說過，『以開店而論，我這店是兩個鬼品開的，而其股份與生意的分配，究竟紳士鬼還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紳士們周旋，也仍舊是合不來的。有時流氓鬼要露出面來，結果終於翻臉，以至破口大罵，這雖是由於事勢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轉北，幾乎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脫却紳士的『沙龍』，加入從前那

麼想逃避的女校，終於成了代表，與女師大共存亡，我說運命之不可測就是如此。這之後，我就被學生自治會請去開會， 時期在五月二十一日， 情形如魯迅在『碰壁之後』一篇文章裏所寫，眼見一個大家庭裏鬥爭的狀況，結果當上了一名校務維持會的會員。……

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時赴教育部家長會議，無結果而散。……以後緊接着二十二日武裝接收的一幕，由專門教育司長劉百昭率領老媽子隊伍，開赴石駙馬大街，把女學生拖拉出校，……那班被拖出街上的學生們只得另尋棲止，在端王府的西南找到一個地方，作為校址，校長是易培基。……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赴女師大開學典禮，午返。這以後就暫時在那裏上課，到了十一月底章士釗離開了教育部，女師大隨即復校，仍搬回石駙馬大街原處。可是在第二年即一九二六年中乃有更不幸的事情發生，這即是三一八事件，女師大死了兩個學生，國文系的劉和珍與英文系的楊德羣 ， 隨後有些教員也被迫脅離開了北京，教育總長換了任可澄；……二十二日是去年『毀校紀念』，開會記念了不到十日，教育部又發表將女子大學和女師大合併為女子學院 ， 而以女師大為師範大學部，派林素園為學長，於九月四日來校，武裝接收了。今據林素園的報告照錄於下：

『素園本日午前十一時復任該校，維時該校教職員等聚集多人，聲勢洶洶，當晤教員徐祖正、周作人說明接收理由，該徐祖正等聲言同人等對於改組完全否認，早有宣言，何竟貿然前來，言時聲色俱厲，繼續躍起謾罵，户外圍繞多人，一齊喝打，經部員勸告無效，並被拳擊，素園等只得來部陳明。』，這篇報告登在九月六日的世界日報上，但記者說據前日報告，僅云林上午到校因斥該校教授為共產黨，言語之間稍有衝突，並無互

毆之說，……

有了周作人這篇詳盡的記載作底，我們可以依據之作爲魯迅在這一鬥爭中所處地位的說明。

這次鬥爭長達三年，以魯迅離開北京作結。

魯迅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開始到女子師範大學去講課的。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記**：晚以女師校風潮學生柬邀調解，與羅膺中、潘企莘同往，而續至者僅鄭介石一人耳。八月十二日**日記**：女子師範學校所寄去年十一月分薪水十三元五角，又聘書一紙。十三日**日記**：寄還女師範校聘書。九月十四日**日記**：上午楊蔭榆，胡人哲來。

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鬥爭已有相當結果，**日記**：下午季市來，同至女師大教育維持會送學生復校。二月一日：午後往女師大開會，後同赴石駙馬大街女師大校各界聯合會，其校之教務長蕭純錦嗾無賴來擊。

從此，至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辭去女師大評議會會員爲止，魯迅始終出席維治會，親預其事，唯力是視。

魯迅因爲主張正義，給當時的教育總長章士釗撤了僉事之職。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日記**：我之免職令發表。但魯迅對章士釗提出了控訴，到次年三月，他的控訴雖然得直，他當然不會再回教育部做僉事，而且也不能安居在北京了。

魯迅於五月二十一日應邀去女師大調解，是夜作**碰壁之后**一文，他說：

> 我本就怕這學校，因為一進門就覺得陰慘慘……後來看到楊蔭榆校長『致全體學生公啟』裏的『須知學校猶家庭，為尊長者斷無不愛家屬之理，為幼稚者亦當體貼尊長之心』的話，就恍然了，原來我雖然在學校教書，也等於在楊家坐館，而這陰慘慘的氣味，便是從『冷板櫈』裏出來的。……恍然之後，即又有疑問發生：

這家屬人員——校長和學生——的關係是怎樣的，母女，還是婆媳呢？

想而又想，結果毫無，幸而這位校長宣言多，竟在她『對於暴烈學生之感言』裏獲得正確的解答了。曰，『與此曹子勃谿相向』，則其為婆婆無疑也。……這一年她們的家務簡直沒有完。……

他到學校後，在坐位面前看見了一張印刷品，看了之後，不覺毛骨悚然，因爲裏面說：……茲定於(月之二十一日)下午七時，由校特請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在太平湖飯店開校務緊急會議，解決種種主要問題。務懇大駕涖臨，無任盼禱！云云。

魯迅是個「兼任教員」，不必去「太平湖飯店」，後來兩個學生來請開會，婆婆終於沒有露面，他聽見他所不識的教員在和學生談話：有一句你們做事不可碰壁，在學生的話裏也聽到一句：楊先生就是壁。

他就彷彿見了一道光：

碰壁，碰壁！我碰了楊家的壁了！

其時看看學生們，就像一羣童養媳。……

中國各處是壁，然而無形，像『鬼打牆』一般，使你隨時能『碰』，能打這牆的，能碰而不感痛苦的，是勝利者。——但是，此刻太平湖飯店之宴已近闌珊，大家都已經喫到冰其淋，在那裏『冷一冷』了罷。……

我于是彷彿看見雪白的桌布已經沾了許多醬油漬，男男女女圍着桌子都喫冰其淋，而許多媳婦兒，就如中國歷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脚下似的，都決定了暗淡的運命。

魯迅寫了這篇文章之後，七個教員發表了宣言，這宣言引起了西瀅的「閑話」，一場論爭揭開了火蓋。閑話以粉飾毛厠爲題：

以前學校鬧風潮，學生幾乎沒有對的，現在學校

鬧風潮，學生幾乎沒有錯的。這可以說是今昔言論界的一種信條。在我這種喜歡懷疑的人看來，這兩種觀念都無非是迷信。 女師大的風潮， 究竟學生是對的還是錯的，反對校長的是少數還是多數，我們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 無從知道。 我們只覺得這次鬧得太不像樣了。同系學生同時登兩相反的啟事已經發現了。學生把守校門，誤認了一個緩緩駛行的汽車為校長回校而羣起包圍它的笑話，也到處流傳了。校長不能在校開會，不得不借隣近飯店招集教員會議的奇聞，也見於報章了，學校的醜態既然畢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丟盡。到了這種時期，實在旁觀的人也不能再讓它醞釀下去，好像一個臭毛厠， 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 在這時候勸學生不為過甚，或是勸楊校長辭職引退，都無非粉飾毛厠，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我們以為教育當局應當切實的調查這次風潮的內容，如果過在校長，自應立即更換，如果過在學生，也少不得加以相當的懲罰，萬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將來要整頓也沒有辦法。

閑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我們在報紙上看見女師大七教員的宣言。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佔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這個宣言語氣措辭，我們看來，未免過於偏袒一方，不大平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幾句就知道了。

『至於品行一端，平素尤絕無懲戒記過之迹，以此與開除並論，而又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況六人職俱為自治會員，倘非長才，衆人何由公舉？不滿於校長者，倘非公意，則開除之後，全校何至譁然？所罰果當其罪，則本系之兩主任何至事前並不與聞，繼則相率引退？可知言論尚在人心，曲直早經顯見，偏私謬誤之舉，究非空言曲說所能掩飾也。』

這是很可惜的。我們自然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但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傳佈得厲害了。

魯迅對於這篇「閑話」，連續寫了幾篇文章加以揭露，而且下了如下的結論：

……世上雖然有斬釘截鐵的辦法，却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着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誰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的，他便用了『流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這種蛆蟲充滿的『臭毛厠』，是難於打掃乾淨的。丟盡『教育界的面目』的醜態，現在和將來還多着哩！

女師大本身的鬥爭不斷在演變，所以爭論也在繼續深入，劉百昭率老媽子拉女學生出校，一也；就石駙馬大街另設國立女子大學，派胡敦復爲校長，二也；合併女子大學和女師大爲女子學院，校長林素園武裝接收女師大，三也。

十二月十四日，有許多「名流」在擷英番菜館開會，產生了「教育界公理維持會」，這會又一變爲「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據魯迅在**公理的把戲**一文所載名字如下：

除了萬里鳴是太平湖飯店掌櫃，以及董子鶴輩為我所不知道的不計外，陶昌善是農大教務長，教長兼農大校長章士釗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務長；查良釗是師大教務長；李順卿，王桐齡是師大教授；蕭友梅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教員；蹇華芬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學生；馬寅初是北大講師，又是中國銀行的什麼，也許是『總司庫』，這些名目我記不清楚了；燕樹棠，白鵬飛，陳源卽做『閑話』的西瀅，丁燮林卽做過『一隻馬蜂』的西林，周鯁生卽周覽，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卽李四光曾有一篇楊蔭榆要用汽車迎他『觀劇』的作品登在**現代評論**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東吉祥胡

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對北大對章士釗獨立的人物，所以當章士釗炙手可熱之際，『大同晚報』曾稱他們為『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魯迅說：『公理』實在是不容易談，不但在一個維持會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時竟至于會用了『道義』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臉的嘴巴。西瀅是曾在**現代評論**(三十八)的『閑話』裏冷嘲過援助女師大的人們的：『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現在却簽名于什麼公理會上了，似乎性情或體質有點改變。而且曾經感慨過：『你代被羣衆專制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麼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係」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現代四十**)然而現在的公理什麼會上的言論和發表的文章上，却口口聲聲，側重多數了；似乎主張又頗有些參差，只有『吃飯』的一件事還始終如一。在**現代評論**(五十三)上，自詡是『所有的批評都本於學理和事實，絕不肆口嫚罵』，而忘却了自己曾稱女師大為『臭毛厠』，並且署名于要將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陳源　。陳源不就是西瀅麼？半年的事，幾個的人，就這麼矛盾支離，實在可以使人憫笑。但他們究竟是聰明的，大約不獨覺得『公理』歪邪，而且連自己們的『公理維持會』也很有些歪邪了罷，所以突然一變而為『女子大學後援會』了，這是的確的，後援，就是站在背後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報**上所載該後援會開會的記事，却連發言人的名姓也沒有了，一律叫作『某君』。……因為明白地站出來，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專在背後，用暗箭的聰明人的人格。

西瀅——這位正人君子的代表人物，當然也不會就此歇手的，據魯迅**這回是『多數』的把戲**一文中說：

現代評論五五期『閑話』的末一段是根據了女大學

生的宣言，說女師大學生只有二十個，別的都已進了女大……于是發問道：『要是二百人（按據云這是未解散前的數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樣？難道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招了幾個新生也去恢復麼？我們不免要奇怪那維持會維持的究竟是誰呢？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要是』帝國主義者搶去了中國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們便怎樣？別的都歸了强國了，少數的土地，還要維持麼？明亡以後，一點土地也沒有了，却還有竄身海外，志在恢復的人。凡這些，從現在的『通品』看來，大約都是謬種，應該派『在德國手格盜匪數人』，立功海外的英雄劉百昭去剿滅他們的罷。

以後，西瀅的戰畧改變了，他集中於攻擊魯迅個人，而且超出於女師大事件的範圍，結束於給徐志摩的一封長信。這種對於個人的人身攻擊，在論戰中本屬無聊，但有關於學術的造謠誣衊，我們必須引用在這裏，因爲其中的是非曲直，自有事實證明的。

西瀅在**現代評論**（五十）「閑話」中談到「剽竊與抄襲」，對魯迅放了一枝冷箭，他說：……很不幸的，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子，張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麼？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

後來他在給徐志摩的信中，就指名說魯迅剽竊，因爲他懷疑魯迅匿名指他的太太凌叔華所做的小說「**花之寺**」剽竊柴霍甫的「在消夏別墅」，其實魯迅從來明鎗交戰，决不匿名攻擊，指凌叔華剽竊的是署名晨牧的人，另指**晨報副刊**篇首圖案剽竊琵**亞**詞侶的則是陳學昭（署名重余），與魯迅全不相干。

西瀅說：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

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畧』，却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魯迅答覆道：這流言早聽到過了；後來見於『閑話』，說是『整大本的剽竊』，但不直指我，而同時有些人的口頭上，却相傳是指我的『中國小說史畧』。我相信陳源教授是一定會幹這樣勾當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罵街，這可實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語』。這回說出來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沒有猜錯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為『做你自己的藍本』了，比先前輕得多，彷彿比自謙為『一言半語』的『冷箭』鈍了一點似的。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攷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畧』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他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好在鹽谷氏的書聽說（！）已有人譯成（？）中文，兩書的異點如何，怎樣『整大本的剽竊』，還是做『藍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

但這個願望要等到十年之後才算實現，魯迅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作**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中說：

三、在『中國小說史畧』日譯本的序文裏，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却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復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

卽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于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閑話』裏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囘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裏去了。

魯迅在囘答陳源文內又說：

但我還要對於『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這事說幾句話；『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的，似乎倂不是我。因為我于詩向不留心，所以也沒有看過『沫若的詩』，因此卽更不知道別人的是否鈔襲。……

……因這一囘的放泄，我才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為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將『大盜』兩字掛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權威者』。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並不看這些小說。『琵亞詞侶』的畫，我是愛看的，但是沒有書，直到那『剽竊』問題發生後，才刺激我去買了一本Art of A. Beardsley 來，化錢一元七。可憐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見的並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

其他關於人身攻擊的話，不再具引了。讀者自可細讀**華蓋集**、**續集**、**西瀅閑話**幾本書，研究雙方爭論的論據。這裏應該介紹魯迅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所寫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他非常客觀地選載凌叔華的小說，並且加以評介：

現代評論比起日報的副刊來，比較的着重於文藝，但那些作者，也還是**新潮社**和**創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

華的小說，却發祥于這一種期刊的，她恰和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很謹慎的，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卽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為了偶受着文酒之風的吹拂，終于也回復了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汪靜之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門鉅族的精魂。

魯迅嫉惡也許過甚，他不斷追擊的戰法，更使若干人爲之披靡；但他態度坦白，不存偏見，這是與人共見的。

東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此後有許多人學而優則仕，紛紛在國民黨政府出任要職，陳源、陳西瀅、陳通伯先生，更做了「過河卒子」，在國民黨政府偏安台灣後，出任聯敎組織的常任代表，一九七〇年死於倫敦。

出任人民政府要職者，有馬寅初、丁西林、李四光等。

× × ×

在魯迅爲女師大事件不斷與「正人君子」鬥爭時，歷史上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上海英租界槍殺學生工人；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執政府門前槍殺學生。這兩件大事都影响以後的歷史發展，「五卅」動搖了帝國主義的統治，「三一八」開始結束北洋軍閥的政治。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後，在工人、學生，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已打定了一定的基礎。在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實際運動方面，有了决定的作用，所以五卅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牠是中國共產黨員多方面工作的成果，帝國主義者們用對付義和團的方法，來對付有組織，有覺悟的革命羣衆，自然會遭受普遍全國的罷工罷市罷課的一致抵抗。五卅運動的本身雖然是失敗了，它不僅被北京政府出賣，而且也被東南民族資產階級出賣，但這是一次革命綱領與革命行動的初步檢閱，它爲此後的革命工作開了先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立了二十四年的今天，

對於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的歷史功過，足夠做出結論來的。蘇聯本身和第三國際，那時以後已逐漸爲史大林的官僚層所控制，在「四個階級聯盟」的理論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當了一次資產階級的苦力。這在五卅運動中，資產階級也已淸楚可見地叛賣了民族革命，它表示隨時可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的。

在辛亥革命中受過深刻教訓的魯迅，對於五卅運動並不怎樣表示熱心，在他看來：上海的風潮，也出于意料之外。他還是冷靜地對運動中暴露出來的惡劣現象痛下針砭。自從**新青年**分裂之後，他不追隨向左的陳獨秀李大釗，却輕視向右的胡適——因爲他是此後的「正人君子」的精神領袖；他和錢玄同等人仍繼承**新青年**的老路，認爲非從事「思想革命」不可，直至他死前和周揚論戰，可說都是他所主張的「思想革命」的擴大與深入。

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爲了女師大事件，他一直和「正人君子」們鬥爭，中間發生了五卅，最後則發生了用流血結束的三一八。魯迅的攻擊目標是一貫的，因爲這都是黑暗的中國社會所產生的，他向思想和政治的黑暗勢力開火，雖然有時使他感到這是絕望的抗戰。

他把這兩種鬥爭合而爲一，而且視對內的鬥爭比對外的鬥爭更爲重要，他的矛頭常常指向統治階級，中國的統治階級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他以後和周揚的爭論也是以此爲出發點的。

魯迅的「思想革命」和**新青年**當年不同，目標和場地都有所轉移了，他首先揭發這個社會的黑暗，徹底從辛亥革命算起，因爲他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於是他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

他以歷史爲例，指出中國狀況之可怕可悲：

> 秦漢遠了，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

著作寥寥。至於唐宋明的雜史之類，則現在多有。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現在，則中國的情形還可以更腐敗，更破爛，更凶酷，更殘虐，現在還不算達到極點。但明末的腐敗破爛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李自成，張獻忠鬧起來了。而張、李的凶酷殘虐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滿洲兵進來了。

歷史的比擬自然是有條件的，有時似乎擬於不倫，但在歷史遞嬗變化之中， 仍有原則可尋的，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沒有讓中國再受三百年的異族統治；而新的農民戰爭，却推送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政權。

在當時，魯迅並無這種預見，足以洞澈未來，他只知道從歷史演變上現在反動的軍閥統治必然沒落，所以他用警闢的言詞，拚命向青年人指出應走的道路，他相信進化論，相信青年人比老年人有希望。

他說：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無論愛什麼——飯、異性、國、民族、人類等等，——只有糾纏如毒蛇，執着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者有望。但太覺疲勞時，也無妨休息一會罷；但休息之後，就再來一回罷，而且兩回， 三回……。 血書，章

程，請願，講學，哭，電報，開會，輓聯，演說，神經衰弱，則一切無用。

因此，他提出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飽，三要發展，但他認爲生存不是苟活，温飽不是奢侈，發展不是放縱。對於所謂「苟活」，他引用古訓爲例，什麼知命者不立於岩墻之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這都是敎人苟活的，我們要生活，不是苟活，半死半生的苟活，那只是掛了生活的招牌引人到死路上去。

青年人果眞是站起來了，局部的，女師大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魯迅和其它六個敎授，挺身站在學生一邊，和敎育總長章士釗，東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們鬥爭；普遍的，由上海工人學生反對日本和英國帝國主義引起的五卅慘案，簡直像燎原之火燃遍了全國，魯迅對於北京政府的軟弱外交，加以如下的抨擊：

>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我們並不還擊，却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說道我們並非『赤化』，因為沒有受別國的煽動；說道我們並非『暴徒』，因為都是空手，沒有兵器的。我不解為什麼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暴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記得新希臘人也曾用兵器對付過國內的土耳其人，却並不被稱為暴徒；俄國確已赤化多年了，也沒有得到別國開鎗的懲罰。而獨有中國人，則市民被殺之後，還要皇皇然辯誣，張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
> 其實，這原因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為我們並非暴徒，並未赤化的緣故。
>
> 因此我們就覺得含寃，大叫着偽文明的破產。可是文明是向來如此的，並非到現在纔將假面具揭下來。只因為這樣的損害，以前是別民族所受，我們不知道，或

者是我們原已屢次受過，現在都已忘却罷了。公道和武力合為一體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現，……

魯迅向青年人號召：

> 因此，中國青年負担的煩重，就數倍於別國的青年了。因為我們的古人將心力大抵用到玄虛漂渺平穩圓滑上去了，便將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後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現在可真到了試練的時候了。對手又是堅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來磨練。假定現今覺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齡為二十，又假定照中國人易於衰老的計算，至少也還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不夠，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彷彿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只好甘心滅亡。因為在民族的歷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

魯迅並不大喊大叫「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他認爲在中國人中，仇視那真誠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國或日本人還凶險。

魯迅對於學生們在演講時常常說的同胞，同胞！……問：你們可知道你們所有的是怎樣的『同胞』，這些『同胞』是怎樣的心麼？

他希望他們在演講和募捐之後，已經有機會接觸到社會上的各式人物，然後將所見所受，所感的都寫出來，無論是好的，壞的，像樣的，丟臉的，可恥的，可悲的，全給牠發表，給大家看看是怎樣的「同胞」。

魯迅自己在個人情緒方面，對「同胞」二字是非常悲觀的，但他還是鼓勵青年人：卽使所發見的並無所謂同胞，也可以從頭創造的；卽使所發見的不過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戰鬬的。

那時候，是有人在羣衆集會上「砍下指頭」，或是「當

場暈到」的，這是一種企圖作爲由此喚醒羣衆，到處流行的手段。魯迅指出斷指是極小部分的自殺，暈倒是極暫時中的死亡。我希望這樣的教育不普及；從此以後，不再有這樣的現象。

那時又有一種「到民間去」的運動，這運動本發生在沙俄時代。記得魯迅編輯的莽原上，馮雪峯譯有石川啄木的一首詩，描寫日本的知識分子，大意是說酒已飲得夠了，慷慨激昂的話已說得很多，但沒有人用拳擊着桌子說，「到民間去」！這首詩曾給我精神上很大影响，經過第二年（一九二六）三一八之後， 在北京的波希米亞式的小名士們， 如胡風，雪峯等人，果然實踐到民間去，而且後來都成了共產黨員，和魯迅携手戰鬥。

魯迅對於叫出這種口號的青年人也有一種期待，他認爲即使這種青年再回到北京，沈默而痛苦，新的生命也會在苦痛的沈默裏萌芽的。

時代究竟不同了，范愛農式的悲劇决不會再產生了。

魯迅最後的告誡是：不耻最後。他說：

> 記得韓非子曾經教人以競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後』。卽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的目標。

關於這個告誡， 他說了又說， 他以運動會中的競走爲例：

> 競走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鬆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入看客的羣集中；………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却儘跑，儘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因為他太不聰明，『不耻最後』的緣故罷。
>
>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 ， 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多有『不恥最後』的人的民族，無論什麼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的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樑。

× × ×

在一九二五年中，魯迅出版了**苦悶的象徵**，譯了**出了象牙之塔**；組織了**未名社**，出版了第一本有意義有頃向的書：**蘇俄的文藝論戰**，編了**莽原**；開始與許廣平通訊；在住宅庭園內種了幾株樹，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楊二；對滬案捐了四元五角又八元；往東亞公司買了本**文學與革命**，托洛次基著，在**創造社**攻擊他醉眼矇朧之前三年，他早已開始研究新興的蘇聯文學；此外，二月十七日**日記**：邵元冲黃昌穀邀飲，晚一赴即歸。

邵元冲黃昌穀都是國民黨中弄弄筆頭的人，他們的邀飲和孫中山卽將入京有關，應邀的一定包括很多教授和文人，魯迅一赴卽歸，可見他對這種邀飲並無興趣。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做了臨時大總統，不久卽讓位於袁世凱，國民黨自始在政治上居於失敗地位，而許多黨員就爭着去做議員做官了。魯迅在東京時候，和回國以後在紹興經歷辛亥革命時候，他接觸的都是光復會的人，他生平佩服章太炎，從不談到孫中山。俄國革命的成功，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推動孫中山去改組國民黨，但孫中山就想在直奉戰爭之後，去和張作霖段祺瑞聯合，他主張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可是一到天津就病了；做了臨時執政府執政的段祺瑞，一上台就已表示外崇國信，並號召召集善後會議，這和孫中山的主張完全背馳，卽使孫中山不死，也決不可能貫徹其主張的。孫中山所代表的國民黨以及牠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其中途妥協性，政治投機性，不必等到魯迅目瞪口呆，早已暴露了，魯迅在當時自然想不及此的。

魯迅在**華蓋集**題記上說，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這話是對的。但在孫中山死後，他寫了一篇戰士與蒼蠅，據他說文章的本意是指孫中山先生和民國元年前後殉國而反受奴才們譏笑糟蹋的先烈的，可見他不眞是無所感觸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他又寫了中山先生逝世一週年，這篇文章並未編入**華蓋集續編**，刋在魯迅死後蒐集的**集外集拾遺**裏面，據景宋後記，那是應該屬於魯迅生前故意删掉之例的。

魯迅祇是一個資產階級性的左翼改革者，他所攻擊的主要限於抽象的中國的靈魂， 國民性， 中國人的惰性……之類，這都沒有超出**新青年**早期主張改革的範圍，他雖受到章士釗和「正人君子」們的壓迫和圍剿，直到一九三〇年，讀了梅林格（Franz Mehring）幾篇文章之後，他才知道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裏，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携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得最兇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

魯迅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的 ， 這是一個携貳者的憎惡，即一個本階級的背叛者的憎惡；最後在改變了他自己的階級意識之後，他又憎惡藉抗日之名第二次企圖投降國民黨的、在共產黨中頗爲得勢的周揚之流 —— 周揚後面站着米夫、王明一系，米夫、王明背後站着從「第三時期」走到「聯合陣線」的史大林。

× × ×

在一九二五年，有一件事使魯迅不僅受老年人攻擊，而且也受青年人攻擊的，那便是對於青年必讀書的主張。

當時的**京報副刊**，會向學術界人士徵求青年必讀書十部的意見，胡適等正在提倡「整理國故」，引導青年人離開對於社會的政治的實踐，走向書齋和故紙堆中，故魯迅在應徵

表中特地塡上兩句話：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並在附註上說：

但我要趁這機會，畧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沈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卽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是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這個主張，遠沒有吳稚暉要把中國線裝書丟入毛厠裏三千年那樣的激烈，但已飽受了老年人青年人的攻擊，那時有一個署名ＺＭ的人投文**京報副刊**爲魯迅解圍，他仍用魯迅在講堂上說的話替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這句話作註解，原文如下：

讀了許多名人學者給我們開的必讀書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動我的是魯迅先生的兩句附註……因這幾句話，又想起他所講的一段笑話來。他似乎這樣說：『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徵象。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真有實力的勝利者也多不做聲。譬如鷹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鷹；貓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貓。……又好像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時候，他並不說什麼；等到擺出詩人面孔，飲酒唱歌，那已經是兵敗勢窮，死日臨頭了。最近像吳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賦彼其詩』，齊燮元先生的』放下槍枝，拿起筆桿』，更是明顯的例了。

魯迅的主張是有所爲而發的，**新青年**的勢力分散之後，北京那時正是「風雨如晦」，他屬望青年人不要再說空話，而要行，起而行。可是想不到，當時和魯迅多少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周作人，到晚年居然說這是魯迅的高調之一，他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給香港友人信中說：……說得不好聽一點，他好立異鳴高，故意的與別人拗一調，他另外有給朋友的兒子開的書目，却是十分簡要的……這是似是而非的，不符事實的話。

魯迅替許季茀的兒子開過一張書單，因爲他讀的是中國文學系；這和**京報副刊**公開徵求青年必讀書的意義完全不同，別的學者自然可以開列古書一大批作爲青年人必讀書，魯迅却針對時弊，主張少讀中國書，這當然不是因爲立異鳴高或故意與人拗一調。周作人所說，未免近於事後詆譭了。

魯迅替許季茀兒子開的書目，據許季茀後來的記述是這樣的：

> 吾越鄉風，兒子上學，必定替他挑選一位品學兼優的做開蒙先生，給他認方塊字，把筆寫字，並在教本面上替他寫姓名，希望他能夠得到這位老師品學的薰陶和傳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長兒世瑛年五歲，我便替他買了『文字蒙求』，敦請魯迅做開蒙先生。魯迅只給他認識二個方塊字：一個是『天』字，一個是『人』字，和在書面上寫了『許世瑛』三個字。我們想一想，這天人兩個字的含義實在廣大得很，舉凡一切現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無遺了。後來，世瑛考入國立清華大學——本來打算讀化學系，因為眼太近視，只得改讀中國文學系，請教魯迅應該看些什麼書，他便開示了一張書單，現在鈔錄如下：
>
> 計有功　宋人　唐詩紀事（四部叢刊本，又有單行本。）
>
> 辛文房　元人　唐才子傳（今有木活字單行本）

嚴可均　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　全上古……隋詩（排印本）

吳榮光　歷代名人年譜（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會大事，　因其書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認為歷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參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範最新世界年表」。）

胡應麟　明人　少室山房筆叢（廣雅書局本，亦有石印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實是現有的較好的書籍之批評，但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

世說新語　劉義慶（晉人清談之狀）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狀態）

抱朴子外篇　葛洪（內論及晉末社會狀態）有單行本

論衡　王充（內可見漢末之風俗迷信等）。

今世說　王晫（明末清初之名士習氣）

這樣的一張書目，如果現在有人在大學裏研讀中國文學系，我想依然可以推荐的。

× × ×

在一九二五年，魯迅筆下撻伐的，除「正人君子」之外，主要的敵人要算章士釗了，他是段執政下面的教育總長，作爲僉事的魯迅的頂頭上司。章士釗可以撤他的職，可是無法封他的筆，他以他所主張的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的精神，和章士釗扭打下去，直到無法在北京立足爲止。這種一貫到底的韌性的鬥爭，確實啓發和引導了不少青年人。

話說章士釗於八月十三日明令免去魯迅教育部僉事職務之後，魯迅在答ＫＳ君的信中說：

第一，章士釗將我免職，我倒並沒有你似的覺得詫

異，他那對於學校的手段，我也並沒有你似的覺得詫異……我們看歷史，能夠據過去以推知未來，看一個人的以往的經歷，也有一樣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種無端的迷信，將章士釗當作學者或知識階級的領袖看，于是從他的行為上感到失望……他這人本來就只能這樣，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誤謬。……

第二，你這樣注意於**甲寅週刊**，也使我莫明其妙。**甲寅**第一次上版時，我想，大約章士釗還不過熟讀了幾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倣吞剝，看去還近於清通。至于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連成語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況』之類。……這種東西，用處只有一種，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會的暗角落裏，有着怎樣灰色的人們……

所以，卽使真如你所說，將有文言白話之爭，我以為也該是爭的終結，而非爭的開頭，因為**甲寅**不足稱為敵手……

文言白話之爭自然已不是爭的開頭，但這與讀經復古之爭還是很有聯繫的，因爲直到國民黨反共之後，仍有人主張讀經。直到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二十三年之後，**甲寅雜誌**的編者仍出版了**柳文指要**，讓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身上，去找兩千年傳統文學體裁之最終結穴！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日，章士釗主持的教育部部務會議，規定了小學學生讀經，自初小四年級讀起，每周一時，至高小畢業止。對這一反動措施，魯迅力加抨擊：

尊孔，崇儒，專經，復古，由來已經很久了。皇帝和大臣們，向來總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詔天下』，而且又『以貞節勵天下』。但是……孔子之徒的經，真不知讀到那裏去了；倒是不識字的婦女們能實踐。……

所以要中國好，或者倒不如不識字罷，一識字，就

有近乎讀經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彊載質』的最巧玩藝兒，經上都有，我讀熟過的。只有幾個胡塗透頂的笨牛，真會誠心誠意地來主張讀經。……

至于現在的能以他的主張，引起若干議論的，則大概是濶人。……他們的主張，其實並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張，是所謂別有用意；反對者們以為他們真相信讀經可以救國，真是『謬以千里』了。

我看不見讀經之徒的良心怎樣，但我覺得他們大抵是聰明人。而這聰明，就是從讀經和古文得來的。我們曾經文明過而後來奉迎過蒙古人滿洲人大駕了的國度裏，古書實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再進一步，並可以悟出中國人是健忘的，無論怎樣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後矛盾，撒謊造謠，蠅營狗苟，都不要緊，經過若干時候，自然被忘得乾乾淨淨，只要留下一點衛道模樣的文字，將來仍不失為『正人君子』。……

這一類的主張讀經者，是明知道讀經不足以救國的，也不希望人們都讀成他自己那樣的；但是，耍些把戲，將人們作笨牛看則有之，『讀經』不過是這一回耍把戲偶爾用到的工具。……

魯迅對於主張讀經人士，用的是誅心之論，他主張讀經不如讀史，讀正史不如讀野史，他介紹**宋人說部叢書**，**明季南北畧**，**痛史**等，因爲我們現在的情形，那時早已有過了，宋以後是金和元，明以後是清，這都是外族入侵的最好例子。

總之，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則，雜史雜說上所寫的就是前車。……

× × ×

一九二四年九月，北方發生了直奉戰爭，南方發生了蘇浙戰爭。直系裏面的馮玉祥對曹琨吳佩孚倒戈，一時控制了北京，迫賄選總統曹琨下了野，並迫曹琨事先免了吳佩孚的職；又把盤踞在清宮的遜帝傅儀驅逐出宮。馮玉祥與張作霖聯名擁護段祺瑞爲臨時執政府的執政，歡迎孫中山北上，孫中山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五月十一日奉軍入了關，一到天津便解除馮玉祥收編的部隊的武裝，與段祺瑞聯成一氣。十一月，張馮之間的戰爭暴發，奉軍因郭松齡倒戈，形勢逆轉，這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公然出兵助奉，十一月十三日佔領了奉天兵工廠，側擊郭松齡，郭失敗被殺；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砲轟大沽口馮軍，並聯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國，藉口維護辛丑條約，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間軍事行動，撤除防務。北京各界於三月十八日集會反對，結隊至執政府請願，段祺瑞命令衞隊開槍，這就是有名的八。一三慘案。

慘案經過，周作人在回想錄中有比較詳細的追憶：

>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北京鐵獅子胡同執政府衞隊對於請願的民衆開槍，造成死者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餘人的慘案，這乃是反動政府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佈置而成的局面，其手段之凶殘，殺傷之衆多，都是破天荒的；後來孫傳芳蔣介石的肆行殘殺，差不多都是由此出發的。當日我到盔甲廠的燕京大學去上課，遇見站在課堂外邊的學生，說今天因為請願去了，所以不上課，我正想回來，這時忽見前去赴會的許家鵬君氣急敗壞的跑回來，說：『了不得了，衞隊開槍，死傷了許多人！』他自己好像沒有受傷，但一看他戴着的一頂呢帽，在左邊上却被子彈穿了個大窟窿。我從東單牌樓往北走，一路上就遇着好些輕傷的人，坐在車上流着血，前往醫院裏去。第二天真相逐漸明了，那天下着小雪，鐵獅子廣場上還躺着好些屍體，身上蓋着一層薄

雪。有朋友目擊這慘象的，說起三一八來便不能忘記那個雪景。死者多半是青年學生，與我有關係的學校是女師大的劉和珍與楊德羣二人，燕大的許君雖是奇蹟的沒有受傷，可是研究生郭燦然却因此失了一條大腿；……

三一八事件發生以後，我也只能拿了筆桿與文字紀念死者，做了幾副輓聯，在三月二十三日給殉難者全體開追悼會的時候，送去一聯云：

『赤化赤化，有些學界名流和新聞記者，還在那裏誣陷。白死白死，所謂革命政府與帝國主義，原是一樣東西。』……

當時日本的**北京週報**，有如下記述：

『在這個混亂之中最令人感動的事，是中國女學生之剛健。凡有示威運動等，女學生大抵在前，其行動很是機敏大膽， 非男生所能及， 這一天女學生們也很出力。在我的前面有一個女學生，中了槍彈，她用了毛線的長圍巾捫住了流出來的血潮，一點都不張皇，就是在那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佩服了。我那時還不禁起了這個念頭，照這個情形看來，中國將靠了這班女子興起來罷。』

該**週報**的社論也說：『據當日親身經歷、目睹實況的友人所談，最可佩服的是女學生們的勇敢。在那個可怕的悲劇之中，女學生們死的死了，傷的傷了，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時候 ， 她們却始終沒有失了從容的態度。……以前有一個專治漢學的老先生，離開中國二十年之後再到北京來 ， 看了青年女子的面上現出一種生氣，與前清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驚異，說照這個情形中國是一定會興隆的。我們聽到這句話，覺得裏邊似乎的確表示着中國機運的一點消息。』

我們現在很難找到當時的資料，究竟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否都是學生。魯迅有一篇文章，特別紀念劉和珍的，因爲她

和另一死者楊德羣，另一傷者張靜淑都是女師大的學生，這都是積極而勇敢地和楊蔭榆，章士釗，劉百昭等人鬥爭過來的人，所以魯迅更熟識她們，他在文中說：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云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却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强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着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却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賃屋授課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于是見面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着，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復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的前途，黯然至於泣下。……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仆；，同去的楊德羣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于是死掉了。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說她們是被利用的。

是誰屠殺這四十七個的愛國者？直接的兇手是段祺瑞，

他是執政府執政；是賈德耀，他是執政府國務總理；是章士釗，他是執政府秘書長。

第二天，通緝令發表，說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羣衆，屢肇事端。本日徐謙以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名義，散布傳單，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徐謙等並着京內外一體嚴拿，盡法懲辦，用儆效尤。

後來**京報**透露，該項通緝令羅織之罪犯有五十人之多，魯迅當然在內。

魯迅以無比憤激的心情，寫下了如下的句子。

>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
> 如果中國還不至于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
>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
>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真實。
>
>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
>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
>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沈默呵，沈默呵！不在沈默中爆發，就在沈默中滅亡！

這時候，魯迅和其他許多人，過的是一種地下生活，因爲通緝令的株連甚廣，有一天下午，齊壽山通知許季茀，張作霖的前頭部隊已經到高橋了，請立刻和魯迅避入D醫院，一切向看護長接洽就得。

於是在一間破舊什物的堆積房中，魯迅和十多人白天用麵包和罐頭食品充飢，夜晚在水門汀地面上睡覺，有時回家去看一下，但他仍不斷寫文章和章士釗及「正人君子」們週旋。

時局的變化非常快，由張作霖馮玉祥捧上台的執政府，在三月十八日殘殺學生後，四月九日就被馮玉祥迫下台，鹿鍾麟收繳了執政府衞隊的槍械，段祺瑞章士釗等逃匿東交民巷，執政府消滅，所謂北洋軍閥中的安福系也就從此完結了。

我們現在想交代一下章士釗的下落。

他失勢以後南下上海，托庇上海大流氓頭子杜月笙，做了他的門下客，又掛過大律師的招牌。

內戰時期，他做了國民黨方面的和談代表。

解放以後，他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中央文史館館長，一九七二年出版了他的三大冊**柳文指要**，在通要之部續序中，他有這樣的指出：柳文重發光艷，殆起於一九四九之大革命初期，倘無毛主席著作發揚，決不會有崇柳風尚。這裏說的是毛澤東早已提倡學習柳宗元了。

說到一九四九年，章士釗有他一個獨特的見解，他在柳子厚生於今日將如何一文中，將中國的歷史分為兩個時期，卽以一九四九年為分界線。這以前，他都算成廣狹不同之封建社會，這以後，則滅絕封建基礎，一切統轄於民。這個意見的前一部分，把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和奴隸社會都一筆勾銷了。後一部分，則社會主義直接由封建社會產生。這是他的中國社會發展史觀點，簡直和毛澤東的「唯物史觀」開了一次大玩笑。

他又說：昔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漢經生以謂孔子為漢開赤制，史遷踵其意，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為一大限，下述六國以及漢初百年，用相配置，號曰史記。惟吾之視今亦然，蓋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者，不啻中國麟止開制之歲也。吾嘗論史，以是歲為斷，是歲以前，不問經過數千百年，不分朝代，統為一目，自是年起，不問日月幾何？為另一目。洪荒以來，人世所經，兩目而已，亦比於唐一行畫天下山河為南北兩戒，時與地交相輝映。

在他看來，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另一日」是遠邁前史的。他說：吾敢斷言：今日之中國形勢，以至清至明之政府，行不屈不撓之紀綱，外侮不敢來，變亂無由生，賄賂不得行，風紀不致亂，自上達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以至下令如流水，無遠勿屆，於是舉國矢勤守儉，孳孳佗佗，以從事於建設，績效之生，遂乃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此真陸賈所謂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夫社會基礎如此堅定，從而政權期於不壞，而亦不可能壞，節節設防，層層杜漸，一日如百年，復百年如一日，因知我即一九四九年判斷史期，以二千年對十五年，挈短料長，了無不稱。

在這部書中，他表示了對這幾年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大抵國家從事文化大革命，作者雖日迫西山，而亦在同聲同氣之列，固不能與青少年程功比烈，終究不無多少進步可期。他認爲文化大革命的大風雨使宇宙重潤。

根據他的說法，一部**柳文指要**，可以歸結到這樣一個意見，一九四九年止於獲麟，一九四九年以後有王者興。揚雄的「劇秦美新」對之黯然失色，郭沫若的「兩個太陽頌」，如小巫之見大巫。當年魯迅所稱謂的落水狗，在「反共」「討赤」大業之後，搖身一變，便置身革命陣營，宣揚他的「道統論」了。

魯迅的預言何其正確！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在目瞪口呆之餘，懂得了只要青天白日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但他有一點不正確，他想不到孤桐先生的革命，不在青天白日旗下，而在五星旗下，不在蔣介石時代，而在毛澤東時代。章士釗是「聖之時者」，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他的古文又行了時，如果許多人循着**柳文指要**去研究古文，不久也許又會提倡讀經了吧，誰相信時間竟會倒流呢！

× × ×

經過三一八血的洗禮之後，有覺悟的青年人分批南下了，很多投身到當時由國民黨所領導的革命鬥爭中去，所謂

革命鬥爭主要是北伐的軍事行動，這幾年佔據東南五省的是孫傳芳，以京漢路爲根據地的是吳佩孚，盤據關內外的是張作霖，這都是北伐軍的對象。隨着軍事活動的開展，階級鬥爭也跟着深入，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廣州發生「中山艦案」，國共兩黨的合作已開始了分裂的徵兆，經過彌縫之後，表面上和合無間，實則共產黨已處下風，一年之後，國民黨終於大事屠殺，使魯迅爲之目瞪口呆了。

經歷了三一八事變之後，魯迅似乎已疲於鬥爭，因爲他走出了血腥的北京，竟去了荒凉的厦門。這是他有意的選擇。他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答有恒先生**：……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沈默期間是兩年。……

現在有許多人視魯迅是革命的鬥爭的化身，魯迅却並不自命爲革命家，他的另一面很陰暗，很虛無，這種感情只表示在私人通信中，主要表示在和景宋的通信中。**兩地書**是一九三三年初出版的，那時他已是左翼作家同盟的領導人之一，眞實地站在革命陣營了，他願意暴露自己的另一面，據他說的理由之一，是由於他看到某種作家一旦向左，連孩子時代的啼哭也有合於革命文學之概，而他這本書則是並無革命氣息的。

景宋是女師大事件中被開除的六個代表之一，由於魯迅支持她們，她有機會和他接近，最初訪問魯迅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一同離開北京是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開始同居是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他們的交往具見於**兩地書**中，確如魯迅所說：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我們完全可以從這書裏了解魯迅的內在生活和感情。

他對自己有這樣的解剖：

> 我其實那裏會『立地成佛』，……假使我真有指導青年的本領——無論指導得錯不錯——我決不藏匿起

來，但可惜，我連自己也沒有指南針，到現在還是亂闖。……

我想，苦痛是總與人生聯帶的，但也有離開的時候，就是當熟睡之際。醒的時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國的老法子是『驕傲』與『玩世不恭』，我覺得自己就有這毛病，……

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者就為此。……

總結起來，我自己對於苦悶的辦法，是專與襲來的苦痛搗亂，將無賴手段當作勝利，硬唱凱歌，算是樂趣……

這裏的所謂樂趣，不正是他所嘲弄的阿Q的精神勝利法嗎？

我所說的話，常與所想的不同，至於何以如此，則我已在吶喊的序上說過：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願，則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至於『還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的反抗，却不過是與黑暗搗亂。

魯迅對於自己的「反抗」，非常缺少自信，甚至墮入虛無，他常常愛引用裴多斐的一句話自警：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他有時簡直懷疑自己神經過敏，他說：

其實，我的意見原也一時不容易了然，因為其中本含有許多矛盾，教我自己說，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所以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時候，有時確為別人，有時却為自己玩玩，有時則竟因為希望生命從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此外或者還有什麼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但我對人說話時，却總揀擇那光明些的說出，……

這不是陷於兩重人格嗎？他揀光明的話對人說，却信自己的思想太黑暗；他是用熱烈的表皮，包着一顆冰冷的心

的，毋怪在一場鬥爭之後，要遠離沸騰的北京，去而之墓地似的厦門了。

魯迅在厦門的半年中，牢騷很多，但他的不滿都是生活上瑣屑之事；卽使鬥爭，也是「茶杯裏的風波」。他替在廣州的景宋謀劃的話，則簡直近於「自私」，他在信中不止一次的說：一個人也許應該做點事，但也無須乎勞而無功。看你收入和做事的比例，實在相距太遠了。你不知能卽作他圖否？我以為如此情形，努力也是白費的。人固然應該辦『公』，然而總須大家都辦，倘人們偷懶，而只有幾個人拚命，未免太不『公』了，就該適可而止，可以省下的路少走幾步，可以不管的事少做幾件，自己也是國民之一，應該愛惜的，誰也沒有要求獨獨幾個人應該做得勞苦而死的權利。

這時景宋在廣州教書，對魯迅訴述的話也都是些身邊瑣事，魯迅有一篇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鼓勵青年人做傻子，但爲了所愛的人，却鼓勵她做聰明人。

我們可以說，這也是「人情之常」，但對於魯迅來說，還是不免於言行不一致罷！

魯迅對於自己的言行不一致，是並不掩飾的，坦然示人的。只是把魯迅比附爲李大釗那樣的革命家的人，那是替魯迅戴上一頂他生前非常嫌惡的紙糊冠罷了。

× × ×

魯迅和景宋由相識到結合，經過了兩年半以上的時間；魯迅自與朱女士結婚後，對於家庭幸福這一回事，本來不存甚麼想望的了，在這過渡時期，有許多人是自願犧牲的，爲的這也不是勉強被人撮合在一起的女人的錯。但究竟時代不同了，有許多人也自覺地掙扎着衝破着這個道德的枷鎖，所以沒有人會以此責備魯迅和景宋，而且他們的嚴肅的共同生活，是一種榜樣，一種範式，讓在婚姻痛苦中生活的青年男女們有一條可走的道路。

在他們相愛的發展過程中有一個插曲，那便是比自己爲

太陽，比景宋爲月亮，比魯迅爲黑夜的長虹。長虹是參加**未名社**的人，魯迅一走，他和韋素園就爲了**莽原**稿子的取捨吵起來了，結果鬧成分裂，之後，長虹在上海大罵魯迅，後來才知道還有一個原因，那是長虹在暗戀景宋，遷怒魯迅。

魯迅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給韋素園信說：

……三， 是他（按： 指長虹）真疑心我破壞了他的夢，——其實我並沒有注意到他做什麼夢，何況破壞——因為景宋在京時，確是常來我寓，並替我校對，抄寫過不少稿子（「墳」的一部分，即她抄的），這回又同車離京，到滬後她回故鄉，我來厦門，而長虹遂以為我帶她到了厦門了。倘這推測是真的，則長虹大約在京時，對她有過各種計劃，而不成功，因疑我從中作梗。其實是我雖然也許是『黑夜』， 但並沒有吞沒這『月兒』。

如果真屬于末一說，則太可惡，使我憤怒。我是一向在悶胡盧中，以為駡我只因為**莽原**的事。我從此倒要細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樣的夢，或者簡直動手撕碎牠，給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搗亂，什麼『太陽』之類都不行的。

他又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給景宋信說：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從韋漱園的信裏纔知道的。他說，由**沉鐘社**聽來，長虹的拼命攻擊我是為了一個女性，**狂飆**上有一首詩，太陽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還問我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點詳細。我這纔明白長虹原來在害『單想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這裏來的原因，他並不是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對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敵對的態度，直待我到了厦門，纔從背後駡得我一個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則當然要有月亮的，還要做什麼詩，也低能得很。那時就做了一篇小說（按：即**故事新編**中的**奔月**），和他開

了一些小玩笑，……

直到此時，他才坦白地對景宋表示：……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按：指長虹等）的言行思想的內幕，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麼樣的人了，我可以愛！

等到魯迅和景宋正式同居以後，流言自然止息了。他曾在給韋素園的信裏說到這事：……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恐辱沒了對手。然而一到愛起來，氣起來，是甚麼都不管的。後來到廣東，將這些事對密斯許說了，便請她住在一所屋子裏——但自然也還有別的人。前年來滬，我也勸他同來了，現就住在上海，幫我做點校對之類的事——你看怎樣，先前大放流言的人們，也都在上海， 却反而啞口無言了，這班孱頭， 真是沒有骨力。

一九二九年九月，他們有了唯一的孩子：海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給**兩地書**寫序，回顧過去，作了總結：回想六七年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誣衊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却也已經掙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間，含沙射影者都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就是漱園和柔石。我們以這本書為自己紀念，並以感謝好意的朋友，並且留贈我們的孩子，………

最近發現了魯迅曾在芥子園畫譜上題了一首詩給景宋，這首詩並未收入**集外集**，云：

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圖畫怡倦眼，此中甘苦兩心知。

× × ×

從**未名社**分裂出去的高長虹，一面罵魯迅一面又想利用魯迅，起初魯迅不則聲，他要看看長虹的技倆發揮到如何，

到了長虹在**新女性**上登廣告，說他們會和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及最進步的青年文學家合辦**莽原**時，他就出手還擊了，他也在同一刊物上登廣告：

……我在北京編輯**莽原**、**烏合叢書**、**未名叢刊**三種出版物，所用稿件，皆係以個人名義送來，對於狂飆運動，向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如何運動，運動甚麼。今忽混稱『合辦』，實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聲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則假借虛名，加我紙冠，已非一次，業經先有陳源在**現代評論**上，近有長虹在**狂飆**上，疊加嘲罵，而**狂飆社**一面又錫以第三項『紙糊的假冠』，真是頭少帽多，欺人害己，雖『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

這樣的啓事，對於長虹說來，確是一個重大打擊。所以如此，魯迅對景宋有這樣的解釋：

……我之所以憤慨，却並非因爲他們使我失望，而在覺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見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殺，還將肉作罐頭賣以獲利。這回長虹笑我對章士釗的失敗道，『于是遂戴其紙糊的「思想的權威者」之假冠，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狀態矣。』但他八月間在**新女性**上登廣告，却云『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莽原**』，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別人所加之『假冠』而罵我，真是輕薄卑劣，不成人樣。有青年攻擊或譏笑我，我是向來不去還手的，他們還脆弱，還是我比較得禁得起踐踏。然而他竟得步進步，罵個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裏去，也還要戮屍的樣子。所以……我已決定不再彷徨，拳來拳對，刀來刀當……

果然，長虹等人是禁不起踐踏的，以後，他們一夥就逐漸沒入更黑暗處所去了，可是魯迅也不免因此心靈受到創傷。他以前的敵人是平等的對手，現在却是小於他的青年人了，他覺得在北京時忘記喫飯，減少睡眠，吃了藥來編輯，

校對，作文。誰料結出來的，都是苦果子。他甚至想從二十四期止，便將莽原停刊了。在厦門他儘有閒工夫，但寧願翻本無聊的書玩玩，遇到有人催他做文章，大抵置之不理。他覺得這是退步，但又認為從別一面看，倒是進步也難說。

於是他……彷彿全感空虛，不再有甚麼意見，而且有時確也有莫明其妙的悲哀。可是相反，他又覺得自己或者並不渺小，他要在蔑視他和罵倒他的人們眼前，站着黑的惡鬼似的「魯迅」！

悲哀，怨恨，報復，這一切意念使他內心非常矛盾，對於此後自己應該做甚麼事，也很有些徘徊不決，那就是：做文章呢，還是教書？因為這兩件事，是勢不兩立的：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兼做兩樣的，倘不認真，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一時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果還是兩面不討好。……

在厦門的半年（不到半年）對於魯迅說來，可以說是他一生中在內心方面最黑暗的時期；以後，在廣州的半年（多過半年），則是驚心動魄，化悲憤為力量的時期；再以後，他回到上海了，為形勢所迫，他已無法再教書，也不再到別處去，他不得不用一枝堅强的筆，不僅和一批自命為革命文學家的人鬥爭，和反動的國民黨文化人鬥爭，和第三種人鬥爭，而且和共產黨裏面王明一系的人鬥爭。

魯迅的中年

廣州的血洗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魯迅到了廣州，去時也不是沒有幻想的，他想除教書外，仍繼續做文藝運動，或其他更好的工作，甚至想和創造社聯合起來，造成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那知他到廣州後，開了幾次教授會議，去了一次香港，東奔西走作了幾次講演，就在黃埔軍校那次講演之後的第四天，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向閘北的總工會糾察隊進行了流血進攻；火蓋一揭開，凡是蔣介石統治的地方，都一起赤裸裸地露出了猙獰面目，肆意殺人了！廣州的反共屠殺，比上海遲了三天，使魯迅爲之目瞪口呆。

魯迅也不是沒有先見的，到廣州住了兩個月，他早就駭然了，他覺得往日所聞，全是謠言，這地方，却正是軍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國土。他說：廣州的人民並無力量，所以這裏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又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道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他在廣州雖然看不見北方似的捕殺青年，有時確也感到一點小康，但隨即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却絕對想不到有一天會聚而殲旃！

× × ×

魯迅在廣州和香港的演講，祇有五篇記錄，在香港青年會講的二篇，一篇是**無聲的中國**，一篇是**老調子已經唱完**；在黃埔軍校講的一篇是**革命時代的文學**，這都是淸黨以前講

的。七月間在知用中學講的**讀書雜談**，不過是「老生常談」，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不僅有學術價值，而且「借古諷今」。

魯迅的演講自然是因人，因時，因地而施，所以對香港的青年人， 他說的主要是中國的文化， 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

這主要是針對着殖民地而說的，當時香港總督金文泰，前清太史賴濟熙正在提倡「整理國故」，而且要中國人「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大漢之發天聲！」

魯迅希望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胆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他說，因為我們說着古代的話，說着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現在，一九七二年，離開魯迅說這話已四十六年，從「文化大革命」一場噩夢中醒過來時，文化界第一件大吹大擂的事，就是出版以反對白話文出名的章士釗的**柳文指要**，魯迅當時的大聲疾呼，真是白廢了的。

× × ×

黃埔軍校是國民黨改組之後成立的，目的專在訓練革命的軍事幹部，以後國共兩黨的年青軍事領導人物，多爲黃埔出身。邀請魯迅去演講的應修人和宿荷是共產黨員；面對着革命的軍事幹部，魯迅就說他從未談過的革命與文學的關係問題，但從來沒有人指出過魯迅的意見只是複述托洛次基著的**文學與革命**這本書裏的意見 。 這本書由李霽野韋素園合譯，由**未名社**出版，記得魯迅寫了後記，現在自然無法再找得到這本書，魯迅的「後記」也未收入**集外集**中，好在我們現在有了更好的譯本（香港信達出版社出版，惠泉譯），我

們不妨找出若干字句用來和魯迅的演講對照一下：

托洛次基的「**文學與革命**」

文化以吸取經濟底液汁為生，所以必須有了點物質上的剩餘，文化才能生長發展，以及變為精緻。

藝術需要有安適，甚至需要富饒。（第一頁）

藝術一定要走它自己的道路，運用自己的方法……藝術領域是這樣的一個領域，它不是依靠黨的號令行事的。（第二〇一頁）

而最重要的，我們有革命的人……（第二〇九頁）

革命文學不能不充滿着社會仇恨的精神。（第二一〇頁）

魯迅的「**革命時代的文學**」

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的產物。

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

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

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復仇。

魯迅對於**文學與革命**這本書，特別喜愛，前已說過，一九二五年，他已買了這本書，到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他要離開廣州時又買了英譯本贈廖立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又去內山書店買了日譯本，三月，**未名社**出了中譯本，五月，他譯**文藝政策**，這本書等於**蘇俄文藝論戰**的擴大，其中有托洛次基發言，和**文學與革命**的見解一貫，和所謂當時的無產階級文學對立。在以後魯迅對抗**創造社太陽社**諸「無

產階級作家」的對抗中，托洛次基的見解給了他最大助力。

× × ×

四月十五日以後，魯迅沉默了，他能說甚麼呢，他堅決退回中山大學的聘書，辭了一切職務，和景宋、許季茀幽居白雲樓，幾乎足不出戶，炎熱的太陽晒滿了大半間屋，他埋頭修訂離開北京時與齊壽山合譯的**小約翰**；編集**朝華夕拾**，作後記，繪插圖；又編錄**唐宋傳奇集**，凡此與當時時局變化毫無干涉的工作，都不過是爲了「苟全性命於亂世」，並掩飾其內心的傷痛吧了。

但魯迅也不能長此沉默，正如胡適以後批評共產黨的話一樣，人民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淸黨之後，魯迅也是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不說話，就有共產黨的嫌疑。我從黃埔軍校的出版物上，曾見過應修人的詩，後來我問他，爲甚麼你寫那樣莫明其妙的詩，他說不寫反共文章就無法離開，寫反共文章非心所願，寫首詩就容易朦混過關。（他脫身回上海後就去了蘇聯，一九三二年回上海，翌年，五月十四日爲避免拘捕，在北四川路一家旅館高處，跳樓自殺。）魯迅是名人，要永遠不說話自然更難，所以到七月六日，他去知用中學演說，廿三日，又至學術講演會演說。

在魯迅沉默期間，有人納罕他爲甚麼近來不開口？他祇好說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因爲他怕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鐵窗斧鉞風味**，而在青天白日旗下又有**縲絏之憂**。他彷彿感到有一種團體，自以爲正統，而喜歡監督思想的，有時遇到盤問式的訪問者，他就疑心是他們。

他說，他經驗了從來沒有過的恐怖，他從前以爲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漸漸死去，中國就可以比較有生氣。現在他知道殺戮青年的倒是青年，有**用斧劈死的**，有**亂槍刺死的**……血的遊戲已經開頭，他看不見這出戲的收場。

魯迅沒有舉出任何實例。我分明記得，在當時革命青年

中最有影响的二個人， 是惲代英與蕭楚女， 後者的名字嫵媚，却是個大痲子，黃埔教官，清黨時正在病中，給人在牀上亂棍打死。其他犧牲的當然很多，估計達二千一百餘人。在**魯迅日記**中， 雖然沒有明言， 顯然有許多青年受他幫助逃走的，許季茀說，他時常提起，有某人瘦小精悍，頭腦清晰，常常去談天的，而今不來了。

魯迅的悲痛，甚至到了自怨自艾的程度，他懷疑自己也在幫助排着人吃人的筵宴：他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使他們在遭災時嘗到加倍的痛苦。

確實，當三一八之後，讀到下面所引的魯迅的句子，誰不受他的感召，走上一條更積極的道路呢？

他說：

>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
>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於是大批有覺悟的青年南下了，却不料所謂革命的南方正是死地！所以魯迅覺得他是做醉蝦的幫手，終於覺得無話可說。

到了這樣的時候，他自己最徼幸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共產黨。他說：

> 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裏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卽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于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卽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

他說：

> 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

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爲了要救助自己，他說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痺，二是忘却。但這老法子並不有效，他旣不能麻痺，也忘不了歷史的教訓，他在死前還責罵忘記了歷史教訓的那種共產黨人。

以上所說，都見於魯迅到上海前後發表的文章，如果這些文章在廣州發表，或幽居在廣州的時候發表，我相信他就沒有從容回上海的可能了。所以他在廣州最後一次講演是旣嚴肅又技巧的。他闡釋魏晉是亂世，淸談佯狂都爲得避禍，但阮籍能免，稽康就不能免了。由於辭旨隱晦，人家祇把這篇講演當作文學史的硏究看。

上海定居——圍剿與反圍剿

革命失敗了，由革命隊伍退下來的前文化人，多半滙集到上海，於是重整筆墨生涯，適應時勢要求，提倡「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了，他們東征西討，氣焰萬丈（其實還是受第三國際史大林布哈林的影响，他們把革命的失敗當做革命的高漲）。但他們犯了個大錯誤，把正在痛定思痛的魯迅當做箭靶子，罵他是封建文人，有閒階級。魯迅過了幾個月才正式回答，在延長二年的筆戰中，魯迅的正面文章祇有三篇：**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和年紀**，**現今新文學的概觀**。

魯迅從來沒有自認爲革命家 ， 但他親身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三一八種種歷史事變，非常深切地從中汲取了寶貴的教訓。在他辛辣的雜文和創作中，無一不浸透了這種苦味的教訓的。現在，他又在廣州經歷了一次新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到上海，白色恐怖仍未過去，這就使他放棄了一向相信的進化論，另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歷史了。這過程也不是一天完成的。**創造社**和**太陽社**對他的圍剿，據他四年之後寫**三閑集**序言時說，只不過擠他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而已。

魯迅對圍剿他的那批人一針見血地說：因為那邊正有『武器的藝術』，所以這邊只能『藝術的武器』。然後他問：這種最高的藝術——『武器的藝術』，現在究竟落在誰的手裏了呢？只要尋得到，便知道最近中國的將來。

革命失敗了，毛澤東上了井崗山，魯迅說這話的時候，毛澤東還沒有發明**槍桿子裏出政權**的理論，他要到一九三八年才從武裝鬥爭中歸納出這個道理。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中共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從上一年的八七會議以後直至一九三〇年，是瞿秋白和李立三前後相繼的時代，他們認爲**革命高潮**（其實是史大林布哈林的意見）正在到來，所以到處進行示威和暴動，所謂革命文學的囂張的氣勢，完全是有國際背景的，他們不承認革命已經失敗，實行**盲動主義**。倒是冷靜的魯迅，比他們更有清醒的估計，自從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之後，武器的藝術，不正完全掌握在國民黨資產階級的手裏了嗎？中國最近的將來，是反革命勝利的時代，魯迅一向正視現實，他不像當時共產黨那樣自欺，他知道未來的日子必須從事艱苦的鬥爭，所以他非常藐視那種革命文學家的輕浮態度，他試舉馮乃超劇本中最後的警句爲例：

>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
> 偷兒：我們反抗去！
>
> ……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裏遙望廣州暴動的詩，**Pong Pong Pong**，鉛字逐漸大了起來，只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隻手**是很有人推為佳作的，但內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後失了一只手，所餘的一只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體，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實在還不如一只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了。只準備失去一只手，是能減少戰鬥的勇往之氣

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只這一點。一只手也還是窮秀才落難，后來終于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喧喧嚷嚷的革命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終竟沒有甚麼能夠成爲氣候的成績。關於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祗有茅盾的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替這個時代留下了面影與足跡。

圍剿魯迅的英雄們，以後的出路如何呢？有幾個可以考見的如下：

成仿吾：騙了小軍閥一批買軍火的錢，先到日本，後到德國去享受了；

郭沫若：在日本研究古代史和甲骨文；

蔣光慈：寫了一本「麗莎的哀怨」，被視爲同情白俄，後來病死了；

錢杏邨：後來以研究明清小說出名；

楊邨人：揭起小資產階級文學的大旗；

潘漢年，成了革命指導者，可是最後則成了「墮落的反革命分子」；

葉靈鳳：「不久卽轉向國民黨方面去，抗日時成爲漢奸文人。」

巍然獨存的是魯迅，他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參加左翼作家聯盟之後，就被尊爲**革命文學**方面的領導人物！

× × ×

從**魯迅日記**看魯迅，他絕不是一個劍拔弩張，尖酸刻薄的人，試舉數則如下：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午同廣平由廣鴻安旅店運行李上太古公司『山東』船，立峨相送。

　　十月三日，午後抵上海，寓共和旅館。……玉堂、伏園、春臺來訪，談至夜分。

　　五日，夜小峯邀飯於全家福，同坐郁達夫、王映

霞、潘梓年、欽文、伏園、春臺、小峯夫人、三弟及廣平。

八日，上午從共和旅店遷入景雲里寓（按：魯迅與景宋自此開始同居）。

十八日，夜章雪村招飲於共樂春，同席江紹原及其夫人、樊仲雲、趙景深、葉聖陶、胡愈之及三弟、廣平。

二十三日，夜同許希林、孫君烈、孫春臺、三弟及廣平往近街散步，遂上新亞樓啜茗，春臺又買酒歸，同飲大醉。

二十五日，下午李式相來，同至勞動大學演講約一小時。夜同三弟及廣平至日本演藝館觀電影。

（按：在勞動大學的演講題是**關於智識階級**，黃河淸筆記，日期爲廿八日，當是誤記。內有云：我從前也很想做皇帝，……做人的趣味在和許多朋友有趣的談天，熱烈的討論。做了皇帝，口出一聲，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絕聲的Yes. Yes，那有甚麼趣味？但是還有人做皇帝，因為他和外界隔絕，不知外面還有世界。魯迅這話移用到一九六〇年，那眞是最適切不過了。三面紅旗換來的三年災害，就是 Yes. Yes 造成的，毛澤東一住進中南海，就不知外面還有世界了。）

二十八日，下午往立達學園演講。

（按：講詞似未記錄，曹聚仁的**魯迅年譜**，說講題是**偉人的化石**，大意說：「一個偉人在生前總多挫折，處處受人反對，但到了死後，就無不圓通廣大，受人歡迎了。」這話對於魯迅自己說，也是適切的。）

十一月九日，夜食蟹飲酒，大醉。

十八日，買布人形一枚贈曄兒。

十九日，晚邀孫君烈、許希林、王蘊如、三弟、曄兒及廣平往東亞食堂夜餐。

二十三日，晚得田漢信，夜復。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潘漢年、鮑文蔚、衣萍、小峯來，晚同至中有天飯。

十八日，晚收大學院聘書並本月分薪水泉三百。

（按：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有云：……他初回上海，即不願教書，我順便告知蔡孑民先生，即由蔡先生聘為大學院特約著作員，與李審言同時發表。）

大學院的薪水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才停止，三十一日**日記**：收十一及十二月份編輯費各三百。接着發生一二八事件，據三月二日魯迅給許壽裳的信，則十二月以後當已被裁。信內有云：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為之設法，實深感激。惟數年以來，絕無成績，所輯書籍，迄未印行，近方圖自印**嵇康集**，清本畧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內，存佚蓋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當，受命之日，沒齒無怨。……可見魯迅所接受的每個月三百元編輯費，完全是國民黨政府教育部白白送給他的，計四十七個月，共一萬二千三百元。我對於魯迅收受國民黨政府這許多金錢，很表驚異，曹聚仁兄回答得很幽默，他說：你要知道，魯迅不是不食周粟的。

關於蔡元培，有人說到他，便像他是「人格的完人」，其實，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中，他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先是四月二日下午七時，國民黨召集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到會三分之二，公推蔡元培為主席，通過吳敬恒**查辦共產黨**的提案，正式的清黨便開始了。歌頌魯迅的人，對於這種細節，都是畧而不提的。

二十一日，午後衣萍來，邀至暨南大學演講。

講題為**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曹聚仁記錄，這篇講演有魯迅獨到之見，他說，

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在部落裏，他們有一個首長，他們跟着首長走，首長的吩咐，就是他們的標準。首長要他

們死，也只好去死，那時沒有甚麼文藝，即使有，也不過贊美上帝（還沒有後人所謂 aod 那麼玄妙）罷了！後來……文藝也起來了，和政治不斷地衝突；政治想維繫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

革命成功以后，閑空了一點；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這已不是革命文學。他們恭維革命頌揚革命，就是頌揚有權力者，和革命有甚麼關係？……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採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於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

自從一九四二年二月王實味寫了**野百合花**被清算，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所謂文藝作家所走的路，無一不是魯迅早已指出過的那條歧途，作爲政治家的毛澤東的文藝政策，只是不斷地把那些不滿意的文藝家排軋出去，所謂文藝，祇有**兩個太陽頌**之類容許存在，魯迅認爲這種頌揚就是頌揚有權力者，和革命沒有甚麼關係。所以，魯迅如在，他是否被尊崇或是被排軋，已不是揣測的問題，或者最好是如斯諾後來所說被逼沉默而已。

三十一日，晚李小峯及其夫人招飲于中有天，同席郁達夫、王映霞、林和清、林語堂及其夫人、章衣萍、吳曙天、董秋芳、三弟及廣平，飲後大醉，回寓歐吐。

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晚立峨來，即同三弟往旅館，迎其友人來寓。

十五日，訪商務印書館買英文**蘇俄之表裏**及**世界文學談**各一本。

十六日，往內山書店買**童話及童謠之研究**、**列寧給高爾基的信**各一本。

二月一日，往內山書店買世界美術全集一本，什麼叫階級意識一本，斯特林堡全集三本。

五日，往內山書店買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考古學通論各一本。

十日，北京有電報來問安否，無署名，下午復一電至家。往內山書店買俄國工黨史一本。

十九日，下午往內山書店買辯證法雜書四本。

二十三日，晚往內山書店買文學與革命一本。

（這天，他寫了醉眼中的朦朧，正式回答創造社的攻擊，但日記上未記此事。）

三月二日，往內山書店買蘇俄之牢獄一本。

十四日，往內山書店買階級鬥爭理論一本，唯物的歷史理論一本，一週間一本。

二十五日，往內山書店買世界美術全集一本，中國革命及世界之明日一本。

四月十四日，午後往內山書店買馬克思主義與倫理一本。

十七日，往內山書店買社會意識學概論，藝術之原始各一部。

五月三十一日，往內山書店買革命後之俄國文學一本。

六月二十四日，下午買什物十餘元，以棉毯二枚分與立峨。

三十日，往內山書店買階級社會之諸問題一本。

七月十二日，晚同欽文、廣平赴杭州，三弟送至北站，夜半到杭， 寓清泰第二旅館， 矛塵、斐君至驛見迓。

十三日，晨介石來。上午矛塵來。午介石邀諸人往樓外樓午餐，午後同至西冷印社茗談，旁晚始歸寓。晚斐君攜小燕來訪。矛塵邀諸人至功德林夜飯。

十四日，上午介石來。矛塵、斐君來。午欽文邀諸人在三義樓午餐。下午腹瀉，服藥二丸。

十五日，午邀介石、矛塵、斐君、小燕、欽文、星微、廣平在樓外樓午飯。飯訖同遊虎跑泉，飲茗，沐髮，盤至晚歸寓。

十六日，下午矛塵來，同至抱經堂買石印**還魂記**一部四本，王刻**紅樓夢**一部廿四本，**百美新詠**一部四本，**八龍山人畫譜**一本，共泉十四元二角。晚又至翁隆盛買茶葉、白菊等，約十元。夜失眠。

十七日，清晨同廣平往城站發杭州，欽文送至驛。午到寓。

八月四日，晚因小峯邀，同三弟及廣平赴萬雲樓夜飯，同席為尹默、半農、達夫、友松、語堂及其夫人、小峯及其夫人，共十一人。

十三日，午後璇卿自北京來，並持來母親所給果脯兩種。

二十四日，立峨回去，索去泉一百二十，並攫去衣被什器十餘事。

九月二日，午後同三弟往北新書局，為廣平補買**談虎集**（上）一本，又**談龍集**一本。

十五日，晚存統來並贈**目前中國革命問題**一本。

二十二日，阿菩周歲，贈以食用品四種，午食麵飲酒。

二十六日，得馮雪峯信晚復。

二十七日，晚玉堂、和清、若狂、維銓同來。和清贈罐頭水果四事，紅茶一合。夜邀諸人至中有天晚餐，並邀柔石、方仁、三弟、廣平。

十月十二日，晚往內山書店買**思想家馬克思**一本。

十九日，得王實味信午後復。寄還王實味小說稿。

十二月七日，下午內山書店送來**藝術之社會基礎**一

本。

九日，柔石同畫室來。

十二日，往內山書店買**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托爾斯泰**一本。

二十日，晚往內山書店買**世界文學與無產階級**及**巴黎的憂鬱**各一本。

二十七日，往內山書店買**歷史底唯物論入門**一本。

三十一日，晚往內山書店買**中國革命的現階段**一本。

以上從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及一九二八年全年中摘錄出來的日記，可以看到魯迅被圍剿期間的生活一斑。在這時期，他和許廣平正式同居，和當時及以後的左右派都有來往，有幾個都是他以後論爭的對手；他非常注意閱讀有關馬克思基本理論的書籍，（記在書賬裏的更多，內有**論新反對派**一本，可見他早已注意蘇聯黨內的史托之爭。）最有趣的，一個自稱做他「義子」的廖立峨，帶同他的兄弟愛人住到他的家裏（從一月八日到八月二十四日），後來他忿忿的對魯迅說：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這是他在厦門結下的苦果，是他遇到的惡劣青年中特殊的一個。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他和趙平復（柔石）馮雪峯有了來往，日漸密切，他們都是共產黨員，認識他們以後，他逐漸左傾，轉而和**新月社**鬥爭，可見受他們影响之深。

此外，他飲酒大醉，有三次之多，也許這就是**創造社**諸人說他醉眼朦朧的緣故。

一九二九年是他向前突進的過渡的一年，他寫文章很少（一九二八和一九三〇年都是如此），埋頭翻譯**文藝政策**及**藝術論**。所謂**創造社**「擠」他看了幾種科學的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淸的疑問，就在這個時候。他已然找到了確定的文藝觀點，但他的生活思想仍是非常遊移，這一年的五月十三日，他回了一次北京的

老家，住了二十天，在離開的前二天他給景宋的信說：

> 總計各種感受，知道瀰漫於這裏的，依然是『敬而遠之』和傾陷，甚至於比『正人君子』時代還要分明——但有些學生和朋友自然除外。再想上去，則我的創作和編著一發表，總有一羣攻擊或嘲笑的人們，那當然是應該的，如果我的作品真如所說的庸陋。然而一看他們的作品，却比我的還要壞；例如小說史罷，好幾種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後，而凌亂錯誤，更不行了。這種情形，即使我大膽濶步，小覷此輩，然而也使我不復專於一業，一事無成。而且又使你常常擔心，『眼淚往肚子裏流』。所以我也對於自己的壞脾氣，時時痛心，想竭力的改正一下。我想，應該一聲不響，來編**中國字體變遷史**或**中國文學史**了。然而那裏去呢？在上海，**創造社**中人一面宣傳我怎樣有錢，喝酒，一面又用東京通信誣栽我有殺戮青年的主張，這簡直是要謀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北京本來還可住，圖書館裏的舊書也還多，但因歷史關係，有些人必有奉送飯碗之舉，而在別一些人即懷來搶飯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納履，而要使人信為永不納履是難的，除非你趕緊走遠。D。H。你看，我們到那裏去呢？我們還是隱姓埋名，到什麼小村裏去，一聲也不響，大家玩玩罷。

這是魯迅和景宋二人之間的私話，因而感情是眞實的，但也只是一時的「獃想」，一回到現實，他也祇能如胡適後來所說，做一個「過河卒子」，努力向前了。

這一時期的魯迅正是進退不得，尤其是北京，在魯迅看來，那是灰黯的世界，**新青年**及**語絲**時代的戰友都已改變了，一個是錢玄同，胖滑有加，嘮叨如故；一個是劉半農，漸漸的據了要津，彼此之間，早已無話可說，敵人呢，陳西瀅凌叔華的照片登上**紅玫瑰**，胡適之的詩載於**禮拜六**，他慨嘆時光老人的力量，真能逐漸的顯出『物以類聚』的真實。

他又遇見了顧頡剛，見我卽踟躕不前， 目光如鼠， 終卽退去，狀極可笑。他說南北統一後，『正人君子』們樹倒猢猻散，離開北平，而他們的衣鉢却沒有帶走，被先前和他們戰鬥的有些人拾去了。於是他嘆息在寂寞之世界裏，雖欲得一可以對壘之真敵人，亦不易也。

他後來在**彷徨**上面題的一首詩：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 荷戟獨徬徨。 相信是這次去北京時的寫照。

他把北京和上海比較，認爲住北京是不壞的……幾乎有『世外桃源』之感， 我來此雖已十天 ，却毫不感到什麼刺戟，畧不小心，確有『落伍』之懼的，上海雖煩擾，但也別有生氣。

魯迅對於留在北京的**未名社**，**沉鐘社**的青年人，還是懷有深摯的感情，一道喫飯，一道談天，特別對於在西山養病的韋素園，系念更甚。三十日，他終於去看了他：

> 今天我是早晨八點鐘上山的，用的是摩托車，霽野等四人同去。漱園還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曬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歡，談了許多閒天。病室壁上掛着一幅陀斯妥夫斯基的畫像，我有時瞥見這用筆墨使讀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的苦臉，便彷彿記得有人說過，漱園原有一個愛人，因爲他沒有全愈的希望，已與別人結婚；接着又感到他將終於死去——這是中國的一個損失 ——便覺得心臟一縮，暫時說不出話，然而也只得立刻裝出歡笑，除了這幾剎那之外，我們這回的聚談是很愉快的。

韋素園終於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三十八分病歿於北京的同仁醫院；過了二年，魯迅寫了篇文章紀念他：說他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 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 沈靜着，又嚙碎了自己的心。

魯迅一九三三年所寫的**爲了忘却的紀念**和一九三四年所

寫的**憶韋素園君**，都是最最動人心魄的文章。

左聯時期——從加入到齟齬——死

魯迅一生的思想和行動，可以分做前後二個時期，而以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做分水嶺。在此以前，他的鬥爭偏向漫天匝地的黑暗，他實行了並且繼承了**新青年**開始的啓蒙運動；在此以後目標確定了，政治鬥爭更重於思想鬥爭，他和共產黨的鬥爭方向合流，死前雖然和共產黨的文藝領導人發生齟齬，甚至懷疑到共產黨的政策，睽離究竟不遠，所以死後得到共產黨最高的尊榮。

但魯迅的思想是一貫的，當然是進步的，我們現在要研究的就是這方面。

魯迅對於蘇聯文藝活動的注意，一九二五年早已開始，對於蘇聯的十月革命則不僅冷淡，並且懷疑；但他對於自己會經經驗過的革命，則是深切了解的，他以後對於革命的觀點，仍受此種經驗的影响，經過一九二七年痛切的事變，對於創造未來新社會的是無產階級，以及由此革命會出現無階級的社會，則逐漸有了確信，而且由此增加了許多勇氣。

魯迅的思想非常重實踐，不說空話，人家說他在執政府門前打落門牙兩顆，他說*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場，……為什麼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意思是如不生病，他是會去的。女師大事件他奔走甚勞，就是證明。

所以他在和圍剿者爭論時，敢於提出這樣的問題：

倘若難於『保障最後的勝利』，你去不去呢？

說空話的自然不會去，但魯迅一定去，他不是因爲有了保障才去的，而且接着他就「去」了。

不待說，他對革命本質是有清楚了解的，革命不是說大話，空話所能達到的，革命是切切實實的鬥爭，而且需要藝術。

魯迅决不輕視「藝術的武器」，他認爲藝術雖然沒有旋

乾轉坤的力量，也可用之於「宣傳」。他又認爲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却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于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牠是文藝。

在魯迅思想中，對文藝的正確了解，預先反駁了將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標準，即黨的文藝工作……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那種見解，魯迅的正確了解，我想還是受了托洛次基意見的影響，在**文學與革命**中，托洛次基認爲共產黨對文藝家應該採取如下態度：向他們提出了擁護革命抑反對革命這個不含糊的標準之後，我們要容許他們在藝術園地內有自決的完全自由。因爲馬克思主義方法與藝術方法並不是一個東西。

在史大林與毛澤東的文藝政策中， 魯迅筆法， 魯迅作風，魯迅精神都是應該打倒的，延安座談會上，毛澤東就有此表示， 而事實上， 承襲了魯迅筆法、作風、精神的文學家，以後也無一不被清算了，這都是由於毛澤東認爲文藝祇可盡宣傳的作用，不可能有獨立的存在，不可能有自己的廣濶天地，更不可能直接批評到現實政治。

我們說的當然是後話，魯迅如果不早死，他會堅持而且發展他的見解麼？爲保衞文藝的獨立存在而鬥爭麼？讓文藝不至於淪爲共產黨某一時期政策的婢女麼？從魯迅的思想說來，他當然不會如此。

一九二七年後，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是血的鬥爭，關於革命者的血，魯迅早就見過了，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他以後悟到自己的進化論思想之非是，懂得了革命是什麼之後，他就成爲奮然前行的猛士。他認爲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結，大概由於投機者的潛入。也就是內裏蛀空。

魯迅作爲一個思想家，他的片言隻語，往往勝過某些空話作家千萬言的著作。革命的內裏蛀空，是歷史的結論，是顚撲不破的眞理，他說這話的時候，正給人罵作醉眼陶然，但實際他的「明眼」是直透入革命本質的。現在人民共和國已成立了二十四年，有多少投機分子在從事內裏蛀空啊，可是對於這種投機分子更有不少人在加以稱頌哩！

這裏有一個永遠不滿意現狀的魯迅，有一個不斷地要求革命的魯迅，他把文藝家和政治家視作兩個衝突的對立體，政治想維繫現狀使牠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牠漸漸分離；……文藝旣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除非革命成功之後，你能恭維革命，頌揚革命，但他認爲恭維革命頌揚革命，就是頌揚有權力者，和革命有什麼關係？如果這時文藝家仍不免於不滿意，在反對那些革命成功後又重新採用前人用過的老法子的政治家，那就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

文藝家要有這樣的自覺，才可以去參加革命。在圍剿中的魯迅，他逐漸培養成這種自覺，他感謝**創造社**，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漢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在譯**藝術論**的時候，他說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痛。

他對於那批革命文學家雖然應戰，實際上是很渺視的，革命失敗，參加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退到上海收拾殘兵，號召革命文學去補償眞實革命中的失敗感覺，但是他們認錯了敵人，魯迅雖在革命中給嚇得目瞪口呆，但並沒有被嚇得不敢說話，他對於反革命攻擊得更不容情，更澈底，當然他不是站在所謂無產階級的立場上，革命失敗對他有極大影响，使他深思，使他追求原因，因爲這次革命究竟不同

於辛亥革命，牠曾引起千千萬萬工農階級參加的，可是結果被淹沒在血泊之中。 文學與革命的關係， 革命與階級的關係， 他都在攷慮，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他在回答愷良的信中，明確地談到他對於辨證唯物論的感受：……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於經濟』（也可以說根據於經濟組織或依存於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着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 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 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無產階級意識，所以我是真的無產者』的革命文學者。

那麼魯迅如何肯定自己的階級性呢？

> ……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繫於一身，在替大衆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 ， 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却是的確的。

如此，魯迅斷定自己是中產的智識階級——這階級的携貳分子。

不僅對於當時的革命文學家 ， 他視爲只是想另掛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地位的機會主義者，他尤其不相信文藝可以改變環境，說這不過是「唯心」之說。我覺得這方面的意見，魯迅也是受托洛次基影响的，他說政治先行，文藝後變；所謂革命文學，那是須得待到革命畧有結果，畧有喘息的餘裕，這才產生新的革命文學者的。他對於當時的所謂革命文學家加以辛辣的嘲笑，他舉王獨淸和郭沫若的作品爲例，認爲那種演戲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家，由他看來，像前淸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的。

上面的話，是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燕京大學

演講會上說的；即使到了一九三〇年三月，他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之後，他仍一貫保持了他的意見。八月十二日，他在社會科學研究會演講**上海文藝之一瞥**，他罵葉靈鳳是新的流氓畫家，**創造社**是新才子派，上海的革命文學家，中的都是才子＋流氓的毒。但他對於突然興起的革命文學，並不否認牠的存在，而且有很客觀的分析，他認爲這是由於政治環境突然改變，革命遭了挫折，階級的分化非常顯明，國民黨以『清黨』之名，大戮共產黨及革命羣衆，而死剩的青年們再入於被壓迫的境遇，於是革命文學在上海這才有了强烈的活動。所以這革命文學的旺盛起來，在表面上和別國不同，並非由於革命的高揚，而是因為革命的挫折；雖然其中也有些是舊文人解下指揮刀來重理筆墨的舊業，有些是幾個青年被從實際工作排斥，只好借此謀生，但因為實在具有社會的基礎，所以在新份子裏，是很有極堅實正確的人存在的。

由於魯迅的看法如此，所以他能與**左翼作家聯盟**合作，他對於青年人畢竟還是抱有信心的。

他的不容情的批判，自然引起**創造社**領導分子的不滿，郭沫若後來寫了幾本書反攻魯迅，但陣地已經改變，這種爭論不再有什麼作用了。

魯迅的矛頭同時指向從前的年青朋友，如早已與魯迅絕了交的向培良，他現在提倡人類的藝術了，他反對有階級的藝術，認爲人類祇有好人和壞人之分，而藝術是好壞鬥爭的武器。魯迅記得向培良曾經說過一句話：青年人不但嗥叫，還要露出狼牙來。他說：這句話並不壞，但狼是狗的祖宗，人類馴服了牠，於是狼就變成狗了，狗能分別人類爲好人和壞人，因爲在狗看來，豢養牠的主人是好人，窮人和乞丐是壞人，不是叫，便是咬了，如果一變而爲叭兒狗，就和自稱不問俗事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名人們一樣了。

魯迅攻擊的是某一種類型，因爲這都是翻着筋斗的小資產階級，將來由他嚴厲地批評的第三種人，也屬於這一類

型。

另一種類型，是**新月社**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新月社**的中心人物，是胡適之羅隆基陳西瀅徐志摩梁實秋等人，這是東吉祥胡同「正人君子」一系人物。一九二七年之後，他們最初是國民黨政府的反對派，不久，就成爲政府的擁護者了。魯迅選中了梁實秋當作該派的代表，因爲他反對無產階級文學，又反對魯迅的「硬譯」，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鬥爭，確乎有代表性的。

梁實秋反對無產階級文學，主張人性論。他認爲資本家與勞動者，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他們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這是人性，文學就是表現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魯迅認爲人在階級社會裏，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

其次，梁實秋認爲宣傳式的文學不是文學。魯迅說，這是梁實秋的自擾，他和無產文學批評家錢杏村所說一樣，把口號標語算做文學了，實際是這種無產文學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都沒有無產氣的，所以並非是無產者文學。

魯迅從事翻譯文學理論，並不否認他在硬譯，這是由於他想塡補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他是希望中國眞有一兩個誠實的俄文翻譯者，陸續譯出好書來的；他這希望未會落空，以後曹靖華，孟十還等都是這方面的名家好手，魯迅自己在死前一年內所譯的**死靈魂**，也決不是硬譯，而是名譯。

× × ×

魯迅在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之前，對自己從事文學工作的一個階段作了檢討和總結，這就是**我和『語絲』的始終**，時期約略從一九二五至二九年。他和**語絲**訣別，也就和這個時

代訣別，和承繼了**新青年**啓蒙運動的同伴們訣別。他說：**語絲**初創時，幾乎有個共同態度，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權威， 並奚落其敵人來取媚。 這就是說反對北洋軍閥，同情南方孫中山一系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十月，魯迅回到上海，**語絲**正在遷滬出版， 編輯任務， 自然由周作人之手，移到魯迅肩上，一方面觸了新得政權的國民黨的忌諱，受了一回警告，繼在浙江省禁止發行；另方面**創造社**等開始圍剿魯迅，**語絲**成爲魯迅反攻的據點。但**語絲**舊人却和魯迅睽離了，魯迅陷於孤軍奮鬥；這是一個轉變期，可說是落伍的落伍，前進的前進。劉半農江紹原都因故不再投稿，孫伏園已另編**貢獻**，而李小峯也成爲眞眞實實的老闆了，一成爲老闆，便唯錢是務，於是**語絲**上出現了種種廣告，魯迅抗議無效，因此不得不辭去編輯之職。

魯迅在一九三二年四月編集**三閑集**與**二心集**時，附了篇**魯迅譯著書目**在一九二九年的雜文之末，也可認爲是他大半生工作的總結，那時他參加**左翼作家聯盟**已逾兩年，但他似乎有不能明說的牢騷，再過幾年，這種牢騷轉而爲明確的憎厭了，我們得引用他的原文作爲這種說法的佐證：

> 我還要將這（按：書目）附在**三閑集**的末尾。這目的，是為着自己，也有些為着別人。據書目察核起來，我在過去的近十年中，費去的力氣實在也並不少，卽使校對別人的譯著，也真是一個字一個字的看下去，決不肯隨便放過，敷衍作者和讀者的，而且毫不懷着有所利用的意思。……
>
> 但這些陸續用去了的生命，實不只成為徒勞，據有些批評家言，倒都是應該從嚴發落的罪惡。做了『衆矢之的』者，也已經四五年， 開首是『作惡』， 後來是『受報』了，有幾位論客，還幾分含譏，幾分恐嚇，幾分快意的這樣『忠告』我。然而我自己却並不全是這樣想，我以為我至今還是存在，只有將近十年沒有創作，

而現在還有人稱我為『作者』，却是很可笑的。

我想，這緣故，有些在我自己，有些則在於後起的青年的。在我自己的，是我的確曾認真譯著，並不如攻擊我的人們所說的取巧，的投機。所出的許多書，功罪姑且弗論，即使全是罪惡罷，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塊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開』，必須有較大的腿勁。憑空的攻擊，似乎也祇能一時收些效驗，而最壞的是他們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沒去，消去了。

但是，試再一檢我的書目，那些東西的內容也實在窮乏得可以。最致命的，是：創作既因為我缺少偉大的才能，至今沒有做過一部長篇；翻譯又因為缺少外國語的學力，所以徘徊觀望，不敢譯一種世上著名的巨製。後來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會跨過的。但僅僅宣傳些在西湖苦吟什麼出奇的新詩，在外國創作着百萬言的小說之類却不中用。因為言太夸則實難副，志極高而心不專，就永遠只能傳揚一個可驚可喜的消息；然而靜夜一想，自覺空虛，便又不免焦躁起來，仍然看見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塊很大的『絆脚石』了。

對於為了遠大的目的，並非因個人之利而攻擊我者，無論用怎樣的方法，我全都沒齒無怨言。但對於只想以筆墨問世的青年，我現在却敢據幾年的經驗，以誠懇的心，進一個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斷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載，幾篇文字和幾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絕後的大勛業。還有一點，是：不要只用力於抹殺別人，使他和自己一樣的空無，而必須跨過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陣的時候，幼稚和淺薄都不要緊，然而也須不斷的（！）生長起來才好。並不明白文藝的理論而任意做些造謠生事的評論，寫幾句閑話便要撲滅異己的短評，譯幾篇童話就想抹殺一切的

翻譯，歸根結蒂， 於己於人， 還都是『可憐無益費精神』的事，這也就是所説『聰明誤』了。

當我被『進步的青年』們所口誅筆伐的時候，我『還不到五十歲』，現在却真的過了五十歲了，據盧南（E. Renan）說，年紀一大，性情就會苛刻起來。我願意竭力防止這弱點，因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決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於將來的。但燈下獨坐，春夜又倍覺凄清。……

這就是魯迅眞實的另一面。他對青年人的忠告是永遠有用的，但春夜又倍覺悽清， 這心情何其孤獨！ 在戰鬥生活中，他是常常體味這種孤獨的，因爲即使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陣地改變了，但他對於那些同路人並不存什麼期望，他在演講中一開頭就說，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 他舉出了幾個容易成爲「右翼」作家的理由，過不了多時，他的話就很快的應驗了；他對於所謂「左翼」作家並不輕易相信的，反而對於**語絲**時期的年青人，如許欽文章川島等及**莽原社**諸人，有更多的信任和更多的直紓胸臆，現在祇舉他給章川島的一封信爲例，這封信，到一九七二年才發表，而且祇限於「內部發行」。

矛塵兄：

廿五日來信，今天收到。梯子之論，是極確的，對於此一節，我也曾熟慮，倘使後起諸公，真能由此爬得較高，則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國之可作梯子者，其實除我之外，也無幾了。所以我十年以來，幫未名社，幫狂飆社，幫朝花社，而無不或失敗，或受欺，但願有英俊出於中國之心， 終於未死， 所以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聯盟，於會場中，一覽了薈萃於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於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此外，他在致曹靖華信中，也談到當時的情形。

> 至於這裏的新的文藝運動，先前原不過一種空喊，並無成績，現在連空喊也沒有了。新的文人，都是一轉眼間，忽而化作無產文學家的人，現在又消沉下去，我看此輩於新文學大有害處，只有提出這一個名目來，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沒的。……

信裏都提到**自由大同盟**，據魯迅給他們信中的述說，這同盟的發起人共五十一人，魯迅列名第二，郁達夫第一，同盟成立之後，五十一人卽被通緝，魯迅被名爲墮落文人，這是在國民黨專政統治之下的一次民主運動，可惜共產黨當時在瞿秋白的盲動之後， 繼之以立三路線， 又繼之以王明路線，對於如何利用民主要求擴大反國民黨的軍事獨裁，並未加以注意，故**自由大同盟**等組織未能成爲羣衆運動的起點，祇限於若干上層知識分子的號召，稍加壓迫，便卽渙散，後來的**保障人權同盟**也是如此。

話雖如此，魯迅之加入這種運動，都是熱誠而自覺的，所以他竭力以赴，毫不退縮，更因爲他見得遠，就受得起打擊。

魯迅看得和舊社會舊勢力的鬥爭，重於一切，他一生是貫澈着這種鬥爭的，他認爲革命作家和批評家，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現社會， 去了解牠的底細， 他舉出共產主義青年團當時刋印的**列寧青年**爲例，在牠批評中國文學界的文章中，對於**創造社**講得很長，認牠是無產階級文學派，其次對於**語絲社**，作爲小資產階級文學派，就說得短了，最後是**新月社**，作爲資產階級文學派，說得更短了，還不到一頁，這就是因爲這位青年批評家，對於愈認為敵人的，就愈是無話可說，也就是愈沒有細看。他主張在了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面的敵人的。

× × ×

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後，僅僅過了十個月，有五個作家

就在龍華遇了難。 表面上看來， 由於魯迅出名的二篇文章——**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爲了忘却的記念**，似乎這五個作家爲左聯犧牲的，其實完全不是。他們的死，死於共產黨的內部鬥爭，死於江蘇省委反對王明一系篡奪黨權的鬥爭；他們的死，應該說是由於他們是共產黨，而不是由於他們是作家，是左聯成員。

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後，完全受制於史大林布哈林領導的第三國際，當時統治中國黨內的理論，是「四個階級聯盟」的階段論，這是孟雪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的機會主義理論，爲列寧嚴加排斥的。 一九二五年起， 中國革命問題引起蘇聯黨內史大林與托洛次基之間劇烈的爭論，影響非常深遠，結果史大林獲得支配地位，中國革命因而慘遭失敗；八七會議後瞿秋白上台，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蘇聯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布哈林主持會議；一方面批評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另方面批評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但又拒絕托洛次基提出的普選全權無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民主口號，他們認爲中國革命正在不斷高漲之中，中國應該建立蘇維埃，實行暴動。這種混亂矛盾的决議，陷中國黨於無出路的境地，祇有盲目地向左傾機會主義的道路前進。一九三〇年史大林發明了**第三時期**的理論，中國黨受其影响，李立三於六月十一日通過决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八月，紅軍進攻長沙失敗；九月，中共中央在瞿秋白領導之下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米夫指導之下，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取銷三中全會補選的中委，解除瞿秋白職務（他此後潛居上海二年， 與魯迅共同從事**左聯**的工作）， 王明乘機取得黨權，開始了**王明路線**時期， 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 毛澤東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取得黨內勝利，才算結束了**王明路線**。

關於**王明路線**的整個時期，說來話長，我們無法詳細叙

述，但王明在四中全會篡奪黨權，引致五個左翼作家被殺的何孟雄一案，我們在這裏應該有個交代。

這些事件，都已成了歷史，我們也祇有引用權威性的歷史文件，才能說明眞相。

第一個文件，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的決議案，**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 一九三一年一月，黨在這些以陳紹禹同志為首的『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從各方面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按：指周恩來)對於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持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儘管六屆四中全會在形式上還是打着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的旗幟，它的主要政治綱領實質上却是『反右傾』，……但是在實際上，它是批准了那個代表着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即在當時及其以後十多年內還繼續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陳紹禹同志的小册子——『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在這個綱領下面，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同志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同志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並在六屆四中全會後接着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其實，當時的所謂『右派』，主要地是六屆四中全會宗派主義『反右傾』鬥爭的產物。……至於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羣衆有很好的聯系，並且接着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强不屈，慷慨就義。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

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

這篇決議案向來附錄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內，四中全會以後，王明的主要敵人便是毛澤東的土共產了，毛澤東忍辱負重許多年，在遵義會議中才算取得初步勝利，抗戰期內，王明又挾史大林以自重，駸駸乎又來與毛澤東爭奪領導了，但毛澤東的地位已不可動搖，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畧問題**，已經不指名的批評了王明，以後爭論相當公開了，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表面上批評的是王明，實際上批評的是王明背後的史大林，中蘇共的理論分歧應該回溯到這裏。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毛澤東取得絕對勝利後對王明派的徹底最後的清算，全部決議沒有一個字涉及史大林和第三國際，但史大林操縱的黑手還是分明可見的。今天，在北京節日中雖然高掛着馬、恩、列、史的照片，但將來對於「社會帝國主義」追本溯源時，仍然要回到史大林背叛列寧的官僚機會主義的。

第二個文件，是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四中全會壓抑了立三路線，也嚴重的打擊了一班反立三路線的老幹部；並使米夫的黨徒陳紹禹等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機構。……統治了中共幾達五年之久，成為有名的**王明路線**。

……我們夫婦於一月二十日左右，安然到達上海，住也東方旅館。幾天以前何孟雄等十七個重要老幹部就是在那個旅館內開會被捕的。……

那些同志見着我，便向我敘述何孟雄等被捕經過。何孟雄任過上海區委書記，他與担任重要宣傳工作的林育南及任少共中央常委的李求實等十七個重要幹部，因反對米夫派陳紹禹等，假東方旅館一個房間，秘密集會，竟全體被捕，這件事震動一時。他們向我敘述的最

初談話中，沈澤民默默寡言，也不敢直說何孟雄等是右派和反黨；趙雲、陳鐵錚等都為這些同志的不幸而悲傷，也深恐牽連中共所有機構和同志的安全，尤其令他們担心的是一般同志的不滿情緒和有些同志竟樹起了反中央的旗幟。主持全國總工會的羅章龍，主持海員工會的陳郁和上海區委委員徐錫根、余飛、王克全等，都不滿四中全會的決議，反對米夫派的行為，已有一些分裂性的活動。

當天我又會見了周恩來，他熟悉全盤狀況，態度也頗持平。他對何孟雄等的被捕極為難過，他認為如果我能早到，和他們事先說說，可能一切迎刃而解。……他自己也在會上承認了對立三路線採取調和態度的錯誤，為會衆所滿意，因而繼續担任中央工作。他說明何孟雄等所不滿意的，是陳紹禹等留俄學生毫無歷練，就逕行担任中央領導工作，因而反對四中全會關於中央人選的決定。現在羅章龍等同志對於何孟雄等的被捕，發生極大誤會，竟認為是由於陳紹禹的告密而遭暗害。……

周恩來還告訴我，四中全會後，米夫偕陳紹禹即趕回莫斯科去了，現在代理米夫職務的是一位波蘭同志。……從那個波蘭人的那種殺氣騰騰的言詞和氣派看來，那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同志們指責和懷疑米夫和陳紹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幹部的話，似也不是任意捏造。……

第三個文件，是一個托派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

中國反對派的統一大會，召開於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三個月之後。那時，因陳系政變造成的混亂現象還充塞着全黨。尤其是那所謂『調和派』或『右派』的悲慘命運，在幹部同志中留下了極其深刻的痛苦印象。關於此事，我必須在此說幾句話：以羅章龍、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為首的一羣老幹部，多數在江蘇省委中員

責，有的則是長期的工會工作者。這羣人可說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到當時為止所造成的一部分最優秀的職業革命家，特別是傑出的工人運動家。他們切實、苦幹，與無產階級息息相關。雖然其中沒有出色的『理論家』，不會像陳紹禹們的引經據典，賣弄『學問』，但因真正生活在革命中，密切地分享着工人階級的命運，所以他們的觀察，感情和見解常常是正確的，比那永遠以莫斯科來電和決議作思想出發點的中央，總是要正確得多。尚在一九二八年，當史大林派遣他的『神童』洛明那次到中國來，指揮瞿秋白等進行盲動之時，這羣以江蘇省委為中心的同志們，曾經提出過正確而嚴厲的批評。他們的一九二八年五月決議案，曾被托洛次基整段的摘引於其論文**六大以後的中國革命問題**中，稱之為『關於共產國際政策和黨制的一個絕妙文件』。江蘇省委從自身經驗中得出的對於史大林路線的批評，竟和反對派的理論分析不謀而合。

中共六次大會以後，這羣人的某些個別分子曾經接觸到托派思想，接觸者自然受了深刻感印。只因他們的實際主義和經驗主義作祟，一時還跳不出史大林的圈子，正確些說，還沒有批判國際權威的勇氣。但是對於六次大會後緊接而來的「第三時期哲學」，即「立三路線」，他們却和以前反對盲動主義一樣，深深感到不滿。六屆三中全會的批評李立三，正是這部分人構成了瞿秋白的羣衆。後來，陳紹禹們起來澈底清算李立三和打倒瞿秋白，事前也可說獲得這班人的默許。可是陳派一經上台，以其更為荒謬的『左』傾路線，更為嚇人的氣焰，更為專橫的作風，立即逼反了這羣真誠的革命家們。陳紹禹於是採取了主攻，憑他原有的國際靠山，加上了新得的黨內權勢，發動了非常猛烈的『反右派』攻擊。這是一場上壓下的打鬥，一切優勢操在陳紹禹們手

裏，但『右派』（同時又被稱為『調和派』）却表現了堅強氣慨，不肯屈服，明知是絕望的鬥爭，然仍英勇抵抗，甚至不惜組織第二黨來貫澈主張呢。可是不幸得很，當第一次該派主要領袖們在先施公司後面的中山旅館闢室會議之時，突被龍華派來的警探捕去。在威迫利誘之下，被捕者始終不屈，遂遭蔣介石屠殺於龍華機場。二十餘位烈士中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其中還有我的舊友趙平復（即柔石），以及與我同舟回國的惲雨棠。小說家胡也頻，也是此次遇難者之一。

『右派』同志們的壯烈犧牲，在黨內激起了持久而深刻的悲憤。有一個流言傳播着，說這次事變是陳紹禹借刀殺人，是他告的密。這種卑鄙行為雖然符合於史大林——陳紹禹精神，但終究無有實據，難以肯定；但這是黨內激烈而殘酷的鬥爭促成了的慘變，却總是無可否認的。因此，牠在一般同志心中產生了敗壞性的與頹喪的影响。失望與消極情緒，隨伴了悲憤而擴展着。而陳紹禹們呢，却還是不顧一切，為了自己宗派的利益，也為了要貫澈史大林以直接代理人把持中國黨的企圖，繼續無原則地、絕對無情地進行各種各式的迫害，將一切不合作的，或簡單『看不順眼的』老幹部們解除工作，甚至踢出黨去。

以上三種歷史文件，對於何孟雄等與王明鬥爭經過及被捕殉難事實，叙述得大致相同，惟究竟有多少人犧牲，則言人人殊，文件第一與第三無確實人數，均說二十餘人，文件第二則說是十七人，魯迅文章**為了忘却的記念**，則是二十三人，我認為二十三人比較接近事實，魯迅與柔石關係非常密切，柔石等死難前後，魯迅所得消息一定甚為可靠，可是除掉五個作家，及何孟雄等幾個老幹部外，其餘都是黨內的積極份子，而且是眞正的工人，現在却連姓名都湮沒無聞了！

為了寫這段文字，我讀了柔石的小說**二月**，不禁喚起了

年青時代的感情和回憶，所謂年青時代我是指五四以後五卅以前那段時期而言的，離開現在快要五十個年頭了。我不知柔石的**二月**是否爲現代青年所了解，因爲這個苦難的年代究竟是一去不回了。新的時代有新的社會矛盾與鬥爭。我一口氣讀完了**二月**之後，覺得牠像是矗立在歷史路上的里程碑，上面鐫着青年革命者的足跡。這是値得珍重的，魯迅的文章與詩也足以和青年革命者的生命永垂不朽。

第一文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刪除了，那時正在淸算劉少奇。瞿秋白，這個曾被尊重爲革命家的，也被評定爲「叛徒」，連遺骨都從八寶山烈士公墓遷出了。他在四中全會中被排出領導地位後，公開在黨報上寫文章自承爲「無恥的機會主義者」，我當時見到這樣的「悔過書」，眞是萬分難過。

魯迅日記：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下午偕廣平携海嬰並許媼移居花園莊 。 這是柔石身上一份有關魯迅的出版合同，使他不得不暫時躲避一下的，他的著名的詩就是在如此悲憤的心情中寫下來的：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極度的悲憤祇能長歌當哭，要過了二年，魯迅才能在平靜中寫出**爲了忘却的記念**，替這幾個青年革命家樹碑立傳。

魯迅有半篇**夜記之五——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文末有云：現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經一年有餘了，偶然從亂紙裏檢出這稿子來，真不勝其悲痛。我想將全文補完，而終於做不到，剛要下筆，又立刻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所謂『人琴俱亡』者，大約也就是這模樣的罷。……

這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夜裏寫的，想見魯迅傷痛之深且久。

共產黨內王明一系篡奪黨權的事實，魯迅一定有深切體會，雖然他不是共產黨員，但他的「親密戰友」馮雪峯以及後來的胡風都是參加實際工作的共產黨員；不久之後，與魯迅聯合戰鬥，魯迅認爲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瞿秋白，更是從四中全會打下來的，他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犧牲於福建長汀，簡直是被黨遺棄。魯迅後來公然與王明的文藝路線（國防文學）爲敵，主要由於以上的種種認識，但王明與毛澤東雖有分歧，在總方向上兩者還是具有共同點的，他們都是史大林主義者，所以即使在一九四五年之後，王明一系澈底的失敗了，主宰共產黨文藝路線的，仍是當年王明的擁護者周揚其人，官僚主義的專斷與獨尊，需要軟脊骨的人阿諛奉迎，這是路線擇人，與個人愛憎無關的。

× × ×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這是表示對外向帝國主義屈服，對內向一切舊勢力屈服；翌年五月三日，駐青島的日本軍藉口製造濟南慘案，交涉員蔡公時被割耳挖鼻後處死，交涉署人員死難者十六人，其他民衆無數。可是蔣介石下令軍隊退出濟南，毫不抵抗。

六月十五日，國民黨政府對外宣言，表示承認不平等條約。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襲取瀋陽，砲轟北大營，蔣介石下令不抵抗，關東軍席捲東北。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在上海突向北站，江灣、吳淞等地進攻，十九路軍奮起抗戰。

全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如火如荼，但國民黨政府勇於內戰，寧願喪權辱國，步步退讓；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向蘆溝橋進攻，全面抗日戰爭方才開始，經過八年抗戰，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以後又經過四年內戰，共產黨率領工農紅軍，解放了全中國。

魯迅死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他經歷了日本侵畧與國民黨政府退讓的最惡劣時期，不及見全面抗戰發生。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魯迅曾於二十一日**答文藝新聞社問**；闡明日本占領東三省的意義：

> 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懲膺』他的僕役——中國軍閥，也就是『懲膺』中國民衆，因為中國民衆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羣衆，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

日本進攻中國，標榜反布爾雪維克主義，當時第三國際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魯迅談話的第二層意義，就是這個口號的反應。其實日本直至投降以前，牠深深陷入中國的泥足，始終無法拔得出來，所以不可能實現「進攻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蘇戰爭，蘇聯業已轉敗爲勝，波茨坦宣言後，蘇聯以百萬軍隊與日本宣戰，摧枯拉朽一般地解决了不可一世的關東軍；但在九一八事件發生當時，日本軍閥眞以爲很快能征服中國，然後進攻蘇聯的。

魯迅認爲國民黨政府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中國民衆在國民黨政府控制之下，則是僕役的僕役，奴隸的奴隸，所以一樣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懲膺，他這話是沉痛的，但也深深表示對國民黨政府的憎惡。左聯的五個作家及其他革命者不斷遭受屠殺，魯迅時時被人跟踪，所以他的談話代表了被壓迫階級，他是國民黨政府不可調和的敵人。

一九三二年一月，他又寫了**答中學生雜誌社問**。

> 編輯先生：
>
> 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你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麼？假如先生說『不』，那麼我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我說：第一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

爭取言論自由，這是民主要求之一，在當時共產黨的王

明路線之下，這種民主要求（應該統一於「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口號下面）是被否定的，結果共產黨的城市工作，據後來劉少奇在八次大會上的報告，百分之百的被消滅了。

但魯迅始終不屈不撓地鬥爭，一九三三年，他和蔡元培、宋慶齡、楊杏佛等組織**人權保障大同盟**，爭取民主要求的實現，他積極地工作，雖無文獻可徵，但**日記**中有簡單的具體記載：

> 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下午往商務印書館，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權保障同盟幹事會。
>
> 十一日，下午往商務印書館訪三弟，即同至中央研究院開民權保障同盟會，胡愈之、林玉堂皆不至，五人而已。
>
> 十七日，下午往人權保障大同盟開會，被舉為執行委員。
>
> 十八日，往中央研究院午餐，同席八人。
>
> 二十五日，下午往中央研究所。
>
> 三十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
>
> 二月二十四日，訪蔡先生，午楊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語堂、李濟之。
>
> 三月一日，得楊杏佛信並照片二枚。
>
> 三日，往中央研究院。
>
> 三十日，午前往中央研究院。
>
> 三十一日，往中央研究院。
>
>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
>
> 五月十一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
>
> 十三日，上午往中央研究院又至德國領事館。
>
> 二十五日，午後往中央研究院。
>
> 六月十二日，得楊杏佛信並我之照相一枚。
>
> 二十日，午季市來。午後同往萬國殯儀館送楊杏佛殮。

二十一日，下午爲坪井先生之友樋口良平君書一絕云：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爲斯民哭健兒。

魯迅冒着必死的決心，去送楊杏佛之喪，據同去的許季茀說，他出門時不帶鑰匙；這天林語堂沒有到，魯迅事後對許說：「語堂太小心了。」在生死決於俄頃之際，最容易見到一個人的行誼，空口說說是沒有用的，魯迅和林語堂的交情不薄，但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記**有云：

……同赴南雲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

自此以後，他們的關係時斷時續，國民黨政府對反對者的壓力加强時，林語堂刋行**論語**，提倡幽默，魯迅雖爲投稿人之一，但他是明白反對林語堂提倡幽默的，以後彼此距離日遠，魯迅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給曹聚仁信有云：

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拼死，只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於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

魯迅一生中有許多無話可說的朋友，**新青年**時代的，**語絲**時代的，在激烈而嚴重的鬥爭局勢支配之下，人的分化尤其迅速多變，魯迅當然也不會想得到，**新月社**裏的詩人聞一多，後來竟也成爲楊杏佛第二呢！

× × ×

現在說起一九三〇年代，和說起五四時代一樣，這在中國文化史上都是佔據一重要地位的。革命失敗，激發革命思想的深入檢討，當時所謂中國社會史論戰，實際上聯系到革命理論的認識，革命策畧的爭論，更具體些說，這是史大林主義與托洛次基主義之爭，是中國革命的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之爭，是中國社會封建殘餘佔優勢，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之爭，影响之深廣與久遠，直到今天毛澤東思想統制了全國， 還是無法作出定論的， 最近的爭論又集中到秦始皇了，其實背後的眞正意義還是上述社會史論戰的繼續，究竟秦始皇創始了封建時代，還是結束了封建時代？按照毛澤東（史大林）的說法，中國第三次革命（一九四九年）的任務始終是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所以他們進行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民族革命， 革命之後， 資本主義仍有若干長時期的發展， 但事實不然， 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在歷史經驗的教訓之下，承認他們是不斷革命論者，但如何調和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 則從來沒有明確地正式作過結論。 可是爭論既然存在，在一涉及歷史或思想的發展問題時，就會重覆到舊爭論來，譬如郭沫若談到「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就說：

> 中國社會的發展，曾經經歷了原始公社、奴隸制和封建制 ， 和馬克思主義所劃分的社會發展階段完合符合。這已經成為一般的常識。四十年前，托派所叫嚷的中國社會空白了奴隸制，在原始公社的廢墟之上建立起封建社會的謬論，早已被吹送到九霄雲外去了。
>
> 但在各個階段的具體劃分上，以前也曾經過不同的意見，分歧相當大。經過大家的努力，認識逐步接近，在古代史分期上， 就只剩下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那就是奴隸制和封建制的交替 ， 究竟應該劃分在什麼時期？

除掉郭沫若無端拉入的「托派謬論」外，談到「奴隸制

與封建制應該劃分在什麼時期」，正是一九三〇年代中國史派與托派爭論的重點所在哩。

魯迅在當時是注意這些爭論的，但他並未參加這些爭論，這不是他的所長，他是文化戰士，不是歷史學家，不是經濟學家，嚴格說來，更不是馬列主義的革命家，在文學範圍內，他於一九二三年寫過一本**中國小說史畧**，根據的是進化論觀點，那時他還沒有注意科學的藝術論，以後也沒有根據他新的認識去改寫，所以他除掉開始時對於中國社會史的爭論給予相當的注意外，從未對這些爭論發表過任何意見。

他的注意祇表現在**我們要批評家**短文裏，他說：

> 看大概的情形，……出版界的趨勢，已在轉向社會科學了。這不能不說是好現象。最初，青年的讀者迷於廣告式批評的符咒，以為讀了『革命的』創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會，都可以得救，於是隨手拈來，大口吞下，不料許多是並不是滋養品……
>
> 得了這一種苦楚的教訓之後，轉而去求醫於根本的，切實的社會科學，自然，是一個正當的前進。
>
> 到這裏，我們所需要的，就只得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社會科學的批評成爲「中國社會史論戰」，文學批評始終還是魯迅自己有成績，他此後不再從事文藝創作，他的戰鬥性的雜文雜感，則是面對惡劣的政治環境作出了社會批評，不僅僅以文藝批評爲限了。

× × ×

魯迅有「無話可說」的朋友，也有「生死不渝」的朋友，前面說過的瞿秋白就是。他們的戰鬥友誼始於一九三二年九月，終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不到二年；再過二年，魯迅給他編印遺集，不久魯迅自己也逝世了。

魯迅日記：

> 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午前同廣平携海嬰訪何家夫

婦，在其寓午餐。

十四日，文尹夫婦來，留之飯。

十八日，得文尹信，並贈海嬰金鈴子一合，叫哌哌二合，包子一筐。

二十五日，閱文尹小說稿，下午畢。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買現代散文家批評二本，贈何君，並文始一本。

十一月四日，以一天的工作歸良友公司出版，午後收版稅泉二百四十，分與文尹六十。

十二月九日，下午維寧及其夫人贈海嬰積鐵成象玩具一合。

十一日，治饌六種邀樂揚、維寧及其夫人夜飯。

二十五日，下午得維寧信並贈火腿爪一枚，答以文旦餄二合。

二十八日，下午得維寧信並詩，即復。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下午寄維寧信。

十五日，晚得維寧信。

二十四日，夜得維寧信並稿，即復。

二月四日，得維寧信。

十日，上午復靖華信，附文它箋。

三月一日，同內山夫人往東照里看屋。

三日，午後往東照里看屋。

（按：這是魯迅為瞿秋白找的避難所。）

六日，下午訪維寧，以堇花一盆贈其夫人。

七日，午後寄靖華信，附尚佩吾及維寧箋。

四月二十一日，付何凝「雜感集」編輯費百。

七月五日，得疑仌及文尹信，並文稿一本。

十日，下午收良友圖書公司版稅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華各卅。以選集編輯費二百付凝冰。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寄杜衡信，並稿一篇，書兩

本，又蕭參譯稿一篇。

九月十二日，得杜衡信並書二本，現代九月號稿費二元，蕭參豫支高氏小說選集版稅廿二日期支票百元，即復。

十月九日，上午得凝冰信。

二十四日，得凝冰信。

十一月十日，得宜賓信並稿二篇。

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晚宜賓來。

（按：瞿秋白被派赴蘇區瑞金，與魯迅作別。）

九日，夜得宜賓信。

二十八日，得宜賓信。

二月三日，得文尹信並譯稿一篇。

八月五日，晚得文尹信。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瞿秋白在長汀就義。十二月十九日，魯迅致函曹靖華：史兄病故後，史嫂由其母家接去，云當旅行。三月無消息，兄如與三兄通信，乞便中一問，究竟已到那邊否。——按：三兄當為留俄的肖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得文尹信， 附王弘箋。

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下午以「文學叢刊」寄文尹、肖三及約夫。

七月一日，上午得文尹信。

二日，得文尹所寄石彫烟灰皿二個，亞歷舍夫及密德羅辛木刻集各一本。

十七日，得文尹信，下午復。

以上日記所記名字，都是瞿秋白的化名，祇有文尹兩字是他們夫婦兩人合用的，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以後的文尹，應該祇是楊之華了。瞿秋白被捕後，楊之華的行蹤，據國民黨的記載如下：

> 一九三四年朱毛秦等率匪軍竄往川康，瞿秋白被留江西，翌年於閩西被捕，死於汀州。楊（之華）以滬不能居，後赴莫斯科，受『革命互濟會』之招待。
>
> 一九四一年德俄戰起，九月送返迪化，後即為盛世才所拘禁。一九四六年經政府送往延安，旋即任匪黨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委員，領導婦女運動。（**中共人名錄**五四二頁）

瞿秋白生前文字，魯迅蒐集了文藝方面的譯作，印成**海上述林**兩大册， 謝澹如則印了他的雜文**亂彈**， **亂彈**出版當時，上海已成孤島，距魯迅去世已有二年許，原稿用鉛筆寫在二册練習簿上，由我替他向一個開明的資本家借了一千元付印，因當時抗戰已發生，故大約有四篇攻擊國民黨過甚的文字未曾印入，書出版不久隨即再版，還淸欠款後還有餘力印了本**方志敏自傳**，本來還想印幾篇長征中的紀事的（這些原稿曾經魯迅看過，魯迅後來認爲無力運用這些材料寫有關長征的故事，所有原稿這才經過雪峯托謝澹如保存的），大約當時許多人心目中以爲這次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一定會產生像**鐵流**那樣的紀念碑似的偉大作品，却不道看了原稿，旣散漫又貧乏，裏面絕無郭如鶴那樣的英雄人物，祇好作罷，現在距離長征已將四十年，距離全國解放已有二十四年，可是這樣的文學作品還未產生呢。

亂彈出版後，原稿就托那位資本家保存，解放後獻給政府，這就是印行**瞿秋白文集**四大册屬於**亂彈**部份的根據，可是瞿秋白臨死之前所寫的**多餘的話** ， 任何一本文集都未收入， **逸經**刋登這篇文章時， 上海的地下黨斥爲國民黨的僞造，但是和秋白一道工作許多年的托派領導人之一的鄭超麟斷定它是眞的，說：「秋白就是那樣的人」。後來楊之華寫「憶秋白」時並不否認這篇文章，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據此斥瞿秋白爲「叛徒」。一個革命家的遭遇，眞不如章士釗那樣生得尊崇，死得殊榮！

× × ×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魯迅在北京寫信給許廣平說：

前日到家，母親即問我『害馬』為什麼不一同回來，我正在付車錢，忽忙中即答以有些不舒服，昨天纔告訴她火車震動，不宜於孩子的事，她很高興，說，我想也應該有了，因為這屋子裏早應該有小孩子走來走去了。這種『應該』的理由，雖然和我們的意見很不同，但總之她非常高興。

九月廿七日日記：晨八時廣平生一男。

十月一日日記：下午往福民醫院，與廣平商定，名孩子曰海嬰。

從此他時時在給母親和朋友的信裏談起他的海嬰；他的論敵，有時在筆頭也帶到海嬰。他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寫了**答客誚**的詩，表示對於海嬰的愛：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

他對於親子的愛，是最純眞的愛，並沒有借此表示有其他作用，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前者指自己，後者指海嬰，如此而已。解詩的人必欲在此探求微言大義，未免失之穿鑿，他們對以下的兩句詩便不提了，如果他眞的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那不明明白白成了個自私自利的自了漢嗎？

他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上說 ： 舊歷除夕也，治少許肴，邀雪峯夜飯；又買花爆十餘，與海嬰同登屋頂燃放之。蓋如此度歲不能得者，已二年矣。

五十三歲的父親和四歲的孩子一同在屋頂放花爆作樂，這是何等開朗的胸懷！把魯迅描寫成爲整天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那樣的革命家，這只表示這種人的新式八股的頭巾氣罷了。

魯迅遺囑說：

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長大後的海嬰切切實實的做到了這一點，今年（一九七三）他四十四歲了，在北京廣播電台任技術副主任，樸實無華，絕不和他母親一樣，在反胡風， 反雪峯， 及丁玲的時候，聽從周揚的指揮棒對他們落井下石，而在反周揚的時候却去喊四個偉大。

× × ×

關於魯迅的翻譯，從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五年，不斷有人反對他， 最先反對的是梁實秋， 說他「硬譯」等於「死譯」。 創造社圍剿魯迅的時候， 魯迅深感他們的攻擊廢話太多，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於是他就發心翻譯文藝政策，繼之翻譯藝術論，這都是從日文轉譯的；他在文藝與批評的後記中說：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澁，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了，所餘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着頭皮看下去而已。

要讀者硬着頭皮看下去的魯迅的「硬譯」，我當時確有這樣的經驗，實在看不懂，可是創造社太陽社那種批評文章也一樣難懂，因爲他們的文章雖不是翻譯，却充滿仍是從日文搬過來的生硬的名詞，簡簡單單的「資產階級」，偏偏譯做「布爾喬亞」，無產階級譯做「普羅列塔利亞」，知識分子譯做「英帖利更追亞」，雖說那時對於許多社會主義科學的名詞有待於輸入與肯定，對於一般人困難的還是文字的結構，魯迅過分遷就日本的文法與語言結構，所以變成硬譯，但是我們不能否認魯迅繙譯的苦心，他認爲與其「曲譯」不如「硬譯」，他的本意是要從別國竊得火來煮自己的肉，而且在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所以他希望世間總會有較好

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 ， 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

他說：

> 中國曾經大談達爾文，大談尼采，到歐戰時候，則大罵了他們一通，但達爾文的著作的譯本，至今只有一種，尼采的則只有半部，學英德文的學者及文豪都不暇顧及，或不屑顧及，拉倒了。所以暫時之間，恐怕也只好任人笑罵，仍從日文來重譯，或者取一本原文，比較了日譯來直譯罷，我還想這樣做，並且希望更多有這樣做的人，來填一填徹底的高談中的空虛，……

魯迅的翻譯，目的在乎藉此應急迫的需要，但即使「硬譯」，他還是有「硬譯」的理由，他認爲文字本身是有變遷的，「史」「漢」不同於「書經」，白話文又不同於「史」「漢」，而且文字有添造，唐譯佛經，元譯上諭，當時就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習用，便容易懂得。現在又有許多外國文的句子需要生造，說得壞一點，就是「硬造」。

攻擊魯迅「硬譯」的，據魯迅說已經有了三代，祖師是梁實秋教授，徒弟是趙景深教授，徒孫是楊晉豪大學生。這三代之中，他認爲趙景深如下的主張最明白而澈底：

> 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

於是魯迅舉出三個順而不信的例子，證明譯得「信而不順」的至多不過看不懂， 想一想也許能懂， 譯得「順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誤……

他舉的例子都不是趙景深的，不久，魯迅找到了趙景深在二月號(一九三〇年)的**小說月報**上介紹的**國外文壇消息**，有一條是格羅潑已將馬戲的圖畫故事『Alay Oop』脫稿」。魯迅又找到這本圖畫，原來說的不是「馬戲」的故事，而是「做馬戲的戲子們」的故事。在十一月號上，趙景深又介紹了一則**國外文壇消息**：塞意斯完成四部曲，而且連最後的一册

「半人半牛怪」（Der Zentaur）也已於今年出版了。

魯迅說：

> 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發白，因為這是茄門話（按：即德國話），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濟學校也幾乎無處可借，那裏還敢發生什麼貳心。然而那下面的一個名詞，却不寫尚可，一寫倒成了疑難雜症。這字大約是源於希臘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們還常常看見用它做畫材的圖畫，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馬，不是牛。……
>
> 『牛』了一下之後，使我聯想起趙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來了。……却說希臘神話裏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歡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間去，和某女士生了一個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個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後，便對那孩子取到上天，要看機會將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滿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頭，便一吸，太太大吃一驚，將他一推，跌落到人間，不但沒有被害，後來還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噴了出來，飛散天空，成為銀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實是『神奶路』。……

魯迅辛辣的幽默，簡直像拿住了寧順而不信這個主張者的贓物，他說趙景深遇馬發昏，愛牛成性，這些牛頭不對馬嘴的翻譯，叫作亂譯。

而且他又形之吟詠，傳之久遠，曰：

> 可憐織女星，化作馬郎婦。
>
> 烏鵲疑不來，迢迢牛奶路。

以上都是魯迅對於「硬譯」問題的反攻，雖然口吻上有些玩笑，却可見魯迅對事物執着認眞得可怕，他不出擊則已，一出擊簡直制敵死命。

對於翻譯問題正面的討論，具見於瞿秋白（J・K・）

與魯迅的通訊，這裏不再具引。

可是那時候不負責任的翻譯，也引起了讀者的反感，於是新起的論者，開始輕薄着販來的洋貨，爲了矯正這種極端，魯迅尤其提倡翻譯了，說：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譯』。而且他提倡一本書不妨有幾種譯本，他以達爾文的**物種由來**爲例，日本是有兩種譯本的，先出的有許多錯誤，中文譯者馬君武根據的就是這個壞譯本，所以他主張實有另譯的必要。

對於讀者的抱怨，他也愷切地忠告：倘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並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所以，翻開第一行就譯的譯者固然不負責任，而漫無區別，對於要無論什麼譯本翻開第一行就懂的讀者，也是不負責任。

然而沒有完，穆木天以樓適夷所譯的**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爲例，指他濫譯及對原文濫下注解之不當。魯迅認爲批評家不僅指出壞的，而且要奬勵好的；倘沒有好的，則較好的也可以。穆木天祇做到第一點，他以爛蘋果作比，以前的批評家是說，這蘋果有爛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拋掉。他却要求：倘不是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着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吃得。

樓適夷那時幽囚在南京的軍人監獄，徒刑十五年，魯迅之護衛他，是抱有對革命作家的同情在內的，穆木天後來也被捕，但悔過被釋，所以在和周揚鬥爭時，魯迅在筆頭上時時帶着他。

又是穆木天，他反對間接翻譯，即重譯，魯迅認爲懂某一國文，最好是譯某一國文學，這主張是斷無錯誤的，但中國人所懂的外國文最多的是英文，其次是日文，如果不重譯，則易卜生、伊本涅支、塞萬提司的作品，我們都將無從見到，因爲沒有人精通丹麥、挪威、西班牙文，所以從英文重譯是不可免的。有時重譯反而比直譯好，因爲人家的譯本

已經加過工了。 如果有好的直接譯本， 重譯本自然應該淘汰。但穆木天要譯者一勞永逸地譯出好的書，魯迅認爲一勞永逸的事是沒有的，中國字就不是一勞永逸的符號。有空地便會生長荆棘或雀麥，要緊的是有人來處理，或培植，或删除，使翻譯界畧免於蕪雜，這就得依賴於批評。

魯迅提倡翻譯，並不主張凡翻譯必須硬譯，他自認硬譯是不得已，在和朋友談到自己譯**死靈魂**的困難時，他就非常婉惜瞿秋白的死，瞿若不死，譯這種書是極相宜的，卽此一端。卽足判殺人者為罪大惡極。全國解放以後，文化方面最大的成功是翻譯的忠實可靠， 凡是硬譯、 亂譯都一掃而空了，尤其在社會科學方面 ， 我所見到列寧著作的翻譯，是每出一次新版本就改譯一次的，的確可說是力求達到「信、達、雅」這三個標準的。

× × ×

在文學方面，魯迅嚴厲而澈底地排擊民族主義文學，這種文學興起在日本明目張胆的侵畧之後，國民黨政府既然抱着「寧與外人，不與家奴」的安內第一態度，那種御用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實際上不過是賣國文學，這種文學不可能發生大作用。眞正的民族主義文學，首先必須是被壓迫階級力求民族解放的文學，是抵抗帝國主義侵畧的革命文學。所以祇有最澈底的革命階級，才能負担起民族主義革命文學的任務。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與帝國主義同生共死的，反映到意識上來，就是他們自以爲是統治着奴隸的奴隸主，黃震遐的**隴海線上**，就是這種意識的暴露。

> 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羣星之下，手裏執着馬槍，耳中聽着虫鳴。四周飛動着無數的蚊子，那様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菲洲沙漠裏與阿拉伯人爭鬥流血的生活。

登載在當時**前鋒月刊**上的這篇作品，據編輯者說，牠是

「參加討伐閻馮軍事的實際描寫」。魯迅分析說：

> 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從『青年軍人』，從『民族主義文學者』看來，是並非驅同國人民互相殘殺，却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兩個國度，兩個民族，在戰地上一到夜裏，自己就飄飄然覺得皮色變白，鼻梁加高，成為臘丁民族的戰士，站在野蠻的菲洲了。那就無怪乎看得周圍的老百姓都是敵人，要一個一個的打死。……

黃震遐的另一篇作品，是**黃人之血**，寫的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元帥的西征，所征的是歐洲，其實專在幹羅斯（俄羅斯）——這是作者的目標，漢族，當然是參加西征的聯軍的一部分，作者說：黃禍來了！黃禍來了！魯迅認爲作者忘記了趙家末葉的中國，是蒙古人的淫掠場，他所描寫的死神捉着白姑娘拼命地摟，其實就是蒙古人征服中國人的實際情形，一到成吉思汗的孫子，他們就携手西征了。日本人東征了東三省，那是詩人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只有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後才能趕他打仗，將來的主子是否肯信用優待忠勇的奴才，是一個很要緊，很可怕的問題，這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共存共榮的大關鍵。

魯迅批評的是民族主義文學，但這批評洞澈了未來的歷史發展， 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力圖與日本主子共存共榮的漢奸，與抗戰之後把淪陷區人民當作被征服者的刼收大員們，正如魯迅所說：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澈底的掃蕩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有十九路軍的抗戰，這是出乎國民黨政府意料之外的，三月一日，戰爭終於在政府壓力之下結束了，過了一年， 日軍席捲內蒙諸省， 進窺平津，同一作者寫了**大上海的毀滅**，其中有云：

> 十九路軍打，是告訴我們說，除掉空話以外，還有些事好做！
>
> 十九路軍勝利，祇能增加我們苟且，偷安與驕傲的

迷夢！

十九路軍死，是警告我們活得可憐，無趣！

十九路軍失敗，纔告訴我們非努力，還是做奴隸的好！

這就是民族主義文學所洩露的統治階級的心聲，他們的民族英雄在指揮戰爭，戰爭計劃則不多不少剛剛適宜的辦法是失敗！

從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戰到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與日本訂立塘沽協定，這期間東北成立了僞滿國（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國民黨進行第四次圍剿（一九三二年六月），共產黨中央由上海遷入蘇區（一九三三年初），王明路線引致此後紅軍的軍事失敗；全國白色恐怖橫行，托派領袖陳獨秀被捕（一九三二年十月五日）。

魯迅雖是**左翼作家聯盟**的領導人之一，但據他後來自述：由於不在革命的漩渦中心，而且久不能到處去孜察，所以他仍然只能暴露舊社會的壞處而已。

一九三二年，大約由於逃難與壓迫，他寫的文章非常少，蒐集在**南腔北調集**的祇有九篇，他在給台靜農的信上說：

『一二八』的事，可寫的也有些，但所見的還嫌太少，所以寫不寫還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聞的多不可靠，據我所調查，大半是說謊……

又說：

上海……文禁如毛，緹騎遍地，則今昔不異，久見而慣，故旅舍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鷄之聳人耳目矣。我亦頗麻木，絕無作品，真所謂食菽而已。……

但到了一九三三年，魯迅所寫的文章特別多，當時黎烈文新從法國回來，主編申報**自由談**，以郁達夫介紹，魯迅不斷寫稿，除**南腔北調集**所載三十九篇外，蒐集於**僞自由書**的

有三十五篇，**准風月談**的有六十四篇，在他一生中這是從所未有的豐收。因爲他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所以招致了許多敵人，尤其是所謂第三種人。

在階級鬥爭非常激烈的時候，小資產階級常常覺得自己處於**兩把火**之間，所謂第三種人，就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楊村人、杜衡、施蟄存、章克標等等都是。中國的資產階級由於已失去歷史的生存條件，所以文化上及文學上不可能再有什麼建樹，民族主義文學祇能代表資產階級沒落的反動。楊邨人特別舉起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的大旗，但這不過是空洞的大話，到施蟄存提倡「莊子與文選」時，則已是拾讀經復古的餘唾，沒有什麼生氣了。

第三種人這個名詞，創始於一九三二年，提出這名詞的不是魯迅，而是蘇汶，但在一九二九年，魯迅與「革命文學家」論爭時，在他看來，這些自以爲革命文學家的人，不過是脚踏兩頭船的小資產階級吧了 。 當時還沒有發明第三種人，可是氣昂昂，凶糾糾的革命文學家中，儘多後來提倡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楊邨人那樣的人，所以魯迅在燕京大學演講**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時，對這批人不客氣的指出：

> 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 使大衆看去， 為仇為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裏存着許多舊的殘滓，却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無產階級！』……

爲什麼當時發生了革命文學？魯迅也有解釋：

> ……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却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變，來作刺戟，正如飽於飲食的人，想吃些

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裏失敗了，却想另掛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魯迅否認當時的革命文學家代表無產階級，他可是承認文學是有階級性的，他與梁實秋爭論的重點就在這裏，他認爲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所以即使喜怒哀樂，人之情也，階級不同，感受自異。文學家自以為『自由』，自以為超了階級，而無意識底地，也終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至於在「無產者文學」這旗幟之下忽翻筋斗的那些人，其實都是小資產階級，他們卽使在做革命文學家，寫着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的，他們忽然一天晚上「突變」過來，不久又突變回去了。

他祇希望有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出現；他以爲他們是生長在滅亡着的階級中的，對這階級有甚深的了解，有甚大的憎惡，所以刺下去的刀也最為致命與有力，但這種作品終於沒有出現，那是由於革命文學家一只脚踏在革命的船上，另只脚踏在文學的船上，環境好的時候，作者在革命這只船上踏得重一點，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壓迫，則在文學的船上踏得重一點，他變得不過是文學家了。這樣的革命文學家，當然不會認眞革命，也不會有認眞的文學作品。

魯迅所分析的革命文學家，豈不就是後來的第三種人？也許第三種人更坦白些，因爲他們至少不自稱爲革命文學家。

第三種人的出現，是在文學革命家喧喧嚷嚷的三年之後，這三年中，旣有**左翼作家聯盟**，也有國民黨御用的**民族主義文學**，同時又興起了一批可稱之爲**現代派**的小資產階級文學，穆時英，蘇汶（杜衡），施蟄存，劉吶鷗，戴望舒，蓬子都是這一派的中堅人物。左翼作家裏面，也不斷有人分化出去，如魯迅所說的，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於

也頹廢得快，譬如最澈底的革命文學家葉靈鳳先生，他描寫革命家，澈底到每次上茅廁時候都用我的吶喊去揩屁股，現在卻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家屁股後面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位葉靈鳳先生在香港**新晚報**上發表了許多**歌德派**的文章，署名**霜崖**，我曾加以批評，請參看拙著**直言集**。）

第三種人冒頭訴苦的理由是：左翼文壇說他們是資產階級的走狗；而左翼作家則是左而不作。他們主張真的，永久的文藝，超出於階級鬥爭之外的文藝，為將來的文藝。但因左翼作家的批評嚴酷，害得他們祇好擱筆。

魯迅承認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不僅有左而不作的，而且有由左而右的，但也有被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錮，殺戮的；他不敢必左翼批評家是否會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爲資產階級的走狗（這種拉着大旗作為虎皮，包着自己的左翼作家，後來魯迅自己也親身領教了，至於以辱罵和恐嚇來戰鬥的，魯迅也立即予以批評），但第三種人是不可能有的，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

第三種人自己所想像的那樣的第三種人，自然是沒有的，有的祇是依違於兩個主要階級之間的小資產階級。戴望舒援引法國的紀德作爲第三種人的同志，當時紀德剛剛轉向，他從遊歷非洲法屬殖民地剛果回來之後，寫了**剛果旅行**，深深痛惡這種帝國主義的不人道的剝削；一九三三年，希特拉在德國上了台，紀德於是面向了社會主義的蘇聯，他以爲在那裏可以找到人類的公平、正義和希望，這是一個資產階級作家叛離本階級的行爲，和魯迅一樣，和其他三〇年代世界偉大的智識分子一樣，他們一叛離本階級，沒有不向社會主義的蘇聯去尋求人類的希望的，可是祇有紀德在遊歷

蘇聯之後能把感受到的眞實說出來，但說出來之後，他仍回到自己的階級去了，最後接受了他原本看不起的院士的尊崇的地位，否定了共產主義。

魯迅否認紀德是戴望舒所說的第三種人，因爲他憎惡法西斯在德國進行的恐怖，而在蘇聯的社會創設中，他却見到了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中國的第三種人却是反對**左翼作家同盟**的，當然和紀德不同調。

魯迅認爲事實上並無第三種人，等於人體有胖有瘦，一加比較，非近於胖，就近於瘦，决不會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會分明的顯現。紀德向左，有的人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

當然，事實如此，以第三種人自命的人，後來向左的有蓬子，戴望舒等，向右的甚至做了漢奸的，有穆時英，劉吶鷗等。

魯迅雖然否定有第三種人，其實第三種人祇是小資產階級的別名，而這個階級實際上是存在的。楊邨人就不自稱爲第三種人，他揭起了「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的大旗，與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對立。魯迅說他在**自白**中，有農民的純厚，小資產階級的智識者的動搖和自私，但仍不過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而不是奸商，他所謂奸商者，一種是國共合作時代的濶人，那時頌蘇聯，贊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黨』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濶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濶；一種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為『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楊邨人不是這種人，有些投機是無疑的，他不過竭力要做第三種人，過比革命黨較好的生活；但還是受到左右夾攻，連第三種人也做不穩的。

如果有什麼第三種人，楊邨人要算是最好的「類型」了。

對於這種類型的行徑，魯迅稱之爲**二丑藝術**，二丑一名二花臉，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壞。

> 義僕是老生扮的，先以諫諍，終以殉主；惡僕是小丑扮的，只會作惡，到底滅亡。而二丑的本領却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着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

二丑藝術就是幫閒藝術，魯迅認爲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有主子忙於行兇作惡，那自然就是幫兇。幫閒的例子，有女婿問題，話說詩人邵洵美的書店，出版了一本**十日談**的雜誌，在第二期上，邵洵美談到文人無行，認爲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的，便來做這種嗞本錢生意，而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這話觸怒了魯迅，他寫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於是牽涉到女婿登文壇的問題，他說：

> 要登文壇，須濶太太，遺產必需，官司莫怕。窮小子想爬上文壇去，有時雖然會僥倖……但究竟隨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濶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笑罵隨他笑罵，惡作我自印之。……但其為文也，必須是唯美派，……

魯迅的文章一出，幫閒者紛紛反攻，說這是狐狸吃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最惡劣的，又牽涉到盧布，許多中國作家現在都變成了俄國的女婿了。

魯迅曾應日本改造雜誌之請，用日文寫了三篇文章：譏評中國、日本、滿洲的，邵家惡辣的謀士，就在這甜葡萄棚裏產生出來的**人言**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譯出了**談監**

獄，並由編者加以附註：

> 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但我們刊登此稿目的，與其說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議論透澈；不如說舉一個被本國迫逐而托庇於外人權威之下的論調的例子。……

魯迅認爲提出軍事裁判這種字樣，是含有甚深的殺機的。他說見到這些富家的鷹犬，更深知明季向權門賣身投靠之輩的陰險了。

× × ×

但第三種人又提倡青年人讀莊子與文選。

魯迅是主張「少看中國書」的，他感慨於光緒末年的新黨立志維新，而沒有染過八股毒的新青年却學起篆字來了，填起詞來了，勸人看『莊子』、文選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版了，新詩也寫成方塊了，……他以爲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新式青年的軀殼裏，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嘍囉。

這就引起了施蟄存的反攻，他說像魯迅先生那樣的新文學家，似乎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純粹的白蘭地嗎？我就不能相信。沒有經過古文學的修養，魯迅先生的新文章決不會寫到現在那樣好。……

這種論據在五四運動時早已有過：保護文言者是說凡做白話文的都會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讀。現在保護古書者說反對古書的也在看古書，做文言，——可見主張的可笑。

魯迅認爲這是永遠反芻，是讀透了莊子的話。

主張讀莊子與文選的還有一種理由，說從這些書裏可以找到字彙，作爲描寫自然景物，個人情感，宮室建築……之用。魯迅反駁說：從前嚴幾道從甚麼古書裏——大概也是莊子吧——找着了『幺匿』兩個字來譯Unit，又古雅，又音義雙關的。但是後來通行的却是『單位』。嚴老先生的這類『字彙』很多，大抵無法復活轉來。現在却有人以為『漢以

後的詞，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帶來的字和詞，可以拼成功我們的光芒的新文學』，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詞，那大概像古墓裏的貴婦人似的，滿身都是珠光寶氣了。

魯迅說得好：人生却不在拼湊，而在創造，幾千百萬的活人在創造。這是歷史的眞理，蒼白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然看不見這一點眞理的。

如果魯迅活到現在，看見人家大吹大擂地推荐**柳文指要**，又將如何說？詮釋魯迅的人多的是，但絕無人把這些問題聯系起來說的。

× × ×

魯迅在一九三三年以後所寫的文章，每篇都換上一個筆名，否則便不易登出，約畧計之筆名多到五十以上，然而善用嗅覺的檢查官們，對於可疑的文章還是不准刋登。檢查官中也有第三種人。檢查之外，更有暗殺，但魯迅仍以其匕首的一擊，繼續其再接再厲的鬥爭，他認爲一羣流氓，幾枝手槍，並不能治國平天下的。可是為了『閒話皇帝』事件，官家的書報檢查處忽然不知所往，還革掉七位檢查官，可見當時國民黨政權對外的奴顏婢膝，對內的兇殘壓迫。

魯迅的矛頭，主要針對國民黨政權攘外必須安內的剿共政策，所以他的文章，像杜甫的詩一樣，反映的都是當時歷史的眞實。魯迅也有詩，不多，他的詩也可稱爲「詩史」。華北快要特殊化了，古董南遷，這都不再引起人們的反抗，既無人請願，也無人遊行，於是有人罵北京的大學生不愛國了。因爲他們不再用頭來『碰』刺刀和槍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却發明一種新辦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魯迅剝崔顥黃鶴樓詩以弔之：

闊人已騎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專車隊隊前門站，晦氣重重大學生。

日薄榆關何處抗，烟花場上沒人驚。

這時共產黨在華北已恢復了地下工作，由劉少奇領導的大學生多半潛入了各種抗日團體，不是眞的各自走散回家。

× × ×

我們在上面已約畧把魯迅反對的類型舉了出來，魯迅雖然如此向四面八方戰鬥，但由於時時改換名字，許多人簡直摸不淸楚，所以他說：

近兩年來，又時有前進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現在不大寫文章，並聲明他們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無可置辯的，但也有一點誤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從在新靑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裏的最末一篇止（按：指且介亭雜文二集），共歷十八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後九年中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後九年中，近三年中所寫的字數，等於前六年……

魯迅所說的近三年，是指一九三三至三五年，時代多艱，作者更不潛心於鴻篇鉅製，他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他忙於為現在抗爭，認爲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魯迅自覺他的文章雖然不是「詩史」，却有時代的眉目的，但是他的話不過引起許多人的憎惡，要到不幸而言中，這才大家默默無言，然而爲時已晚；他說：

我有時決不想在言論界求得勝利，因為我的言論有時是梟鳴，報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會有不幸的。在今年，為了內心的冷靜和外力的壓迫，我幾乎不談國事了，偶爾觸着的幾篇，如『什麼是諷刺』，如『從幫忙到扯淡』，也無一不被禁止。別的作者的遭遇，大約也是如此的罷，而天下太平，直到華北自治，

才見有新聞記者懇求保護正當的輿論。我的不正當的輿論，却如國土一樣，仍在日即于淪亡，但是我不想求保護，因為這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魯迅出力奮鬥的三年中，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年頭，一方面，日本軍隊侵佔了東北諸省，華北變色，另方面蔣介石加緊剿共，迫使紅軍長征。對於民衆的愛國運動，則效法史大林希特勒的特務統治，盡根剷除。但使魯迅悲哀的，不在壓迫的加緊，而是同志的叛變與暗箭，他從一九三四年起，對朋友就不斷訴述這點。

魯迅與左翼的齟齬，不僅僅在私人通訊上發發牢騷而已，他在公開文字上加以痛斥，這就是**答『戲』週刊編者信**，在說過關於阿Q劇本的意見之後，他不禁聲色俱厲地說：

> 臨末還有一點尾巴，當然決沒有叭兒狗的尾巴的有趣。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過還是非說不可。記得幾個月之前，曾經回答過一個朋友的關於大衆語的質問，這信後來被發表在**社會月報**上了，末了是楊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位紹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說我已經和楊邨人先生調和，並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國人之富於調和性。這一回，我的這一封信，大約也要發表的罷，但我記得**戲**週刊上已曾發表過曾今可，葉靈鳳兩位先生的文章；葉先生還畫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吶喊**還沒有在上茅厠時候用盡，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買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紹伯先生的判決所震懾，這回是應該不敢再寫什麼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這裏要順便聲明：我並無此種權力，可以禁止別人將我的信件在刊物上發表，而且另外還有誰的文章，更無從豫先知道，所以對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沒有表示調和與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

之上的。

類乎這樣的暗箭，是不一而足的。

魯迅爲要應付內外的敵人，祇得橫站着戰鬥，逐漸，周揚一伙佈置了圍剿陣，終於和魯迅完全决裂。

有一時期，魯迅是在病中戰鬥的，他從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起至年終，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起至十月十七日絕筆，都斷斷續續地在病，日記上記載熱度、病象及就診的情形相當詳盡，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病後大瘦，義齒已與齒齦不合，因赴高橋醫生寓，請其修正之。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至三十日，簡直病得無力記日記。但他在病中寫作不輟，病嚴重時甚至口述由別人筆錄。第一次病後他給友人信說：近半年來，因為生了一場病，體力頗減，而各種碎事，仍不能不做，加以担任譯書等等，每天真像做苦工一樣，很不快活。……

在這幾年中，他雖說爲了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與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使他寒心、灰心，但大抵休息一會，就仍然站起來，然而好像終竟也有影响，不但顯於文章上，連自己也覺得近來還是『冷』的時候多了。在這樣的處境中，他比之爲穿了一件濕布衫。

他向來非常愛護青年，最後幾年，此種愛護之忱更篤，從他致蕭軍肖紅的信，和致曹白的信，可見一二。他曾向左聯提議，當今應務之急，是在養成勇敢而明白的鬥士。儘管他如此用心，却總是人微言輕，終無效果。但他自己是竭力做到這一點的。他以同樣的感情對待徐懋庸，却不料他代表了共產黨的聯合陣線政策，給予魯迅以致命的打擊。

魯迅和左聯的齟齬，看似個人問題，實際上是領導問題，最後則完全是政策和路線問題。我們已說過他和紹伯（田漢）之間的公開衝突，但暗中他對共產黨的文藝領導人更爲不滿。他回答蕭軍說：……議論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調，其實唱高調就是官僚主義。我的確常常感到焦煩，但力

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獨戰』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們，却斥責我懶，不做事；他們昂頭天外，評論之後，不知那裏去了。

對於這樣的官僚主義，他不僅焦煩，而且反感，官僚主義另有一面，這就是他所說的：我憎惡那些拿了鞭子專門鞭扑別人的人們。

在馮雪峯帶着瓦窰堡會議的决議，到上海見魯迅時，**左聯**的實際領導人周揚早已遵從了**八一宣言**，解散**左聯**，宣傳與國民黨合作抗日，倡導國防文學了。對於這種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魯迅祇能自認落伍；而且承認脾氣也的確愈來愈壞，眞的愈來愈看不起人了。馮雪峯認爲這些不過是牢騷，而周揚所犯的不過是宗派主義錯誤，這是曲說。他爲了政治利益，當托派給魯迅信時，的確在魯迅病中，影响他用生平最嫌惡的盧布說去誣衊托派，以此掩蓋魯迅對共產黨改變政治路線的反對意義。托派致魯迅的第二封信（**日記**：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得陳仲山信，托羅茨基派也。）迄今仍未發表，但第一次信中對於共產黨再度投降國民黨的批評，證明以後毛澤東與王明的長期鬥爭（通過「聯合戰線」與「獨立自主」之爭），最後更承認自己及黨爲不斷革命論者，則是非曲直之誰是誰非，已有歷史做見證，不必在此多說了。

魯迅從此不再與共產黨的文藝領導人爲伍，**左聯**既然解散，他不再加入以國防文學爲中心口號的任何文藝組織，他在遺言中斬釘截鐵地說：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他寫**半夏小集**罵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爲，寫**女吊**罵反對報復的人爲人面東西，可見他至死都是共產黨投降政策的反對者。

寫魯迅傳的人，說到魯迅這段鬥爭史時，都是無從下筆，含含糊糊過去的。因爲毛澤東雖然崇揚死了的魯迅，他却任用魯迅的死對頭周揚做他文藝政策的劊子手，以此淸算魯迅生前所愛護的靑年朋友，簡直無一能夠倖免。周揚倒台

後，魯迅的書信有若干部分解了禁，讓我們更淸楚了解當時鬥爭的眞相，但一定還有更多的信不能公開的，因爲他反對的不是個人，而是一般的政策。

魯迅死後， 周揚爲洗刷自己過去的錯誤， 在重新刊印**魯迅全集**時，對**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這篇著名的文章，加了如下的註解：

> 中國共產黨于1935年8月1日發表宣言，向國民黨政府、全國各黨各派和各界人民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到該年十二月更進一步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促進了當時的抗日高潮。在文藝界，宣傳和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也成為那時最中心的問題； 當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學界，于1939年春間即自動解散『左聯』，籌備成立『文藝家協會』，對于文學創作問題則有關于『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魯迅在本文以及他六月間發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中，表示了他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當時文學運動的態度和意見。
>
> 徐懋庸給魯迅寫那封信 ， 完全是他個人的錯誤行動，當時處于地下狀態的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文化界的組織事前並不知道。魯迅當時在病中，他的答覆是馮雪峯執筆擬稿的，他在這篇文章中對于當時領導『左聯』工作的一些黨員作家採取了宗派主義的態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實的指責。由于當時環境關係，魯迅在定稿時不可能對那些事實進行調查和對證。

由此可見，當周揚替天行道，炙手可熱時，是如何顚倒黑白， 僞造歷史， 誣衊魯迅！在共產黨嚴密的「文網」之下，許廣平周建人爲了自保，祇能默不出聲。魯迅的銅像巍巍然，可是一瞑之後，言行兩亡，黨官僚自然可以隨意利用

魯迅，閹割魯迅了！

魯迅就是這樣死於戰鬥中，死前他說：

我對敵人一個也不寬恕！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寫完

文學史家的僞造

中國歷次的政治鬥爭，在文藝鬥爭上都有集中的反映。代表中共文藝政策的周揚，即周起應，因在解放以前在上海的宗派主義領導，受到魯迅最澈底的攻擊，這鬥爭更似一條紅線，貫穿在反胡風反雪峯的運動中。佔據統治地位的黨官僚周揚，千方百計要抹去魯迅用鋒利的筆尖給他劃下來的肖像，唯有在打擊當年屬於魯迅門下的胡風和雪峯時，來間接證明魯迅本身的錯誤。

魯迅死了之後，共產黨把他捧成偶像（他自己倒是願意死掉拉倒的）。魯迅讓中共利用的地方固然多，但他對於共產黨宗派主義及過去實行階級合作政策所表示的抵抗（集中在他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口號及答徐懋庸的信中），却成爲中共御用文學史家的障碍，無法掩飾或調和魯迅和當時黨的文藝政策的矛盾。

在**文學研究**一九五八年一月號中，御用文學史家劉綬松提出了這樣的論據，他說當時魯迅病中受了胡風和雪峯的欺蒙，企圖以此改變當時爭論的眞實內容。可惜無論如何化盡力氣，總無法駁倒魯迅致徐懋庸信中的種種對人對事的論點。（在反胡風時，周揚即使應用特務手段證明胡風爲「內奸」，但仍是無法使讀者信服的。）

劉綬松說魯迅受欺蒙，是因爲他在病中。雪峯在「魯迅快要逝世的時候，利用他的黨員的身份來對魯迅進行蒙混和欺騙。」現在他爲了「保衛偉大的魯迅先生，也有必要把這

一樁歷史公案弄清楚。」

怎樣弄清楚呢？他說致徐懋庸信是「出自『共產黨員』馮雪峯的手筆」，「也幸而由馮雪峯代筆的這篇長文的原稿也還留在人間」，就可「對這次爭論得到一個比較正確公允的看法，而這事件的眞相也大白了。」

好一枝曲筆！不從反駁魯迅信中的論據去證明，而從這信是雪峯的「代筆」去證明——證明魯迅寫這信不是出於他自己的認識和意志，只是被雪峯的反黨活動所利用。這等於在泥塑的魯迅偶像上去鍍金，可是手藝太拙劣了，反而把泥塑底子暴露出來了。

原來他們如此舖張崇奉的魯迅，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鬥爭化身的晚年，竟然病得昏瞶胡塗了；原來這隻虎虎有生氣，至死也不肯饒恕敵人的大蟲，不過是一隻易受欺騙受人擺佈的死狗。

（劉綬松這個發明，在以後別人的文學史著作中，都已採用了作爲正式的史實。）

據**且介亭雜文末編**後記說，這本書是魯迅生前自己編的，致徐懋庸信當然在內。但在該後記中並未說及這信是馮雪峯代筆的。魯迅文章由馮雪峯代筆的有**答洛托斯基派的信**和**病中答訪問者**。魯迅全集印行了許多版，沒有人敢否認這封信不是魯迅自己的，只是在較後來的註釋中，把徐懋庸致魯迅的信說成是「徐懋庸個人的行動，而雪峯替魯迅擬稿採取了宗派主義態度」。劉綬松比這更進一步，說魯迅病中受了欺蒙，才如此顚倒了黑白。厚誣魯迅，孰有甚於此者！

不論怎樣說法，卽使以雪峯的原稿來作證，對於魯迅致徐懋庸信中的論據，從來沒有人敢於正面駁覆，甚至坐在中共宣傳部高位上的周揚也不能。在對付胡風和雪峯的鬥爭中，只證明魯迅之憎惡周揚確有先見之明，周揚終不過是一個「白衣秀士」王倫！

御用的文學史家不敢引用魯迅別的文字的，早在一九三

五年六月二十八日，魯迅致胡風的信中說：

> ……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中坐了……
>
> ……現在元帥和『懺悔者』們的聯絡加緊，（所以他們的話在我們裏面有大作用，）進攻的陣線正在展開，正不知何時才見晴朗……

一年之後，他在致徐懋庸信中說：

> 胡風先前我並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却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證據，則說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信！……

魯迅說：他是由於看事看人的結果，才下這個斷語的。魯迅已死，自不可能替被清算的胡風辯護了，可是他所寫的信，對於此後胡風的罪狀，却是永遠有力的辯護狀，並足以指控中共歷次文化寃獄的羅織罪狀之不實的。

此外魯迅生存的最後幾年中，在中共領導下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致胡風的信中也可想見的：

> 就是近幾年……一到裏面去，卽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却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

這裏所說的「元帥」、「工頭」，究竟是指誰呢？根據

劉綬松的文章，那時上海黨的文藝方面的領導人，是周揚卽周起應。雪峯在**回憶魯迅**中說魯迅那時有過「牢騷」和「憂鬱」，不是沒有根據的。幸而**魯迅書簡**中保有了這兩封信，正直無偏見的文學史家將來一定不會說魯迅曾受了欺蒙。

實際上， 不論周揚運用什麼部長的地位， 把胡風、雪峯、黃源、孟十還等魯迅生前所愛護的人加以如何打擊，或御用的文學史家劉綬松之流怎樣用曲筆玩弄文字，說魯迅如何受了欺蒙，說雪峯以自己的意見和文章，强使魯迅爲他利用，達其反黨目的，但有一條最確實的證據，使他們的千言萬語失去立足之點，那便是**魯迅日記**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所記的一句話：

夜治答徐懋庸文訖

僞造歷史， 厚誣前賢， 是史大林派在黨爭中慣用的手法，他們假借保衞魯迅之名，對文學宗派主義進行護短護私之實，只不過在魯迅的戰鬥精神照耀之下，暴露出他們的侏儒技倆而已。　　　　　　　　　（一九五八年四月）

魯迅詩的曲解　（一）

魯迅有兩句詩，現在給人廣泛引用的，是：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這的是好詩，和他的另一首詩「悼柔石」正可媲美，而且永遠可以寫進文學史去的。這兩首詩都表示出魯迅的戰鬥精神，讀了能使「懦夫立」的。

可是魯迅寫俯首甘為孺子牛時，他的感情只不過傾注在他的兒子海嬰的身上，這個興風狂嘯的戰士，也常常回眸時看小於菟的。這首詩題名自嘲，書贈柳亞子，而且附有款識：達夫賞飯，閒人打油，偷得半聯，湊成一律。魯迅時時以牛自況，對於文學家也說吃的是草，擠的是牛奶；他給李秉中的信裏說：只得加倍努力，為孺子牛耳。但他雖以牛自況，並不是光給人做工，而且老了還給人殺了吃的。他說：

譬如一匹瘦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之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貼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樣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

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若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裏。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為淺薄，從戰士化為畜生，嚇我以康有為，比我以梁啟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上當。

由此可見，近人把魯迅的俯首甘為孺子牛作廣義的解釋，認爲孺子是指人民大衆，魯迅甘為孺子牛，是願意爲人民大衆服務，即使不是曲解，也是一種穿鑿，或者只不過利用魯迅的話，來爲一種政策註解，或者甚至不過假借「人民大衆」名義，要人服從某種領導吧了。把魯迅的詩作廣義解釋的，始於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說：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裏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決不屈服。『孺子』在這裏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羣衆，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從此以後，這個解釋便成爲不可移易的正統的解釋。最近文化大革命當中，打倒了掌權十七年的魯迅所不齒的周揚，替魯迅反了個身，於是這兩句詩更爲每篇有關魯迅的文章所必引了。

但是我覺得如果把魯迅所說的孺子當作「人民大衆」來解釋，那是完全違反魯迅精神的，魯迅韌性的戰鬥，矛頭常常指向黑暗社會，但大半生他只是孤軍奮鬥的，在晚年他靠左了，但他首先遇到的元帥却正是現在的「反革命黑幫」周揚，這就使他一到裏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而且使他痛苦地感到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說，不得已時，就撒謊。

即使在這樣的苦境中，他還是幹，今天要給文學做論壇，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替狀元捧場，一面又要顧

及第三種人，不能示弱，此所謂『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也。（以上引文均見致胡風信）

魯迅也許明白革命是「人民大衆」的革命，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衆」 的革命， 但他一定不明白共產黨領導之中，有王明的領導，也有毛澤東的領導，抗戰時期，這兩種領導之間的矛盾，常常表面化的，但魯迅死前，卽使有馮雪峯從瓦窰堡帶來的指示，他對於兩個口號之間的鬥爭，還是由於他一生對黑暗勢力鬥爭的經驗而來，而不是基於一個革命政黨的策畧改變。 他在「致徐懋庸信」 以後所寫的**女吊**中，說得很明白，被壓迫者卽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閒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 —— 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 。 「右傾機會主義者」王明及其追隨者周揚（何止他一個人？）是否宣揚過勿念舊惡的格言，這主要得求之於當時史大林的世界政策。希特拉上台以後，他廣泛推行**統一戰線**，**人民陣線**，出賣了西班牙革命，也幾乎出賣了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那麼，**勿念舊惡**的是史大林，中國共產黨以及王明和周揚，不過奉行史大林的世界政策罷了。魯迅的文章中很少用「人民大衆」字樣（自然他用過大衆文學，大衆語字樣），至於用孺子來代替人民大衆，我相信魯迅絕對沒有這種想法，因爲把人民大衆看做孺子，「孺子可教也」的孺子，孟子說的「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的孺子，這只是毛澤東的想法，他是紅太陽，普照萬方，普照子民的。這和國民黨訓政一樣，把四萬萬人民看做劉阿斗，才能讓他們做諸葛亮。毛澤東也祇有把人民大衆看做孺子，他才能做偉大的導師， 偉大的領袖， 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一九六六，一二，二二）

魯迅詩的曲解　（二）

——「我的失戀」——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魯迅寫了一首擬古的打油詩——**我的失戀**，因爲排版後給晨報總編輯劉勉己抽掉了，副刊編輯孫伏園氣得辭了職。據魯迅後來的解釋，他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呀，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現在有人解釋這是魯迅「對於當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創作潮流，施予尖銳的嘲諷。」寫「阿呀阿呀，我要死了」的詩的人，當然屬於小資產階級，但魯迅可並沒有分明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諷刺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詩，這是解釋魯迅詩的作者硬派給魯迅的「階級意識」。他似乎不知道，或者故意不知道魯迅之獲得「階級意識」，乃是一九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之後的事，而且也不是一天獲得的，還得經過當時所謂「革命文學家」圍剿之後，「擠」他「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這才獲得的。直到一九三二年，他在**二心集**的序言裏才這麼說：

>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裏，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凶的，倒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了

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 ， 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於現狀』了，並且仿『三閑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然而這並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

魯迅的自白比之那種八股的機械的階級分析論者，使我們更易了解他思想的變遷之跡，要解釋魯迅思想的發展，一定要了解他所處的環境與時代，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到一九二二年止，他雖然參加**新青年**，作了小說和雜感，自說顯示了『革命文學』的實績，頗激動了一部份青年讀者的心，也止於吶喊而已；一九二四年以前，**新青年**的主將已從議論進於實踐，但魯迅却減少了熱情，自覺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了；一九二五年底，他作**華蓋集**題記，說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所以他在一九二四年寫**我的失戀**那樣的諷刺詩，與此後和章士釗及正人君子的論爭相比，不過是開開玩笑吧了，眞稱不得大陣仗！如果要在這裏去找「階級意識」，那麼魯迅說得好：大凡作家一旦向左，則舊作也即飛昇，連他孩子時代的啼哭也合乎革命文學之概……了。對於這種恭維，魯迅一定「敬謝不敏」的。

魯迅詩的曲解　（三）

——「自題小像」——

魯迅的舊詩，和毛澤東的詞，在舊文學中自然是了不起的作品，最主要他們都是言之有物，但誠如毛澤東所說，如果當作倡導一種文學形式來說，那麼怕會是「謬種流傳」了，因爲沒有「寒窗十年」的功夫，誰也做不出舊詩詞來的。時代距離得太遠了，即使舊詞章也能表現得新思想，毛澤東也未必把他的指令寫在他的詩詞裏，詩詞總是表達個人感情的。

魯迅年青時候的詩，意境都很平凡，直到二十一歲時，他寫的詩才脫出了因襲的窠臼，有他自己的感情，這首詩就是**自題小像**（這題目一定不是原有的，而是人家給他安上去的）。

二十一歲是一九〇一年，這年他在南京路礦學堂畢業了，他已接觸到新思想，第二年就去日本留學了。奇怪的是，從曹聚仁起，到做**魯迅詩新解**的那位先生止，都派這首詩是魯迅一九〇三年所作，因爲他那年寫這首詩在小照上送給許季茀。實則魯迅另有手寫的這首詩稿，明明寫着「二十一歲時作五十一歲時寫時辛未二月十六日也」，爲什麼到五十一歲時再寫這首詩，我想也許和柔石等被捕殺有關，他身處危境，想起當年自勉自誓的句子，覺得「此志不渝」吧，這首詩是：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闇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因爲每個人都把這首詩安排在一九〇三年（作**魯迅舊詩箋注**的張向天則推定爲「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魯迅先生二十一歲生辰之後，述志抒懷之作。」），所以引起了**新解**作者如下的議論：「魯迅是一九〇二年四月到東京留學的。當時中國正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卽舊民主主義時期……章炳麟、蔡元培等在日本創立了**光復會**……魯迅……參加了一些革命活動，形成了民族革命的思想。一九〇三年他毅然決然地剪去了象徵滿淸統治的辮子以後，照了一幀小照送給朋友許壽裳，並寫了這首詩，滿懷着熱愛祖國的激情，遙對着處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黑暗統治下的祖國，感慨祖國同胞的還沒有覺悟，立下了獻身於民族革命的誓言。」

這種解釋包含了幾重錯誤，**光復會**創立於一九〇四年的上海，發起人爲蔡元培與龔寶銓，那時章炳麟尚在獄中，他的加入**光復會**，大約是去了日本以後的事。他一到日本便主持當時革命刊物**民報**（八月出版的第六號，卽章所編）；魯迅受教章氏之門，則是一九〇八年的事。魯迅雖認識許多革命者，他自己當時有否加入**光復會**，從未形諸筆墨，所以他死後引起爭論，各執一詞。他學醫，從事文學，目的在改良社會，並不爲獻身於民族革命運動，他不是有行動的革命黨人，這都有魯迅本人的文字可稽的。解詩的人如果預先安排魯迅是個革命家，然後給他戴上這頂紙糊冠，那就永遠不會符合歷史的眞實，可是人們最喜歡做這種魯迅生前痛惡的事！

魯迅逝世前的一封信

魯迅死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廿五分，在四個月之前，即六月五日的**日記**上，他記有下列文字：

自此以後，日漸萎頓，終至艱於起坐，遂不復記。其間一時頗虞奄忽，但竟漸愈，稍能坐立誦讀，至今則可畧作數十字矣。但日記是否以明日始，則近頗懶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熱時記。

以後魯迅仍記日記，自七月一日至九月十七日。其中七月七日**日記**云：

得陳仲山信，托羅茨基派也。

這是陳仲山給他的第二次信。第一次是六月三日寫的，在日記上無記載，因爲魯迅接到這信一定在六月五日之後，他已因病不能記**日記**了。他的回信寫於六月九日，O・V筆錄。這封信曾廣泛爲共產黨所利用，發表時用××代陳仲山名字。陳仲山當然不是眞名字， 他的眞名是陳其昌， 河南人，曾是北大教育學系的學生，加入了共產黨，積極工作。他那時非常崇拜魯迅，後來他變爲托派，在魯迅與上海共產黨文藝領導人發生齟齬時，他以爲魯迅政治上改變了，對他有了幻想，便寫信寄刋物給他，不知他此時已在病中。當時稱得上他入室弟子的，便是從瓦窰堡會議後回到上海的馮雪峯。陳其昌和馮雪峯、張光人（胡風）、趙平復（柔石）等人那時期都在北京（按：當時稱北平），但陳其昌不認識他

們，他們只是從事文學的青年，還不是共產黨員，陳其昌是共產黨員，可是與文學無緣。

馮雪峯代魯迅筆錄的覆信，當然有他對魯迅一定的影响。因爲覆信中主要的二點：可認爲當時共產黨反托的公式，都與魯迅平日爲人不符的：（一）他以成敗論人，因為史大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説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麼？……魯迅常從歷史反面論斷人物，這種勢利觀點，非他所有；（二）魯迅深惡「盧布說」的，現在反過來用「盧布說」誣衊托派，且以之誣托洛次基本人，這只是共產黨人誣衊托派的末技。後來王明發明了「陳獨秀接受日本人每月三百元津貼」之說，引起陳獨秀的朋友、學生和許多人的憤慨，發起保陳運動，就是實例。魯迅平日對於此類謠言，本來排斥不遺餘力。魯迅病中病後是否看了陳仲山寄去的刊物，我們無法知道，除掉這封信外，他在第二天也由O．V筆錄的**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中，也帶上一句托派，他以後自己寫的文章中再沒有提到陳仲山和托派了。他在八月三至六日寫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提到托派，那是他反對共產黨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之不當的。我們知道，魯迅不是一個政治家，不是共產黨，他臨死前最親密的朋友和戰友，是馮雪峯和胡風二人，他們都是共產黨員，我們從魯迅對胡風的批評，知道胡風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衆化……可見他和魯迅是有若干距離的，不似雪峯那樣是魯迅家中的親密的常客。魯迅胡風和雪峯都是共產黨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的反對派，因此是共產黨文藝領導人的眼中釘。他們誣衊胡風爲「內奸」，所以魯迅爲胡風辯護。雪峯則是共產黨和魯迅之間的橋樑，他兩方面關係都好，四條漢子攻擊

胡風爲「內奸」，爲「托派」，矛頭從不曾針對雪峯，他們甚至誤認O・V爲胡風，可見儘管魯迅如何誣衊托派，也不爲周揚輩所諒解，因爲直接罵胡風，也就間接罵魯迅，獲得魯迅病後不得不親手奮力還擊。

魯迅在病中，當時轉向了的紀德正在第二次轉向，他訪問蘇聯後，公開了他對蘇聯的觀感，他批評史大林的個人崇拜，指出所謂托派只不過是一種批評精神。書一出版，一夜之間，他從「蘇聯友人」變爲「法西斯走狗」。魯迅很重視紀德（在他的書單中，最後買的一本書是紀德的**新糧**）。這件事大大震動了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朋友，共產黨開動了他們所有全世界的宣傳機關，無所不用其極的漫罵紀德。他的書**從蘇聯歸來**，則爲人爭着譯出，上海立刻出了三個譯本，魯迅對此不則一聲 。 據樓適夷後來對我說：魯迅曾對人表示，如果他到了蘇聯，眼見紀德所見到的那種情形，他也會和紀德一樣說出來的。當時魯迅在病中，有人勸他到蘇聯休養，他拒絕了。

這是眞正的魯迅，具有紀德同樣精神的魯迅。所以我說O・V筆錄的魯迅致托派的信，違反魯迅平素爲人之道，這只是政治鬥爭中的一次小手段， 利用「造謠誣衊」的小手段。陳仲山看到了魯迅的信，大爲痛苦，因爲他寫這信出於個人對魯迅的敬仰，以爲一向硬骨頭的魯迅，一定會爲共產黨對國民黨的第二次投降，脫離共產黨影响的。魯迅和共產黨正在發生齟齬，二個口號之爭從暗地裏引起很大風波，公開出來已是以後的事了， 魯迅也許和胡風一樣被罵爲「托派」，現在忽然有個眞正的托派寫信寄刊物給他，很可能他要藉機會給反對他的人一個反擊， 先洗淸人家給他的「誣衊」，就不得不用「誣衊」的手段來罵托派，以後共產黨就利用他的信作爲反對托派的工具，可是因爲魯迅發表時附了陳仲山的原信，往後的歷史發展，愈益證明陳仲山所說的正

確。至於當時代表了王明路線的周揚，以及代表了史大林路線的王明，以後都和魯迅的門下弟子——胡風、馮雪峯等一樣，被鬥倒鬥臭了。

陳仲山給魯迅的第二封信，沒有得到答覆，自然也沒有發表。托派的領導人陳獨秀當時尚在國民黨的南京獄中，他知道了這事大發雷霆，他認爲魯迅之對於共產黨，無異吳稚暉之對於國民黨，我記得他在信上甚至用了「紅色老狗」字樣。陳獨秀的話也許有感情用事的成分，我總覺得魯迅對於當時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投降政策，是反對甚力的，他不從政治上或理論上反對，而從他一生的經驗上反對，在女吊的結尾，他說：……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沒有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閑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所謂人面東西，魯迅指的不可能是國民黨蔣介石，他們沒有用這種格言去招降納叛，而是史大林所操縱的中國共產黨，正從「左傾機會主義」退向「聯合戰線」，企圖對國民黨進行第二次階級合作，才用犯而不校，勿念舊惡的格言去說服國民黨壓迫下的革命者的。魯迅沉痛地寫出這幾句話時，是否想到這點，或竟無意中同意了托派陳仲山的話呢，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確知他是至死反對國民黨的，他在遺囑中說：他對敵人一個也不寬恕！

陳仲山（其昌）於一九四二年因抗日工作在上海被日本憲兵所捕，據後來一個不知名的同時被囚的人對他太太講述，仲山被捕後受刑慘酷，一星期伏在木板床上不能動彈，有一天拉出去後再沒有回來。對於共產黨借魯迅之筆誣衊托派的話，陳仲山以生命給予了最好的答覆。

雜談魯迅和他的日記

最近國內外的文壇上，正大談魯迅，談魯迅有捧有貶，捧的不必說，彷彿他生前是一個毛澤東思想的實行者，是百分之百的共產黨之中最忠實於毛澤東的人，忘記了他生前反對周揚正因爲周揚是正統的共產黨第二次聯合國民黨政策的執行人之一，魯迅死後二年，毛澤東正寫着**論新階段**，肯定「國民黨有光明的前途，它能夠繼續抗戰，繼續進步……」可見那時毛澤東與王明之流奉行的都是史大林在生前決定的「聯合戰線」政策。魯迅只是根據他對革命的觀察與經驗，深惡痛絕那些人面東西，他們是……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閑，這種幫閑的工作，在乎勸誘別人犯而勿校，勿念舊惡，以此去出賣革命。

毛澤東與王明的政策分歧 ， 一個在乎抗日戰爭中保持「獨立自主」，一個則主張「一切經過聯合戰線」，毛澤東到六中全會結束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才確定地提出這個立場，精神上才算和魯迅早已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相符合，這口號包括有嚴格的階級意識，而「國防文學」口號只是王明的「一切經過聯合戰線」政策在文學上的應用，牠的實質是投降主義。

那麼魯迅確有政治上先見之明麼 ？ 他不可能見得那麼遠，也無從了解共產黨中毛澤東和王明之間有什麼不同。他所反對的周揚，以後一直是毛澤東在文藝方面的劊子手，要到一九六七年他才算倒了台。魯迅死後，他和周揚的爭論早

已成爲歷史的陳蹟了。

何況，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基本精神上是反對魯迅作風的。

今天魯迅之忽然行運，只是毛澤東利用其爭論打擊新敵人，和魯迅全無關係。

但相反，有一部分人則從魯迅的**日記**上，證明魯迅在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戰爭時，托庇日人，有不可告人之處，像老吏斷獄，深文周納，甚至以魯迅後來寫的一篇文章**我要騙人**爲證，證明魯迅在**日記**上早已騙了人，這種論據，眞是別有用心的。

魯迅的**日記**，本來不是爲死後發表而寫的，所以他記的都是零星事項，爲自己備忘之用，他在**日記**中有時流露出好惡的感情，但絕對不記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都在所寫的雜文中，完全與人以共見，我們今天看重他的**日記**，正因爲他在**日記**中毫不僞飾，從他的**日記**中更可見他是和我們一樣的平凡，有時簡直和我們一樣的庸俗，他在雜文中那種劍拔弩張的鬥志不見了，他罵人是狗，在孔廟中陪祭，和孩子上屋頂放爆竹，給母親買才子佳人的小說，爲稿費請律師，幫朋友的兒女找醫生，如果把他失記補記的**日記**，認爲是他自己或別人有意作僞，那麽作此種論證的人，他一定是富有機心的人，我讀這種論證時，常常爲之悚然的。

紀德是非常內省的人，讀他的日記正如讀他任何一本小說，那種剝繭抽絲一樣對思想感情的解剖，使人覺得他具有的一片至誠，引導人去重走他已走過的人生歷程，托洛次基只當他沒有機會讓他發表文章時，才把他的鬥爭思想傾瀉在日記裏。他們的日記生前都親自發表了，這和魯迅的**日記**不同，如果魯迅生前有習慣記零用賬目，死後給人發表了，我們也一樣歡迎的，因爲這可以供給後人查考當時的物價和生活程度。**魯迅日記**並不是自願發表的，用不着在當時預先作

僞，至於說有所不記的事就是他內疚神明的事，那是可笑的「莫須有」，你儘可以說魯迅是日本侵畧中國的「內奸」，祇因爲他和日本人做朋友，在日本雜誌上做文章，不必說他在日記上沒有記上許多不可告人的事。

魯迅在一·二八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在上海發動了戰爭，這是從上一年九月十八日進攻瀋陽，席捲東北所發生的一次測探性的戰爭，國民黨正在抱定「攘外必先安內」的宗旨，把剿共看得比抗日更重要，但出乎日本和國民黨當局的預料，駐防上海的十九路軍竟不願做亡國奴，出力抵抗，戰事遷延到三月才停止，日本軍知道併吞全中國的時機尚早，仍回頭先去經營東北和華北了。

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和閘北的民衆，在戰事將起的時候，倉皇逃難，狼狽不堪，租界人滿爲患，也有無法逃走的，仍在戰火下討生活，住在北四川路一帶的小部分人就是如此，閘北則已十室九空了。

魯迅是住在北四川路底的，與日本軍司令部相近，我想他之不逃，不是不願逃，也許估計戰爭暫時不會發生，因爲九一八以來，南京的國民黨政府並不準備抵抗。

從魯迅的**日記**看，他過的日常生活很從容安閒，寫信、贈詩、買書、帶孩子看病，直至二十八日，他才覺得**附近頗紛擾**，二十九日，他才覺得遇戰事，終日在槍礮聲中了；三十日下午，他才全寓中人俱遷避內山書店，只携衣被數事；內山書店和他住處不遠，但托庇內山，不是爲的避免戰禍，因爲內山書店和他住處一樣不安全，我想理由應該避免日本軍的騷擾。

在這樣的情形中，從二月一日至五日的**日記**失記，是可以想見的，魯迅也是會和平常人一樣，在倉皇逃避中弄得心神不安的，很難說他的失記是做了什麼「不可告人的事」。

但從六日起直至三月十九日他仍記**日記**的，大概因爲臨時記在身邊的小本子上，所以十九的**日記**上說：夜補寫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記，這是一本固定的**日記**本。

二月六日是陰曆元旦，他又在下午全寓中人俱遷避英租界內山書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這才眞正脫離了戰火。於是他又恢復了日常生活 ， 討版稅、飲酒、買書、胃痛、看朋友，甚至因爲飲醉了酒，居然到四馬路靑蓮閣去飮茶，化了一元邀一妓略來坐。

如果不爲了海嬰生疹子，他急急和建人去找旅館，一定會席地而卧直到戰事停了回家爲止。他全寓十人在三月十三日移住到「大江南飯店」，至十九日海嬰疹已全退，上午遂俱回舊寓，逃難生活才告了段落。

魯迅所說的全寓十人，應該帶同建人一家。

魯迅以後給朋友寫信，說到逃難的有詳有畧，私人通問和打報告不同，尤其是並不準備在死後搜集了來發表的，發表**魯迅日記**和**魯迅書簡**，與魯迅生前寫日記寫信的本意毫不相干，魯迅書簡未發表的數量之多，一定超過現已印行的幾十倍，如果說他在一二八前後的生活行動有不可告人之事，需要在**日記**上或**書簡**上作僞，那麼只有早就判定他和日本人有默契做「漢奸」，而日本人不論內山或山本實彥，不是間諜就是軍國主義走狗的人，才會如此用心在他的**日記**和**書簡**上找證據，以證明對他的定讞之不誣。可是這種證據是不能折服人的，因爲失記日記並不能構成罪狀，對朋友通信有詳有畧，更難說是隱瞞罪狀。

作此種想法的人，和自命左傾無微不至捧魯迅者的所失一樣，那都是出於忮心，他們愛給魯迅戴上一頂他生前痛惡的高帽子，這頂高帽子一面寫的是「革命家」，一面寫的是

「漢奸」。

但魯迅對於一二八戰事以及日本侵畧中國的看法又如何呢？要了解這一點，必須先了解當時的政治關係。經歷過辛亥革命和一九二七年淸黨的他，他自命爲本階級的「携貳分子」。他不是共產黨員，但受共產黨的政治影响。國民黨對日本侵畧採取不抵抗政策，因爲中國正處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他們的第三次圍剿失敗了。共產黨雖然通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要求聯合抗日，但第三國際的世界政策仍是「第三時期」，在中國則是建立蘇維埃政權。這是從瞿秋白盲動主義——立三路線——過渡到「左傾機會主義」的王明時期，這時期要到一九三五年七月第三國際七次大會才算結束，以後全世界進入「人民陣線」時期，在中國則爲「統一戰線」時期。魯迅對一・二八的態度，一方面是共產黨政治態度的反映，一方面則是他自己對統治階級一貫的認識，他不相信國民黨政府能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進攻。他對國民黨不斷殘殺愛國青年的反動行爲，用文字力予鞭撻，對「民族主義文學」的鬥爭就是一端， 但即使在共產黨進行 「統一戰線」之後，他也再三提出警告：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魯迅說了這話以後，不久就逝世了。

事後證明 ， 魯迅的話是符合共產黨裏面毛澤東一系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他們主張「獨立自主」；而代表史大林的王明一系，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魯迅的認識和當時他所提出的文學口號有關，這口號却和毛澤東與王明後來的分歧無關。他們的分歧，要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才發生，那時毛澤東寫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公開與王明對立。文學上的兩個口號之爭，以後時時在新的政治鬥爭中提出來，彷彿魯迅當年早已是「毛澤東思想」的

擁護者，這是神話。馮雪峯傳給魯迅聽的瓦窰堡會議的報告和決議，只是毛澤東和王明一致奉行的第三國際七次大會決定改變的政策，那時尙未發明「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

歷史的發展往往受統治者所利用，被加以歪曲的解釋，我們從共產黨的政治鬥爭中，已懂得很清楚了；個人的歷史發展亦然，「一貫正確」的毛澤東對魯迅作品和爲人的解釋，就是閹割了或誇張了魯迅的。

可是，今天忽然有人起來從反面「醜化」魯迅了，說魯迅「有不可告人之事」，那也一樣是「神話」！

「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雜憶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藝術大學開成立大會，我和李白英、蔣衡、宋易四個人去旁聽，我們不是作家，但在當時的一部分作家的眼中，我們却是「異端」分子，所以我們一露面，本來相熟的馮雪峯，就非常緊張地跑過來，我笑着對他說：「我們只想來旁聽，並無別意。」他去商量了一下，准許我們坐在後面。魯迅演講之前，有幾個人演講，現在都記不起來。只是潘漢年演講的姿勢，到今天還靈活地現在眼前。他是模仿列寧的，有許多列寧演講的照片，當時登在雜誌上，那是身子向前傾，右手向上直指出去的姿勢。潘漢年演說的大意是：「紅軍正在盛大發展，誰說現在不是革命高潮到來了？」他的話是有所指的，因爲當時莫斯科對於中國革命的史托之爭，已因幾個俄國留學生中的托派分子回到中國，在黨內引起了爭論。我們幾個人對這種爭論正在研究中，但已被視爲「異端」。

我見到潘漢年，很覺奇怪，大約一年之前吧，我曾和適夷到過他的家。他和葉靈鳳這二個創造社的小夥計，正住在霞飛路上一家臨街的洋樓，他們的住家有個名稱，叫「聽車樓」，他們自稱「聽車樓主」，落地的玻璃長窗，用粉紅色的絲綢做幔，兩隻寫字枱對角擺着，這聽車樓主之一的葉靈鳳正在寫文章罵魯迅，**用十二個銅子從舊貨攤上買來的一册吶喊撕下三頁到露台上去大便**。至於潘漢年，魯迅不久之前

稱之爲也是青年革命藝術家的，忽然變成黨的領導人，在公共集會上代表正式的黨致「訓詞」了，怎不叫人驚異？

不久，輪到魯迅上台了，他說的是不疾不徐，深沉有力的紹興官話，說不上三句，當說到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這句話時，滿堂一下子爆發了哄堂的笑聲，爲什麼這句說來相當沉痛的話，在別人聽來是那樣可笑？我去旁聽之前，遇到「詩人」徐遲正和我的一個朋友在路旁談天，，朋友問他參不參加**左翼作家聯盟**？他頗自信地回答，「當然去參加，難道還會右傾的？」對於這樣天然的左傾分子，我很是懷疑，現在聽到魯迅一說，我覺得好像一支利箭射中了那種天然的左傾分子的心，但結果不過引起一場哄笑罷了。

以後魯迅在演講途中，還多次引起哄笑，現在重新讀他的演詞，他的眞知灼見，確是照見了此後許多左翼作家的前途。尤其是那一位模仿列寧姿勢的潘漢年先生，在魯迅全集的註釋中是被稱爲墮落為反革命份子的。我長久懷疑，當一九四九年末，他在香港的地下黨中，是多麼炙手可熱，不必說，他是預定的上海市長，而新民主主義正在向所有由上海逃港的資本家招降，我親見許多資本家鑽洞覓縫地要和潘漢年見上一面，見面之後，頗有「相公厚我厚我」的滋味。後來，潘漢年果眞做了上海市副市長，但不久，便跌下了台，和饒漱石一同長期關在監獄裏了。我無法知道他的罪名，最後還是問了曹聚仁兄才知端的，據說，還在汪精衞時代，他潛伏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曾偸偸去過一次南京，解放後中共查到了眞憑實據，他就被捕入獄，可是始終沒有宣佈罪名，他的被捕雖和高饒同時，却與高饒無關。

魯迅的演講一完，馮雪峯便走來要我們退席，說現在要進行決議了，我們自然遵命。記得走出大門時，風日正麗，我們精神上非常愉快。

魯迅在**左翼作家聯盟**演說之後，直至一九三二年十月二

十五日，他寫了連環圖畫辯護一文時，對於這種「哄笑」，才表示了公開的不滿，他說：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小小的經驗。有一天，在一處筵席上，我隨便的說：用活動電影來教學生，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埋葬在一陣哄笑裏了。

他又說：然而許多人的隨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筆，它能夠將粉塗在對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話好像小丑的打諢。這眞是慨乎言之了！

魯迅說的雖然是另一個小小的經驗，但我相信他的經驗一定是很多的，而那次左翼作家成立大會上的「哄笑」聲，在他經過幾年「圍剿」之後，對他一定有更深的影响，決不會輕輕過去。

魯迅加入左聯之後的戰績，有他七八本的雜感集在，我們不必細說。只是他逐漸和左聯對立起來了，不是和左聯的成員對立， 是和左聯的領導者對立， 左聯的成員一部分死了，一部分正如他所說的，變成了右翼分子，連他作詩悼念的丁君（丁玲），後來也證明政府在養他，他的落寞可知，但這是後話，我們在另一篇文章中再談。

再談魯迅在一·二八

要了解魯迅在一·二八對抗戰的態度，必須了解日本侵華當時的政治環境，近日讀故友曹聚仁兄的**我與我的世界**，其中有云：

……本來，抗日戰爭的謠傳，從『九一八』以後，就時起時伏，到了第二年一月中旬，更是飛飛揚揚；但在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已經完全接受了日方所提出的幾個條件，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也已封閉了，顯然不作抵抗的打算了。那時，洪逵兄，兼任吳市長的秘書，他的家正住在新木橋頭的東邊，該屬於消息靈通方面，連他們都不搬家，我們更不必驚惶了。那位住在梁家花園的徐名鴻兄，他是十九路軍的秘書長，他聽了全面屈服的消息，氣得上床睡覺去了。……

曹聚仁兄的話，證明了魯迅倉皇逃難的情景，又證明十九路軍的抗日，違反了國民黨最高當局的本意，我們更從史乘上摘錄有關九·一八以及一·二八前後內憂外患，政治變化及民衆抗日運動的形勢，和魯迅對這個運動的反應。

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討伐閻、馮，中原大戰。

一月六日：與日本訂立關稅協定，日本享受最惠國待遇。

二月：魯迅加入自由大同盟。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反動文人——魯迅。

三月：魯迅加入**左聯**。

四月：郵局扣留左翼刊物──**萌芽**。

七月：紅軍進攻長沙。

十月：中原大戰結束，馮玉祥失敗。

十一月：開始對紅軍第一次圍剿。

十二月：國民黨軍剿共前敵總指揮張輝瓚被殺，第一次圍剿失敗。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柔石等五名文學家被捕，魯迅被牽涉。

一月三十一日：南京政府頒布「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

二月七日：柔石等被殺（同案三十五人，被殺二十四人，由何孟雄領導，反對王明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篡奪黨的領導，共產黨史上稱爲「右傾調和主義」），魯迅賦詩悼之：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三月：進行第二次圍剿。

五月：圍剿失敗。

六月：進行第三次圍剿。

九月十八日：日軍佔領瀋陽，席捲東北。

二十三日：蔣介石對南京市黨員大會演說，「此時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强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聯公理之判決。」

同日發表「告全國軍民書」：「現在政府旣以此案訴之國聯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

二十四日：上海學生罷課，三萬五千碼頭工人反日罷工。

二十六日：上海反日大示威。

二十八日：京滬學生去京請願。七千餘學生押回上海。

十月十日：廣州學生反日示威，軍警開槍，被殺十餘人。

二十三日：魯迅發表「**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十一月七日：瑞金召開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號召「抗日」。

十四日：中國與日本爲天津事件締結協定，向日道歉，取締反日言論，撤防禦工事。

三十日：蔣介石發表演說：「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

十二月十七日：到京請願學生，在珍珠橋被殺三十餘人，傷百餘人，國民黨謂爲「自行失足落水」。

二十五日：魯迅發表**友邦驚詫論**。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魯迅發表**答中學生問**。

一•二八事件發生，十九路軍抗敵。

三月二日：日軍瀏河登陸，十九路軍撤退（五月調閩剿共）。

九日：滿州國成立。

六月十八日：魯迅答台靜農信，論抗日運動：「抗得輕浮，殺得切實。」

一九三三年一月：開始第四次圍剿。魯迅參加**民權保障同盟**。

二月：日軍進攻熱河。

十一日：魯迅發表**論**「**赴難**」**和**「**逃難**」。

五月：與日軍訂立「塘沽協定」。

六月二日：楊銓被殺。魯迅臨弔，並作詩悼之：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十月：開始第五次圍剿。

魯迅寫九一八一文，無處發表。

十一月：十九路軍發生「閩變」。

一九三四年二月：國民黨提倡「新生活運動」。

五月十五日：魯迅致楊霽雲信，有云：漢奸頭銜，是早有人送過我的，大約七八年前，愛羅先珂君從中國到德國，說了些中國的黑暗，北洋軍閥的黑暗。那時上海報上就有一篇文章，說是他之宣傳，受之於我，而我則因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給日本人出力云云。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這一套，叭兒們何嘗知道什麼是民族主義，又何嘗想到民族，……其實，假使我真做了漢奸，則牠們的主子就要來握手，牠們還敢開口嗎？

十一月十三日：史量才被殺。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領導。

六月四日：與日軍訂立「何梅協定」，華北特殊化。

十一月：紅軍抵達陝北，長征結束。

…………

我們的「大事記」到此爲止。以後國民黨「抗戰」了，在武漢尚未淪陷前，表面上抗戰也似乎有聲有色，共產黨和國民黨「共赴國難」。但據郭沫若說：當時有人作這樣的解釋，這是『共產黨在赴國民黨之難』。而且他們自己都認爲做了傀儡的傀儡。即使到了重慶，蔣介石仍未忘情和談，通過德國大使陶德曼試探與日本講和。

一・二八前後，魯迅是無法擁護「抗戰」的，要抗戰，先須打倒國民黨；在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沒有第二條道路。

但是地火在地下運行，「抗戰」畢竟實現了，經過短短幾年的「勝利陶醉」之後，國民黨又畢竟埋葬了自己（刧收，對共軍事失敗，經濟崩潰）。

魯迅之被視爲「漢奸」，在當時是必然的，因爲對於國民黨來說，他是「異端」；以後共產黨襲用故技，把「漢奸」的頭銜給了托派和陳獨秀，這也不足爲奇的，因爲對於共產黨說來，托派和陳獨秀也是「異端」。誠如魯迅慨乎言之的，這是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的老法子。但想不到魯迅死了三十八年之後，還有人罵他是「漢奸」，那就未免出奇了。

魯迅與毛澤東

以「野百合花」出名的王實味，他是北大學生，胡風的同班同學。他與魯迅的關係不如後來胡風與雪峯等人之深，但和魯迅的交往則早於他們。他是共產黨員，後來又成爲托派，和寫信給魯迅的托派陳其昌交誼甚厚，陳其昌在同志中被親暱地稱爲「大哥」，對這個小弟弟是盡情招拂的。王實味性情耿介，不通世故。在上海時期（一九三〇年前後）生活窮困潦倒，後來得徐志摩介紹，替中華書局譯了幾部長篇文學名著。

三〇年代的文學青年，大多受魯迅精神的感召和影响，所謂魯迅精神：反抗黑暗、蔑視權威、 批評傳統、 同情弱小。後來因時代的推移，魯迅精神的思想基礎移行到馬克思主義，所以牠和社會主義革命思想合流了。

而堅實的年青一代，他們思想上的改變是早於魯迅的，又勇於實踐，他們加入了共產黨，甚至變爲托派，魯迅則至死仍不過是一個「同路人」。

魯迅死得早，正當他的左傾作用發揮到頂點的時候，他死了，他死之前，對於以周揚爲代表的共產黨內的宗派主義表示了厭惡，這厭惡對共產黨可能發生負的作用，但因有助於黨內以後的政治鬥爭，所以魯迅始終被認爲是一個前進的完整的文化戰士。

毛澤東在一九四〇年，便是這樣稱頌魯迅的：

魯迅是中國文化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

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也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澤東說得很正確，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卽相隔二年，當王實味寫了「野百合花」被圍剿時，毛澤東對魯迅的看法不同了。

「野百合花」本身實在不足以構成這樣的大事件，但因爲王實味代表了一種傾向，所以才造成中共治下的第一次文字大獄，這種傾向就是魯迅精神。後來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也不提王實味，而直接攻擊魯迅精神。

爲什麼被毛澤東稱頌的「硬骨頭」，和毛澤東所代表的共產黨竟發生了矛盾呢？這得從毛澤東當時已取得一尊地位來說明，這種一尊地位需要造成以神化領袖爲象徵的官僚極權制度，而魯迅精神却以反權威、反壓制、重批評、倡民主爲內容，兩者之間是絕不相容的，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首當其衝，就不得不被全力加以撲滅了。

毛澤東在談話中反對人性論，人類愛，反對文藝作品寫光明與黑暗並重，反對暴露；他認爲在延安，雜文時代已經過去，魯迅筆法已不需要，刻劃無產階級「黑暗」的作品必定渺小，應該歌頌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不然，便是「對人民事業並無熱情，對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抱着冷眼旁觀的態度——」這種人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必須加以消滅的。

談話發表之後，中共的文藝政策有了確定的路向，主持這個路向的，便是拉大旗作爲虎皮， 包着自己， 以嚇唬別人，定人罪名的周揚一流人，以後曾經爲魯迅所保護，多少保持着魯迅精神的胡風、雪峯、巴人，甚至蕭軍、丁玲、黃

源等人，無一不爲王實味之續，在飽受折磨、清算、凌辱之餘，在文壇上逐一消失。

談話以後一年，便產生了「東方紅」那樣民歌體的頌詞，表示「天命有歸」了。

共產黨是容不得魯迅那樣的人的，他不相信未來的黃金世界，又認爲一個不落伍的改革者，對於時代環境應該是始終抱着不滿的。那麼受過魯迅精神薰陶的人，卽使在「黃金世界」中，也一定會成爲「叛徒」。他說過：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是黃金世界的事……數十年來蘇聯和中國的歷史發展，證實了魯迅這樣的預言。

但是今天歌頌魯迅的人，就不會懂得魯迅精神的所在，而且也不會懂得毛澤東當年閹割魯迅眞精神的所在，毛澤東稱讚魯迅的「硬骨頭」，但他的政制必須折斷文藝家的硬骨頭，他不允許獨立的批評，不允許在文藝園地裏生長出一株野百合花，文藝祇能替政治服務，跟着政治的變動，隨時改變其內容，文藝追隨着政治行情，爲某一時期的政策作詮釋工作。

魯迅精神雖屢被摧抑，但又時時重生，雜文仍被用作表現批評的工具。批評的矛頭所指，往往是思想上的專斷，政治上的一尊。紀德說過：

> ……若是國內一切公民思想都是一致的，這對統治者自然很便利。但在這個貧乏前面，誰還敢說甚麼『文化』呢？沒有對抗力量，『精神』怎能不偏向一方發展呢？……消滅反對黨派，——這點，幸而無疑，史大林並沒有多大成功。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一句：消滅魯迅精神（牠有時超出文藝範圍，成爲對官僚政制的直接彈劾），幸而毛澤東沒有多大成功。

折斷文藝家的脊骨是容易的，當年王實味就是如此，一

九四四年五月，有一個記者團訪問延安，記者趙超構回來寫了**延安一月**，其中有云：

> 有一天下午，交際處通知我和國民公報記者，請我們到文協晚餐，到那邊的時候，有一個瘦長的男人和丁玲一同出迎，介紹過來，才知道這就是王實味，這種意外的會見，頗使我一時失措，因為我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和他交談。說『野百合花』吧，深恐有傷他的自尊心，可是當我們坐下來的時候，王實味却先開口談起他自己的事情來了，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着手勢以加强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得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談話繼續了一小時之久，我好幾次打斷了他的話頭，因為我覺得這種話在說者與聽者兩方面都會感到不舒服。……

從此以後，公私記載方面，再也不見王實味了，也許折斷了脊骨之後，他不再在人世（註）。

類乎王實味的事，以後發生了好多次，我們自不必一一叙述。毛澤東的文藝園地，號稱百花齊放，其實都不過是「樣版戲」吧了，沒有一部作品值得眞正重視的。

註：據「毛澤東思想萬歲」所載：他忙於行軍期間被保安機關所殺，年份不詳。

馮道・章士釗・魯迅

爲了章士釗，引出了正反兩種議論，正面的議論，譏他爲馮道，反面的議論，說他不是馮道，據論證：「欲求馮道，必於『反共』之門」，愛國的，擁護革命的章士釗，不可能是馮道。

時代變了，歷史條件不同，人物評價的標準當然也不同了，我們不可能從變亂動盪的五代歷史背景所產生的馮道，比喻二十世紀的章士釗。史上有毀馮道的，固然說他歷事「五姓八朝」爲寡廉鮮恥，奴顏婢膝，但當時也有譽馮道是孔子復生的，孔子不是聖之時者嗎？在短短的五十三年中，如果個個人能「大節不虧」，那眞是「盛世」了！我們對歷史人物，應該了解他的時代，不在表示個人愛憎。

以章士釗比馮道，未免看重了章士釗，他雖短短地貴爲總長，其實他的大半生不過做做「食客」。在人民共和國毛主席名下做「食客」，和在「現代孟嘗君」杜月笙名下做「食客」，實質上並無什麼分別，他那有馮道那樣的「位高而勢尊」。

章士釗是以柳子厚自況的，這却無人說過。這種自況，我也以爲擬於不倫。他自己設問：「柳子厚生於今日將如何？」他舉出「八長」以證明柳子厚「假如親見一九四九年之政權，必當無鑿枘不相容之處」，因爲他是「爲民打算」的，這樣的一個「子厚生於今日，定在士者行列，以己力協助隆平，進退惟遇，毫無缺望，社會決不覺多此一人，致生

齟齬，理有固然，無可疑者。」

這樣的一個柳子厚，不正是章士釗的化身？他怕的是誠恐社會覺得多此一人，致生齟齬而已。

我的話不是沒有根據的。章士釗認爲「倘中唐絕無柳子厚，而此時欲得一士，作爲承先啓後，並裨輔毛主席著作之天然準則，勢將通涉歷史，旁皇無可措手足……」好了，幸而有個柳子厚，幸而有個深通「柳文」的章士釗，爲這「文化革命」的大時代「指要」，祇此一點，已足證我的說法不誣了。

有人引郭沫若的悼詞，說他「爲國家的統一大業，不辭勞苦，鞠躬盡瘁」，我也深不以爲然，這方面，章士釗並無貢獻可言。如果有人認爲「印九經，布天下，提倡孔孟之道於不墜，繼承中華文化的一夥」是馮道之流，難道章士釗竟在和馮道們談統一大業？ 招降納叛， 國共雙方本來都有一手，但如果必須招馮道之流來完成統一大業，那不是誣衊毛主席爲五代的耶律德光嗎？這算什麼話！

章士釗和杜月笙關係之密切，二十餘年前他來香港「招降」的故事，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這種事當然不會寫入有關他的任何「行述」，但寫**杜月笙傳**的人並不諱言這一點。幸而階級鬥爭的客觀形勢證明了革命的公道，章士釗的「招降」不過是徒勞。

> 這一場鬥爭曠日持久，經年累月，認真說來，它應該從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算起 ， 一直算到民國卅九年，共產黨佔領上海一年後，露出猙獰面目，全面搜捕反共分子，其中多的是黃杜張一系列人物，逮捕人數據中共報導卽達三萬餘人，市郊刑場，血跡不乾，共產黨終於血債血償了。（**杜月笙傳**第二卷第九六頁）

我不禁要問，章士釗是否有光榮參加過這個業蹟，反共時期和鎭壓反革命時期的兩種業蹟？

固然，又有人會辯護說：人是會變的，「在人民革命勝

利的時代，終於他變成爲擁護革命，熱愛毛主席的新的章士釗。」

這種人物太多了，李濟琛，楊虎，杜聿明，李宗仁……從第一流的到第×流的，長長一大串，他們「擁護革命，熱愛毛主席」，生則在北京頤養天年，死了葬在八寶山烈士公墓。他們如果今天還在台灣，按照某種說法，應該都是馮道，要是今日台灣的馮道，能共同來完成統一大業，那就一變而爲「章士釗」！

又有人引用魯迅評價劉半農章太炎的文章做標準，認爲如果魯迅活着，「必定也是一本其有利於革命，有利人民的原則，一本其政治標準去評價章士釗的。」

也許是見仁見智，我覺得說到魯迅的「政治標準」，首先得瞭解他的革命觀點，早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前，他已有了這個觀點，他說：

> 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

這是一般的說法，他還有更具體的話：

> 只要青天白日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

這句話應驗在一九四九年之後，那時青天白日旗可完蛋了。

孤桐先生就是章士釗，他不是「來革命」的，革命已由共產黨領導工農完成了（經過千百萬人的犧牲才完成的），他是來「擁護革命」，享受革命的。

可惜魯迅死得早，沒見到革命的完成，他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從事革命（當然限於文學方面）工作，並不期望有一天會享受革命，他早說過如下的話：

> ……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為勞動大衆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

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着牛油麵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際上決不會有這種事……

革命成功了，革命文學家吃不到牛油麵包，這不是由於無產階級對待革命文學家的無情，而是正如他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上所說，世間那有滿意現狀的革命文學？於是他們統通給清算掉了！吃牛油麵包的，甚至吃魚翅席的，另有其人，章士釗之類便是，他們懂得「擁護革命，熱愛毛主席」。

魯迅對革命也實在悲觀，他說：

革命的完結，大概只由於投機者的潛入，也就是內裏蛀空。

說魯迅如果活着，會用評價劉半農章太炎的標準，去評價章士釗的人，那是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魯迅，更不懂得章士釗的。

附：論馮道

葵堂

（一）

上一個月，有幾個人好像得了什麽指使，竟不約而同的罵起馮道來。最巧的是在七月七日那一天，竟有兩家報紙都把馮道抬出來痛罵一番。

站在中國人民立場，馮道是應該罵的。尤其是當時對入侵中國的遼國主耶律德光，他擺出了奴顏婢膝、苟且貪生的一副諂媚恭順的奴才相，更令人痛恨。他的對外恭順柔媚，竟給異族侵畧者耶律德光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因而特別信任他，特別賞識他的奴才的溫順。耶律德光入汴，責劉繼勳爲後晉出帝謀絕兩國之好，劉繼勳膽小怕死，諉罪於馮道，說馮道是宰相，是他爲出帝謀議，遂致「南北失歡」。

可是耶律德光對馮道的奴才德行早有好感，因說：「此老子不是好鬧人，無相牽引！」

像這樣的媚事外族的馮道，甚至今天不管他打着什麽旗號，「三民主義」也好，「反共」也好，只要投靠外國勢力，諂事異族而有馮道之行的，都當鳴鼓而討之！

我們不妨抄下一段「和尚罵賊禿」的妙文，以供大家欣賞：

「契丹滅晉，馮道朝見遼主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他事變無能，馮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馮道答：『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譏之，問：『你是何等老子？』德光喜其恭順，以之爲太傅。只看這一個故事，便活現出一個無恥糊塗腐臭的傢伙，只要有官做，便什麽都沒有問題了，耶律德光正需要這樣的走狗，也便把他當狗來豢養。」

讀報紙的人都記得：有一個姓任的曾一如事實眞相而毫不掩飾地指出蔣集團是美國人的最忠順的看門狗。就此說來，試把上邊所抄的一段文章，把馮道換上另一個名字，把耶律德光換上「美帝國主義」，那該多麽合於二十多年來的歷史事實！

「此地無銀三百両，對門張二不曾偸」，痛罵馮道的那幾個人，首先請你們照照鏡子！看看今天，在中國神聖的領土——台灣省——上，究竟還有誰依然做着走狗，被人「當狗來豢養」？

（二）

過去歷史上，評議馮道、認爲最不能加以恕免的大罪是說馮道的歷事「五朝八姓」，對他所事的國主「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因而譏之爲無廉無恥。例如：

薛居正「五代史」論馮道說：「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爲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於再三者哉！」

這裏有褒美，認爲他「有古人之風」，「深得大臣之體」；也有貶斥，斥之爲有如一女嫁六夫，不夠貞節。

「通鑑」（二九一）引歐陽修「新五代史」的論馮道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

司馬光的論評也說：「臣愚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爲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

以上都是過去封建專制社會時代地主階級史論家的議評。

站在進步的、人民的立場來看，我們認爲這是封建專制社會下統治階級內部的互揚家醜，倒是要拍手稱快的。

同時在以家爲天下的古代封建社會，地主階級史論家口中的所謂廉恥、大節、忠貞……其實都是謊言一句耳！

像嚴復這樣的遺老，由於他畧讀過近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思想的著作，所以對過去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有如此的分析：「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爲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 。 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而人民特奴婢之易主者耳……」（法意」第五卷第十四章）。

人民對馮道的事沙陀李家，或是事石家、劉家、郭家、柴家倒沒有興趣，因爲歸了包堆這些東西都是殘害、剝削、壓廹人民的豺狼禍水！

做了一家的奴才就高潔過做了兩家的奴才嗎？不見得，其爲奴才者一也！如果從這裏分定什麼名節的高低，那正是由於篤信「奴才家法」的緣故。就人民的立場說，評者被評者都是一丘之貉，二者只有程度之差而無本質之別。

再說封建社會歷史上，又豈止一個馮道！多得很。就在和馮道的同時，就有張昭遠其人，歷仕唐、晉、漢、周，以迄於北宋，爲「五朝元老」。試問，有誰曾指斥其不當？

同時尚有鄭韜光。「五代史」本傳稱 ： 鄭韜光「自襁褓迄於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仕無官謗，無私過 。 」此外還有很多，無法盡擧。

這還是五代時的歷史，試上溯漢魏以來以迄隋唐 ， 又是怎樣情形？

「陔餘叢考」（十七）「六朝忠臣無殉節者」條稱：「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即爲興朝佐命，久已習爲固然。歧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己，且轉藉爲遷官受賞之資……不必其以身殉也。」

這又是封建階級內部的互揚家醜，不止五代如此，甚至漢魏以迄

隋唐也莫不如此。

再往上追溯一下，儒家素以「先儒」稱之的叔孫通，據「漢書」（四十三）本傳稱：叔孫通首爲秦博士事秦始皇，又事秦二世；陳涉起義兵起，欲降於薛，不成，又投靠項梁；項梁兵敗定陶，叔孫通轉而從懷王，懷王徙長沙，又回頭事項王；漢王入彭城又轉而降漢王。後爲漢王劉邦謀立朝儀，派人赴曲阜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來，責斥叔孫通說：「公所事者十主，皆面諛親貴。」

「身事十主」的叔孫通能爲劉邦定朝儀，爲統治者幫了大忙，極得後世儒家人士的頌美，馮道的事唐、晉、漢、周等四朝十君，也不過向先儒叔孫通看齊而已！

薛居正和司馬光的以女事夫比作臣的事君，這正是出於儒家孔孟的道德觀，所謂「忠」、「貞」、「節」又全是儒家的主張。就歷史事實證明，也正是由於儒家孔孟的學說思想尊君上、抑臣下的奴才思想，才產生了歷史上如此衆多的馮道。

馮道者，也正是行孔子之道、孔子之教而已。

孔子周遊列國，「干七十餘君」（「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除了魯定公外，他還想重作馮婦，再改嫁事人，向七十餘君求官作；不過列國之君不想納這個馮婦而已。孔子不得已才返魯講學。其一生所講的學問一言以蔽之，就是「事君」的學問。「學而優則仕」，這是孔子高門子夏的話。子路也有「不仕無義」之言 。 孔門弟子學好「事君」的本領，大都做了大官僚、封建貴族統治者的幫兇和幫閑。尊稱孔子的所謂「萬世師表」者，實際是官僚政客之萬世師表而已！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中庸，其行爲是，「聖之時者也」，主張「無可無不可」，正因爲孔家思想的主張中庸、調和、折中、騎牆，於是在後來的歷史上才出現了如此衆多的馮道！試看「通鑑」所描述的馮道面目：「爲人淸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沉取容」。這不是一個行孔子之道、實踐孔子之教的純儒的最好典型嗎？薛居正「五代史」對馮道的褒美 ， 稱之有「古人之風」 、 「深得大臣之體」，這不也正是孔子教爲官僚政客的最高的目標嗎？

試細讀馮道本傳，馮道青年時代「不恥惡衣惡食」 ， 「負米養親」作孝子之外，「惟以披誦吟讀爲事」，好一個孔孟儒家學派的好弟子。

及至作了官，口不離「仲尼聖人」，所秉筆爲文，「典麗之外，

擨含古道」。口口聲聲自稱「儒臣」，自以「在孝於家，在忠於國」自許。在推廣、弘揚孔孟之道上也極爲出力，爲同州鎮官時，出俸錢修孔子廟；又以諸經糾謬，乃「取西京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通鑑（二九一）還爲此大書一筆：「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淸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胡三省並於此注曰：「史言聖人之道所以不墜者，以其有方策之傳也。」馮道對孔孟儒家的功勞該多麼大？像馮道這樣的尊孔崇聖、印「九經」，布天下，提倡孔孟之道於不墜，「繼承中華文化」，倒是和今天蔣集團是很好的一夥！

那少數幾個文人罵馮道，却正罵到蔣集團他們自己的頭上了！

我們認爲：馮道這類人物，正是孔孟儒家、封建社會思想文化的產物。不論今古，凡是崇拜十三經，自以爲是負了什麽「道統」，大倡保存國粹、繼承封建文化之輩，他們身上大有可能附着「馮道型」的鬼，遠的有叔孫通，近的有曾國藩、袁世凱、段祺瑞和今日的一小撮人。

孔孟儒家思想，也正是培養、製造「馮道」的最好溫床！與其痛罵馮道，不如提出徹底的辦法：打倒孔孟封建反動文化思想，這才是正本淸源之道！「反共」者敢於如此的徹底解決馮道問題嗎？

再舉一個極富於諷刺性的好例，以見尊孔讀經的儒生頗多無廉恥的「馮道」，反而是不讀詩書，不明史法的人民羣衆，却能夠明黑白、辨是非，其識見、見義必爲的膽量往往決非熟讀經書的孔孟儒生所能比。就如歐陽修在「新五代史」論評裏所說：

「予於五代得全節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

歐陽修的慨歎，自是歷史的實情。披儒者之服，以學孔孟之道自居的，頗多不免做「馮道」！一爲儒者，那就很易陷入「馮道」的汚泥潭裏而難於拔出脚來！

歐陽修也是儒者，因爲他生在一姓之主的「太平之世」，暫時作穩了奴才，所以沒有出過醜，但在他的裔孫歐陽玄身上却顯了原形。

「元史」（一八二）「歐陽玄傳」稱：「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歐陽）修，同所自出。……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

書」。「弱冠後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這些儒家學問，也正是「事君」的資本，只要能「事君」，誰又管他是什麽「君」，甚至是哪國之君！於是在蒙古朝照樣赴考（仁宗延祐十二年中進士），照樣作官。「元史」本傳稱：歐陽玄「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卽國子博士——引者），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屢主文衡，兩知貢舉」。

泰定四年（一三二七）丁卯八月十二日，歐陽玄這個國子博士，有授業生兩人分別於左右榜進士第一名及第，你看他樂得什麽樣子，竟作「喜門生中狀元」詩以紀其榮。其中兩首：

「昔被仁皇雨露恩，三朝五度策臨軒。
小臣報國無它技，館下新添兩狀元。」

「都人舉手賀昇平，不羨黃金遺子籝。
進士從今成典故，唱名纔罷拜先生。」

眞是肉痲當有趣，使歐陽修裔孫喪失其本心的是什麽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孝經」、「論語」這些玩意兒！

歐陽修駡馮道也是犯了「此地無銀三百両」的病，同時他裔孫也證明了「儒者之中」確實多的是沒有廉節忠義的人！

封建地主階級史學家暴露其階級內部的醜，我們是願意從旁欣賞的，因爲革命人民就是要在鞏固、發展自己的革命新文化的同時，全力掃蕩封建孔孟反動文化，封建史學家的暴露與其互揚臭史，是對人民有利的。

實可以仿老子的話改成這樣的一句：「聖賢不死」，馮道不止！

什麽藤，結什麽瓜；什麽樹，結什麽果。只要依然是尊聖崇古、提倡家天下的封建孔孟奴才思想，力倡拜孔讀經，那就一定源源不絕地造出大批的馮道！

有人於愛國擁護革命的章士釗老先生來港醫病之時，妄以馮道作比附，足見其毫無歷史知識，幼稚無知得可笑，可憐！又有人任意誣人「你有資格當馮道」！這簡直是無賴！在今日的革命與反革命的兩個陣線而言，確可仿「孝經緯」的話說：欲求「馮道」，必於「反共」之門！眼前暫未解放的台灣省正是「馮道」的大本營、無廉無恥的官僚政客的培養所！而在某些報紙上恬不知羞恥地駡馮道的少數幾個人，照照鏡子吧，看看自己是不是披着孔孟皮而實爲馮道骨的奴才！

至於革命的新中國，正努力徹底、乾淨地消滅產生「馮道」的封建文化與封建社會思想根源。

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

附：　魯迅評價人物兩例

葵　堂

現代中國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魯迅，在文藝創作和文學思想理論等方面為我們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更在評事論人，褒貶善惡，臧否人物這一方面，也為我們提供了足以學習取法的正確原則。

魯迅一向主張「黨同伐異」，在評事論人的褒貶善惡、評價人物上要有分明的是非，熱烈的愛憎，要有政治標準，要旗幟鮮明。

在魯迅文集裏，有兩篇評價人物的精采文章，一是「憶劉半農君」（「且介亭雜文」）；一是「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雜文末編」）。從這兩篇文章中，我們可以淸楚地看到魯迅取人論人的正確原則和標準。

一九三四年的夏天，劉半農赴西北內蒙進行考古和方言調查，不幸染上回歸熱症，醫治無效，病死於七月十四日。

這時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對半農的一生作了極不公正的論評，有人批評他「淺」；有人特別拿了劉半農的生活上的趣事，打諢取笑，奚落劉半農；更有些陷沙鬼對劉半農進行誣衊，要把劉半農拖入爛泥的深淵。

魯迅先生却獨排衆議，以正確的革命歷史觀點，站在革命人民的立場上對劉半農的一生作了極為公正的評價。

首先就革命歷史，肯定了劉半農早期在「新青年」撰文時代，在當時的新文化革命運動中的功績。肯定了劉半農「是『新青年』裏的一個戰士。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又讚揚他是「好伙伴」，在對敵人進行戰鬥之際，是可信賴的好戰友。

其次也批評了劉半農的「淺」。但是魯迅的批評又不同於一般的含混的批評。魯迅又以分析的方法，客觀的立場，得出劉半農的「淺」的可愛處。他說：「不錯，半農確是淺。但他的淺，却如一條

清溪澄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牠的深淺來了；如果是爛泥的深淵呢，那就不如淺一點的好。」

於是，魯迅就運用了正確的歷史觀點，把劉半農的一生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一是十年前「新青年」時代的作為文化革命運動中的一員猛將的劉半農；一是十年後躲進研究室、成為專家教授而漸據要津、脫離時代，不問政治，「不斷的做打油詩，弄爛古文」的劉半農。因而作出這樣的評價：「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他的為戰士，即使『淺』罷，却於中國更為有益。」

魯迅又運用了同樣的觀點和立場對章太炎作了極為公正的評價。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章太炎病逝蘇州。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各地官紳、以及章氏門人紛紛為章太炎開追悼會，編印遺著，頗為熱鬧了一陣，事後也就終歸寂然，無人再提。至於紀念、追悼章太炎的，無不衆口一詞地推尊之為「純古文學家」，「清代樸學押陣大師」，又是什麼「餘杭之學，可謂匯合浙西經學浙東史學二大派而自成新派者」（邵祖平「治學芻言」）云云，對章太炎一生的眞精神、眞價值從無人道及。

魯迅特為作「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對章太炎一生作出了最精當而正確的評價。

魯迅首先肯定章太炎一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又肯定章太炎主持「民報」時代的革命戰鬥文章，以為這「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紀念章太炎的最好辦法，是校印、流布章太炎的這些戰鬥文章，這才使章太炎和後生相印而永久活在戰鬥者的心中。

魯迅也批評了章太炎入民國以後的「既離民衆，漸入頹唐」的一段歷史時期，但也認為這只不過是「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而頌美章太炎的早年革命歷史，並予以高度的評價說：「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

像這樣抉發了章太炎眞精神，評定了章太炎一生事業的眞價值的大文章，在當時眞可以說是並世並無第二篇！

綜觀以上兩篇文章，可以得出魯迅評價人物的這樣的一些原則和標準：

一、魯迅論人以政治爲首要標準，以革命利益 、 人民利益爲依歸，在革命歷史階段中，凡擁護革命、提倡進步事物的 ， 都予以稱許，予以肯定。

二、魯迅評價人物決不沾有主觀主義色彩，絕不片面，決不一成不變的看人論人。就如分析劉半農的歷史爲十年前 、 十年後兩個時期；論章太炎又把他區分爲民國前 、 民國後兩個時代的言行而下評定。

三、魯迅評價人物全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站在人民民主革命的立場，定是非，別善惡，對善有熱烈的愛，對惡有熱烈的憎，決不模稜兩可，決不吞吞吐吐，含含混混。

此外，魯迅對人，即或對待正面相對的敵人，也從不採取橫暴手段，把敵人一棍子打死。例如魯迅在「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一文中特別揭出這樣革命者對待革命敵人的正確態度：「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爲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爲要殺人，即使是正面的敵人倘不死於戰場，就有大家的裁判，決不是一個詩人所能提筆判定生死的」。（「南腔北調集」）

這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說：「我們的任務是消滅封建制度，消滅地主之爲階級，而不是消滅地主個人。」

毛主席在社會主義革命時代曾定下判斷人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的六大標準，那就是：（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這些標準全是從我國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出發所作出的論人，評是非的政治標準。

寫到此處，我們想到這樣的一個問題：假使魯迅今天還在，假使他看到了當年和他敵對並站在和他相對抗的戰線上的章士釗轉變而成

爲擁護革命，並對中國人民的團結作出貢獻，他又該是怎樣評價章士釗呢？

那毫無疑義地，魯迅必定也是一本其有利於革命、有利人民的原則，一本其政治標準去評價章士釗的！

章士釗的一生確實走了許多曲折的彎路。他早年參同加盟會，擁護中山先生，贊成革命 ； 可是後來正如魯迅所評論的某些人一樣：「先前確曾和黑暗戰鬥，但他們自己一有地位 ， 本身又便變成黑暗了」（致章川島的書簡），這便是一九二五年前後的章士釗。但是章士釗並沒有老死於黑暗中，他中年迷途，老聞眞理，他有這種幸福活到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時代，終於他成爲擁護革命、熱愛毛主席的新的章士釗。試看他逝世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他所作的蓋棺論定，稱之爲「爲國家的統一大業，不辭勞苦，鞠躬盡瘁」（郭沫若在追悼會上所作悼詞）， 這就是今日的章士釗不同於昔日的章士釗的具體表現。

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曾有這樣的話：「要注意『變』爲世界基本的現象，不變只是變的一個抽象的特殊情形」。（王浩「談中國之行」）

世界在變，一切的事物在變，人也在變！章士釗就是從變中變過來的隨時代而前進的愛國人士。

「變」的道理說來似乎新鮮，其實也不新鮮，因爲人類的社會歷史就是遵循「變」的常規不停地向前發展的。例如在封建社會歷史，有名的愛國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在四十歲之前是一個「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宋史」本傳）的人，可是四十歲後，當德祐初年，江上報急，恭帝詔天下勤王，文天祥奉詔 ， 盡以家財爲軍費，最後計窮被俘不屈而死。

假若以四十歲前的文天祥作爲文天祥的一生來評價，這樣的人若不是昏蟲也必定是神智不清的呆鳥。

又如明末的李定國，他本是農民起義軍張獻忠的養子，在明朝統治者眼中，他是「叛賊」、是「流寇」，但是到了明朝末年，永曆帝輾轉黔貴西南大後方，李定國却成了獨支明朝暫時不亡的唯一支柱，保衛明朝社稷的忠臣。最後竟和明朝的命運相終結！

假若以崇禎時代的李定國來論定永曆時代的李定國，那麼這樣的人也難免昏蟲之譏的！

早些時候，章士釗來港探親，有人說：「你歌頌五四的領導者魯

迅，但你又歌頌五四的『反動者』章士釗……」。最近又有什麼「魯迅筆下的章士釗，却是一個殺學生的軍閥走狗，無恥政客……然則是魯迅對呢？抑或魯迅不對？……這到底是怎樣解釋呢？」

像這樣的，把歷史人物都看成一成不變的僵石，看文天祥，只知道有一個「聲伎滿前」的享樂者，看李定國，只知道是張獻忠起義軍反明的餘部……那又有什麼辦法！也惟有一任其充昏蟲、做呆鳥而已！

魯迅與托洛次基

魯迅晚年所寫的二封信，影响非常大，一封是致托派的，他應用一生所痛惡的「盧布」說，誣托派是「盧布」黨，另一封是給徐懋庸的，指斥他們動輒誣人爲「漢奸」，爲「托派」之不當。這二封信至今仍廣泛爲當權的共產黨所利用，但從沒有人勞神去說明二封信之間的矛盾。

我曾用當時的政治背景說過魯迅致托派信的事實經過，迄未有人給以任何駁覆，我現在要談魯迅在一九三〇年之前直接所受托洛次基文學觀點的影响，這又是一般談魯迅的人所諱言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立刻波及到全世界，中國共產黨跟着在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國民黨也於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組；魯迅參加編輯的**新青年**向左右分裂，可是他既不跟着陳獨秀李大釗向「左」，也不跟着胡適之向「右」，他站在中間陣地，先加入**語絲社**，隨後又和幾個青年人發起**未名社**，印行**莽原**和**未名叢書**，沒有什麼政治理想，也不標榜什麼主義，但由於出身關係，對舊社會的了解非常深刻透徹，所以他自認爲只是和黑暗鬥爭，他並不想像未來是否是個光明世界。

在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期間，他和「正人君子」及章士釗面對面的鬥爭，眞不愧是個虎虎有生氣的鬥士，可是這種向漫天黑暗的個人鬥爭，終竟使他疲倦而徬徨了，他從火熱的北京走出，投向了荒凉的厦門。

他的立場雖屬中間陣營，思想上仍不免受十月革命的侵襲，當**創造社**還在提倡浪漫主義時，他已在**未名社**介紹了**蘇俄文藝論戰**（一九二五年），介紹了**十二個**(一九二六年)，介紹托洛次基的**文學與革命**（一九二八年）。

文學與革命的譯本雖出版於一九二八年，但他受這本巨著的影响，則早在一九二五年。**魯迅日記**：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往東亞公司買**革命卜文學**一本（按：應爲「**文學卜革命**」）。

十二個出版時，魯迅從**文學與革命**中譯出第三章「亞歷山大・布洛克」，當做附錄，而且介紹托洛次基說：

> 中國人的心目中，大概還以為托洛茲基是一個暗嗚叱咤的革命家與武人，但看他這篇，便知他也是一個深解文藝的批評者……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魯迅在**中山先生逝世一週年**這篇紀念文中，又說到托洛次基。他說：

> 托洛斯基曾經說明過什麼是革命藝術。是：即使主題不談革命，而有從革命所發生的新事物藏在裏面的意識一貫着者是；否則，即使以革命為題，也不是革命的藝術。

這當然是**文學與革命**中的意見。

文學與革命是李霽野韋素園合譯的，從一九二六年起，魯迅在與李霽野的通信中就已不斷地談到這本書的繙譯，我們從他的信裏知道，此外傅東華也譯過這本書，登在**中央副刊**上。**未名社**出版這書時，他已經在廣州目擊過慘酷的歷史大事變，不料初回上海，却給革命文學家罵作有閒階級，痛加圍剿了。

魯迅是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到廣州的，担任中山大學的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眞實的在職期間甚短，到八月二十九日他向大學辭一切職務，十月三日就已回到上海。前後八個多月，他曾在廣州和香港演講多次，但保留的講辭祇

有五篇，三篇在清黨之前，二篇在清黨之後，清黨之前的三篇，二篇在香港講演，即**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另一篇則在黃埔軍校所講，**革命時代的文學**；清黨以後，則是七月間在知用中學講的**讀書雜談**，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

在黃埔軍校講的**革命時代的文學**，主要論據都是從托洛次基**文學與革命**這本書上借來的。

魯迅日記：四月八日，晚修人宿荷來，邀至黃埔政治學校演講，夜歸。

（應修人早年是湖畔詩社的詩人之一，後來成了共產黨員，他犧牲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那時從蘇聯回來上海不久，立三路線正得勢，他担任經濟方面的任務，據他的好友謝澹如對我說，這任務主要是變賣蘇區「打土豪」得來的金銀珠寶。可是當時的白色恐怖委實厲害，他時時為這樣一個問題煩惱，即如果被捕該怎麼辦？他是和丁玲潘梓年等人同一天被捕的，結果完全不同，丁玲後來證明「政府在養她」，潘梓年徒刑十年以上，在南京軍人監獄服刑，抗日戰爭發生前出獄，應修人則挑選了自殺一途，他從很高的旅館窗口跳下來，肝腦塗地。）

四月八日距離十五日祇有八天，李濟琛繼蔣介石之後動手殺人了。

魯迅回到上海後，鑒於當時和他論爭的人，攻擊往往未中肯理，所以他譯了**文藝政策**，陸續發表在**奔流**上，這是蘇聯文學論爭的結集，有各派不同的意見，主要的脈絡，也可說是主張「無產階級文學」的一派與托洛次基一派的對立，所以魯迅在「編校後記」中說：

托洛茲基是博學的，又以雄辯著名，所以，他的演說恰如狂濤，聲勢浩大，噴沫四飛。但那結末的豫想，其實是太過於理想底的——據我個人的意見。因為那問

題的成立，幾乎是並非提出而是襲來，不在將來而在當面。文藝應否受黨的嚴緊的指導的問題，我們且不問，我覺得耐人尋味的，是在「那巴斯圖」派因怕主義變質而主嚴，托羅茲基因文藝不能孤生而主寬的問題。……這問題看去雖然簡單，但倘以文藝為政治鬥爭的一翼的時候，是很不容易解決的。

這個不易解決的問題，以後不斷爆發爲中國文學上的爭論。在當時，則魯迅時時引用托洛次基的意見，爲自己的意見張目，如：

托羅茲基雖然已經『沒落』，但他曾說，不含利害關係的文章，當在將來另一制度的社會裏。我以為他這話却還是對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

又如：

來信的『吃飯睡覺』的比喻，雖然不過是講笑話，但托羅茲基曾以對於『死亡恐怖』為古今人所共同，來説明文學中有不帶階級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實差不多的。……（**文學的階級性**）

魯迅對於當時蘇聯內部爲了中國革命引起的托史之爭，自然不會清楚知道，但對於失敗了的托洛次基則還沒有勢利之見，觀於他在沒落兩字上加了引號可知。大約在一九二八年末，有幾個留蘇學生回到上海，他們都是托洛次基派，我認識其中一個，當時革命失敗，共產黨內完全受盲動情緒支配，一經托派分子把當時托史的爭論介紹過來，對於苦悶無出路的革命者，恍如在黑暗中睜開了眼睛，我參加過這種討論，記得馮雪峯也參加過一次，我和雪峯的認識是由謝澹如介紹的，他們都是湖畔詩社的詩人；雪峯已和魯迅來往，魯迅當時正在譯蘇聯的文藝理論，雖從日文重譯，但遇有難解之處，則用俄文參攷，雪峯常常啣魯迅之命，把某一段文章請我找留俄回來的托派代譯，每條不過幾十字或幾百字，

但魯迅一定給予稿費一元或二元， 當時繙譯一千字的稿費不過一，二元，所以說來無人相信，魯迅和托派並不是毫無淵源的。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魯迅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演講，題目是**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有云：

>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的出現，並不如文學家所豫想。所以巨大革命以前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畧有結果，畧有喘息的餘裕，這才產生新的革命文學者。……

政治先行，文學後變， 魯迅說得多麼好， 多麼簡單明瞭。但如果你讀過托洛次基的**文學與革命**，那麼便知道魯迅不過在闡述托洛次基的基本觀點罷了。

可是到了一九三〇年 ， 以魯迅加入**左翼作家聯盟**爲界限，他從此不再提及托洛次基和他對於文學的觀點，因爲三〇年代起， 史大林已是全能的神， 蘇聯的歷史得從頭寫過了，魯迅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他却是**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之一，也是受某種符咒禁制的。

但是有一件事，我還是認爲魯迅用間接的批評，反對對於托洛次基的無恥誣衊。在**文學與革命**一書中，托洛次基特別推崇革命詩人別德納衣，可是在反托狂潮中，別德納衣寫了首長詩**沒有功夫唾駡**，登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四日蘇聯出版的**眞理實報**，從托洛次基的祖宗三代駡起，全篇都是用最下流的「粗口」組成的。托派在中國旣已生根，成長，發展了，給王明打下了台，在悔過書上自稱爲「無恥的機會主義者」的瞿秋白， 便以反托工作自効， 他把這首長詩譯了出來，登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版，周揚主編的**文學月刊**上，接着有人模仿別德納衣的筆調，也是祖宗三代的駡胡秋原了，

魯迅立刻寫了篇**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鬥**，批評這種下劣的文風。其中所說，都可以移用作者對別德納衣的批評的，如果你還保存得有**瞿秋白文集**，大可以覆按一下。至於瞿秋白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定爲叛徒，連屍首都從八寶山烈士公墓移走了。

到魯迅晚年，在O．V筆錄的致托派信中，他用諷刺的筆調，對托洛次基本人加以挖苦和誣衊，有云：

> ……因爲史大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麼？現在的流浪，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 因爲那時怕連送一片麵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不同，這卻因了現在蘇聯的成功。……

魯迅是懂得讀歷史的，這種成王敗寇，出主入奴之見，我相信決不是魯迅固有的衡人衡事的標準 ， 但他寧願做個「勢利小人」，不僅誣衊中國托派爲漢奸，而且誣衊托洛次基本人不得不用「敵人金錢」，他和周揚還能有什麼分別？難道爲了托派這個共同敵人，必須唱一樣的調子麼？這調子在魯迅一生骨梗的鬥爭史上，在他和周揚的最後決裂上，又何其不協調？

魯迅的反托論調，祇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即他在不利的情勢下，必須與敵手競爭對於所屬政治派系的忠貞，於是就違反自己的意志， 連平日最最痛惡的「盧布說」 都用上了，他之墮入這種惡劣的政治派系鬥爭，和他的思想弱點也有聯系，即他雖然信從了階級論，思想上始終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在一九二五年說過……主要目的是正的——這所謂正與不正，又只專憑自己判斷——即可用無論任何手段……這是主觀唯心論，但可以說魯迅在一九二五年尚未服膺科學的唯物論，到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他已受過一般的馬克思

主義，特殊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洗禮，但他在答楊邨人的公開信上仍是說：*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以為是不錯的*……，基於此，他自然成爲勢利之徒，即成爲成王敗寇論者了，其實，「爲目的不擇手段」，這只不過是馬嘉唯利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後者是主張目的與手段互相依存的，用正當的手段，才能達到正當的目的。

魯迅寫致托派的信時，正在病中，連寫簡單的日記都不能了，但不論O·V（雪峯）能給他多少影响，這封信總是魯迅本人認可的；到他病愈後能親自回答徐懋庸時，他仍變爲虎虎有生氣的鬥士，到他拒絕加入文藝家協會，就有「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慨了，而一擺脫派系的拘束，他就公然反對共產黨「不念舊惡」的聯合戰線政策了。

「沈滓的泛起」

本年（一九七三）七月廿五日**大公報**第一版登載了兩篇文章，無獨有偶都和魯迅生前有關，我們且摘引一下。

第一篇是王芸生寫的，他回憶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以張治中爲首的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到達北京，他看見一位翩翩瀟洒的老者，和其他一行進入北京飯店，就是章行嚴先生。據他說，以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他們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涵育中，經常在一起學習黨的路線政策……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章行嚴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座談他在寫作**柳文指要**一書，王芸生在座，因此結了文學因緣，他認爲這部近百萬言的巨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出版，實在是一件盛事。他說「行嚴先生曾深自謙抑地說：『吾之此一臃腫龐大之陳舊述作，分明一無價值。』却自設一題『柳子厚生於今日將如何？』就與當今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盛治相聯系了。此文列舉柳有八長，說『子厚卽以當日養之有素之思想尺度，假如親見一九四九年之政權，必當無鑿枘不相容之慮。』從而斷言：『子厚生在今日，定在士者行列，以己力協助隆平，進退惟遇，毫無缺望，社會亦決不覺多此一人，致生齟齬，理有固然，無可疑者。』就是說，柳宗元如生在今天，以他的學行修養，也必然熱愛偉大的毛主席，熱愛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熱愛偉大

的社會主義祖國，而爲社會主義事業盡其一分力量。行嚴先生以此詡許柳子厚，也正是他的『自道』。……」

王芸生說得好，章行嚴拉着柳子厚的皮蓋着自己，祇有一個目的，讓「社會決不覺多此一人」而已。至於說他臨死前還在「懷念台灣的故舊， 關心祖國的統一」， 那是「官話」。「祖國的統一」寄托在與章行嚴同時代行將就木的那些「故舊」身上，不寄托在台灣被壓迫的工農無產階級的自求解放身上，這就說明了成立政權二十四年的「祖國」的實際蛻變的政治狀態：對外「和平共存」，對內「和平演變」。

說到「故舊」，我們就得引用第二篇文章：**訪奉化溪口有感**，作者毛翼虎，前國民黨立法委員，當今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寧波市委員會副秘書長，這樣的官銜，當然比不上章士釗的顯赫。但他所懷的故舊中，有一個和魯迅很有關係，而且在魯迅的鬥爭歷史上，其作用不下於章士釗的，那就是一九三〇年前後身居國民黨浙江省黨部黨務指導委員的許紹棣。

文章說：「最近看到舊同事許紹棣『集唐』感時詩云：『幾多人物在他鄉，枕繞泉聲客夢涼，白首思歸歸不得，海天東望夕茫茫。』許兄長期漂泊異鄉，『白首思歸』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所謂『歸不得』的想法，又未免太消極悲觀了。祖國的大門對一切愛國者始終是敞開的。」

這是公開的「招降納叛」嗎？ 不， 這是「和平解放台灣」的國策，歡迎一切國民黨人來歸，如果你以前殘殺革命者越多，便越歡迎，因爲這就表示你兩方面的業績更重要，李濟琛在四一五，章士釗在三一八，都是卓著的人物，一旦識時務，生得崇敬不必說，死了還可卜葬在八寶山烈士公墓裏哩。

爲此，我們得從舊籍中搜羅些許紹棣的業績，以便爲他有朝一日歸來後替他作起居注者的參攷。

魯迅談到語絲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有人說是因為登載了揭發復旦大學內幕的文字，而那時浙江的黨務指導委員老爺却有復旦大學出身的人們。這個人，就是許紹棣。

接着是萌芽在浙江被扣留。

一九三〇年二月，魯迅加入了自由大同盟，浙江省黨部呈請南京政府下令通緝墮落文人魯迅， 主其事者也是許紹棣。

魯迅以後的「隋洛文」筆名，出典就在這裏。

加入自由大同盟的有郁達夫，那時他正深戀王映霞，而上海的白色恐怖也日益加甚，郁達夫退縮了，他想和王映霞隱居到杭州去，魯迅寫了一首詩阻郁達夫移家杭州，達夫不聽，卒在杭州建了「風雨茅蘆」和王映霞同住。可是過不久抗日戰爭爆發，在亂離中王映霞移情別戀，郁達夫痛哭流涕寫了「毀家詩紀」，這次弄得郁達夫家破人亡的，也是這位浙江省黨部委員老爺許紹棣。

後來郁達夫在星洲作「回憶魯迅」一文時，就後悔不聽魯迅的忠告。

魯迅曾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寫過一篇沈滓的泛起，說：

> 在這國難聲中，恰如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種古的沈滓，新的沈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來，在水面上轉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
>
> ……但因為泛起來的是沈滓，沈滓又究竟不過是沈滓，所以因此一泛，他們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後的運命，也還是仍舊沈下去。

但魯迅沒有更深一層地討論這個臭池塘，沈滓是寄存在臭池塘裏的， 如果沈滓堆積得太多了， 「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是否有變成臭池塘的危險？專愛用棍子攪起沈滓的人們，應該好好地想一想！

魯迅和他的小說

魯迅談到自己的小說，常常引用一句成語，「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對於魯迅小說的批評，眞是多極了，但魯迅大多不加理會，有時不得不回答幾句，目的也不在乎反駁或申辯，不過藉此說明當時創作的動機，至於這種創作能造成何種影響，更不是他事前事後所能計及的。祇當一九二八年之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風起雲湧，而且宣佈阿Q時代已經死亡時，他才非常有意識地主張他的創作，在當時實在是一種革命文學。

> 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這一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迹了，但在那時，却無疑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
>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魯迅認爲他所作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的陸續出現，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的，因爲**新青年**初出版時，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嘏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的。魯迅的**狂人日記**開闢了用白話創作的風氣，由於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在那時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他認爲這篇**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所以他自己看重這篇作品。

雖然如此，魯迅自己却深深苦於寂寞，這寂寞又一天一天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我的靈魂了。但因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所以他也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珍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

魯迅最出名的小說自然是**阿Q正傳**，這小說引起的毀譽也最多。他在北京參加**新青年**所提倡的文學革命時，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確乎已有了好幾年，由於孫伏園催促，他在晚上逐漸寫了出來，在**晨報**揭載之後，便引起人們猜測，以爲魯迅在揭發他們的陰私，借阿Q罵他們。過了四年，魯迅在替俄文譯本作序時說：

> 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於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靈魂來。……

魯迅認爲中國是民分十等的國家，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又因聖人和聖人之徒的教訓，更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他說，四年來，百姓祇能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

阿Q正傳發表之後，有的加以譴責，有的說是病的，有的說是滑稽的，也有以爲是諷刺的，以爲是冷嘲的，這使魯迅自己也疑心心裏真藏着可怕的冰塊。他在一九三〇年說到牠時，承認我之作此篇，實不以滑稽哀憐爲目的。一九二八年在厦門時，他認爲阿Q的時代或者竟還有二三十年之久呢！

新青年同人風流雲散之後，魯迅還是做小說，他認爲以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爲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爲讀者所注意了。魯迅自己也很少談到牠們。

吶喊、**徬徨**之後，魯迅不再創作小說，他寫了大量戰鬥

性的雜感，我們不在這裏論列。此外，尚有可稱之爲散文詩的**野草**，回憶式的**朝花夕拾**，運用古代題材的**故事新編**都值得一談。

關於**野草**，他自說技術並不算壞，但心情太頹唐了，因爲那是他碰了許多釘子之後寫出來的。

野草作於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因為那時難於直說，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例如：因為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作**我的失戀**，因為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作**復仇**第一篇，又因為驚異於青年之消沉，作**希望**。**這樣的戰士**，是有感於文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臘葉**，是為愛我者的要想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槍擊徒手民衆後，作**淡淡的血痕**，其時我已避居別處；奉天派和直隸派軍閥戰爭的時候，作**一覺**，此後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他又從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作了**失掉的好地獄**。

野草雖然頹喪，因爲是預言式的，故富於時代的氣息。魯迅一九二七年十月回到上海後，不久就遇到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的圍剿，他在回答他們時，引用**野草**上的字句，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 ， 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于是並且無可腐朽。

他說：還只說說，而革命文學家似乎不敢看見了……這預言後來自然實現爲眞正的革命，但革命實在也並不能燒盡一切，舊的阿Q時代還是會回來的。

朝花夕拾十篇，據魯迅所說：前兩篇寫於北京寓所的東壁下，這寓所不是八道灣，而是西三條胡同。他們兄弟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日失和，他於八月二日遷出八道灣，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定居在西三條胡同的。中三篇是流離中所作， 地方是醫院和木匠房， 這三篇是**二十四孝圖**，**五猖會**，**無常**，寫於一九二六年五月至六月，那時他正爲段祺瑞

政府下令通緝。後五篇寫於厦門大學的樓上，他雖然對環境很不滿意，發發牢騷，但這些牢騷究竟不過是「茶杯裏的風波」。

這十篇回憶的編集，却是在驚心動魄的反革命風暴之後，他給血嚇得目瞪口呆，祇能躲在廣州一所叫做白雲樓的房子裏，做這與世無礙的不急之務。他說，目前是這麼離奇，心裏是這麼蕪雜。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這在魯迅的戰鬥生活中，簡直是一片空白。

故事新編的寫作，從開始到編集，歷時十三年之久，第一篇**不周山**，寫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最後三篇寫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據魯迅所說**不周山**原本編在**吶喊**裏的，他當時試想用「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來做小說，——

> 首先是很認真的，雖然也還不過取了弗羅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緣起。不記得怎麼一來，中途停了筆，去看日報了，不幸正看見了誰——現在忘記了名字——的對於汪靜之君的**蕙的風**的批評，他說要含淚哀求，請青年不要再寫這樣文字。這可憐的陰險使我感到滑稽，當再寫小說時，我無論如何，止不住有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出現了。這就是從認真陷入了油滑的開端。……
>
> 這時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創造社門口的『靈魂的冒險』的旗子底下掄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說罷，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還輕視了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不周山**的後半是很草率的，決不能稱為佳作。……於是當**吶喊**印行第二版時，即將這一篇刪除；向這位『靈魂』回敬了當頭一棒——

我的集子裏，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魯迅對於**故事新編**，自己還是不滿意的居多，他說這是塞責之作，除**鑄劍**外，毛病主要是流於油滑。即如其中的一篇**奔月**，就是由於他聽說長虹以太陽自比，以月亮比許廣平，以黑夜比他而寫的。如果不是爲了長虹的攻擊，他對許廣平還不敢坦白地說，我可以愛哩。在這以前，他說他雖然是黑夜，但並沒有吞沒這**月兒**，現在知道長虹的攻擊不過爲**了月兒**，這就使他憤怒，因爲過去他一向在悶葫蘆中，他說，只要他敢於搗亂，**什麼太陽之類**，他都不管的：

魯迅常常說，他對青年們不還手，爲的是究竟自己還受得起踐踏。果然，魯迅一動手還擊，長虹一夥全都沒入了黑暗之中。但**奔月**發表時，祇有很少人知道這是開長虹的小玩笑。

故事新編中的**出關**，作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爲什麼事隔十年之後，魯迅又忽然想到借古代題材來做「短篇小說」呢（而且在同一個月中連續寫了三篇）？魯迅沒有透露原因，我們祇能作如下的揣測，魯迅自一九三〇年加入**左聯**之後，過了不久，就和**左聯**的領導人發生齟齬了，一九三六年，這種齟齬變成爲公開的衝突。他在序言中說：因為自己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過了十三年，依然並無長進，看起來，真也是『無非不周山之流』……，言外之意，深可玩味。

正是這篇**出關**引起了許多批評，魯迅寫了篇**出關的「關」**作了總的回答。他說：這回却想破了向來對於批評都守緘默的老例來說幾句話………批評者有從作品來批判作者的權利，作者也有從批評來批判批評的權利……爲什麼魯迅竟一反緘默的老例呢？因爲實際上這不是一次文學的批判，而是有關共產黨改變政策後的政治的批判。

魯迅並不看重另一種批評，即以爲這是諷刺傅東華的說

法，他闡釋了小說如何在現實中取材模特兒，即使是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豬八戒高老莊招親，在人類中也未必沒有誰和他們精神相像的，他以爲傅東華如果一進小說，就有代表一種人物的資格，他並不輕視這種資格。可是他的模特兒，實在不是傅東華。這種專門從作品去揣摩諷刺的對象爲誰的人，像是後街阿狗的媽媽，她是只知道，也只愛聽別人的陰私的。

另有一種批評却是政治性的，當時已流行一種對魯迅個人的批評，說他「個人主義」，說他「破壞聯合戰線」，所以同樣在左翼陣線的丘韵鐸（他本是創造社的一個小夥計），對出關提出了如下的批評：

> ……至於讀了之後，留在腦海裏的影子，就只是一個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獨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的感覺着讀者是會墜入孤獨和悲哀去，跟着我們的作者。要是這樣，那麼，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的削弱了，我相信，魯迅先生以及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的本意是不在這裏的。……

魯迅回答這位批評者，既然知道他的本意並不在這裏，但是沒有說出在那裏，也許看不出在那裏。實在他的本意是非常簡單：

> 老子的西出函谷，爲了孔子的幾句話，並非我的發見或創造，是三十年前，在東京從太炎先生口頭聽來的，後來他寫在『諸子學畧說』中，但我也不信爲一定的事實。至於孔老相爭，孔勝老敗，却是我的意見：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子也尚柔，但孔以柔進取，而老却以柔退走。這關鍵，即在孔爲『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鬆的實行者，老則是『無爲而無不爲』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談家。要無所不爲，就只好一無所爲，因爲一有所爲，就有了界

限，不能算是『無不為』了。我同意於關尹子的嘲笑：他是連老婆也娶不成的。於是加以漫畫化，送他出了關……

說來如此簡單的一個故事，在政治上抱有歧見的人看來，在堅持宗派主義的人看來，不僅覺得他（老子和魯迅）是一個全身心浸淫着孤獨感的老人，而且加以忠告，希望他們是一定會繼續地運用他們的心力和筆力，傾注到更有利於社會變革方面，使凡有利的力量都集中起來，加强起來，同時使凡是可能有利的力量都轉為有利的力量，以聯結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

魯迅說得好：一為而『成一個巨大的力量』，僅次於『無為而無不為』一等，我『們』是沒有這種玄妙的本領的，然而我『們』和丘先生不同之處却就在這裏，我『們』並不『墜入孤獨和悲哀去』……所以他疑心丘韵鐸和他同一類作家的本意，只是想寫了巨大無比的抽象的封條，去封閉他無利於老子的具象的作品。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日，第三國際七次大會決定用「人民陣線」代替「第三時期」策畧之後，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政策也隨之改變了。這種改變並不是中國國內共產黨所決定的，牠只是由史大林一系所控制的第三國際作出決定後，命令中國共產黨去執行。改變開始於在莫斯科發表的「八一宣言」（國際代表陳紹禹（王明）起草，用中國蘇維埃政府及中國共產黨的名義發表），然後指派代表（林育英）去延安傳達這種政策，由中國共產黨正式加以接受。這政策主要爲聯合國民黨共同抗日。魯迅是反對這種政策的，丘韵鐸的批評就是共產黨的話，翻成了政治語言，就是毛澤東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瓦窰堡會議中所作的報告：「黨內的基本策畧任務是什麼呢？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事後證明，毛澤東對如何實

現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王明（實則史大林）大有分歧，但在一九三五——三六年，這種分歧並不明顯，魯迅只是憑他的直覺，反對這樣的聯合戰線。他說：也要聯合國民黨，那些先前投敵的分子，是最受歡迎的了。要一下子將壓迫忘記得乾乾淨淨，是到底做不到的。以為壓迫會輕起來，那也是做夢……（馮雪峯**回憶魯迅**）所以他借着回答丘韵鐸的批評，作了個反批評，他認爲聯合一切成爲巨大無比的力量之後，如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只不過是徒作大言的空談罷了。

這是借文學批評進行的政治鬥爭，牠又表面化而爲兩個口號之爭，四個月後，魯迅對周揚一夥展開了攻擊，但我們當在另一篇文章裏專談這個問題。

× × × ×

魯迅對於文學的見解是主張為人生的，他在日本學醫不成之後，就相信可以利用文學作爲改良社會的工具，二册**域外小說集**就是這種信念的結果。以後他認爲他的**狂人日記**是當時的革命文學，這話也毫不誇大。到一九二八年，文學與革命關係越來越密切，在翻譯了**文藝政策**之後，他對於文藝應否受黨的嚴緊的指導的問題，祇能暫時置而不談，他認爲倘以文藝為政治鬥爭一翼的時候，這問題是不容易解決的（**集外集**單行本一六六頁），但到一九三六年，他必須在實際上解決這個問題。

魯迅相信文藝本身的階級性，他在和第三種人爭論，主張……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 都有一個『自己』， 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於他自己的藝術人，也就是忠實他本階級的作者……

他參加**左翼作家聯盟**，並不因而自命爲無產階級作家，他相信自己是本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携貳分子，有時簡直自稱爲破落户子弟，他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致蕭軍信說：

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親才窮下來，所以我其實是『破落户子弟』，不過我很感謝我父親的窮下來（他不會賺錢），使我因此明白了許多事情。因為我自己是這樣的出身，明白底細，所以別的破落户子弟的裝腔作勢，和暴發户子弟之自鳴風雅，給我一解剖，他們便弄得一敗塗地，我好像一個『戰士』了。使我自己說，我大約也還是一個破落户，不過思想較新，也時常想到別人和將來，因此也比較得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

那麼魯迅是不是破落户子弟作家呢？不是，他是階級的移行者，本階級的叛徒，因而他是新興階級的同路人。

但他對於自己所寫的創作說：我並未為自己所寫的人物感動過。各種情形刺激我，早經麻木了，時時像一塊木頭，雖然有時會發火，但我自己並不覺痛。

從這個角度去了解魯迅和他的創作，就會破除最近許多關於魯迅的「神話」！

一九七四，一，二八

一條新註解

一九七三年五月出版的**魯迅雜文選**，對於魯迅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一文有新的註解，說：這首長詩『漢奸的供狀』，署名芸生，其實是『左』傾盲動主義頭子瞿秋白的作品。阿英在以『鷹隼』為筆名寫的『關於瞿秋白的文學遺著』（載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文匯報**）中有這樣一段話：秋白後期所作的詩歌，最為人稱道的，是在翻譯了蘇聯別德內衣馬托洛次基的長詩**沒有功夫唾罵**以後所作的**漢奸的供狀**。阿英是原**文學月報**的編輯，**漢奸的供狀**一稿的經手人。

這條註解非常新鮮有意義，自從文化大革命中判定瞿秋白爲叛徒後，凡是說到瞿秋白時，不是嘲弄，便是鄙夷。最近出版的一本左派雜誌，重又登了瞿秋白的**多餘的話**，這篇遺文在香港出版的雜誌上已登載了好多次，我覺得那時登載的意義，有點出於對一個革命家的遭遇的同情，現在則似乎有意「示衆」了。對於新出現的註解，我也有同樣的感想，揭發這篇被魯迅批評的長詩的作者爲誰，也是帶有「示衆」意義的，因爲他是「左傾盲動主義」的頭子。

把「右傾機會主義」歸之於陳獨秀，「左傾盲動主義」歸之於瞿秋白，這種說法絲毫沒有解釋在過去中國革命運動當中各種歷史錯誤的眞正原因。

新註解提出的證據是阿英（錢杏邨）的文章，但這是孤證，當時及以後並無別人的記載，周揚時期印行的**魯迅全集**

（4），關於這篇文章的註解是：這首詩題名『漢奸的供狀』，發表在**文學月報**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版）上，它的本意是在諷刺『自由人』的胡秋原的反動言論，可是其中有魯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嚴重的缺點和錯誤。並不指名道姓，僅此而已。

魯迅寫了批評之後，不再談到這個問題，但新出的**魯迅書信選**，在魯迅致曹聚仁的信後又有新的註解，據註⑨云：這裏揭露的是周揚一伙『左』傾機會主義者的罪惡行為。一九三二年底，周揚在其主編的**文學月報**上發表署名芸生的長詩**漢奸的供狀**，不久，魯迅寫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一文，批判了他們『左』傾機會主義的惡劣傾向。周揚一伙陽奉陰違，口是心非，表面上稱魯迅的意見是『尊貴的指示』，背地裏又指使走卒祝秀俠之流，用假名夾雜着真名攻擊誣蔑魯迅『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魯迅致曹聚仁的信寫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夜，祇簡單地說：歷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這句話是泛指，不定是專說周揚指使祝秀俠化名反擊的事。但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致蕭軍的信上，確實說得非常具體：那個雜誌的文章，難做得很，我先前也曾從公意做過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夾雜着真名，印出公開信來罵我，他們還造一個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錯者。我提出質問，但結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領，我真好像見鬼，怕了。……

魯迅的一篇嚴正的批評，引出了如許糾紛，可見他在**左聯**雖受「尊重」，與**左聯**的眞正領導者周揚，關係實在非常惡劣。但如說**漢奸的供狀**是瞿秋白所作，我還是不能無疑，第一，魯迅與瞿秋白的締交是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或更早些，瞿秋白從四中全會被打下來後，眞像魯迅所說，正在回頭鑽入草莽，舐掉血跡。他隱居在上海南市謝澹如家中，足不出戶，魯迅就是到那裏去訪問他的。以後交情日密，

共同從事文學鬥爭，魯迅視之爲**生平得一知己足矣**，可見他們相互之間的契合。**漢奸的供狀**登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的**文學月報**上，如果係瞿秋白所作，魯迅事先事後應該知道，可是他一見這首詩，立即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說：

> 尤其不堪的是結末的辱罵。現在有些作品，往往並非必要而偏在對話裏寫上許多罵語去，好像以為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罵詈愈多，就愈是無產者作品似的。其實好的工農之中，並不隨口罵人的多得很，作者不應該將上海流氓的行為，塗在他們身上的。即使有喜歡罵人的無產者，也只是一種壞脾氣，作者應該由文藝加以糾正，萬不可再來展開，使將來的無產階級社會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鬧得不可開交。況且即是筆戰…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國志演義』式戰法，至於罵一句爹娘，揚長而去，還自以為勝利，那簡直是阿Q式的戰法了。
>
> 接着又是什麼『剖西瓜』之類的恐嚇，這也是極不對的，我想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為要殺人……現在雖然很有什麼『殺人放火』的傳聞，但這只是一種誣陷。……而我們的作者，却將革命的工農用筆塗成一個嚇人的鬼臉，由我看來，真是鹵莽之極了。

這首長詩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出版的**亂彈**，一九五三年十月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上均未登載，據筆者記憶，**亂彈**出版前，我曾見過瞿秋白幾本用鉛筆寫的練習簿原稿，其中並無這首長詩。我們知道，瞿秋白的文章，政治性的不必說，從**赤都心史**到**多餘的話**，從沒有像魯迅所批評的那種惡劣表現，瞿秋白是標準的知識分子共產黨人，不像別德內衣那樣擅長講「粗口」，現在我們已無法看到**漢奸的供狀**這首長詩，但據魯迅批評，這首詩的「粗口」是超過**沒有功夫唾罵**

的。我們可以斷定，這首長詩與瞿秋白的文品是不類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出版的**瞿秋白筆名印譜**，蒐集了瞿秋白一生中用過的名字，上自小名阿雙，下至被捕時臨時造的名字林祺祥，蒐羅甚備，但其中沒有「芸生」這個名字。

倒是在**瞿秋白文集**第一冊中，有二篇文章——**慈善家的媽媽**和**鬼臉的辯護**，那是對於魯迅批評的聲援，後者的副題是「對於首甲等的批評」，他指出首甲等爲反擊魯迅而寫的文章非常錯誤——他們判定魯迅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他認爲魯迅的批評能提高文化革命鬥爭的任務，他的論點和魯迅一樣，反對**丟那媽**，以及牽纏着祖宗三代的辱罵，他認爲這是由於承受了封建宗法社會的文化遺產的弱點，表示無能的氣急。

如果這首長詩是瞿秋白自己寫的，他會如此批評嗎？

我們知道，**丟那媽**是廣東人的國罵，魯迅到了廣州才知道的，這首長詩應該是屬於廣東籍的詩人所寫，江蘇常州籍的瞿秋白在筆頭上無論如何寫不出**丟那媽**。

新出版的幾本有關魯迅的書，特別是**魯迅書信選**，其中有從未發表過的魯迅談到與**左聯**發生齟齬的信，這對於三〇年代文學以至政治爭論的歷史眞相，具有無比的價值。共產黨讓文學從屬於政治，而政治又從屬於個人的權力地位，所以他們沒有客觀存在的眞實的歷史及評價，歷史人物也成爲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魯迅和瞿秋白都是如此。

別德內衣有名的詩**沒有功夫唾罵**，是一首政治鬥爭的歪曲的反映，目的只爲反對托洛次基。現在蘇聯出版的列寧全集，對於托洛次基，齊諾維埃夫等當時反對史大林的政治上的犧牲者，已有比較公平的記述，不再加以誣蔑和辱罵了，雖然對於他們爲史大林所謀害不置一詞。

至於別德內衣呢，雖然他的反托表現得到史大林的恩寵，不久却失了歡，史大林對他作了尖銳的批評：他在二十

年代末，滾到實際上造成了破壞黨性，污衊蘇維埃政權，解除工人階級武裝的結果。這在史大林時代，等於反革命罪行，有可能充軍到西伯利亞的勞動營去做苦工的（見**史大林與蘇聯文學**第二十頁）。

八七會議中因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而上台的瞿秋白，想不到自己背上「左傾盲動主義」的歷史罪名，而又從革命家變成「叛徒」，現在談到當年的文壇故事，也眞是「多餘的話」了。

清黨前魯迅的革命觀

魯迅對於革命文學的見解，是一九二五年接觸了蘇聯文學之後形成的，他最先注意的是蘇聯的文學思想與批評，我們從他附錄在**日記**後面的書帳中可以知道，一月六日，他買了**新俄文學的曙光期**；二月十四日，買了**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八月十一日，買了**俄國文學的理想與現實**；八月二十六日，買了**文學與革命**……這些都是日譯本。在三〇年以前，他深受**文學與革命**一書的影响，經常引用牠，經常複述其中的意見，在和**創造社**的爭論中，經常用托洛次基的文學觀點爲自己張目。

在文學作品方面，他最先介紹的是布洛克的**十二個**，這本書對當時的年青人影响很大，我記得，癩皮狗似的資產階級，在風雪中行進的十二個紅軍兵士……加上生動的木刻插圖，至今仍保持着新鮮印象。爲了解釋布洛克，魯迅特地譯了**文學與革命**的一章——「亞歷山大·布洛克」，作爲附錄。

可惜這本書絕了版，以後也沒有人肯化力氣去重譯。對於魯迅和托洛次基文學思想的關係，崇拜魯迅的人更諱莫如深，因爲一涉及這個問題，便會被人視作異端分子。魯迅自己後來也爲了政治上的理由，竟嘲笑誣蔑托洛次基的被迫流亡，完全墮入了勢利觀點。

魯迅雖然熟悉**文學與革命**的評斷，他却並不因此成爲一

個共產主義者。在陌生的廣州，正當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清黨之前，他深夜坐在中山大學的大鐘樓上，還搞不清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分別，他個人仍是一貫地無法與現實調和，他說：那時我對於廣州無愛憎，因而也無欣戚，無褒貶。我抱着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中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在這樣索漠的心境中，他記起了蘇俄曾經有名的詩人，**十二個**作者勃洛克的話來：——

共產黨不妨礙做詩，但於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礙，大作家者，是感覺自己〔是〕一切創作的核心，在自己裏面保持着規律的。（**魯迅全集**（4）第二三頁）

魯迅的索漠，是不是由於共產黨妨礙他做大作家呢？我們不知道。但他對於革命的態度說得很明顯：

> 老實說，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確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命起來，或者我所熟悉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麼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拼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魯迅全集**（4）第二五頁）

在魯迅看來，革命之於他，不如吃一杯牛奶更好。

魯迅所引布洛克的話，不是布洛克說的，他因爲手頭沒有**文學與革命**這本書，所以記錯了。（他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寫信給李霽野說：托洛次基的書我沒有帶出，現在寫給密斯許，托她在寓中一尋……）

十月革命以後，蘇聯文學主要是「同路人」文學，他們來自舊社會，他們雖然肯定了革命，却和共產主義格格不相入，所以他們保有道德與藝術的兩重性。托洛次基說：

> 在娜傑希達•巴夫洛維奇(Nadezihida Pavlovlch)寫的布洛克回憶中，有如下一句話：『布爾雪維克並不妨礙你寫詩，但他們妨礙你自己感覺到是一個主人；他

要是一個主人，他就感到他的創造底軸心，且能保持他內心的韻律。』……布爾雪維克派妨礙一個人自覺為主人，因為一個主人，他的內心裏一定要有一個有機的，無可否定的軸心，而布爾雪維克派却已推翻了這個主要的軸心，沒有一個革命底『同路人』內心中還帶有這個軸心。」（**文學與革命**——雙山譯，四八頁）

魯迅憑記憶錯引了關於布洛克的話，因之把這個話的原來的精神面貌改變了，「同路人」之自覺失去了軸心，那是由於革命推翻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緣故。共產黨本身並不會妨礙什麼人自認爲大作家的。

由於魯迅錯誤的引用，因而也使他發生了錯誤的了解，他後來雖然成爲共產黨的「同路人」，却始終沒有失却作爲他個人的軸心，他保持這個軸心，所以能夠在死前反對共產黨聯合陣線的投降政策。

魯迅與伊羅生

魯迅的外國朋友，除日本人外， 主要有三個人， 斯諾（**魯迅日記**作「施樂」）、史沫特列、和伊羅生。關於前二個人和魯迅的友誼，說的人很多，關於後一個人，簡直沒有人提起，因爲他曾是托派，而他所著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中譯作**中國革命史**，托洛次基曾爲之作序，則是權威性的著作，在國際學術界非常出名。

魯迅日記：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得伊羅生信。

（當時伊羅生在上海創辦英文的**中國論壇報**，與左翼作家互有聯系。）

日記：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下午伊洛生來。

五月二十八日，以**戈理基短篇小說序**稿寄伊羅生。

七月五日，晚伊君來，邀至其寓夜飯，同席六人。

十一月三日，上午葉洛聲來，贈以**僞自由書**一本。

（十四日，**中國論壇**被國民黨特務所搗毀。）

據伊羅生爲**中國革命史**中文本所作的新序，他是一九三〇年來中國的，目的是研究和撰寫有關中國最近發生的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他本是個史大林主義者，但當一九三二年十月五日，托派領導者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被國民黨逮捕之後，在上海的共產黨中央（王明領導）逼迫伊羅生在**中國論壇**上登載汚衊陳獨秀的文稿，引起伊羅生的極大反感，由此他通過上海英文**大美晚報**編輯葛拉斯夫婦的關

係，加入托派的地下組織。

這種政治思想的改變，我們無從知道他和魯迅之間是否坦白談過。不久，他得到托派劉仁靜的合作，到北京去搜集革命史的資料。

魯迅日記：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伊君來。

三月二十五日，夜招知味觀來寓治饌，為伊君夫婦餞行。

七月二十八日，午後得羅生信。

二十日，得羅生信。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與保宗同復羅生信。

他們通信中所談的事，當是有關**草鞋脚**的事，魯迅曾於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作**草鞋脚**序，收入**且介亭雜文一集**中，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寫的「附記」中特地說明：

草鞋脚是現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應伊羅生 H. Isaacs 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選出，他更加選擇，譯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還沒有出版。

魯迅日記中所說的保宗，可見是茅盾的化名。

魯迅寫「附記」的時候，伊羅生已回到了美國，我們不知道他離開上海的正確日期，但八月九日，他在挪威和托洛次基會面，討論中國革命中的許多問題，這篇談話紀錄蒐集在**中國革命問題**這本書中。

伊羅生到了美國之後，一度和魯迅通信，**日記**：十月七日，得伊羅生信。十六日，夜覆伊羅生信。

以後就不再在**日記**上出現伊羅生的名字。

伊羅生費四年之力寫成的**中國革命悲劇**，出版於一九三八年，魯迅當然不及見到。這本書有多種文字譯本，一九四七年出版了中譯本，現在香港又重印出版，伊羅生爲新版寫了序，其中有云：

愈研究這歷史的資料，我愈覺得托洛次基事實上對

中國每一主要的轉捩點曾作出十分精確的推測，並極其準確地把這部歷史劇的主角刻劃出來。他對黨官方路線的分析和批判曾屢被證實。而本書對這些證據作有史以來首次的詳細檢討，這事實是不會隨時間或作者觀點的轉變而改變的。

他對於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在中國取得政權 ， 認爲那是帶着不可思議的因果相尋的奇妙的辯證法，使得列寧主義產生了史大林主義與托洛次基主義的對立，史大林主義與托洛次基主義又合而成爲一個新的革命的毛澤東主義。

一九三八年，共產黨在武漢誣衊陳獨秀爲漢奸時，康生的文章中曾提到伊羅生，說他和葛拉斯夫婦都是與日寇有關的「托匪」。抗戰中期，伊羅生又以美國某報記者名義到了重慶， 共產黨的**新華日報**捧過他， 但有意把他的名字譯做「伊薩克」，不再提他是「托匪」。

魯迅的「批孔」

魯迅對孔子的正確態度，具見於他在一九三五年所寫的一篇文章：**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中，因爲當時日本一方面侵略中國，一方面在國內提倡尊孔。表面上，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日本早已是「禮義之邦」了，魯迅年青時去日本留學，弘文學院的學監大久保就領着他們去謁「御茶之水」地方的聖廟。現在（一九三五年）湯島地方又新造了一座聖廟，湖南省主席何鍵寄去了一幅向來珍藏的孔子畫像，所以魯迅也寫了這篇文章登在日本的**改造**雜誌上。

魯迅是同情孔子生時的遭遇的，因爲他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並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於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由，後來也因為和敵人戰鬥，被擊斷了冠纓，……被人砍成肉醬了。

魯迅認爲孔子直到死後，才被種種權勢者用了種種的白粉給他化了粧，才算變了聖人的。他和民衆並無什麼關係，那些權勢者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着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在三四十年前，凡有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之為『敲門磚』……孔子這人，其實是自

從死了之後，也總是當着『敲門磚』的差使的。

所以孔子和民衆並無關係， 人們之要打倒他， 不過是厭惡和尚，恨及袈裟而已。

魯迅認爲二十世紀開始以來， 孔子的運氣很壞， 袁世凱，孫傳芳，張宗昌都想把他當「敲門磚」，可是時代不同了，他們都明明白白的失敗了。

那麼在解放之後二十五年 ， 去袁世凱的時代已六十二年，說林彪還想利用孔子當「敲門磚」，誰能相信呢？

林彪攻訐毛澤東的名句是披馬列之皮，奉始皇之法，行孔孟之道，毛澤東對於奉始皇之法，直認不諱，對於行孔孟之道，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所以批林批孔成爲一體，究其實， 這都和民衆毫不相干的， 但作爲統治者的藝術，孔夫子今天仍似乎陰魂不散，這可也由統治者自己的揭發。二十五年來，老百姓讀的是**毛選**，不是**四書五經**，他們實在是並不認識孔夫子的。

「清明時節」

讀魯迅的**清明時節**，不免使人「發思古之幽情」。中國人其實向來沒有宗教的，輪迴的思想，鬼神的祭享，都不是有規模的宗教，中國人又傾向於多神教，所以更沒有占統治的宗教，中國人有的是祖先崇拜，這是家族制度的反映，也是經濟發展程度的反映。中國的資本主義已完全沒有出路，牠在發展中途早已腐爛了，牠瓦解了家族制度，却仍殘留着祖先崇拜的落後意識。

這種落後意識不僅支配了個人，也支配了國家的統治階級。

這是一九三四年，滿洲國已經成立，華北也特殊化了，全面抗戰沒有開始，國民黨還在力求和平相處之道，於是溥儀皇帝派人到關內來祭祖，國民黨也派戴季陶、邵力子、楊虎城等到咸陽周陵去祭文王、武王、周公的坟，又到茂陵去祭漢武帝、霍去病、衞青的坟。前者的功蹟是「屏四夷」，後者的功蹟是「驅匈奴」。至於溥儀的目的，也許是要憑先王之靈，長驅入中國，可惜他們滿族早已與漢族同化，名存實亡，現在祇能爲日本皇帝作先驅了。

魯迅寫**清明時節**，是把掃墓救國當做笑話講的，因爲中國人一向喜歡造些和大人物相關的名勝，石門有『子路止宿處』，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處』，一個小山洞，是埋着大禹，幾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

魯迅的譏笑也許並不能動搖統治階級的一片「誠心」，因爲他們向來是「不問蒼生問鬼神」的。

再過了二年，即一九三八年，又是淸明節，共產黨派張國燾到陝西中部縣去陪國民黨祭黃陵，他乘機脫了黨，這是中共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

據他的回憶記述，黃帝被視為中華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於延安西安間的中部縣，每年四月四日都要舉行一次盛大的祭禮，例由國民政府派大員主持，這一次的祭禮是由國民政府特派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主祭，我以邊區政府主席的身份參加陪祭。在抗戰後的第一年，這種祭禮有奮發民族意識的作用，我選擇在這個時候離開中共，雖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義。

我們沒有興趣研究張國燾所說的政治意義，黃帝不過是中國民族的歷史傳說，這傳說富有神話色彩，幾堆大土堆，國民黨和共產黨不免貽魯迅以「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之譏，即使共產黨的行動不過是在玩弄政治手段，那也是卑劣的政治手段，爲魯迅所不齒的。

但讀了今天（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大公報**的一篇文章，簡直使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且引開頭的幾句話如下：

> 一九六〇年五月的一天，在萬里長城山海關外的『孟姜女』廟前，來了一幫子衣冠楚楚的新『祭客』。他們圍着廟宇又是瞻仰憑吊，又是頂禮膜拜，十分動情。
>
> 這伙人中，為首的就是那個一有機會就惡毒咒罵秦始皇的林彪。

作者接着攷據孟姜女故事的歷史衍變，證明這故事是反對秦始皇的儒家編造出來的。林彪反對秦始皇（實則是毛澤東），所以崇儒尊孔，對孟姜女也「非其鬼而祭之」了。

九大時手拿着小紅本子跟在毛澤東身後亦步亦趨的林彪形象，我早覺得是小丑一個；但那時他是四個偉大的毛主席

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誰敢冒生命危險去揭發一九六〇年林彪祭拜「孟姜女」那樣的小丑行徑？

神話是拆穿不得的，創造神話的人既然是小丑，那麼神就不再是「**神**」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幾十萬的人變成了「**鬼**」，現在還有誰去提起？

一九七四，五，一九。

重讀魯迅的「阿金」

魯迅的**故事新編**，編集於一九三五年底，所以成爲爭論的**出關**，就已蒐羅在內。他早一年寫的**阿金**，後一年寫的**我的第一個師父**、**女吊**都祇編入**且介亭雜文**，這三篇與雜文完全不同的文字，應該再編入**朝花夕拾**中。

最後的一篇**女吊**，是有爲而發的，魯迅反對向國民黨投降的聯合陣線政策，開頭就引用明末王思愼的話，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以此痛斥贈人以犯而勿較或勿念舊惡的人面東西。

阿金表面看來似乎是卽興之作，他頗欣賞阿金的坦白：

> 你這老×沒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但對阿金也頗有非議，因爲**她無情，也沒有魄力**，眼看自己的愛人被人追擊，趕快關上了後門。

阿金時時引起巷戰，卽使有暫時的和平，魯迅又担心這和平不過是兩次戰爭的時日。

魯迅因此引起了對於人事的從新疑惑，他說：

>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裏，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但向來男性的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現在阿金卻以一個貌不出衆，

才不驚人的娘姨，不用一個月，就在我眼前攪亂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個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麼，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見了：足夠鬧出大大的亂子來。

魯迅的推論當然有歷史根據，社會改變了，時代不同了，但有許多現象，往往會讓人感到是歷史的重演。魯迅是相信中國的婦女有一天會獲得解放的，他可以幻想未來的社會就會是理想的世界。我們不說魯迅的預言有多少準確性，只爲了推往可以知來，歷史畢竟是人創造的，歷史有牠的躍進和倒退，躍進的時候使人覺得史無前例，倒退的時候就會覺得又是歷史的循環了。

重讀**阿金**，不免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魯迅的「騙人」

魯迅是主張戰鬥的，他一生不懈不息地在戰鬥，但他也有消極的一面，像是他戰鬥生活中的陰影。一個戰士有時也需要休息，有時也會失望， 也會心灰意冷， 他常常喜歡引用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斐的詩：絕望之為虛妄，與希望同。

魯迅從一九三四年起，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他死爲止，時時流露出這種失望的感情，失望一變而爲悲憤，他像裹傷再戰的戰士，悲憤又使他獲得力量。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日記**：脊痛，以後日記上就不斷有熱度的記載；直到十二月十七日：病後大瘦，義齒已與齒齦不合，因赴高橋醫師寓，請其修正之。夜塗莨宕丁幾以治背痛。

二十九日：略飲卽醉臥。他病後已不勝酒力了。

但在這期間，他仍然工作，寫了許多雜文，計蒐集在**花邊文學**的有二十四篇，蒐集在**且介亭雜文**的有十七篇，其中一篇簡直是力作：**門外文談**。

如果不讀他的**日記**，那就不會知道他在抱病工作。

十二月十一日，他寫了**病後雜談**，十七日又寫了**病後雜談之餘**，據他附記所說：前一篇在**文學**上登出來時，只剩下第一段， 其餘的都給檢查官刪削了， 以致有一個作家評論說：魯迅是贊成生病的 ；第二篇則……不說不准登，也不說可登，也不動貴手删削，就是一個支支吾吾。發行人沒有

法，來找我自己刪改了一些，然而聽說還是不行，終於由發行人執筆，檢查官動口，再刪一通，這才能在四卷三號上登出，題目自必須改為**病後餘談**，小註**關於舒憤懣**這一句也不准有……

這二篇文章主要是談他在病中看**蜀碧**這本書後的感想，從張獻忠談到明朝皇帝的凶殘虐殺(以剝皮始，以剝皮終)。

我要說的是魯迅當時異常的心境，因爲他竟想到做人的另一種方法，他竟想到最好要能騙人。

> 例如**蜀碧**，總可以說是夠慘的書了，然而序文後面卻刻着一位樂齋先生的批語道：『古穆有魏晋間人筆意。』
>
> 這真是天大的本領！……
>
> 我放下書，合了眼睛，躺着想想學這本領的方法，……瞑想的結果，擬定了兩手太極拳。一、是對於世事要『浮光掠影』，隨時忘卻，不甚了然，彷彿有些關心，卻又並不懇切；二、是對於現實要『蔽聰塞明』，麻木冷靜，不受感觸，先由努力，後成自然。第一種的名稱不大好聽，第二種卻也是卻病延年的要訣，連古之儒者也不諱言的，這都是大道，還有一種輕捷的小道，是：彼此說謊，自欺欺人。
>
> 撒一點小謊，可以解無聊，也可以消悶氣，到後來，忘卻了真，相信了謊。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來。

魯迅的這種想法，直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更有直率的表達，他的文章題目就是**我要騙人**。

> 疲勞到沒有法子的時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現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來試試，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好像貝類一樣，外面非有殼不可的。……
>
> 為了希求心的暫時的平安，作為窮餘的一策，我近

來發明了別樣的方法了，這就是騙人。

雖說他要騙人，但其實他還是睜着眼睛自願地被人所騙，有一天，他去電影院散悶，剛要跨進大門，被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學生，在募集水災的捐款，因為冷，連鼻子尖也凍得通紅。我說沒有零錢，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覺得對不起人，就帶她進了電影院，買過門票之後，付給她一塊錢。她這回是非常高興了，稱贊我道，『你是好人』，……他知道這一塊錢不夠水利局的老爺們買一天的烟卷，總算是買了這天真爛漫的孩子的歡喜。

魯迅這篇文章是爲日本的雜誌寫的，目的並不僅僅在乎暴露自己政府的醜惡。對於日本人，他說也祇能寫寫騙人的文章，他認爲即使到了斷頭台上閃爍着太陽的圓圈，也不是披瀝眞心的時候，所以他祇能臨末用血添寫幾句個人的豫感，這可是騙不得人的眞實。

他寫了這篇文章以後不久，眞正的被人騙了，話說三月十日那天，他接到一個不相識者由漢口寄來的信，要求他替白莽的遺稿孩兒塔做一篇序，他在春夜的淒冷中，引起了很深的惆悵，白莽是被殺的五個青年作者之一，經過五年，現在他又在竭力要忘却的感情上泛起像被刮的新鮮的魚鱗似的記憶……可是這一次，實在是他受了騙，連他的感情在內。

他在三月二日的日記上說：得史岩信，此即史濟行也，無恥之尤！

四月二十一日又說：午後得史岩信片，即史濟行也，此人可謂無恥矣。

原來魯迅發現史岩即史濟行，史濟行即齊涵之。他在漢口編印一本雜誌，化名齊涵之，借白莽的名字向魯迅騙稿，魯迅在續記裏說：

> 中國原是『把人不當人』的地方，即使無端誣人為投降或轉變，國賊或漢奸，社會上也並不以為奇怪。所

以史濟行的把戲，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要特地聲明的，只在請讀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兒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這希望，因為這是我先受了欺騙，一轉而為我又欺騙了讀者的。

這段感慨的前面幾句話，根本拉不到文壇小偸史濟行那樣的人身上，但總是實有所指，不久之後，在「**答徐懋庸的信**」上，我們知道魯迅罵的實在是周揚一夥。

魯迅於一九三〇年加入**左聯**，越到後來，魯迅越感到他們（周揚一夥）做的許多事都是騙人騙己的勾當，早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他給胡風信說：

> 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是怎樣的苦境。

明白了這樣的背景之後，我們才知道魯迅爲什麽在三年中不斷提及**騙人**這兩個字。

一九七四，五，二三。

對于魯迅的斷想

魯迅對於人生是猶疑而又固執的，他覺得人生是痛苦的，要免除痛苦，惟有用驕傲與玩世不恭，他就有這個毛病，但他能夠用無賴手段，當作勝利，硬唱凱歌，算是樂趣，以此與痛苦搗亂，話雖如此，魯迅是既不驕傲，也並非玩世不恭的，我祇覺得他認眞得可怕，執着得極深，對於痛苦，能咬牙忍受，並不應用精神勝利法，所以他暴露阿Q，鞭斥阿Q。

×　×　×

他不認爲有資格領導青年，他自己也沒有指南針，他之不能領導青年，由於他認爲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卽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的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　×　×

因爲如此，所以他對社會的戰鬥並不挺身而出，所以他不勸別人犧牲，否則他早已和陳獨秀李大釗一道去組織共產黨，從事革命了。他走他自己的路。如果走路時遇到歧路，他不會像墨翟那樣慟哭而返，他先在歧路頭坐下來，歇一會，或者睡一覺，於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如果是窮塗，也不會像阮籍似的慟哭而返，他要在刺叢裏姑且走走……他至今還沒有遇到全是荊棘毫無可走的地方過……

× × ×

他雖然並不挺身而出的去戰鬥，但他決不躲避戰鬥，他主張壕塹戰，因爲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如果逼得非短兵相接不可，這時候， 沒有法子， 就短兵相接。

× × ×

他不容易給敵人壓倒，如果遇到老虎，我就自己爬上樹去，等牠餓得走去了再下來， 倘牠竟不走， 我就餓死在樹上，而且先用帶子縛住，連死屍也決不給牠吃。但倘若沒有樹呢，那麼。沒有法子， 只好請牠吃了， 但也不妨咬牠一口。這是魯迅戰鬥的基本精神，一直到他死的時候爲止，這精神並無移易，甚至引致了與共產黨第二次階級合作路線的直接衝突。

× × ×

魯迅雖然戰鬥，對將來却並無幻想，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裏，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是黃金世界的事……他的懷疑，直迫所謂黃金世界的中心，他說這話時是一九二五年，再過十年，人們認爲黃金世界已經實現了的蘇聯，正在進行可怕的黨案審判，十月革命的領導者都成了「叛徒」，放逐的放逐， 處死的處死了， 但那時魯迅給「黨見」所蔽，讚美史大林，夷落托洛次基。

× × ×

對於當時的革命者，魯迅却有這樣的批評：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 就是希望『將來』， 而對於『現在』這一個題目，都繳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

可是自認爲認定了現在這個題目的魯迅，却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却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着偏激的聲音……不過他終於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

認定現在是黑暗與虛無，而又不相信未來是黃金世界的人，在國民黨統治下，在共產黨統治下，都將是一個叛徒。以爲他會喊毛澤東萬歲的人，這只是在魯迅死後閹割魯迅的人，第一個閹割魯迅的人，就是景宋，但在魯迅的敵人周揚眼中，魯迅始終是個叛徒，魯迅的青年朋友一個個的被鬥倒鬥臭，景宋爲了自免，跟着也踢他們幾脚，人們利用死了的魯迅的老虎皮，却丟棄他的眞精神。

× × ×

他的眞精神，具見於下面的幾句話中：時代環境全部遷流，並且進步，而個人始終如故，毫無長進，這纔謂之『落伍者』。倘對於時代環境，懷着不滿， 要牠更好， 待較好時，又要牠更更好，卽不當有『落伍者』之稱。因爲世界上改革者的動機，大抵就是對於這時代環境的不滿的緣故。

魯迅不是革命家，是個改革者，當然不會是落伍者，時代環境在變遷，變遷的環境一定引起新的不滿，改革者如果沒有了不滿，就一定成爲落伍者，毫無長進了。他後來批評章太炎劉半農， 主要就是因爲環境變遷， 而他們「落伍」了。對於時代環境永遠抱着不滿的改革者，當然會成爲叛徒的，在魯迅死後， 這種不滿於時代環境的叛徒， 前有王實味，後有胡風和蕭軍，對於他們的消滅工作，主要是假周揚之手以行的，毛澤東時代需要的是歌功頌德者，不是對時代環境的新的不滿者，爲達到這一點，就必須閹割魯迅精神。

× × ×

魯迅擁護的蘇聯是十月革命的蘇聯 ， 但到他擁護時，（「**答國際文學社問**」）蘇聯已經變了質，和他所喜愛的，能創作出**鐵甲列車**、**毀滅**、**鐵流**的時代完全不同了，和他翻譯的討論**文藝政策**的時代完全不同了。魯迅擁護十月革命和由此產生的蘇聯，他不知道史大林及其官僚層已篡奪了蘇聯革命的果實，他用專制代替了民主，用一家獨尊代替了百花

齊放，用「靈魂的工程師」的稱號，「史大林獎金」的物質利益，直接用命令領導文藝領域，以此扼殺了十月革命初期那種活潑的文藝發展。魯迅對於這種改變，當時是難以察知的，也是難以深入了解的，但由於他的敏感，他說：我覺得現在的講建設的，還是先前的講戰鬥的——如**鐵甲列車、毀滅、鐵流等**——於我有興趣，並且有益……。爲什麼魯迅對蘇聯講建設的文學不感興趣呢，因爲那時的文學必須一致，蘇聯人民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蘇聯作家的思想上和創作上的立場的一致。（蘇共中央一九三三年四月「關於改組文藝團體」的決議） 如果不跟史大林 （他已代替了黨）一致，就會被逐出作家協會的。魯迅譯**文藝政策**時，是一九三〇年，魯迅非常推崇，而且深受影响的托洛次基著的**文學與革命**，中譯本出版於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李霽野韋素園合譯），但托洛次基對於文藝的意見，早在一九二五年，已被史大林操縱的全蘇聯無產階級作家第一次大會判定爲：無政府主義者的『左翼』辭句與門雪維克派的溫情主義的混合物，是應用於觀念形態和藝術的托洛次基主義。

至於在**文藝政策**中出現的許多當時文藝界人士，同路人也好，無產階級作家也好， 後來幾乎毫無例外的， 都被加上了「暗害分子」、「人民公敵」與「托洛次基分子」的罪名，被肅清了。

× × ×

蘇聯的文學爭論， 是在革命成功之後， 中國的文學爭論， 却在革命失敗之後， 從革命中擠出來的小資產階級作家，脫離了革命，却大喊無產階級文學，難怪郭沫若後來躲在日本從事攷古學， 研究甲骨文， 成仿吾去修善寺作溫泉浴，阿英研究明清小說，蔣光慈作了「麗莎的哀愁」，被視爲同情「白俄」，至於由「左翼轉爲右翼」，或竟躲了開去的，實繁有徒。

眞正站在左翼，認定了目標（舊社會舊思想），不斷施以攻擊，至死靡已的，自然只有魯迅一個。但他也不完全是跟着共產黨的指揮棒走的，只有在共產黨能容忍他的時候，他才和共產黨一起走，到共產黨轉了向，要重新走階級合作的道路，投降國民黨的時候，他便和共產黨分手，而且不惜公開引起了爭論（現在把這種投降叫做「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

× × ×

可是魯迅在死前四個月寫了給托派的信，使他不能不成爲一個政治上的勢利之徒，不能不最後一次給共產黨作政治上的利用，他所獻出的是一張垂死的老虎的皮，讓共產黨此後好多年用魯迅致托派的信作爲對國民黨資產階級投降政策的遮羞布。魯迅是値得原諒的，他老了，而且在病中，到病後淸楚明白了共產黨的醜惡面目，盡全力予以一擊之後，他一定回復到歷次戰鬥後的那種虛無之感。但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已在箭拔弩張，引滿待發了。托派對他精神上的衝擊，他無法接受，他已沒有精力和時間，去硏究托派的意見和史托之間的政治是非。他在馮雪峯的影响之下，不得不來一次急速的攤牌，因爲周揚一夥正在攻擊他們是「漢奸」，是「托派」。

× × ×

毛澤東的好友斯諾，生前曾出版了一本「大河彼岸」，描繪今日的紅色中國，在論文學與音樂的一章中，有一段話談到魯迅：

> ……現在這個社會已經改正了被魯迅及其弟子們所無情暴露過的某些蠢事。但若魯迅今天還活着，如果這個單薄短小的身軀裏仍然有那同樣的勇氣在，也將不能把人生遠遠地投射出去，以致超出那一套流行的現實價値（意卽被認爲有價値的種種現實——譯者）中種種極爲愚蠢與暴虐之事——在黨本身尚未開始出來改正這些

愚蠢與暴虐之前，他是不會這樣做的。他不會被活埋；多半他也不會被監禁，有如南斯拉夫之時時監禁傑拉斯那樣，不過他一定會被迫去試作思想改造。這樣，這位藝術家會被逼沉默或被逼去重覆黨的老生常談——直至黨的自我批評能終於停止這些廢話並且以新的一套集體常談獲得官方批准爲止。（這段話中譯本全部被删）

斯諾提出的問題，也就是人們時時提出的問題，每當國內在政治上並在文藝政策上發生一次重大改變運動的時候，人們不禁想或問，如果魯迅活着，他將採取如何態度？在周揚領導文藝達十八年之久的期間內，魯迅如果不被逼沉默，也會被逼去重覆黨的老生常談嗎？毛澤東親自處理的「胡風反革命」（五把刀子問題）事件發生時，魯迅還能奮起替他辯護嗎？他能像許廣平那樣，用「四個偉大」來稱頌毛澤東嗎？或者像周建人那樣，時時去重覆黨的老生常談？我個人的答覆是否定的，因爲這都不合魯迅的爲「人」。

一九七四，五，二五。

魯迅對於「死」的觀念

早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魯迅給景宋的信中，就已談到了對死的觀念，他說：

……例如我是詛咒『人間苦』，而不嫌惡『死』，因為『苦』可以設法減輕而『死』是必然的事，雖曰盡頭，也不足悲哀。

這是一個學醫的人的看法，把死視為生理上的必然，故不足悲哀；又是一個戰鬥者的看法，把生當作人間苦，必須去減輕，減輕就需要鬥爭；又是一個哲人的看法，對生盡生的責，對死盡死的責，對於兩者都處之坦然。

時隔約九年，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脊痛，八月九日，脊痛頗烈，雖不是大病，也遷延了幾個月，開始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喫東西。經過幾回檢查，他相信沒有死症，而且藉着養病之名，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只是躺着看**蜀碧**、**蜀龜鑑**，和**安龍逸史**等線裝書，這又使他覺得不像活在人間。

病愈後，他寫了**病後雜談**和**之餘**，結末他說：

我在寫着這些的時候，病是要算已經好了的了，用不着寫遺書。但我想在這裏趁便拜托我的相識的朋友，將來我死掉之後，即使在中國還有追悼的可能，也千萬不要給我開追悼會或者出什麼紀念册。因為這不過是活人的講演或輓聯的鬥法場，為了造語驚人，對仗工穩起見，有些文豪們是簡直不恤於胡說八道的。……

他雖說用不着寫遺書，實際上這就是遺書，可惜直到他死後，沒有人遵照他的遺書辦事，而且也沒有人省下那些紙墨白布的閑錢，去印他所希望的明清人著的**野史**。

到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他的舊病復發了（他於九月三日給母親信說：男所生的病，報上雖說是神經衰弱，其實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經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灣趕出後的一回，和章士釗鬧後的一回，躺到過的，就都是這病……）。三日**日記**：夜肩及脅均大痛，延至六月五日，簡直不能記日記。三十日才在五日之下補寫了如下的句子：

> 自此以後，日漸委頓，終至艱於起坐，遂不復記，其間一時頗虞奄忽，但竟漸愈，稍能坐立誦讀，至今則可畧作數十字矣。但**日記**是否以明日始，則近頗懶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熱時志。

七月一日以後，他一直寫**日記**，直到十月十七日爲止，第三天，他死了！

在這大病期間，他仍寫了許多文章，最用力的是化了四天功夫寫成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至此，他與共產黨的文藝領導人澈底決裂了。

在大病中，魯迅有意識地面對着死的問題，這使他有了前所未有的經驗，寫下了**這也是生活**和**死**兩篇文章。

> ……但回憶十餘年前，對於死却還沒有感到這麼深切。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爲無足輕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 中國人最怕死。 這其實是不確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則有之。

這裏所說的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則有之，是一句很沉痛的話， 因爲自一九二七年以後， 常常有許多魯迅所愛護的，或他所不識的青年們模模胡胡的死掉了。

魯迅的病，經過美國醫生D的診斷，因爲他自己是學醫的，認爲極其準確， 即：倘是歐洲人， 則在五年前已經死

掉。他不介意於他的宣告，但因爲日夜躺着，無力談話，無力看書，……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

想的結果，他歸納出七條遺囑，關於自己的，除老朋友外，不得收受任何人一文錢，要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關於許廣平和海嬰的，要她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最後兩條，是他一生經驗的積聚，牠有普遍的意義，不僅對於他自己的親人爲然，那是：

六，别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最後的一條，如果與他接着寫的**女吊**合起來看，那麼意義就更明顯，**女吊**的結尾說：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幫閒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

對於抗日統一戰線和國防文學的爭論，魯迅在死前不久，做出了這樣必要的結論，但人們從來對這點避而不談。

魯迅不是消極的接受死，祇要他能覺得存在，便將生活下去，即使是從無慾望狀態中蘇生過來，他也希望能看來看去的看一下，這也是生活呀！

他由此悟得生活本身之重要，生活是全面的，平凡的生活也是重要的，他說：刪除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

魯迅認爲有一些事從未爲人所注意，他在病中才經驗到疲勞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適，久病又使他記起年齡，由年齡又想起體力恢復後應該着手做的事情——要趕快做。這是一個畢生從事鬥爭的人的心情，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自然，死是會到來的，他在默默的躺着時，就發生了更迫切的思想，認爲這樣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並不痛苦。此

外，他不再談到死後的事，但我不能不記起他在二年前悼念韋素園時說的話：

> 文人的遺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蠭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一九七四，五，三〇

魯迅與「左聯」關係的始終

馮雪峯寫的**回憶魯迅**，在大陸久已成爲禁書，他竭力要把魯迅說成是**左聯**的領導者，不能不談到魯迅對**左聯**的不滿，這就觸犯了手執毛澤東文藝上方寶劍的周揚之忌，他的被清算是命定的。

魯迅其實不是**左聯**的領導者，表面上看，魯迅受人尊崇，他是批評和反對國民黨的一面大旗，可是魯迅非常清楚他和**左聯**關係的限度，他和他們是親而不密的，如果說他有旣親且密的年青朋友，那麼**未名社**時期的台靜農、李霽野、曹靖華，章川島；**左聯**後期的胡風和雪峯；站在**左聯**之外的蕭軍肖紅等都是，他能和他們談談心底裏的話，情誼至死不渝。

魯迅加入**左聯**，當然是他一生中的絕大轉變，按照他全部的戰鬥史看，這種轉變並不突然，他從參加**新青年**開始，無時無刻不在和漫天的黑暗作戰，直到一九三四年，他**對國際文學社問**，仍說：我大約仍然只能暴露舊社會的壞處。

舊社會的壞處，依魯迅看來，「正人君子，第三種人，民族文學家，奴隸總管」都是代表人物，而這些人物中，魯迅又認爲祇有二類人：破落户子弟和暴發户子弟。他無情地和他們鬥爭，他說：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

魯迅的思想進步很踏實，他固然因爲**創造社**擠他看了幾種科學的文藝論，救正他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但他還是從經

驗上吸取的爲多，他說：我何嘗懂得什麼經濟學或看了什麼宣傳文字，**資本論**不但未嘗寓目，連手碰也沒有過。然而啟示我的是事實，而且並非外國的事實，倒是中國的事實，中國的非『匪區』的事實。……

必須先明白魯迅獨立的思想根源，才可以談到他和**左聯**的始終。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聯**開了成立大會，魯迅出席演說，劈頭一句話，就是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我曾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雜憶**一文說過， 魯迅這句話引起了一陣哄笑， 魯迅的話是認真的，他不會如周作人晚年所批評的故意與人家拗一調，因爲不久之後，魯迅的警告就應驗了。

他在給章廷謙的信裏說得很清楚：……但願有英俊出於中國之心，終於未死， 所以此次應青年之請， 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同盟**。……然而他在會場中，一覽了薈萃於上海的革命作家，都是茄花色的，所以不得不又有作梯子之險，但他看得他們太低能，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呢，不免嘆一聲哀哉了。

這封信到一九七三年四月才發表，非常具體地說明了魯迅當時的心情，同樣意思的話，我們還可從**魯迅書簡**中拾綴出來，例如他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七日致韋素園信說：上海去年嚷了一陣革命文學，由我看來，那些作品，其實都是小資產階級觀念的產物，有些則簡直是軍閥腦子。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到一九三〇年，那些『革命文學家』支持不下去了，創、太二社的人們始改變戰畧，找我及其他先前為他們所反對的作家，組織**左聯**……

過不了幾個月，**左聯**本身起了變化，這當然由於國民黨的壓迫。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致蕭軍信說：其實，**左聯**開始的基礎就不大好，因為那時沒有現在似的壓迫，所以有些人以為，一經加入， 就可稱為前進， 而又並無大危險

的，不料壓迫來了，就逃走了一批。這還不算壞，有的竟至於反而賣消息去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左聯**的五個作家遇難，魯迅哀悼殊深，這些殉難的青年，是維繫魯迅向前鬥爭的精神支柱。他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函胡今虛說：好的青年，自然有的，我親見他們遇害，親見他們受苦，如果沒有這些人，我真可以『息息肩』了。

可是魯迅和**左聯**逐漸發生了齟齬，原因起於魯迅的批評，這種批評精神是非常可貴的，但作爲史大林主義的共產黨人，最容不得批評，他們用所謂「自我批評」來抵擋眞正的批評，魯迅却犯了「批評」的錯誤。

一九三二年魯迅寫的文章最少，蒐集在**南腔北調集**的不過九篇。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發生戰事，魯迅全家倉皇走避，二月十九日才回家，生活不安定，自然是原因之一，但和**左聯**的關係說來，決不能說是親密的，更不必說他起了什麼領導作用了，反之，他在十二月十日寫了篇**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鬥**的文章，以通訊方式登在周起應（卽周揚）編的**文學月報**上。

這篇文章有挑戰性，他先稱讚第四期的**文學月報**上出現了幾個新的作家，打破了沉悶的局面。這話的反面，也可以解釋做**左聯**一向持有宗派關門主義的傾向。

魯迅的批評集中在一首「芸生」署名的詩——**漢奸的供狀**上，說作者對於敵人的辱罵與恐嚇，那是在把革命的工農用筆塗成一個嚇人的鬼臉。

他說：中國歷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翻一翻大部的歷史，就往往可以遇見這樣的文章，直到現在，還在應用，而且更加厲害。但我想，這一份遺產，還是都讓給叭兒狗文藝家去承受罷，我們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拋棄了它，是會和他們成為『一丘之貉』的。

表面上，周揚接受了魯迅的批評，實際上，他指使祝秀

俠（筆名首甲）夥同方萌郭冰若丘東平在**現代文化**上寫了文章反擊，後來魯迅在給蕭軍信說：

那個雜誌（按：**文學月報**）的文章，難做得很，我先前也曾從公意做過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夾雜着真名，印出公開信來罵我 ， 他們還造一個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錯者。我提出質問，但結果模模胡胡，不得要領，我真好像見鬼，怕了。後來又遇到相像的事兩回，我的心至今還沒有熱。……

魯迅這話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說的，時隔二年有餘，魯迅的心還沒有熱，可見他和**左聯**的實際關係如何了。

以後，在周揚領導之下，對魯迅時時發出冷箭，最主要的冷箭來自周揚化名芷因， 廖沫沙化名林然， 田漢化名紹伯，張春橋化名狄克。魯迅的反應是，說得好些，就是我們的同人中有些人頭腦也太簡單，友敵不分……，說得壞些，上海有這樣『革命的』青年，由此顯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取悅於某方。這並不是我的神經過敏，『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一箭之來，我是明白來意的。

在一九三四——三六這三年中，魯迅對於周揚一夥，簡直到了深惡痛疾的程度。例如，一九三四年六月廿一日，他致鄭振鐸信：罵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則自己不做事，而罵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是更做事者。若與此輩理論，可以被牽連到白費唇舌，一事無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無益處。我現在得了妙法，是謠言不辯，誣衊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順便中，則偶刺之。……

十二月六日致蕭軍信：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裏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裏。因此，就有時會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還要照先前那樣做事的，雖然現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學問所限，不能慰青年們的渴望，然而我毫無退縮之意。

十八日致楊霽雲信：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

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因為防不勝防。例如紹伯之流，我至今還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為了防後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後，格外費力。身體不好，倒是年齡關係，和他們不相干，不過我有時確也憤慨，覺得枉費許多氣力，用在正經事上，成績可以好得多。

魯迅創造出橫站二個字，眞是語言上的一絕，對於一個鬥士說來，他主要是對付正面的敵人，但自己陣營裏時時有冷箭射來，於是他祇得橫站着作戰，你看這是怎樣的苦事！

從一九三〇到一九三六年，國民黨的壓迫不僅兇殘，而且精緻，他們從史大林和希特拉那裏學會了種種特務方法對付革命者，**左聯**內部不斷有人動搖以至叛變，最著名的見於魯迅文章和書信的，有下列幾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蕭軍信：蓬子轉向，丁玲還活着，政府在養她。

十七日信：蓬子的變化，我看是只因為他不願意坐牢，其實他本來是一個浪漫性的人物。凡有知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左翼興盛的時候，以為這是時髦，立刻左傾，待到壓迫來了，他受不住，又即刻變化，甚而至於賣朋友（但蓬子未做這事），作為倒過去的見面禮。……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他致鄭振鐸信：穆公木天也反正了，他與另三人作一獻上之報告，毀左翼惟恐不至，和先前之激昂慷慨，判若兩人，但我深怕他有一天又會激烈起來，判我們之印古董以重罪也。（穆公們之獻文，是登在秘密刊物裏的，不知怎的為日本人所得，譯載在支那研究資料上了，遂使我們局外人亦得欣賞。他說：某翼中有兩個太上皇，亦即傀儡，乃我與仲方。其實這種意見，他大約蓄之已久，不過不到時候，沒有說出來。然則尚未顯出原形之所謂『朋友』也者，豈不可怕？）

對於田漢，因爲他發射的暗箭最多，便不像對蓬子似的

多恕辭了。

魯迅是公開明顯地表示憎惡田漢的，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答戲週刊編者信**上說：……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一集**的附記上說：

> 答戲週刊編者信的末尾，是對於紹伯先生那篇『調和』的答覆。聽說當時我們有一位姓沈的『戰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這老頭子又發牢騷了！』『頭子』而『老』，『牢騷』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認真的。
>
> 不過向戲週刊編者去『發牢騷』，別人也許會覺得奇怪。然而並不，因為編者之一是田漢同志，而田漢同志也就是紹伯先生。

一九三五年二月，田漢在上海被捕，迅即遞解南京，曾有一首獄中作的七律傳來，慷慨激昂，壯志冲天，當時左翼作家忽然都做起舊詩來，和者甚多，我到現在仍記得田漢原作中的一句：「劇盜何妨並枕頭」，可惜現在已無從覓得全詩了。可是過不多久，他在南京大演其戲，變化之速，使人瞠目結舌。去年（一九七三）四月在**魯迅書信選**上第一次發表的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致曹靖華信有云：

> 近十年來，為文藝的事，實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結果是受傷。認真一點，畧有信用，就大家來打擊。去年田漢作文說我是調和派，我作文詰問，他函答道，因為我名譽好，亂說也無害的。後來他變成這樣（按指變節事），我們的戰友之一（按指周揚）卻為他辯護道，他有大計畫，此刻不能定論。我真覺得不是巧人，在中國是很難存活的。

魯迅與周揚一夥不斷的明爭暗鬥，往往在給朋友的信中發洩他的怨言，給蕭軍和胡風的信中談得最多，他甚至阻止

蕭軍加入左聯，他說：

……三郎的事情，我幾乎可以無須思索，說出我的意見來，是：現在不必進去。最初的事，說起來話長了，不論它。就是近幾年，我覺得還是在外圍的人們裏，出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裏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却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是怎樣的苦境。

這信寫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 。對於左聯的工作與捐款，他都與周揚唱對台。六月二十八日的信說：

……我實在有些不願意出門。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裏坐了。記得托爾斯泰的什麼小說說過，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險的，但一看見大將面前防彈的鐵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帥以為生命價值，彼此不同，那我也無話可說，只好被打軍棍。

八月二十四日信：昨天遇見徐君 ，說第一期還差十餘元……。我說，我一個錢也沒有。其實，這是容易辦的，不過我想應該大家出一點，也就是大家都負點責任。從我自己這方面看起來，我先前實在也有些『浪費』。

九月十二日信：今天要給文學做論壇 ，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得替狀元捧場，一面又要顧及第三種人，不能示弱，此所謂『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也。

魯迅所謂元帥，所謂狀元，簡直呼之欲出，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史大林作風，黨即是王明，後來即是毛澤東，從三〇

年代的上海文藝界說，黨卽是周揚。

一九三六年，爲了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魯迅和周揚發生了正面的激烈衝突，在左翼作家之中，這問題實現爲二個口號之爭，爭論期間，托派陳仲山（其昌）給了魯迅一封信，使得鬥爭更形複雜，表面上，魯迅是贊成抗日統一戰線的，而且也不一定反對「國防文學」，實質上，他澈底反對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投降政策，絕不妥協。

周揚爲了實行第三國際決定的投降政策，背着魯迅解散了**左翼作家聯盟**，別組**作家協會**（後改爲**文藝家協會**），馮雪峯在**回憶魯迅**中說魯迅並不否認曾經同意解散 ， 這是曲筆，不可信的。魯迅對於這次解散不斷攻擊，例如他在四月五日致王冶秋信說：現此翼已經解散，別組什麼協會之類，我是決不進去了。又於五月四日信上說：近日這裏在開作家協會，喊國防文學，我鑒於前車，沒有加入，而英雄們却認此為破壞國家大計，甚至在集會上宣佈我的罪狀。我其實也真的可以什麼也不做了，不做倒無罪。然而中國究竟也不是他們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來已作二文反擊（按指**三月的租界**和**出關的「關」**），他們是空壳，大約不久就要消聲匿迹的：這一流人，先前已經出了不少。魯迅自已也對馮雪峯說：就這樣解散了，毫不看重這是一條戰線。

周揚通過何家槐，要求魯迅參加發起**作家協會**，魯迅堅決拒絕，他於四月二十四日回信說：我曾經加入過集團，雖然現在竟不知道這集團是否還在，也不能看見最末的**文學生活**，但自覺於公事並無益處。這回範圍更大，事業也更大，實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簽名並不難，但掛名却無聊之至，所以我決定不加入。

所謂「集團」，當然指**左翼作家聯盟**，所謂**文學生活**，那是周揚一夥秘密出版的油印刋物，目的在乎「打擊魯迅，製造分裂」的，所以魯迅看不到這些刋物。魯迅聲明不加入之後，周揚又通過徐懋庸加以詰問，魯迅回信說：

來信收到， 關於我的信件而發生的問題， 答覆於下：

一、集團要解散，我是聽到了的，此後卽無下文，亦無通知，似乎守着秘密。這也有必要。但這是同人所決定，還是別人參加了意見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後者，那是潰散。這並不很小的關係，我確是一無所聞。

二、我所指的刊物， 是已經油印了的。 最末的一本，曾在別處見過實物，此後確是不出了。這事還早，是否已在先生負責之後，我沒有查攷。

至於『是非』，『謠言』，『一般的傳說』，我不想來推究或解釋，『文禍』已夠麻煩，『語禍』或『謠禍』更是防不勝防，而且也洗不勝洗……

好在現在舊團體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沒有加入，不再會因我而引起一點糾紛。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全都從此結束了。

到此，魯迅斬釘截鐵地和周揚（他代表共產黨的文藝一翼）們決裂了。

但是事情並沒有完，魯迅說過：一向做下來的事，自然還是要做的，他不會就此放下武器。

魯迅不參加**作家協會**，於六月十五日聯合六十三個作家發表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他們沒有組織什麼團體，我想主要是因爲魯迅在病中，魯迅的病始於一月三日，他仍力疾工作不輟，直到六月五日，他躺下了，連日記都無法再記，七月一日起，他可以記日記了，病仍纏綿不已。這時，羣仙就大佈圍剿陣，徐懋庸雄赳赳首先打上門來。於是魯迅不得不化了四天功夫 ， 寫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長文，他認爲投一光輝，可使伏在大纛蔭下的羣魔嘴臉畢現，因爲寫這信的雖是他一個，却代表着某一羣。

但他無力完成預定要做的工作。他曾於五月二十三日致

曹靖華信說，上海的所謂『文學家』，真是不成樣子，只會玩小花樣，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萬字，把歷來所受的悶氣，都說出來，這其實也是留給將來的一點遺產。

也許他寫了這篇文章的，共產黨不願意牠發表出來，正如我們第一次在**魯迅書信選**上看到未曾發表的許多書信一樣。

徐懋庸八月一日給魯迅的信，誠如魯迅所說，橫暴得可以。魯迅不怕他們圍剿，但對於其他青年，魯迅的勸告不一，譬如蕭軍，他主張不要加入**左聯**，對於時玳，則勸他加入**作家協會**，我想這是他衡人衡事的結果，蕭軍夫婦新到上海，魯迅不願他們捲入無聊的糾紛，寧願自己化錢替他們印書，這是愛護他們；時玳大概是久居上海的青年，必須和這「一羣」人發生關係。他給時玳的信說：我看你也還是加入的好，一個未經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發瘋的。加入以後，倒未必有什麼大麻煩，無非幫幫所謂指導者攻擊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點較費力的工作，以及聽些謠言。國防文學的作品是不會有的，只不過攻打何人何派反對國防文學，罪大惡極。這樣糾纏下去，一直弄到自己無聊，讀者無聊，於是在無聲無臭中完結。……

魯迅給徐懋庸的信太出名，凡是讀魯迅文章的人一定不會放過，所以我們不必具引，這裏也有許多人，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蹟的，這篇文章是他們一面極好的鏡子。

魯迅斷定**左翼作家聯盟**的解散是潰散，一點不錯。以後的**文藝家協會**再也不像**左聯**似的成爲一個鬥爭團體，因爲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為，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

國防文學是有的，魯迅批評說，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

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為九天護國娘娘了。他指的是夏衍寫的**賽金花**劇本，當時被稱爲國防文學的實績。

對於他們，魯迅認爲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但以後周揚在毛澤東支持之下，飛揚跋扈了三十年，關於魯迅和**左聯**的齟齬，我們引用姚文元的說法，作爲那些年頭官方統治意見的證明：

> 魯迅逝世前那一段短時間裏，胡風、馮雪峯等進行了惡毒的挑撥，企圖利用魯迅來分裂進步文藝界。由胡風、馮雪峯挑起的兩個口號的論爭，其目的就是企圖削弱、破壞文藝界的團結。魯迅當時在病中，對有些情況是不清楚的。然而，盡管他們用了種種挑撥離間的手段，捏造了誹謗革命同志的事實，使魯迅不能了解有些事情的真相，甚至誤解，使他心中很不愉快，但終掩蓋不了上述的魯迅的真正的立場與觀點。經過反胡風鬥爭與反右派鬥爭，已經把胡風的罪惡活動和馮雪峯蒙蔽魯迅，敵視、打擊上海文藝界地下黨的反黨活動，揭露得很清楚了。（**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姚文元著，一九五九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一三四頁。）

姚文元的話正是當時周揚一夥的官方意見，是否符合歷史眞相，讀者自能判斷。我只是想用魯迅自己說過的話，說明他和**左聯**關係的始終，拆穿後來附會在他身上的許多「神話」而已。

一九七四，六，一〇。

魯迅論「國罵」

魯迅走了許多地方後，驚異於國罵之博大而精微，但他還是尊他媽的爲正宗國罵。據他說：他媽的之所以爲國罵，因爲德國和日本都沒有恰當的譯法，前者把牠譯做我使用過你的媽，後者把牠譯做你的媽是我的母狗，當然譯得神韻全非了。

魯迅攷證不出他媽的起於何時，但他佩服發明這一句他媽的人物是天才——卑劣的天才。而在魯迅的故鄉，這國罵更簡化爲媽的，醇化爲我的親愛的一樣意思了。

魯迅是否曾經用他媽的罵過人，我們無從攷證，他愛用狗罵人，則從他日記上斑斑可攷。例如他初到北京的一九一二年——

> 七月十二日，聞臨時教育會議竟刪美育，此種豚犬，可憐可憐。
>
> 八月十二日，半夜後鄰客以閩語高談，狺狺如犬相嚙，不得安睡。
>
> 九月二十日，隣室又來閩客，至夜半猶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
>
> 十月七日，晚隣閩又嗥。
>
> 一九一三年二月八日，上午赴部，車夭誤蹍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數人，突來亂擊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嘆！

以後在他的日記裏，不再有同樣記載。

到了廣東以後，他最先學會的是廣東國罵，廣東國罵也如其他國罵一樣， 正宗的是*丢那媽*； 簡畧的祇有一個字：*丢*；複雜的則是*丢你老母海*。這*丢海*兩字，魯迅記得在東京聽章太炎講過：**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在廣東，讀若 Tiu 或 Tiuhei ，後一字當寫作「州戲」。

魯迅是反對國罵的，三〇年代的左翼作家，有的歡喜在作品上寫些粗言穢語，以示無產階級化。魯迅曾寫了篇**辱罵和恐嚇不是戰鬥**的文章糾正他們，這就成了他和周揚一系發生齟齬的開始。魯迅的糾正是對的，新興階級並不是一言不合，就祖宗三代的罵人的。

那麼，這篇罵人的題作**漢奸的供狀**的長詩如何罵法呢，牠除掉要像西瓜一樣剖開人家的腦袋外 ， 還應用了廣東國罵：

丢那媽！

魯迅談讀經

早在一九二五年時，魯迅就已說過，尊孔，崇儒，讀經，復古，由來已經很久了。却不料時當一九七四年，距離魯迅說這話時已經過了五十年，還喧喧嚷嚷地大反其孔，眞使人有由來已經很久了之嘆！

但魯迅說得好，如果眞正有人主張讀經（當然也尊孔）的一定是個笨牛，因爲提倡讀經尊孔的濶人，內心並不如此。

魯迅認爲濶人懂得學而優則仕，而孔子則是聖之時者也，只要武則天做皇帝，誰敢說男尊女卑？所以提倡讀經的人，一定是濶人而又是聰明人，他們從古書裏學到了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

這種聰明人是把人當作笨牛看的，讀經不過是要把戲偶而用到的工具而已。

所以魯迅要把那些正經老實的反讀經的人們也歸入到誠心誠意主張讀經的笨牛一類裏面去。

今年的批孔算是非常熱鬧的了，當然，不論林彪怎樣寫了幾幅克己復禮的字條，貼在臥室內，代替了「毛語錄」，或頒贈他的同志們，究竟他沒有明目張胆的主張讀經，提倡尊孔，照魯迅的理論演述，倒是那些拚命反孔的人，把批孔批林拉在一起的人，其實不過是笨牛而已。

我想，世間何嘗眞有什麼笨牛，從前提倡讀經的濶人，

固然想把別人當作笨牛， 現在拚命反孔的人， 又何嘗不是「聰明人」？

魯迅向來把尊孔讀經視作一種統治藝術，即使在革命後的蘇聯，魯迅也認爲如果在列寧治下 ， 則共產之合於葛天氏，一定可以攷據出來的。蘇聯人當然不會是孔孟之徒，但只要有列寧，魯迅認爲共產主義也就深通古道了。一九二五年時候，魯迅實在並不明白社會主義革命的眞實意義，他不過據中國的治道來推論罷了。但在實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已達二十六年之久的中國，如果魯迅還活着，倘不想做笨牛，他一定會跟在楊榮國後面去批孔吧 ， 因爲他也會深刻地了解到，「披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是現實的政治，「批林批孔」也是現實的政治，這和章士釗時代並無二致。批孔不過是要把戲偶而用到的工具，別無其他作用。

中國的文化確實悠久，一生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作生死鬥爭的人，不論王明、劉少奇、毛澤東、林彪，個個跳不出孔子這個「維護奴隸制度者」劃定的圈套，那麼你究竟把他們看做笨牛還是聰明人呢，請問？

魯迅談「唐代的釘梢」

魯迅的雜感，都是有所爲而發的，即是「言之有物」。他從沒有寄托閒情之作，但有一篇文章，由於逸出了他原本要想說的範圍，更由於文字優美，簡直和其他的文章不相稱了。我說的是蒐集在**二心集**內的一篇**唐代的釘梢**。

上海的流氓，如果看中了一塊肥肉，總是先「釘梢」，後「拆梢」，釘梢就是尾隨，拆梢就是敲竹槓，相當於廣東話裏的「講數」。但釘的不一定是女人。

釘女人的梢，這事也常有，也許歷盡波折之後，終於會兩情相悅，也許會一事無成，這究竟不是社會大事，無關宏旨的。

一九三〇年以後，國民黨的特務統治很厲害，特務統治形成了白色恐怖，眞如魯迅所說，簡直使人不知活在人間。可是特務手段却是蘇聯的輸入品，那時有許多蘇聯回來的學生，一到上海，就向南京報到，號稱二十八宿之一的孫際明就是如此，這批人成爲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的骨幹分子。「釘梢」是緝捕革命者的初步手段，有時神出鬼沒，被釘梢者需要十分警覺，才能擺脫背後的「尾巴」。

現在這手段已爲任何統治者所普遍應用了。

魯迅自然有被釘梢的經驗，可是他筆頭一滑，竟談到**唐代的釘梢**去了，材料又如此香艷的。

那是他在讀**花間集**張泌的一首「浣紗溪」引起的：

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帘輕，慢迴嬌眼笑盈

盈；消息未通何計是，便須佯醉且隨行，依稀聞道「太狂生」。

魯迅把牠譯成了白話詩，天衣無縫，堪稱一絕。

夜趕洋車路上飛，
東風吹起印度綢衫子，顯出腿兒肥，
亂丟俏眼笑迷迷。
難以扳談有什麼法子呢？
只能帶着油腔滑調且釘梢，
好像聽得罵道殺千刀！

魯迅這篇文章登在當時**左聯**的機關刋物**北斗**上，從鬥爭的觀點看來，無論如何是不調和的，所以我說大概是魯迅一時寫滑了筆，顯出他對於舊詩詞的癖好來了。

可是這就應了他一年之後所反對的一句話：

……將屠夫的凶殘， 使大家化為一笑， 收場大吉了。

我希望我說的話對於魯迅不致於太過穿鑿。

魯迅與周揚的兩個口號之爭

兩個口號之爭，是一次政治鬥爭，不僅僅是文藝鬥爭，鬥爭的主角，一方面是代表王明路線（他又代表史大林的七大路線）的周揚，一方面是符合以後毛澤東路線的魯迅，這鬥爭繼續發展，直至中國共產黨的七次大會（一九四五年四月）才算結束。但反映到文藝方面的鬥爭，要到一九六六年方始揭開面幕，這次對周揚的淸算，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淸算對象已不是王明，而是劉少奇，揭發二個口號之爭的歷史眞相，並不表示魯迅意見的勝利，因爲一九四二年之後，魯迅的思想與作風，也早已爲毛澤東所淸算了。

兩個口號之爭的根源，完全由於史大林世界政策的改變，史大林的「第三時期」理論，打擊了世界無產階級的統一行動，結果幫助了眞正的法西斯希特勒上台，史大林在驚慌失措之餘，來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日，共產國際七次大會宣佈實行人民陣線政策，連帝國主義統治階級都在聯合之列。在亞洲方面，日本帝國主義正在積極侵畧中國，中國共產黨主力紅軍，在失敗之後向西北流竄，到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抵達陝北，結束長征，三十萬紅軍祇剩下二萬五千人。

王明在遵義會議後，仍以中國共產黨國際代表名義駐在莫斯科，氣燄依然不可一世，他和康生出席國際七次大會，秉承史大林的意旨發言，在大會上提出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主張。並於八月一日擅用中國蘇維埃政府，中

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發表宣言，正式提出上述主張，並提出十大綱領，這綱領完全是改良主義的，當然不會談到抗日運動中由誰領導的問題。

八一宣言到達上海， 一定比陝北為早， 因為早在十二月，已有人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了。傳達八一宣言到陝北的，是林育英，據張國燾回憶：

> 一九三六年初（按：當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瓦窰堡會議之前），中共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林育英，從莫斯科回到陝北 。 他帶回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傳達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決議的要旨，重建了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聯繫。
>
> 林育英到達陝北後，立即致電給我……他主要說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否定了原有的蘇維埃運動，現在我們主要的口號，已不是『打倒蔣介石』，提倡『蘇維埃』和『土地革命』，甚至也不是『反蔣抗日』，而是『聯蔣抗日』，『抗日聯合政府』和『一切為了抗日』……
>
> 林育英這些電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間，整個世界都改變了……我們中有人驚奇於『聯蔣抗日』這句話，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小。……

林育英到達陝北後， 在中共內部引起的爭論， 一定很大，我們可以從毛澤東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看出，他所批評的「關門主義」，就是反對這個政策的左傾勢力，但毛澤東還是取得多數，接受國際的新政策。

瓦窰堡會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毛澤東本人對於國際新政策的接納，和王明的調子不同，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也不同，因為他強調這是「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在正式決議之外，他也絕不提「國防政府」，但他又和托洛次基派爭論「革命的轉變問題」，實際上，他所反對的是黨內左翼的意見，因為這一翼反對再次和國民黨聯合。

毛澤東在瓦窰堡會議中的報告，是由馮雪峯在一九三六

年四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親自傳達到上海的，他最先找到魯迅，魯迅懷着滿腹牢騷， 對上海正在活躍的提倡「國防文學」的周揚一夥，大表不滿，魯迅直覺的認爲共產黨的政策是投降，所以他對周揚一夥的活動概不參加，周揚一夥攻擊他爲「左」的宗派主義者，說「他們對於國防文學雖然到現在還是保持着超然的沉默的態度」。

在馮雪峯到上海之前，**左聯**已經解散，魯迅拒絕作正在籌組的**作家協會**的發起人。

（劉綬松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初稿**中竟說：「……於是在魯迅的領導之下，一九三六年初自動結束了**左聯**的活動。」這說法，簡直是對魯迅最大的誣枉。）

魯迅帶着責備的口氣對馮雪峯說：就這樣解散了，毫不看重這是一條戰線！

他並不把「國防文學」看做周揚幾個人提出的口號，他以爲投一光輝，可使伏在大纛陰下的羣魔嘴臉畢現。這羣魔當然指王明路線下面的共產黨人，不可能是別的。他說：也要聯合國民黨，那些先前投敵的分子，是最受歡迎的了。一下子將壓迫忘記得乾乾淨淨，是到底做不到的，以為壓迫會輕起來，那也是做夢！……

魯迅即使從個人感情出發，他也決不忘記對壓迫者的仇恨，他經歷過辛亥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對於反動勢力的終於復辟，他的仇恨帶有被壓迫階級的性質。早在一九二五年，他談到辛亥革命時說：我總覺得復讎是不足為奇的，雖然也並不想誣無抵抗主義者為無人格。但有時也想：報復，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有時也覺得寬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這話是怯漢所發明，因為他沒有報復的勇氣；或者倒是卑怯的壞人所創造，因為他貽害於人而怕人來報復，便騙以寬恕的美名。

這觀念直到一九三六年他死之前，迄未改變，而且更深刻，更廣泛，他把那種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人，稱之爲人面東西，這是共產黨聯合戰線必然的產物。

我確是不容易改變，就算記住敵人的仇是一種錯誤罷，也就只好錯誤了……不念舊惡，什麼話！

馮雪峯寫的這幾句話，對於魯迅的個性很傳神，但魯迅畢竟在馮雪峯所傳達的「毛澤東報告」中，得到一致。我想，毛澤東到達陝北定居後，對於在遵義會議中獲得的勝利，一定在短短的時期會設法加以鞏固的，史大林和王明在中國第二次革命前後的惡毒作用，他是有深切體會的，許多在史大林領導之下失敗的革命領袖，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等，都成了他的反面教員，但他決不敢直接和史大林鬥爭，他沒有條件和史大林的巨大威望相比，他那時已運用陽一套，陰一套的手法和王明鬥爭，但他不得不忍受王明的跋扈，因爲他的背後站着史大林。

馮雪峯當然不斷對魯迅說明毛澤東和王明之間的不同所在，所以魯迅就根據毛澤東提出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主張，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以與「國防文學」相對立。這口號不是魯迅一個人提出，是經過幾個人討論才提出的，我們知道，至少茅盾、胡風、馮雪峯都是參加者；而且不是由魯迅直接提出，他們委托胡風寫了篇**人民大衆向文學要求什麼**的文章提出來的。胡風寫了這文章後，迅即受到「國防文學」論者的大力圍剿，胡風概不答覆，這戰鬥直接轉移到魯迅身上。胡風後來表示，因為我的主將下了命令，說沉默有時是最有力的回答。……只好眼望着問題一直混亂下去。這期間，魯迅大病，到他奮力回擊時，已到八月三日，這篇費時四天的文章（**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簡直像雷轟電擊，萬喙息響。可是影响實在深遠，一九六六年清算周揚的最大理由，就是「國防文學」。以後清算劉少奇陳伯達時，「國防文學」口號也成爲他們的

罪名之一，他們被認爲曾經擁護過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

眞正反對「國防文學」的左傾文學家，祇有徐行一人，他在當時及以後，均被稱爲機械論者，教條主義者。他認爲眞正澈底反帝的社會層是中國出賣勞力的大衆，只有他們是前鋒，只有站在這觀點上的文學才是挽救中國的文學。

我們現在已不知這個徐行爲誰，照蒐集在**現階段的文學論戰**一書中他的二篇文章看來，他不僅反對「國防文學」，而且澈底反對用愛國主義名義的階級調和論者，他熟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且富有革命經驗，他是最先被圍剿的人，有人指他的論調和托洛次基反對國際上的反戰反法西斯聯合戰線的口吻相似，後來這個徐行不再有文章出現了。

魯迅的長文當然是在病後深思熟慮之下寫的，他堅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口號，但企圖與「國防文學」口號相調和，他認爲它是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瞭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裏去的不正確的意見而提出的；他主張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無產階級文學的一發展，但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他認爲托洛斯基的中國徒孫們，似乎胡塗到連這一點都不懂。他的這一種說法，正如他在**出關的『關』**中反對邱韵鐸的所說一樣，一爲而『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僅次於『無爲而無不爲』一等了，階級社會中，誰有這種玄妙的本領呢？魯迅推論到盡頭，不也變爲徒作大言的空談家了嗎？

不過我們是無法責怪魯迅的，他即使反對王明的投降主義，在史大林規定的國際路線下面，在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畧下面，他相信組織**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是第一義，他祇能相信毛澤東的話：現時的革命力量，是有了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煉的紅軍……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他們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夠善處同盟者。日本帝國

主義者和蔣介石能夠用縱横捭闔的手段來對付革命隊伍，共產黨也能夠用縱横捭闔的手段對付反革命隊伍……魯迅是寄托希望於毛澤東的。

經過一場鬥爭之後，魯迅的痼疾越來越沉重了，他退回到個人主義，不再參加任何團體，不久，他死了！

兩個口號之爭背後的兩條路線鬥爭，經歷了相當長的時期，魯迅死後，周揚已不再有對手，「國防文學」占盡了優勢，我記得，馮雪峯為了反對王明和周揚，脫離陣線回到浙西義烏故鄉去幽居，結果在抗戰時期被國民黨特務拘禁在息烽集中營（張學良也拘禁在那裏）。

魯迅死後兩個月，發生了西安事變，這是一條投降國民黨的通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進攻蘆溝橋，八月十三，進攻上海，於是國民黨被迫抗戰，國共合作有了具體條件，可是共產黨提出的政治要求，實現為如下形式：

國民大會變為國民參政會；

國防政府變為國民黨政府國防部的第三廳；

聯合戰線變為八路軍辦事處；

紅軍變為八路軍；

蘇維埃政府變為邊區政府。

在困難的局勢中，毛澤東對蔣介石和王明進行曲線鬥爭；他可以在**論新階段**中喊蔣介石為偉大領袖，但自始至終，絕不放棄獨立自主的立場，這立場貫澈到黨和軍隊的所有組織，深入人心。更由於國民黨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政府徹底腐爛，以致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投降政策無法行得通，到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七次大會時，王明和秦邦憲這兩個紅色買辦僅能在中委會中叨陪末座，史大林想經過他們完全控制共產黨的企圖完全失敗了。

一九七四，七，二〇

「曹子勃谿」？

魯迅曾慨嘆過標點古書之難，他舉下面一例：

『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說應該斷為『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的。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則』他的『士』，要不然，『其為士』就太唐突了。但也很難決定究竟是那一面對。

一九三四年前後，明人小品文經施蟄存之流提倡，出版了許多標點本，錯誤百出，所以魯迅寫了篇點句的難，說這些人看不懂古文。

不說標點，就是解釋一句句子（今人的「古文」），也是不易的。最近有位夏平先生，大談「曹子勃谿」問題，他解釋曹子是指阿丕和阿植，眞是他不說我還懂得，他一說我反糊塗了。

話說一九二七年魯迅爲了女師大問題，和正人君子筆戰，他在**咬文嚼字**一文上，對於女師大校長楊蔭瑜的與此曹子勃谿相向大肆譏嘲，因爲勃谿二字原出婦姑勃谿，他由此與須知學校猶家庭的說法相印證，知道有些人確實把校長和學生的爭端看做婆媳相罵的。但另有一種說法，那是引用相煎益急的古典，來說明這些爭端的，所以魯迅據此斷定引用那句成語的人，把爭端視爲兄弟鬩牆，像曹操的兒子阿丕和阿植似的了。

夏平先生說：

「校長和學生之間的爭執，用『曹子勃谿』，可以說是一誤而再誤。『曹子』是指曹丕和曹植在傳說中『七步詩』的故事，不能借來比喻師生，這是一誤。『勃谿』出自莊子外篇『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句，這是指婆媳相爭。大學女校長和女大學生之間，並非婆媳關係，這是再誤。」

不論如何引經據典，「與此曹子勃谿相向」，是不能截取「曹子勃谿」四字，把牠既解做「兄弟」，又解做「婆媳」的，魯迅說的完全是兩回事，一是指摘楊蔭瑜的說法：「婦姑勃谿」，一是指摘汪懋祖的說法：「相煎益急」，兩者風馬牛不相及！

把「與此曹子『勃谿相向』」，說做「與此『曹子勃谿』相向」，眞覺得點書難，解書更不易！

一九七四，九，一五

從中共的歷史發展證驗托派致魯迅的信

背景：四個爭論問題

魯迅致托派的信，向來爲反托人士所引用，但從來沒有人在歷史的光照之下，檢討這個托派陳仲山給魯迅的信，是否言之成理，是否符合客觀的歷史發展，現在距離當時已有三十八年，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已有二十五年，應該更有可能作一次深入的研究，證明陳仲山所說的是錯誤還是正確。

爲要理解托派陳仲山致魯迅信的時代背景，我們首先必須從歷史的回顧裏提一下當時蘇聯黨內對中國革命的爭論，爭論主要圍繞下列四個問題進行：

（一）**無產階級政黨底絕對獨立問題**　這爭論開始於一九二三年，史大林一系贊成加入國民黨，認爲國民黨是羣衆組織，是各階級底聯盟，共產黨應該加入進去，以便爭取羣衆，爭取領導，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共同進行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史大林一系領導之下，決定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托洛次基認爲國民黨不是什麼羣衆組織，而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共產黨在任何條件之下都不可加入資產階級政黨，更不可服從其紀律，信仰其主義。爲了爭取羣衆，爲要保證對全體革命羣衆的領導權，更爲要保證革命勝利及有利於向社會主義的發展，共產黨必須保持組織上與思想上的絕對獨立。

托洛次基的反對沒有用，一九二五年他提議中共退出國民黨，遭否決；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因中山艦案蔣介石發動一次政變，他再提議退出，仍被否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及七月十五日國民黨兩次清共後，已沒有國民黨可供加入了，但南昌暴動仍在青天白日旗下舉行，直到廣州暴動，這面旗幟才被人撕破了，改舉紅旗。

（二）**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問題**　這問題是以如下方式提出來的，即：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是否使中國的階級鬥爭緩和了，還是加緊了？史大林一系認為這壓迫可使中國內部的階級鬥爭減少到最小限度，所以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及農民可以結成四個階級聯盟，採取國民黨形式。

托洛次基猛烈地反對這個立場，他認為以為帝國主義機械似地從外面焊合了中國底一切階級，那是大錯特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不會減弱，但會增强諸階級底政治分化。帝國主義是中國內部關係中一個很强的力量，這個力量底主要來源，……是外國資本與本國資產階級間的經濟與政治的聯系。托洛次基認為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並無鴻溝之隔，這兩部分資產階級之間，比資產階級與工農之間，要無比地更接近些，資產階級之參加民族戰爭，有如內部的制動機，牠們以繼長增高的仇恨看待工農羣衆，愈來愈準備和帝國主義者妥協。所以他特別提出列寧的話作為警告：工人們必須叫民衆對資產階級政客底欺騙睜開眼睛，必須教他們不要信任空話，而祇要信任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自己的組織，他們自己的團結，他們自己的武裝。

（中國資產階級一連串屠殺工農的事實，打破了史大林四個階級聯盟的神話，但信奉史大林主義的毛澤東並未從這裏得出教訓，萬隆會議的五項原則，驅使印尼無產階級重受資產階級的屠殺；他們更進一步以武器幫助巴基斯坦的資產階級地主軍人的專制政權，去屠殺東巴的工農羣衆，第三世界的理論，就是殖民地四個階級聯盟理論的翻版。）

（三）**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問題**　這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對於中國社會中數量最大成分最雜的中間階層，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史大林一系以階級合作政策去迎合小資產階級上層領袖，去聯絡鄉村中的上層分子，特別是拉攏一些知識分子。他們勾搭汪精衞、鄧演達、宋慶齡，代替了爭取中間層的革命責任；托洛次基認爲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指的是被壓迫階級底幾千萬或幾萬萬城市與鄉村的廣大貧民。這個聯盟不能通過階級合作，必須工人階級領導城市與鄉村的廣大貧民，從事最澈底的階級鬥爭與土地革命。

（四）**組織蘇維埃問題**　當一九二六年北伐軍進入湖南，引起了無疑的革命進潮之時，托洛次基提議在中國開始組織蘇維埃，藉以匯合蜂擁而分散的諸股革命力量，藉以統一下層的鬥爭羣衆，實現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眞正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的統一戰線，由此防止軍事領袖，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領袖們底叛變。史大林們竭力反對，理由爲：①蘇維埃將破壞對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②將予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反對革命的口實；③蘇維埃是暴動機關，祇適用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期；④中國國民黨已經是實際上的蘇維埃。

但是，革命失敗之後，在退兵時的一戰的廣州暴動中，却組織了蘇維埃，而且以後一直進行蘇維埃政府的組織，直到一九三七年再次投降國民黨爲止。

明白了蘇聯黨內的爭論之後，我們才可以把陳仲山的信與**毛選**中的文章對照，主要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決議在一九六九年版的**毛選**中已被刪除。

瞿秋白的盲動主義

陳仲山的信寫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信的第一段如下：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中國康繆尼斯脫不採取退兵政策以預備再起，而乃轉向軍事投機。他們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後到處暴動，想在農民基礎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來，幾千萬勇敢有為的青年，被這種政策所犧牲掉，使現在民族運動高漲之時，城市民衆失掉革命的領袖，並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

這段文字包括的時間，起自一九二七年八月，迄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其間又可分爲瞿秋白領導的盲動主義時期，立三路線時期，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時期。我們且把當初的歷史大事簡列如下：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淸共；

七月十五日，武漢政府汪精衞正式淸共；

八月一日，南昌暴動，葉賀南征，旋卽失敗；

八月七日， 中共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 在九江召開會議，瞿秋白上台。

可是這個由國際決定的八七會議領導人瞿秋白，一開頭就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

關於瞿秋白領導的盲動主義政策，中共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如下論斷：

……『八七會議』 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 卻為『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藉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特別是强迫工人罷工）的傾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鬥爭，過份地或不適當地强調了領導幹部的單純的工人成份的意義，並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後繼續生長，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 ， 就形成為

『左』傾的盲動主義（即冒險主義）路線，並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時的盲動主義者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否認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顧敵人的强大和革命失敗後的羣衆情況，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羣衆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

瞿秋白的盲動主義路線，據官式記載，一九二八年初已經停止，到四月就在全國範圍內結束了，那麼何以有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不斷繼起呢？這是中共及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設下的陷阱，使他們一個接着一個跌下去的。

中共六次代表大會後的立三路線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由布哈林指導的，决議案斷定中國當時的局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牠批評了右的機會主義和左的盲動主義，但並不指出兩個高潮之間應該提出什麼策略，以從事革命鬥爭。

第三國際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也於同時舉行，通過了布哈林起草的綱領，此時史大林與布哈林的鬥爭已顯迹象，史大林提出的第三時期理論，决定了全世界共產黨未來的路線，影响到中國的就是立三路線。

第三時期理論宣布資本主義危機的極端尖銳化，在全世界範圍內，革命正走向高潮。中國共產黨在盲動主義之後，正徬徨無所適從，史大林既已排斥了托洛次基提出的國民會議口號及民主革命政綱，六大又爲事實所迫，不得不將蘇維埃改爲宣傳口號，從議事日程上取消了武裝暴動，於是遂使中共陷於進退失據境地。正在此時，聯共十六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九年四月開會，宣布中國革命的「高潮」快要到來，

就此鼓勵比瞿秋白時代更大規模的盲動，造成了更悲慘的後果。

「高潮」二字，引起中共當時領導人不少迷茫，要到如何程度才算是「高潮」，這是猜謎式的問題。據一位在上海參加領導工作的托派王凡西後來回憶（**雙山回憶錄**）說：

> 在最初，中共多數對這個指示傾向於較消極的接受，因為剛不久纔讓『滾牛奶燙壞了嘴』，如果將新高潮的快要到來作了左的解釋，又怕要碰破頭顱，周恩來和我們研究這個文件時候，就顯出非常謹慎，甚至有幾分為難。我們曾反反覆覆地研究了『高潮』二字的意義，查究了牠的原文。這二字本是俄文的翻譯，含有『高潮』和『高漲』兩層意思，牠有點等於英文中的Rise，所以周恩來最後說，中譯文應確定為『高漲』，他怕的是『高潮』會被了解成『最高潮』，因而重犯盲動的錯誤。至於『快要』二字，據我的記憶，我們在討論中的解釋，也傾向於較遠前途的。不過過不多久，由於國際第三時期的作風愈演愈烈，史大林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激烈左轉，再加上中國好些同志的附和，尤其是江西方面的意見，中央便日益從『左』的角度去解釋『高潮』與『快要』了。其結果便是所謂『立三路線』。

所謂江西方面的意見，就是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的意見。據現在的說法，這篇文章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信，批評他的悲觀思想的，我們引用他對『高潮』的解釋如下：

> 在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上，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缺少正確的認識。他們雖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
>
>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

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根據毛澤東的說法，快要到來的「高潮」，已是出現眼前的事，十月懷胎快要分娩了，他後來雖然批評立三路線，其實他是立三路線的擁護者、 促成者， 他應該分担牠的責任，他寫這篇文章時，已在江西成立蘇維埃政府，脫離了井崗山時代的侷促局面，所以從歷史上說來，像**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說，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時期內，不但在實踐上發展了第六次大會路線的正確方面，並正確地解決了許多為這次大會所不曾解決或不曾正確地解決的問題，這實在是一種神話。可是從**歷史問題決議案**看來，毛澤東與李立三之間是有分歧的， 雖然七月二十七日紅軍的進攻長沙， 占領三日，仍是立三路線的最高表現。決議說：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間，還在黨內存在着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又有了某些發展。……黨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領導，在六月十一日通過了『左』傾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使『左』傾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

關於毛澤東與李立三的分歧， 祇有單方面的敍述， 說李立三污衊毛澤東同志在長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 以農村包圍城市， 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 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決議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

會通過的， 接着開的是七次代表大會， 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綱， 他已是黨內永遠不犯錯誤的「神」， 李立三指摘他的話，我們祇能從**決議案**的引用中見到，所以無從判斷他們二人之間的分歧點是否如毛澤東事後所說，因而也無從判斷他們之間的分歧點誰是誰非。

立三路線的可笑可悲， 作者是身受的， 那時上海的工作，便是佔領馬路，起初是大馬路，即是英租界的南京路，凡可調動的工人和一般同志，三三兩兩地散立在馬路兩側，時間一到，就散傳單，喊口號，演說，過不多時，人高馬大的大批巡捕坐車到來了，動手捉人，最積極最勇敢的人最先被捉 ， 一個英國三道頭（這裏叫幫辦）用手叉住了我的後頸，我跌倒在地，幾個工人同志從後襲擊他，等我爬起，他們已打到幾丈遠。年青女工最勇敢，那時都留着髮辮，被捕時給包打探（這裏叫雜差）一手拉住兩條辮子，兩手四個，捉進捕房去，大多判六個月監禁。示威次數越多，參加人數越少，地點也逐漸改變，最後祇在北四川路短短一段路面舉行，祇要有一個人被捉，其他就悄然散去，那時接觸的省委區委時時換人，他們大都已關在監獄裏，所以領導也越來越薄弱，等於把革命者送給敵人去監禁。

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

立三路線的時期並不長， 據**決議**所說， 不到四個月時間，一九三〇年九月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及其後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線。但這次會議對立三路線採取「調和」態度，如說它的錯誤只是「策畧上」的，不是路線上的，實際在國際的「第三時期」哲學下面，誰敢反對這個路線？ 所以接着來的，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開的四中全會，就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强烈的宗派主義立場……在新的形態下， 繼續、 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就不是奇怪的事了。

陳紹禹（按：即王明）同志領導的『左』傾路線雖然也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强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認爲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或幾個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它並從『左』的觀點污衊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特別强調地宣稱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

決議案指出王明路線的錯誤，是在反對所謂目前黨內主要危險的右傾，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這兩句話表示王明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的衝突，和王明依仗史大林的撐腰，在黨內篡奪黨權的事實，雖然毛澤東不敢正面指斥史大林。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始於一九三一年九月，止於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據劉少奇在八屆代表會議上說，在王明路線下城市工作損失百分之百，三十萬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時祇剩下兩萬五千人。

反革命局勢下的革命民主運動

以上的叙述，主要根據共產黨及毛澤東的文獻，但完全和托派陳仲山致魯迅信所述的符合，現在還應該談一個問題：在反革命局勢之下，革命政黨應該採取何種策畧從事革命工作？

六大決議說中國局勢處在兩個高潮之間，那麼在新的浪潮未起之前，共產黨是否應該不斷暴動，不斷起義，以促成這新高潮的到來？毛澤東取得絕對勝利之後，作出**歷史問題的決議**，但除了批評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之外，對這點也是不置一詞的。因爲他的主要工作，從井崗

山起，到延安止，始終從事蘇維埃政權及紅軍的建立，直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共產國際七次大會放棄第三時期理論，在全世界採取人民陣線路線後，才一轉走到「右」傾機會主義。

一九二七年革命形勢大好時，史大林拒絕成立蘇維埃，到革命失敗，他又拒絕革命的民主運動及國民會議口號。

托洛次基認為一個革命黨底最大任務是要曉得如何及時地認識一個革命局勢，與如何澈底地利用牠。但同樣重要的，是要懂得，什麼時候這個局勢完結了，以及就政治觀點看，變成了非革命的局勢了。在反革命局勢下面組織蘇維埃，托洛次基比之為事後揮拳的勾當，史大林與布哈林將一次革命底尾巴當作了另一次革命的頭，由此確定了暴動路線，希望依靠在由革命餘波所激起的農民身上，單憑軍事行動，造成大革命，並保證其勝利。結果，大量流了中國革命者底血，又延緩了第三次眞正革命的到來。

我們知道了毛澤東對於「革命高潮」的解釋，如果以一九四六年算做中國新革命眞正到來的時候，那麼他所謂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竟逾時十六年方始誕生。

托派陳仲山的信中，並沒有正面提出在「兩個高潮之間」，托派主張的「革命民主鬥爭」的策畧，這策畧之符合現實的政治形勢，在共產黨中，至少是毛澤東本人，確有同樣的認識，而且他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過。

他在井崗山的鬥爭一文中說：

> 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澈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澈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係，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

……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漲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是必經的道路。

中央要我們發布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我們則提請中央制訂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不消說，毛澤東這個要求是落空的，民權革命的政綱早已爲史大林所排斥（他指托洛次基提出民主口號爲取消派）但四個階級聯盟的理論仍爲史大林所保持，亦爲毛澤東所信奉，所以托洛次基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阿拉木圖充軍地預言過：

……中國資產階級在牠的將來，還有不少的盤旋，傾向於左的政策。對於那些喜歡『民族聯合戰線』的人們將來還有許多引誘的機會。如果今天告訴中國共產黨員說：一九二四 — 二七年，你們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完全是正確的，但現在牠已經確定地跑到反革命營壘中去了，所以這聯合現在不適用了，這種說法，是於將來客觀環境發生轉變及資產階級必然左傾時，要第二次解除共產黨之武裝。

這預言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國際七次大會中應驗了。

共產國際的世界性的策略改變

七次大會提出了聯合戰線策略，以代替第三時期，基於這個改變，王明發表了**八一宣言**，毛澤東作了瓦窰堡報告，開始了第二次向資產階級投降的政策。

我們現在引用托派陳仲山致魯迅信的第二段如下：

現在 REDS 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繆尼斯脫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為，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面

目，發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衆的劊子手『聯合戰線』。藏匿了自己的旗幟，模糊了民衆的認識，使民衆認為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衆送交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史大林的這種無恥叛背行為，使中國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為要證實這段話，我們仍須從舊文獻中找出眞憑實據，首先是王明在莫斯科假借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名義發表的**八一宣言**，牠提出：

> 無論各黨各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該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該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一再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携手，共同救國。

為此，宣言號召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組織全中國的抗日聯軍。

毛澤東在延安立刻表示擁護**八一宣言**，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瓦窰堡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報告，對資產階級有如下的分析：

> 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呢？我們認為是有這種可能性的。這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有同外國資本

和本國土地關係較多的一部人，這一部分是資產階級的右翼……

可是什麼人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左」翼呢？據毛澤東的說法，那是蔡廷鍇等人領導的十九路軍，他們是代表着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眞是奇妙的階級分析，可是後來全面抗戰時，毛澤東又轉而大喊蔣委員長萬歲！

毛澤東對於資產階級的說法，正是模糊了民衆的認識，不管他用正面反面的說法，總是美化了資產階級的本質，爲了安慰資產階級起見，他又鄭重作出如下的保證：

> 人民共和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並不廢除非帝國主義的、非封建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而且還鼓勵這些工商業的發展。任何民族資本家，只要他不贊助帝國主義和中國賣國賊，我們就要保護他。在民主革命階段，勞資間的鬥爭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國的勞動法保護工人的利益，却並不反對民族資本家發財，並不反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

毛澤東和史大林王明不同的地方，在乎遵義會議以後他在黨內所占的地位，以及經過相當時期的休養生息之後，黨和軍隊業已恢復的自信，所以另一方面他對黨內反對聯合戰線的左翼分子說：

> 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鍊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鍊的紅軍。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如果現時還沒有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
>
> 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們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夠善處同盟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對付革命隊伍，共產黨也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對付反革命隊伍。

毛澤東的「獨立自主」道路

經過八年抗戰四年內戰之後，毛澤東不僅戰勝了蔣介石，而且也戰勝了王明和史大林，因爲他走的是**獨立自主道路**，他以第二次革命中國共合作的前事爲鑑，不讓史大林再次出賣中國革命，他確實是懂得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去對付他心目中的一切敵人。

但這是後話，在一九三六年，王明和毛澤東對於統一戰線並無歧見，即使有，毛澤東也陽奉陰違。

最有教訓的一回事，毛澤東採用了托派革命民主鬥爭的策略和國民會議的口號，他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說：

> 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分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和製定憲法問題的冷淡，而集中力量於這一具體的帶着國防意義的國民大會運動和憲法運動，嚴厲地批判當權的國民黨，推動和督促國民黨放棄其一黨派一階級的獨裁，而執行人民的意見。今年的幾個月內，全國必須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這運動的當前目標，應當放在國民大會和憲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可是毛澤東不管如何採用了托派的策略，他總是一貫地反對托派的，他在瓦窰堡會議中，爲了杜塞托派及共產黨中來自左翼的批評，特別說：

> 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十分明顯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次基分子，才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
>
> 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何時轉變，應以是

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懷疑這一點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去轉變，如像過去某些同志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是不對的。

毛澤東說托派分子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才是「瞎說」，一九二七年以後，托派說資產階級已完成了反革命，但沒有解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由此提出革命的民主鬥爭與國民會議口號，反對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中共在三重冒險政策之下進行蘇維埃運動，到後來反而政治上投降了資產階級，如果毛澤東不違反史大林的意旨，「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當然祇能重蹈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覆轍， 聽憑資產階級的再次屠殺， 新四軍事件就是顯著的例子。

托派陳仲山致魯迅的信所指出的就是這個前途，事後證明毛澤東扭轉這個失敗的前途，王明成了「右」傾的機會主義者，歷史的諷刺是，毛澤東後來不得不承認他是個「不斷革命論者」。

關於轉變論，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有另一種說法，基本上也是符合托派戰畧的：

> 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這就使我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有可能經過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着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標誌着我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開始。……

劉少奇宣布：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長時期來就是用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按：指不斷革命論） 來指導革命

的，確是坦白而誠實的承認。

魯迅回答托派的信，並沒有正面回答陳仲山提出的論斷，只是用中共慣常的誣衊罵托派是「漢奸」，而且用勢利眼光夷落托洛次基的被逐，這都不合魯迅平素論人論事的準則。這封信雖然至今仍爲中共所利用，但如果我們認眞研究魯迅的言行，以他文學家的敏感，他確已見到托派陳仲山所指出的是事實，而且又以有病之身力加反對的。

一九二七年十月魯迅曾說：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是沒有革命的。這是國民黨的反革命取得勝利的時期，也就是瞿秋白進行盲動主義的時期。

一九三六年他死前說：

> 用筆和舌，將淪為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出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
> 『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為，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

這種話，幾乎都可替托派陳仲山的信作註解的。

× × ×

反托專家石中英先生雖說研讀魯迅致托派的信已有十餘次之多，但我認爲他仍是一無所得的，因爲他不從活的歷史事變去對證托派所指出的共產黨的錯誤，這錯誤經過毛澤東一系的勝利，已經被用「决議」的方式，批准了托派致魯迅的信所提出的指斥，是鐵一般無可改變的歷史事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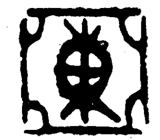
一九七四，十，四。

我不是一個「作家」，但在一九五八年讀了周揚一系對魯迅的誣衊，忍不住寫了「文學史家的僞造」爲魯迅辯誣。事隔八年，周揚被批判，落井下石的文章，無一不引用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這詩經一九四二年毛澤東解釋後，便成爲衆口一辭了。我認爲這解釋是不確的，我又寫了篇「魯迅詩的曲解」，在報上發表。故友曹聚仁兄對我說：這文章寫得很好，他完全同意，他就是這個意見。以後我陸續寫了關於魯迅的長篇和短篇，記得長篇在某雜誌發表時，編者稱我爲「魯迅專家」，但這頂高帽戴得並不太久，曾寫過「魯迅內傳」的李歐梵博士，說我的作品並無新意；另有一個讀者說已有了曹聚仁的「魯迅年譜」和「魯迅評傳」，我的作品是多餘。編者這時不再捧我做「魯迅專家」了，我察覺這個轉變，自動要求「腰斬」，並多謝編者好意，因爲他給我的稿費儘夠買糖食。不久，我的短篇和長篇的段落（因無法再以長篇形式發表了），又在別的雜誌出現，我對編者提出的條件，就是不要增減一字，編者都能遵守這個允約。但有兩篇的遭遇不妙，因爲編者乾脆給沒收了，最後在「左翼評論」上發表，這就是「魯迅與左聯關係的始終」和「魯迅與周揚的兩個口号之爭」。前一篇也曾投寄過「抖擻雙月刊」，來信極表歡迎，但過了半年不見刊登，我去信查詢，終於退了回來。碰壁的原因我知道，他們打探到了我是個異端分子，所以前恭而後倨。

這許多異端的文章中，我最愜意的是一篇「馮道、魯迅、章士釗」，並不是文章是自己的好，對於自命左派的犬儒主義者，我給予了一個重重的打擊，現在特意把這位先生的兩篇高論附在後面，供讀者參考。我又寫了「魯迅與毛澤東」、「魯迅與托洛次基」，讓那些藉魯迅之名進行反托大業的先生們看看，我寫的這些文章很具挑戰性，可惜石中英先生噤不作聲，現在他大概已成了四人帮餘孽，沒入黑暗中去了。但我仍期待有人寫文章反駁我，論爭沒有對手，確實使人寂寞。

另有一個異端分子李克曼先生，他是比利時人，說得一口好國語，他曾是中文大學的客座教授。有一天，他來沙田探訪我的兒子，我問他在研究什麼，他說在研究魯迅，他拿出一本雜誌「東南風」，說有人告訴他，研究魯迅一定要看一丁的文章，這可巧合，我告訴他，我就是一丁，於是大家說得很投契，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和他的研究相印証。他所寫有關中國的文章也很具挑戰性，但我們只是要說出眞相，不是要反對社會主義。在我，不管人家如何誣衊，我的一生可以証明這一點，我是天生的不是一個附和主義者。寫魯迅傳記和闡釋魯迅文章的人多的是，這些人的命運多麼奇特，馮雪峰、周揚、姚文元、石一歌，都是如此，他們本是「毛澤東思想」的不貳之臣。我願以一個異端者的資格，用魯迅自己的話來解釋魯迅，再重覆一句話，我的文章具有挑戰性，我很希望有人提出不同的論據來反駁我。

以一個不懂文學的人來寫這樣一本書，雖然僭妄，但我是充滿自信的。


東亞叢書

BIBLIOTHÈQUE ASIATIQUE